



追寻储安平

ZHUJIXUN  
CHUANPING

谢泳 程巢父 主编

广州出版社



ISBN 7-80592-825-8



9 787805 928258 >

ISBN 7-80592-825-8/G·150

定价: 19.80 元

ZHUIXUNCHUANJIANGPING

谢泳 程巢父主编

# 追寻储安平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向 君  
**封面设计** 谢成华  
**责任校对** 温俊伟

**书 名** 追寻储安平  
**主 编** 谢 泳 程巢父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印 刷**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  
(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  
**规 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87 千字 12 印张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92—825—8/G·150  
**定 价** 19.80 元

观察》与储安平/李伟 . 181

寻找储安平/邓加荣 . 114

民主杂志《观察》封闭前后/唐宝璋 . 206

回忆储安平先生/冯英子 . 161

父亲，你在哪里？/储望华 . 82

从《观察》到《新观察》/林元 . 208

我的同乡/徐铸成 . 111



### 追忆储安平

观察》周刊/张啸虎 . 203

储安平与《观察》周刊/王明星 . 203

储安平编《文学时代》/姜德明 . 171

“新月派”的后起之秀/陈子善 . 179

忆储安平教授/王火 . 181

我与储安平的交往/方成 . 198

观察》周刊/姜德明 . 171

观察》周刊/王明星 . 203

观察》周刊/王明星 . 203

观察》周刊/王明星 . 203

观察》周刊/王明星 . 203

观察》周刊/王明星 . 203

观察》周刊/王明星 . 203

观察》周刊/王明星 . 203

SBL69/02

94. 储安平和他的政论/谢泳
106. 四十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参政意识透视/徐思彦
120. 《观察》始末/谢泳
136. 关于“《观察》丛书”的情况/谢泳
140. 《观察》报告书的意义/谢泳
148. 《观察》撰稿人简况与分析/谢泳
152.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  
《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谢泳
158. 自由主义在战后中国的起落/汪荣祖
167. 《观察》的前身《客观》周刊/谢泳
171. 《新路》与《观察》/谢泳
179. 储安平的《英国与印度》/谢泳
181. 储安平与他的前辈/谢泳
184. 士气与正气/程巢父
198. 梁漱溟与储安平/谢泳
201. 钱钟书与储安平/谢泳
203. 储安平与胡乔木/谢泳
206. 储安平与方成/谢泳
208. 储安平与徐铸成的一段交往/谢泳
211. 储安平的编辑生涯/谢泳
214. 想起了储安平/谢泳

## 储安平政论



- 219. 自由与守法
- 223. 蒋主席的一篇新演说
- 230. 敬告马歇尔元帅
- 235. 杜鲁门声明中的三句话
- 240. 又是一年开头
- 244. 我对于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非政府代表的一个重要进言
- 247. 内战停止
- 249. 谈人力车的废止
- 251. 动荡的国民党
- 260. 失败的统治
- 265. 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 275. 大局浮动 学潮如火
- 281. 学生扯起义旗 历史正在创造
- 287. 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  
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
- 292. 读孙科谈话
- 298. 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 303. 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 311. 白报纸
- 316.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 324. 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
- 330. 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纸配给情形
- 339. 国大评论
- 350. 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 356. 评翁文灏内阁
- 362. 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
- 367. 一场烂污
- 370. 政治失常



## 父亲，你在哪里？

储望华

阅《传记文学》一九八九年五月号徐铸成及李韦的两篇文章，称储安平在“文革”中“曾到宜兴家乡徘徊”，后“由天津踉跄到塘沽，蹈海而死”。上述两位作者（与父亲均有乡谊），都说此消息是“听说”和“未有确证”。对于我——储安平的幼子——来说，这倒是前所未闻的“新情况”。读以上两篇文章，却勾起我对父亲的一些回忆，特别是在“文革”初期以及父亲“出走”前后的种种情形，愿意将这些零碎的材料写成文字，一方面公诸大众，同时藉以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怀念。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星期日）。那天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当时我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并住在教员宿舍中），循例每周末回到家中看望父亲。但见父亲身体虽健，精神却颇为颓丧。那一天我们之间话语不多，家中充溢着沉闷的空气。因为两人谁都不知道（或许亦可说都已有某种不祥的预感）这场“文革”将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何种厄运。记得父亲提到了他的朋友、历史学家吴晗（当时正被猛烈批判的“三家村”成员之一）。父亲说：“吴

啥的问题和我一样，本质上都是要在中国追求一条民主、自由的路，但都行不通。”因为在六月一日《人民日报》上已发表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父亲被划为“大右派”，当然是在必被“扫荡”之列。我当时心中感到无比的恐慌和忧愁。在这种心情下，我便与父亲告辞。我紧紧握着他微弱的双手，说：“爸爸，您多保重吧！”不料这竟是我们父子诀别的时刻！之后由于“文革”运动猛烈展开。我没有可能再回去看望他。到了七月间，我亦自身难保，被作为“埋藏在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揪了出来！

父亲“失踪”，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与作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的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经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踉踉离开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九月二十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

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

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寻获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验我是否和父亲“划清界限”。

一九六六年秋，“寻找”父亲的“失踪”毫无结果，到了两年之后的一九六八年夏，又一次来“调查”他的“下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这种“调查”，我是完全没有信心的。实质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

早在六十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饭走出来的路上，便说他经常有“想去自杀”的想法。我看得出来，自从五七年“反右”以后，虽然写过“检查”，虽经“被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是“错”，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犟”的个人性格，更因为他身上具有一些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况且活得又十分痛苦与艰难——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什么“培植蘑菇”工作。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和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我说：“屋子这么冷，你怎么能睡？”父亲说：“蘑菇繁殖，温度不能

太高。”我看到父亲在这种地方生活、劳动，心中感到非常难过。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情，反倒安慰我。我们二人之间当时沮丧的气氛，比这间屋子更令人窒息郁闷。我在想：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早年留学英国，只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而返回国家，追求民主与进步，最后在一九五七年，为了邀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经几次三番动员，统战部的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我父亲“去开会”、“去发言”，他便写了发言稿，发表了“党天下”的言论，于是便招来了杀身大祸和殃及后代的终生痛苦，便落得被放逐到这步田地，遭受到如此巨大的凌辱与苦难……

徐铸成文中写及父亲“由天津踉跄到塘沽，蹈海而死”。对此，我本人曾听说的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院角厨房边上一间小屋时，曾与被关押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话题。父亲“失踪”后，此人交代以上二人谈话内容，遂被置疑父亲有无可能孑然一身地到天津塘沽去“蹈海”或“偷渡”。在“文革”初期父亲“失踪”后的好几年当中，关于他行踪的各种消息，我是经常不断时有所闻。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则“煞有介事”。例如说父亲“目前正在山西省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说父亲“已被中宣部监护起来了”。虽然这些消息如同空穴来风，十分虚幻，当时我自己是宁可相信它们都是真的，希望父亲尚在人世。至于我自己在无数次梦中见到他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之后枕边的泪痕和一次又一次的幻灭。

到了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那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待向送行的朋友们告别之后，正坐进汽车准备前往飞机场的时候，忽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

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父亲“失踪”十六年之后，在全国范围上上下下几度“调查”无结果之后，而在我即将离别这多灾多难的故土的瞬间，竟以获得父亲的“死”讯，来为我离国壮行送别，心中猛然泛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慨与伤痛。……

为了怀念父亲，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Autumn Cry)。今年，在纪念父亲诞辰八十周年的日子里，这部音乐作品已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正如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所述，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一九六六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父亲，你可曾听见这悲怆的乐曲，浓郁密集的和声，以及深沉的管弦之声，在为你悲鸣，在为你哭泣，在向你呼喊——父亲，你在哪里？

1989年6月27日

于澳洲墨尔本市

补记：徐铸成文中写道，父亲储安平“去新疆旅游时，又和一位少数民族姑娘结婚，结束了近二十年的鳏居生活”，这也是一种得自“听说”的传闻。事实是：一九五六年父亲在鳏居十四年之后，与一位原籍上海的易××女士结婚。他们共同生活了仅四年。随着父亲名声、地位的丧失而离异。据说后来她又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并已移居美国纽约。我在一九八六年底旅纽时，曾试图打电话向她致候，但未果。

## 回忆储安平先生

冯英子

大概是三四年前，我写过一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寄给储安平曾经工作过的报社，过了几月，杳无音讯，于是我给总编辑先生写了封信，问他是不能登、不想登还是别的原因。过了几天，总编辑先生把稿子退还给我，没有写一个字，这是不表态的表态，我当然懂得。后来，有一位朋友见义勇为，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同储安平有点关系的一家杂志，可是也是石沉大海。做了几十年的“右派”，受尽折磨之后，谁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可是连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也难于刊出，则是出乎想像之外的。

为什么不能用，不愿提一提储安平呢？我自然也心照不宣。鲁迅先生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既然不能纪念他，我也只能把储安平设法忘却了。我同储安平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交情，只是彼此踽踽独行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交叉点上碰在一起罢了。我们一起办过报，一起写过文章，可是仅仅这么一点，要忘却他也不容易，他的声音笑貌，好像经常在我眼前，不把它写出来，也好像欠了他一笔债未曾还清

一样。前几天，铸成同志介绍储安平的侄女来找我，说要收集一些储安平的资料，为他写一传记，这倒引起了重新写一篇怀念安平文章的欲望，即使是一鳞半爪吧，也算为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录。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我在湖南晃县办一张《中国晨报》。晃县是黔湘边境的一个小县，照现在说法是一个穷山沟。可是就在报纸出版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进攻。晃县的边上是芷江，那是美国航空队的基地，每次轰炸日本，都由芷江出发。日军的攻击矛头对着贵州，我怕他把攻略芷江作为目标，倘芷江一失，晃县自亦难保，因此我们决定把报纸搬到辰谿出版。

《中国晨报》的社长叫李宗理，这是一位湖南大学的学生，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做了几年税务局长，发了财，投资办报。他也听说储安平能办报。那时安平在蓝田师院教书，李通过关系，把储重金礼聘来《中国晨报》作主笔。到我们在辰谿出版的时候，储果然应聘来了。他是宜兴人，储南强的侄子，皮肤白皙，长身玉立，一副秀里秀气的知识分子的腔调，温文尔雅之至。那时他已与端木露茜离了婚，身边带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中国晨报》的编辑部设在铜湾溪，而营业部则在辰谿的街上，从铜湾溪去辰谿，隔着一条辰水，辰水上没有桥，靠小划子摆渡，上坡下坡，上船下船，安平都背着他的孩子，父亲而兼母亲，生活非常艰苦。有时我们觉得他很累，帮他背背孩子，他总含笑谢绝。我们发现他有一股坚忍之气，有时也觉得他有一种涯岸自高的知识分子的傲气。

我们铜湾溪的房子是一排沿坡而筑的两层楼的木屋，底层做排字房和机器房，楼上则是一间间的小屋，每人一间，屋中的家具完全竹制，竹床竹凳，安平与我贴邻而居，有时就互相

串串房，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中国晨报》在辰谿是五月份出版的。一九四五年五月，正是欧战急转直下，希特勒自杀，纳粹德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了，储安平为《中国晨报》写的第一篇社论，即是谈的此事。他在分析了欧战形势之后，对于希特勒的死显出不胜惋惜之意，认为希特勒也是“一代人杰”。我拿到这篇社论，很伤脑筋，发呢，不同意他这一论点，不发呢，他是重金礼聘来的主笔，岂有第一篇社论就碰壁之理，同副社长严怪愚商量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发这篇社论，第二天我再写一篇社论，以否定他的“一代人杰”的论点。

安平的作品，通晓扎实，说理明晰，逻辑思维很强，但常有他自己独特的意见，为他人所不及。那时《中国晨报》能执笔写社论者，有吴希之、姚家积、黄达三、严怪愚等人。吴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识见高超；姚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文笔精美；黄、严均为湖南大学的同学，在湖南以文名著称。然而安平落落寡合，倒是同我还谈得比较协调，他不想留在湖南这个山城里，想去重庆创一番事业，他一再建议和我合作，去重庆办一份晚报，他负责评论、编辑部，我负责经理、采访部。非常清楚，他认为我还可以做他的副手，余子碌碌，不足道矣。我当然不会离开《中国晨报》，因此这样的煮酒论英雄，也只是论论罢了，并无什么结果。

安平在《中国晨报》只搞了三个月左右，即带了儿子去重庆，他在重庆得张稚琴的支持，办了一个《客观》周刊。但那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晨报》决定迁汉口出版，我先期到了上海去采办设备，而由黄达三带报社同人到汉口。《中国晨报》在辰谿被国民党政府当作湘西的新华日报。湘西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李宗理又是暴



发的“财主”，有钱好使鬼推磨。但迁去汉口，当然不是这个形势了，我当时设想是不管如何先在汉口出了再说，因为只要能出版，其他问题就好办。但李宗理毕竟是个官，他想到了向国民党中宣部申请，要安平去向国民党中宣部联系，申请《中国晨报》迁武汉出版。这申请却出了毛病，国民党中宣部当然不同意这个湘西的新华日报迁到武汉去出版，而李宗理这时则别有意图，也就顺水推舟，赖在长沙不走了。这就导致后来《中国晨报》的关门，我当时认为安平替李宗理去请示中宣部，太书生气，看来这一点书生气，正是他后来的致命之由。

《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同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份《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一九四六年，我回到了江南，先在南京工作了一个时候，后来回到了苏州，在《大江南报》挂了一个社长的名，也在上海民治新专教一点课，经常往返于苏沪之间。这时安平的《观察》办得很有声色，在当时死气沉沉的上海杂志界大出风头，它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大失民心的作为，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弊政，以敢言著称，极受知识界的好评。到一九四八年时，《观察》的声望已到了它的高峰，储安平这个名字，在上海也非常响亮。他那些干净利落，情文并茂的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

那一年我的《大江南报》已被封门，安平有一次忽然写信给我，约我到《观察》去作经理，他的信中开列了一系列条件：一、给我以教授待遇；二、如果我同意住亭子间，可一个人住一间，倘住前楼，两个人合住一间；三、每周工作六天，一天休息。大概还有几条，我已记不起来了。其实我那时正想和王造时合作，办一名叫《自由》的刊物，由我主编。如果去

了《观察》，就不好办《自由》了，而且事实上我也不大想去干经理这一行，因此没有马上给他回信。

不料过了几天，储安平自己到苏州来了。那时苏州苏纶纱厂的老板严欣淇在西美巷办了一个“裕社”，用以交结、拉拢各方面的人物，储也住在“裕社”。他到诗巷我家来看我，我们回顾了湖南时的工作，他又一次希望我和他合作，他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回信，是不是因为条件说得太具体了，有损我的尊严。他说他因受在英国留学的影响，做事也像英国人那样，把条件讲得非常清楚，要我原谅。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只是如实告诉他我与王造时的计划，打消了他和我合作的希望。

一九四八年的下半年，军事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利，社会上物价飞涨，各地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日益澎湃。这时《观察》的言论也日益为国民党政府所不满，对它的压力与日俱增。那时我也因《大江南报》被封之后，苏州地方当局对我也不很放心，他们用各种方法造我谣言，最方便的当然说我是共产党，故我也不常住苏州，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打溜，这里住一天，那里住一天，张稚琴家中的客厅，则常常是我“行宫”。有一天在路上碰到储安平，他约我到他住处去作长谈。

那时他住在八仙桥青年会的宿舍里，他同我谈了《观察》当时的处境，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当时建议他：如果维持现在的立场，出一期算一期，能拖下去最好；倘要改变立场，则不如停刊，以待将来复刊。这个“将来”，大家是心照不宣的。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认为他撑下去已经相当困难，是不是可由我去接替他，支持下去。我因当时已决定去香港，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据我所知，后来他是请了笄移今同志来支持下去

的。

一九五三年秋，我结束了香港《周末报》的事务，调上海工作。从广州到上海的旅途中，我特别去北京绕了一下。那时安平在出版总署作出版局局长，开始做官了。我去出版总署找他，发现他穿了制服，有如临风玉树，一表人材，人也微微发胖了，不复是在辰谿时的憔悴。那时解放不久，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告诉我已经重新结婚，欢迎我到他家中去玩。很抱歉，我没有到他府上去，只是后来在奇珍阁的一次宴会上，看到安平和他的新婚夫人，年轻、漂亮，两个人在一起，正是一对璧人。

五十年代我都在上海。安平去《光明日报》之后，来过一次上海，他找人谈办报理想，找人写文章，是想大有作为的。有一次问我怎样办好《光明日报》，我哪里谈得出来，但答应他可以写点零零碎碎的文章。其实那一次倒是我与安平的最后一次见面，因为不久之后，他就一跤摔了下来，成为全国最“顽固”的“右派”了。

“反右”前后那一阵子，我在《新闻日报》做夜班。有一天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稿子，就是储安平关于大和尚小和尚的发言，我一读全文，发现此君又如在《中国晨报》写社论一样，抒发他的独特意见了，编辑们大家叫好，我不同意放在一版。把它放在三版下角登了，第二天《文汇报》是一版头条，《解放日报》也放在一版。我一下变成编辑部围攻的对象，贴报栏上贴满了责问我的大字报。傍晚举行的编前会议上，好几位同事对我大张挞伐，要我说明为什么不把储安平的文章放在一版？那时我当然还没有听到过“引蛇出洞”这样的“名论”，只是凭我对储的理解处理，可是我能解释些什么呢？后来反右一开始，储的那篇文章竟成他“反党”的铁证，这倒出我始料

之外。

储安平变成了“右派”，而且据说是“死不悔改”的右派。储安平对于办报有他的理想，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于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但是他毕竟是个书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怎么会允许有一家《泰晤士报》呢。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他踌躇满志之时，他以为从此可以振翅高飞，直上重霄了。其实，那抛物线到了顶端，也就是开始下降之时，人们更没想到，他的腾达仅仅是昙花一现，马上枯萎了。从他被划为“右派”之后，我先是听说他被送到新疆去改造，后来又听说他从新疆跑掉了，最后又听说他到青岛投海自杀了，人言言殊，谁也弄不清楚。一直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右派”绝大多数已经改正，却始终听不到储安平的消息，我这样想到，他是凶多吉少，活在世上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

安平对于新闻工作有着特殊的爱好，也特别喜欢跑政治新闻。记得他有一次同我谈起，他认为一个记者要有一支笔，一只照相机，一辆汽车。他认为有了汽车，可以交结许多重要的人物，得到许多独门消息。那时我们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山沟中办报，而前线的消息也不那么美妙，大局如何，很难预见，但他却想得很远，为战后的工作勾出一幅蓝图，这也说明了他对新闻工作的执著和信心。然而谁想得到，他不是倒于新闻工作的岗位上，却倒于一次政治运动中，“引蛇出洞”，这条蛇，终于成为祭台上的牺牲品了。我听到安平跳海的传闻之后，不宁者几日，像这样一位同志，如果不是过早地陨落，他是可能对新闻工作作出更多贡献的。

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总以

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横溢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之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职，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这篇短短的文章，竟然断断续续地写了几天，前半段写于上海，后半段成于北京。一九八七年的元旦，北京大雪纷飞，全市银妆素裹，一派和平景象。过去的历史过去了，但愿消逝的历史，在人间永不再现。

1987年元旦于北京

## 储安平编《文学时代》

姜德明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一起，储安平在北京便神秘地失踪了。“革命派”诬他叛逃到国外，上面派人查了几年也无下落，就此不了了之。于是这位名噪一时的《观察》杂志主编、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声灭迹了。

现在已经有人为他写出了小传，替他鸣不平。估计将会有更多的读者开始认识这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编辑，并同情他的遭遇。笔者也是在最近读了载于今年第一期《东方纪事》的《储安平》以后，才知道当年他先是在青龙桥投河自杀未遂，接着又跳海自沉。然而他究竟是在哪一天，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投的海也仍然是个谜。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在上海创办的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观察》，在知识界影响很大。储安平表现出他的编辑才能。应该说这是他一生最活跃的时期。一边编刊物，一边写文章，同时还编了一套“观察丛书”，总的倾向是进步的。最后惹恼了国民党，下令查封了这个刊物。全国解放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观察》一度复刊，不久又改办为《新观察》，可叹

的是他竟被驱之一旁，无人理睬。一九五七年又动员他发言，终于被打成顽固的“右派”。他算尝够了人间冷暖。

储安平生于一九〇九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参加过新月派的一些活动，编过《中央日报》的副刊，创作过小说，并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说谎者》。这本小说收了他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作品，说明他年纪虽轻，对于社会的观察还是比较深入的。他的这些写作和编辑工作活动，都为他后来出色地主编《观察》杂志作了多方面的准备。现在，如果我们要来研究储安平先生的编辑生涯，或了解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经历，我们不能不提到在抗战以前，他还曾经主编过一本文学月刊《文学时代》。可惜知道这件事的人太少了，似乎也从来没有人讲起过。

《文学时代》的开本类似当时的《译文》和《作家》那样大小，封面是黄色的，没有任何装饰，封面中间是本期作品目录。它创刊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刷发行。这个公司是邵洵美办的，当时号称发行七大杂志，除《文学时代》外，还有《时代漫画》（鲁少飞编）、《时代电影》（包可华编）、《论语》（陶亢德编）等。《文学时代》创刊号没有发表发刊词，从征稿简则里也看不出刊物的主张，只有储安平写的“编辑后记”里，多少透露了办刊宗旨。他说：“我们想出一个文艺刊物的理由十分简单，无非想借此使自己在写作上加上一根鞭策的绳索。”那时储安平正热衷于文艺活动，原计划这份刊物由第一出版社出版，拖延近半年方由时代图书公司接手。显然这与邵洵美当时的兴趣不无关系。尽管储安平一再声明不愿发表办刊宣言，而且认为一个刊物的内容，就是这个刊物的最真切的宣言，但是从他在“编辑后记”里的一段话中，仍可看出编者的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他说：“我们并没

有这种企图，想使读者从这一个刊物里看到有任何一种集体的流动——不管是感情的或者是理性的。我们都尊重思想上的自由。我们容许每一个在本刊上写稿的人，有他自己在文艺上的立场与见解，除了对文艺的本身忠实的这一点之外，我们没有更大的苛求。”提倡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文艺，这是符合储安平一贯立场的。当然他的忠实于文艺的思想，也包含了尊重事实和尊重实际的思想。这也是他办刊物的方针。《文学时代》的封面上公开标榜这是一本“纯文艺”月刊，不想让有政治色彩的社团来干扰刊物。那么他能办到这一点吗？文艺又怎么能纯到毫无政治色彩呢。在储安平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他既然说了就一定要贯彻。我们从储安平编的六期刊物来考查，他所团结的作者确实相当广泛。证明他的许诺并非虚言。不过话虽这么说，圈子还是有的，思想上的好恶也不可能在刊物上毫无反映。创刊号上女作家方令孺就透露：“安平立意邀集文章趣味相同的朋友们创办一种杂志。我想在这内外紧逼的年头，像不祥的云雾包围我们四周，能借文章来抒写心中的郁气，也算得泪眼中的微笑吧。”这“趣味相同”的标准当然也很宽泛，至少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吧。比如《文学时代》里切中时弊的社会言论就不见，注重的还是纯学术的研究。有什么样思想的编者就会编出什么样的刊物来，这是不言而喻的。那时储安平刚出校门不久，才二十六岁吧，气魄已经不小了，他的愿望是善良的，刊物的格调也不低，今天我们不能苛求于他。

看创刊号的作者，便足以反映出编者联系作者的广泛。如老舍先生写来论文《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介绍了作家康拉得的成就，以及自己在创作上怎样受到这位波兰作家的影响。张天翼发表了小说《中秋》，反映了农村生活的



破败。此外还有陈铨的小说《政变》，林庚的散文《今年的秋》，以及陈梦家、孙毓棠等人的诗作。以后各期的作者又有王统照、余上沅、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袁昌英、凌叔华、臧克家、梁宗岱、李长之、季羨林、林如稷、杨丙辰、赵家璧、罗洪等人。从这个名单，的确看不出这刊物属于一个什么派别或集团，甚至连编者同新月派的历史痕迹表现得也不太明显。臧克家的诗是写农村的灾难的，他在《文学时代》第三期上发表了诗《水灾》。那时他已经开始写小说了，第四期便发表了他的《义务打杂》。田汉的两个独幕剧《号角》和《黎明之前》分别发表在第三、六期上，剧中人有些就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物，剧本的内容都反映了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张天翼还发表了小说《蛇太爷的失败》。储安平也在第四期刊物上发表了《一只朱古律糖匣子的身世》，小说寓有讽世之意，写法颇生动。总的看来，刊物比较重视艺术技巧的追求，尤其在诗歌方面更是如此。所以整个刊物尽管有内容进步的作品，但生活天地仍显得狭小些。这样的刊物它所能联系的读者当然就有限了。

《文学时代》并不是储安平第一次编辑的文学刊物，早在一九三一年，他二十一岁那年还曾编了一个刚一问世便夭折了的文艺杂志。此事见于储安平在发表方玮德一首遗诗时所加的注言，他说：“玮德这首诗是他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寄我的。那时我们几个朋友正打算出版一个小刊物。这首诗曾经编入了那个小刊物的第一期上。但那个小刊物虽然印好了第一期，因为别的缘故，仍旧没有搬上市场正式出版。”从编《文学时代》到编《观察》，这十年当中储安平又经历了严酷的民族矛盾斗争，对于社会实际生活的接触更多了，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印象更深，因此一旦遇到国民党政府加紧反民主，进

一步实行独裁专制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编辑《观察》时所表现出的锋芒是令人瞩目的，他变得逐渐激进起来。

当《文学时代》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出版第六期的时候，卷首便刊出储安平的一则启事，上面说：“敬启者，鄙人拟作远行，本刊事务未能兼顾，现已向上海时代图书公司辞去本刊编辑之职，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本刊编辑事务当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另请他人继续负责。此启，储安平谨拜。”稍后，储安平便到了英国，在域外生活了几年。这大概就是放弃编辑《文学时代》的主要原因。但是，即使他不出国，恐怕刊物的命运也不会长久，须知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要想维持一本格调正派的纯文艺刊物又谈何容易。请看储安平在卷后的“告别辞”里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维持的。我们虽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诉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储安平一去，《文学时代》便告结束，没有别人再来接办过这个刊物，恰好出满了一卷。同时他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再关心文艺了。五十年代初，《观察》停刊以后，他也不能在新的环境下施展他那编辑杂志的才能。他变得沉默了。待他被打成“右派”以后，不仅是沉默，他任何人也不愿见。所以梁漱溟先生在六十年代去访他，连续多次叩门，他故意听而不闻，更不用说应声去开门了。

## “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陈子善

作为一位政治家，储安平在一九五七年的不幸遭遇现在已大白于天下，但他早年的文学生涯还鲜为人知。一九二八年秋，储安平考入光华大学政治系。也许是自幼喜爱文学，也许是为当时正在光华执教的徐志摩的个人魅力所吸引。他在求学期间和毕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钟情文学，比他晚一届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穆时英在《光华文人志》中说“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他在《语丝》、《真美善》、《新月》和《文艺月刊》发表作品，接着又出版短篇小说集《说谎者》和随笔集《给弟弟们的信》，还先后主编《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和《文学时代》月刊。在当时文坛上十分活跃。直到一九三六年初负笈英伦之后，储安平才逐渐疏远文学，踏上了书生议政的不归路。

储安平被看作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十四年前，梁实秋与叶公超在台湾主编《新月散文选》（雕龙出版社），就选入储安平在《新月》上发表的《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等三篇作品，徐志摩和梁实秋这两位公认的“新月派”散文大家也不过

各入选四篇，可见编者对储安平的散文颇为推重。《小病》（载一九三〇年《真美善》六卷六期）、《幸福》（载一九三〇年开明书店初版《给弟弟们的信》）和《记田汉先生》（载一九三五年《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三十八期）是新发现的储安平散文佚作，大致显示了储安平早期散文的个性特色，前二篇是抒情和说理的有机结合，后一篇则是一幅生动的人物素描，从中可以窥见储安平当时的人生追求和审美情趣。梁实秋认为“‘新月’的散文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五十年前有一伙人所写的散文就是这个样子”。（《新月散文选》序）储安平“这个样子”的散文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不也仍然值得一读？

1994年6月

## 《观察》与储安平

李 伟

也许是陶醉在抗战胜利中，或者是忙于“接收”无暇顾及，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一九四六年出现进步刊物争相出版的局面。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丛刊形式出版《文萃》，唐弢与柯灵先生合办《周报》，黄炎培先生办了《展望》，《时与文》不知何方所办，就中还有一本颇引人注目的《观察》周刊，为储安平所主办。

从形式到内容，《观察》都与众不同。《观察》不是几套色的封面，非常朴素，中上方是一枚以掷铁饼的健者为图形的刊徽，四周是一排英文字，译意是“观察”和“独立的、非党派的”，下面正中地位是方方正正的“观察”二字，横线下就是直排的文章题目（封面就是目录页），再一条横线下面就是特约撰稿人的名字，都是学者名流，诸如下之琳、吴世昌、李纯青、宗白华、胡适、马寅初、曹禺、梁实秋、傅斯年、傅雷、杨绛等。这些名字每期都出现。

《观察》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八字为标榜，每

期都有抨击国民党政府而且是赤膊上阵的文章。在郁闷的时局下，这自然赢得许多读者。特别是每期都有的军事通讯，预言战局的发展，几乎是言都必中，这就更吸引众多的读者了。

据说《观察》创刊时，只发行八千份，后来扶摇直上，竟增到十万份左右。一个周刊，在那时候能有如此多的数量，近乎奇迹。就中，我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从一九四六年九月的创刊号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被勒令停刊，一整套的《观察》，我本珍藏着，直到一九六六年才被席卷一空，不知所终。

《观察》的那些文章，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储安平写的《一场烂污》。这是一篇爆炸性的文章。一九四八年“八·一九”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同时实行限价政策，不久放弃限价，宣告失败。储安平似乎不计个人利害，秉笔直书：“这是二十年来这一个政府第一次在人民面前低头的一个记录！在这二十年中，这一个政府，凭借他的武力，凭借他的组织，凭借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的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终于屈服了一次！”文章的篇末竟是怒骂：“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烂污！”能写这样的文章，把个人的身家性命都泼出来，在当时储安平不是唯一也是极少数中的一个！

储安平为人耿介直率，不计个人恩怨，这从另一件轶事可以说明。《观察》初创办时，储安平曾致函《文汇报》总编徐铸成，请他任特约撰稿。徐当时“有点左倾幼稚病”（《八十自述》），不作答复。后来，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文汇”与“新民”、“联合”三报被国民党查封。当时的舆论界或缄默不言，或轻描淡写不置可否，敢于向当局抗议，站出来说话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外国人，《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

(Powell)，另一个就是储安平。尽管储安平与徐铸成小有芥蒂，但他批评《大公报》的幸灾乐祸，坦率表明：“当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凶吉安危了。”现在重读这几句话，还感到凛然有正气！

说到储安平，不仅有同乡之谊，还沾亲带故。我的祖母出自储姓，每逢我家有喜庆等大事，都请他的大伯父储南强先生（清末南通知县）。但储安平本人我仅见过他一面，那是在宜兴，未及谈话，当时我毕竟是晚辈。

人生多故。解放后，储安平先是上宾，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头衔一大串。一九五七年一到，一下成了“大右派”。再逢上“史无前例”的“文革”，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先在北京青龙桥附近跳了河，水太浅，死不成。过些日子，他再一次失踪了，在人世间再没有出现。那个阴险毒辣的康生说：“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故乡宜兴曾有过一则无从查考的传闻。储安平的踪迹曾出现在宜兴与长兴交界的茗岭（属宜兴）山中，那是闻名的竹海。储安平怎么到这里，是在他失踪前，还是失踪后？找不到回答。真个是“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1994年4月

## 忆储安平教授

王 火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储安平教授比我大十五岁。按此推论，他生于一九〇九年该是没有错的。如果他仍在人世，今年（一九九五）该是八十六岁高龄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是教授，我是学生。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上半年。他所创办并主编的《观察》周刊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他在新闻系开一门课，名为“报刊评论写作”，与“中文新闻写作”及“英文新闻写作”同属于必修课。当时大学实行学分制，这门课占两个学分。我同系同班的同学读这门课的不少，大都是慕名求学的。

那年，储教授应是三十八岁。他身材修长，约有一米七七至七八的个子，爱穿长袍，或灰或蓝，脚穿黑皮鞋，提一只鼓鼓囊囊的黑牛皮大公事皮包匆匆走来上课，走路姿势潇洒有神，丰满略胖的脸很年轻，冬天时面部肤色常冻得白里泛红，总是带着笑容一边将黑色大皮包放在桌上，一边从皮包里往外拿讲课提纲和大家写的评论作业，一边说：“好！上课！”他是江苏宜兴人，说的普通话尾音略带乡音。那时听说他抗战前在



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在“新月派”刊物上常写文章，到南京《中央日报》编过副刊，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去的时间大约两年。抗战爆发时他尚在英国，回国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任教授，教文学与写作方面的课，并给《中央日报》写社论。后来，又听说储教授在广西桂林和湖南给些不太出名的报纸做过主笔，以后并在重庆创办过一个杂志，是周刊，名叫《客观》，只是这杂志影响不大，命也不长。他的辉煌年代该是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到上海才开始的。在上海他创办了《观察》周刊，自任社长兼主编，当时《观察》引起读者注意和重视，较为畅销，储教授又在复旦新闻系任教，他的名字在知识界、文化界的影响面也就扩大了。

复旦新闻系的同学们当时大部分都是思想进步的，在思想进步的学生看来，储教授过去在《中央日报》干过，在报人中可能是属于右的方面，但显然也感到储教授的思想是在起变化，由右在转化为中间偏左。比如他办《客观》杂志，取名《客观》，显然已带有想不偏不倚在中间的味道；而《观察》的创办，从名字到内容也不像右的刊物，而是中间刊物。《观察》这本刊物，储教授不讲究装潢漂亮和纸张精美，封面的设计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用黑体字排列的特约撰稿人名单。这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教授、名流。而从这一大批特约撰稿人的名字看，左、中、右都有，但绝大部分是左和中的。仅胡适等极少数是右的。因此也有人说，《观察》起初的主旨是走第三条道路宣扬中间路线，只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观察》的态度后来渐渐向左向进步的方向转变。《观察》最受读者欢迎的是每期那两三篇甚至一篇有分量的“帽子文章”（放在刊物最前面的文章）以及它的各地通讯和读者投书。帽子文章都

出自名家之手，一般都能针对时局言之有物，吸引读者注意，认为可读和必读。各地通讯中的军事通讯较真实及时地报道战况为人所乐见，一些各地动态则也为关心国内大势的读者所爱看。储教授态度起醒目变化的是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当时上海及一些大城市学运蓬勃。在学运高潮中，他亲自写了旗帜鲜明的长文——《学生高举义旗，历史正在创造》放在那期《观察》的头一篇作为帽子文章发表，当时颇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震动。文章是很有影响的，那期刊物迅即售完，听说又加印了许多，也很快售罄。而在复旦大学里，储教授态度的变化也在进步学生中引起了好的反响。

储教授给我们上“报刊评论写作”课时，除了讲授报刊评论之重要性和应当如何写评论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我们实践来取得认识和进步，也就是经常要我们练习写评论，由他命题作文。他不时将一些报刊上的社论、评论，包括《观察》上的论文，作为范例讲一讲他的体会，或综合评述一下习作中存在的优缺点；有时也将我们同学中他认为优秀的评论文章让大家当堂传阅。他对大家写的评论，并不在纸上进行批改，却有时采取同每个人进行个别谈话的方式对评论的优缺点进行讲评。他讲课时的内容，时隔这么多年，基本我已忘却，但有一些是牢记难忘的。那就是有一次讲课时，他强调了写文章必需“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本是杜甫的一首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的句子：“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话原是杜甫这位大诗人写诗的体会。储教授借用来指导我们：写评论时如要出色动人，必需要有惊人的佳句，不能平淡无奇，不能用人家用滥了的意思和文句来写评论。记得他同我个别交谈我的评论文的优缺点也仅一次，但因为是个别交谈，印象就较深。我记得谈话时，他仍强调了“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观点。此

外，他谈过论文应有长期存在的生命力，这要依靠学识，但评论既是评，还应有较强的时间性和针对性。他说他办《观察》和《客观》都是周刊，就是为了能及时评点国事，及时反映时局。

在听储教授讲课阶段，我同他的接触不多。原因是他非常忙，每每匆匆来校上课，下课后又匆匆走了。那时他的主要精力看来是用于办《观察》。他也不喜欢主动与学生们接近，对学生的态度是很客气的，但并不很热情，有距离。有同学说他“恃才傲物”，是否如此，不太了解。但就在他同我面谈评论文的那次，我们坐得很近，促膝交谈时，我感到：远看上去，他显得健康年轻，头发黑黑的梳得整齐，但坐近了，却发现他的脸色有点憔悴，头发里也夹杂有极少数的初生白发，而且他站立时，肚子已微微凸出，显然是年近四十平时坐着工作的时间太多，开始有大腹便便的姿态了。

同班同学张啸虎，是储教授很欣赏的学生。啸虎善写骈俪华章，文采斐然，学生时代，就常在《大公报》、《观察》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他因经济困难，又想得一实习机会，大约在一九四八年春就到《观察》杂志做助理编辑，半工半读去了。啸虎与我同住德斋宿舍二楼，他的房间与我对门。有时，晚上他会到我的寝室聊天。从他那里，得知储教授与姓端木的夫人离异后，独自一人生活，住在八仙桥青年会宿舍，在生活上既节约又简单。他家庭生活不顺心，但事业心极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观察》上，他是社长兼主编，所谓《观察》杂志社，实际办公室在虹口狄思威路附近的一间简陋破旧的平房里，拥挤不堪，全社一共仅数人。我在一篇悼念啸虎的文章《名山事业自千秋——学者张啸虎与〈中国政论文学史稿〉》一文（载《读书人报》）中曾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写到储教授：“啸虎一九

四八年在四年级时，被储安平教授邀到他办的《观察》编辑部工作，工作重，人手少，储教授要求高，待遇苛刻。我有一次途经虹口到那简陋狭小的编辑部里去，只见啸虎埋在稿堆中低头孜孜改稿，大热天，穿件破背心汗流浹背，心无二用，只是满面歉意说：“没法留你坐，这稿储先生急等我改出来！”这确是当时实况的写照，那天，储教授也在一张桌前坐着动笔，见到我，我叫了他一声“储先生”，他点点头，仍在忙他的，看得出他工作的全神贯注。我怕影响他们工作也马上走了。啸虎约是这年夏秋之际离开《观察》去《大公报》的，他觉得《观察》这段生活，对他提高业务能力还是颇有帮助的，我在文中说储教授“要求高，待遇苛刻”，并无不敬老师的意思，储教授对自己做事的要求也是严格的，给自己的待遇也是不高的。那时听啸虎说：储教授里里外外地忙，劳累得很，从社务管理到策划选题，组稿审稿和编改稿件，每期刊物的封面和排版，直至印刷校对、发行推广，甚至开付稿费，事无巨细，莫不事必躬亲，是个精明强干的人。《观察》开初创办时，发行数仅数百份，后来增长到几万份，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当局查封前，发行份数竟逾十万份，当时刊物印数达到这数字是惊人的。《观察》在上海和蒋管区各地确成了一本大有影响的刊物。

一九四八年春，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那时，我已即将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带实习性质地在南京作为记者采访。有一天开会时，在“国民大会堂”的二楼上，看到储教授坐在那儿的记者席上，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颇有绅士风度。二楼上的人稀稀落落不太多，我就走到他座位旁，叫了他一声：“储先生！”他客气地起来招呼握手。那次“国大”开得乌烟瘴气，会场外，有的

须退出“国大代表”资格的国民党员在绝食抗议，有的人抬了一口棺材在会场门口吵闹，硬要闯进会场。会场内，开会时常常闹得不可开交。为竞选“副总统”，也吵得熙熙攘攘。我坐到储教授身旁，笑着说：“储先生，您是代表《观察》在这里‘观察’？”他笑了，点头说：“我来亲自看看！”那天谈了些什么，已忘了，我陪他坐了一会，就同他告别。事后，好像是南京《新民报》上登的“国民大会花絮”中有一条：《观察》主编储安平来开会时坐在二楼记者席上“观察”的报道。写花絮的记者想法与我不约而同，所以至今仍留有印象，而那时出版的《观察》上，我确看到有文章报道了伪国大开会及“竞选副总统”的混战情况。

《观察》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被查封的。听说储教授去了北京，幸运地逃脱了逮捕。我再见到他时，大约是一九五三年春天，那时我由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一天，在热闹的王府井大街上突然遇见了储教授。他好像是从新华书店出来，手里还拿着些书，仍然是头发梳得很整齐，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微微含笑，穿的是一套蓝色的当时流行的朴素的干部服，仍提着个黑色牛皮公事包。好几年不见，我上前叫了一声“储先生”，互相握手寒暄。他显得热情，问了我的近况。我知道那时《观察》已改组成《新观察》，他已离开杂志在新闻出版总署任发行局副局长，并是新华书店总店的副总经理。他要我有空去找他。不久，他当选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此后，我在北京连续工作九年，却未再见过他。一方面，因为工作繁忙，而且我不善于跑上层，即使对老师也如此，怕人家忙，无事总不想去打扰别人。二是一九五七年春，储教授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鸣放中他一语“惊人”地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放出了“党天下”的

言论（原标题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引起了全国报纸的讨伐，后来在全国人代会上他做了长达四千余字的《向人民投降》的发言，再后，他就销声匿迹了！

他怎么了？许多年都不知道。到一九六一年，我所在的单位《中国工人》杂志社被“撤庙搬神”，我去了山东，这就更不知他在何处了。他曾是向我授业的老师，我对老师总是关心的，“文革”后向人打听，才知他一九五七年后，曾到北京西山农场里劳动改造，后来住在厂桥棉花胡同，处境可怜，每月拿点生活费，读书写字，没工作干。“文革”开始，红卫兵把他作为专政对象，批斗侮辱，逼他扫街，在一九六六年秋天时，有一天，他曾跑到数十里外的西郊青龙桥去跳河自杀。不料水浅未遂，深夜就被红卫兵又揪回城里，但接着，他就失踪了。据说公安机关曾寻找过，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储教授为什么要远远跑到青龙桥去自杀？这青龙桥，一九二二年冰心曾写过著名的散文《到青龙桥去》。后来，一九五九年她又写过《再到青龙桥去》，一九六三年再写了《三到青龙桥》，储教授是抱着对青龙桥和对古长城的向往与感慨去的吗？

谁知道，谁能说呢？

反正从那时他就消失了！成了一个谜！他有女儿，在哪里也不知道了！听到过一种传说，说他仍活着，在江苏某处寺庙里隐姓埋名青灯红鱼做了和尚！这倒颇像写小说的人笔下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我不信！

## 我与储安平の交往

方 成

我和储安平有过一段交往，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事。

我一九四二年毕业，到王通桥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助理研究员，干了四年。一九四六年我想改行去画漫画，便辞职去上海，那时我二十八岁。先在《西风》发表作品，后经《西风》主编黄嘉音拿我在学校壁报上发表的有关大学生活的一批漫画给《前线日报》副刊发表，他是那副刊的一位主编。此后我便在《大公报》发表连环漫画。政治讽刺画我是学着当时抗日战争时在上海一家英文刊物上转载的西方讽刺画来画的。以前没这样画过。我寄给《观察》，很快收到储安平先生的信，约我见他。当时说些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是要我为《观察》编一版漫画，主要由我来画。我的印象是他对我像教授对学生那样，我也像学生对教授那样。他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我是刚毕业不久的武汉大学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总还是个大孩子，在上海又是初出茅庐，没什么社会经验，见大人很腼腆，所以几个月里没有多少交谈。有一次提到共产党时他

说：“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很行，搞经济怕不行。”（大意）这话我倒记得很清楚。他平时很严肃，办事认真，管理上很有办法。在《观察》杂志社工作的人看样子都尊重他，工作也是严肃认真的。整个编辑部人很少，鸦雀无声，很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办公室，这是我的感觉。

解放后《观察》改为《新观察》，他仍是主笔。记得编辑部在北兵马司胡同。那时我已在北京《新民报》工作，他还打电话约我继续为《新观察》作画。一九五七年他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又约我为《光明日报》画，那时我已调整到《人民日报》，因工作很忙，没有时间为他们作画。他要我介绍一位漫画家到《光明日报》，我说，这时漫画家都有各自的工作岗位，只有两位是响应文化部号召实行职业化的，一位是沈同衡，一位是肖里，估计这两位有可能。后来我知道肖里参加了《光明日报》工作，画漫画，很快便发生“反右派”政治运动，肖里为此被错划为右派。沈同衡在《人民日报》也被错划了。

1995年1月



# 忆储安平先生与《观察》周刊

张嘯虎

## 一

历史的航程是曲折的，险滩迭伏，浊浪横生，人生遭遇的幸与不幸，多属偶然，难以预测，真不是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从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以后，发展到十年动乱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不少高级干部，甚至延及工人和农民，都感到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整个国家也惶惶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倘能坚定信心，咬住牙关，熬过重重折磨，经受种种考验，待黑夜尽，曙光临，寒冬去，阳春来，则又是一番光景，别有一种境界。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政通人和，迎来了祖国的大好春光。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知识分子政策在不断落实，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不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已经或正在处理中，生者扬眉吐气，死者含笑

九泉。大批湮没多年的“出土文物”，得以重见天日，重放光彩，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为祖国的现代化和统一事业贡献力量。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都又重新活跃起来，每当我从报刊上读到他们的言论，通过荧屏重睹他们的面容，备感亲切和欣慰，但又往往涌起一点怅惘，不禁心中默念：安平老师，您到哪里去了呢？

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储安平老师的文章，但究竟是“忆念”还是“悼念”呢？老是捉摸不定。因为我至今尚未确知他的下落，也不能断定他是否尚在人间。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秦城做翻译，曾向从上海来的几位“同窗”打听储先生的消息，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可能他已经死了。以后多方探询，亦不能肯定。我想，像储先生那样的情况，即使在“反右”中得以幸存，在“文革”中也难逃的。不论储先生是怎样的结局，也不论对他应作怎样的评判，鉴于储先生在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所作的贡献，出于师生之谊，我都应聊借片纸，抒我微忱，以表怀念与追思。

## 二

我初次见到储先生，是在抗战胜利后的雾重庆。在此以前，听同学们谈到过他，似乎早期在“新月派”刊物上常写文章，青年时代编过报，甚得国民党报人程沧波赏识，其后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颇受“费边社”影响。一九四五年冬天，“双十协定”签订后，旧政协开过不久，许德珩先生率领十多位文化学术界名流来北碚讲演，在复旦大学举行了一次大型座谈会。记得老舍先生、潘梓年同志，我们学校的张志让、周谷城、洪深等教授，都在会上慷慨陈辞，呼吁履行协议，停止内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张定夫教授在讲话中还

反复念诵孙中山先生的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储先生也在会上作了简短讲话，内容大致相同，表明他的政治立场的进步倾向。

一九四六年夏天，复旦迁回上海，储先生来校任教，我选修了他主讲的《各国政府与政治》和《比较宪法》两门课，得亲聆教导，但从未交谈。这时，储先生主编的《观察》周刊已问世，他的主要精力也放在这个事业上。当时该刊的特约撰稿人名单颇为可观，包罗各方面头面人物，如胡适、梁漱溟、潘光旦、钱穆、傅斯年、费孝通、萧乾、杨刚、徐盈等等，记得都列名其中。显然，储先生办这个刊物的主旨及其言论的基调，都在于宣扬所谓“中间路线”，倡导走“第三条道路”，这在当时是颇为时髦的。同时，它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弊政，揭露国统区的种种腐败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很受读者欢迎。

我当时刚步进青春的门槛，正处于政治的歧途中，在思想上深受安平老师的影响。这时他兼任新闻系的“评论练习”课，得到他更多的教导，对我作文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和论旨，常加批语，表示首肯。一九四七年冬，有一次储先生出《岁寒论政》一题，命我们写篇时评。记得我在文末写道：“岁云暮矣，风雪载途，同室操戈，生灵涂炭。呜呼！戡乱腥风阵阵，革命杀气腾腾；书生无用，空洒忧民之泪，志士有怀，谁张正义之旗？”把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俨然以不偏不倚的中立者自居，客观上显系为美帝国主义者所扶植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鸣锣开道。储先生对此文大为赞赏，在班上传阅。至今回想，我却是深为汗颜的。

### 三

形势迫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道路。随着解放战争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储先生和他所主编的刊物上的言论，也逐渐发生变化。当时我曾写过一篇《我对大公报的看法》的短文，其中批评该报的言论格调是“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含糊之地”，实质上就是指责所谓“小骂大帮忙”的报风。我寄给《观察》杂志，储先生把它发表了，这也表明他的思想路线和刊物的编辑方针正在逐渐改变中。在该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教授名流，我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竟厕身其中，可见储先生的胆识。

四十年代末，《观察》杂志在国统区的同类刊物中较为畅销。储先生惨淡经营，几乎付出他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从社务管理，编辑排版，直至印刷校对，发行和付稿酬之类，事无巨细，都亲自动手。全社工作人员仅数人，他唯一的助手因事离开了，曾公开征聘一名助理编辑，我应征被录用，半工半读，得在安平老师直接指导下，从事编辑工作近半年，也是对所学专业的一次实习，所获教益是很多的。

在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经在望的形势推动下，储先生政治态度的转变趋向也日益明朗了。当上海和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时，那一期的《观察》已发稿，储先生决定抽下几篇文章，腾出卷前的几个版面，他自己动手写了两篇专论，表示对这个运动的热情支持。记得其中第一篇的题目是《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那态度是较鲜明的。储先生还要我以“读者投书”的名义，写了两封短信，刊在封二上，指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当时《观察》杂志的进步倾向较显著，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在复旦毕业后，一九四八年夏到上海《大公报》工作，有时还到《观察》杂志社去探望安平老师。虽然据说他当时家庭生活很不顺畅，一个人住在八仙桥青年会宿舍，但在事业上则很有进展，计划办报纸，出丛书，颇有一番抱负。在全国解放的前夕，《观察》上最受欢迎的文字，是来自各地的军事通讯，真实报道南北战场上“国军”不断败退而“共军”迭告胜利的消息，以及揭露南京国民党政府众叛亲离和各级地方政权土崩瓦解的种种内幕；在言论上，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反对“戡乱”战争，渴望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贪污遍地，民不聊生种种现象，都有所抨击，这就使反动当局深为忌恨，刊物终被查封。储先生主编《观察》，在这段时期对人民所作的贡献，是不应抹煞的。

#### 四

人民是没有忘记作过贡献的爱国之士的。一九四九年九月，储先生作为新闻界代表之一，被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我在北京去看了他，谈及《观察》复刊问题，记得我婉言说到，这类刊物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恐怕要寻求新的起点，我建议储先生仍回上海任教。他当时很忙，匆匆未及多谈。其后不久，由范长江同志主持的新华通讯社新闻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储先生和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等报界前辈都参加了，并在会上讲话。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平老师了。“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在历史的云雾和时代的风雨中，彼此都蹭蹬于各自的征途。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乍暖还寒，阴晴不定，终于迎来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始则鼓励“鸣放”，要求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这时听说储先生出任

《光明日报》总编辑，还发表了她的“办报方针”，依稀又是当年主编《观察》的气派。好景不常，不久，“工人说话了”；接着，“阳谋”抛出批判文汇报的“资产阶级倾向”，掀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储先生是在报上最初被点名的民主党派中的“头面人物”之一，以他在某个鸣放座谈会上提出所谓“党天下”的“反党谬论”，而成为全国驰名被群起攻之的“大右派”。在当时那样的潮流中，这也并非意外事。

记得我在报上看到储先生在一个批判会上所作的一点自我检讨，当然是过不了“关”的，接着又有人揭发他同陆侃夫教授结成什么“反党联盟”的事情，问题越扯越大，不过当时这类大大小小的所谓“联盟”揪出不少，也就见多不怪了。何况，“名师出高徒”，不久我自己也被揪出来了，“大右派”教出“小右派”来，原来顺理成章的，在机关批判会上，有人就揭示出这样“颠扑不破的真理”。此后，储先生似已销声匿迹，不知他的下落了。

现在看来，储先生当时发表“党天下”之类的言论，也是合乎他的思想发展的逻辑的。费边社会主义原是英国费边社倡导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著名剧作家萧伯纳就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他们以善用缓进待机的古罗马统帅费边之名为社名，可以想见这种思潮的特点。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致力于研究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广泛传播改良主义思想。我觉得储先生四十年代言论的基调，就是这类思想的烙印。记得他在《观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个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就是个有无的问题。建国之初，储先生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扭转这类观点，有所表露，可以理解，也不必讳言的。

显然，这毕竟是属于思想范畴的问题，即使按照当时的政

策，也是应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此后的事态是怎样发展的，安平老师究竟怎样结束他的悲剧，我就不大清楚了。这使我想起唐人许浑《咸阳城东楼》诗的末句：“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历史如大江东去，人间在不断经受淘洗，风雨过，阴霾扫，故国又是一派大好春光。现在，党的政策是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特别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我想，这条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储先生的。如果他真已作古，作为及门弟子，我祝愿他的灵魂安息。

1986年11月

## 储安平与《观察》周刊

王明星

储安平（一九〇九——一九六六年），江苏宜兴人，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出版家。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毕业前后就曾出版了政论集《中国问题与名家论见》、短篇小说集《说谎者》等著作。后曾在报纸副刊任过编辑。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留学。抗战爆发后，储提前回国，出任过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和迁至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多家报纸主笔和编辑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又在重庆短暂地主编过一段《客观》周刊，该刊停刊后，继续主办、主编后来名噪一时的《新观察》杂志的前身《观察》周刊。因种种原因，这位资深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和出版史上绝对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却长期湮没无闻。笔者在他曾兼职任教过的复旦大学，找到了他主编出版的《观察》周刊一至六卷。当翻动着这些远隔时代、用劣质纸张印刷、由密密麻麻的小五号和六号印刷字体组成的泛黄书面，笔者的心不由得被编者和作者的浩然长存的一身正气所感动。下面分两个问题，评价一下这个刊物。



## 办刊背景、缘起和内容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加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入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到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样一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以上是储安平撰写的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我们的志趣与态度》一文中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刊物创刊的背景。而其实，抗战胜利以后，这已不是他办的第一个刊物。一九四五年冬，储安平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出版商的支持下，在重庆办过一个十六开的周刊《客观》。按储安平的话讲，“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立言与行事的难与一致”，“看到其事难有前途”，所以办了几期，就戛然放手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他们这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而又对党争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在读者和朋友的惋惜和鼓励下，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他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的办事机构也能多少贯

彻他们自己的精神，即学者办刊、学者入股、学者撰稿。所以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在重庆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当时他们办刊是在两个假定基础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的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尤高，内容充实，则刊物当可获得众多的读者。之后，开始了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拟定了“拟约撰稿人名单”，然后分别函洽联系，并寄有附件三个：一缘起，二拟约撰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编辑部认为允任本刊撰稿人的义务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刊物正式出版后，在每期封面上都登载了包括钱钟书、费孝通等名人在内的七十八位撰稿人名单。

《观察》的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另一重要目标，就是希望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他们致言立事的基本立场和办刊同仁共守的信约是“民主、自由、进步和理性”。“只要无背于这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套用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就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

一九四六年九月，在经过一个夏天的准备之后，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刊物终于出世了。《观察》的封面非常简陋，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封面，它的封面本身就是目录页，作为刊物支柱的撰稿人名单，期期保留。封面的中上方是一枚以掷铁饼者

为图形的刊徽。四周书以英文 THE OBSERVER (观察) 和 INDEPENDENT NON PARTY (独立的, 非党派的), 在首页头条文章的上端, 再次打出带纹饰的刊号, 标出该期撰稿人的学术身分和“储安平主编”五个二号字。

《观察》周刊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创刊, 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查封为止, 前后共出版五卷一百一十四期。前四卷每卷二十四期, 第五卷仅出到第十八期就停刊了。解放以后, 经周恩来等人批准, 《观察》周刊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复刊, 出到二十四期即第六卷出齐后, 奉有关部门指示, 改组为《新观察》半月刊, 主编储安平离开杂志社, 到新华书店总店工作。

在《观察》周刊上, 储安平等人把参政方式分为“干政”与“执政”二种。前者是指“舆论的做法, 以舆论影响干预政治决策”, 后者是指“组党的做法, 以政党参与政治角逐竞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参政方式是前者。这在他们的刊物内容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在开设的十多个栏目中以“专论”、“观察通信”最为著名。按储安平自己的话讲, 专论部分大体又分为二类, 一类为学理性文章。有吴世昌发表的《谁能替人民说话》、《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中国需要重建权威》、《我们所需要的法治》, 杨人楩发表的《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庄智焕发表的《如何走上民主建设之路》、《中国政治上的四种矛盾》等约四十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 体现出这样一种思想: 即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 不仅是国共两党, 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 这是第三种力量, 也是一种民主的力量。这一种力量的动向, 对于中国的前途决定,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类是触及现实的: 有储安平发表的《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中国的政局》、《读孙科谈话》、《大局浮

动，学潮如火)、《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失败的统治》等，有吴世昌发表的《论美军事件》、《试论美国的“中韩调查团”及我国的反应》，张东荪发表的《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等。在前五卷两年多的时间里，《观察》发表了近百篇时评文章，涉及当时所有的热点问题，如“和”与“战”问题，物价问题，学生运动问题，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美援问题等等，这些都充分表明了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浓重的参与意识跃然纸上，这种关注已远远不是内心的反省和同仁间的清谈，而是变成了时代的呐喊。

“观察通信”专栏所发表的文章，更是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道和评论。如《宋子文的政策、政绩、作风、资本》、《民族受辱案》、《北平学生示威记》、《李闻之死》、《成都新中国日报被捣详记》、《青海的马步芳》、《选、打、吃——张群内阁登台后的三件事》、《台湾暴动记实》、《昌淮失守时局鸟瞰》、《徐淮战局的变幻》、《热河之战》、《陇东之战》、《中原战局与最近情形》等约三百多篇。正因为《观察》周刊如此切入政治生活，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也从最初的五千份扩大到十万零五千份，同时也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而终被查封。

### 刊物读者对象、发行数量和相关成绩

在编者最初的办刊意图中，刊物的基本编辑方针是给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观看的高级时事政论刊物，中学生不在他们的读者对象之内。但后来的形势发展逾越了他们的意图和想象，成为一个包括学界、政界、工商等许多行业领域都有大量读者群的时事政论性刊物。我们可从下面的图表中看出各

卷期具体的发行增长数量情况。

卷次 \ 刊期	第 1 期	第 6 期	第 12 期	第 18 期	第 24 期	其中直接订户
一卷	5000	9000	9000	9000	8000	2709
二卷	8000	9000	11500	15500	17000	4973
三卷	19000	21000	24000	25000	25000	6732
四卷	24000	30000	36000	48000	50000	16086
五卷	空缺	空缺	空缺	105000		
查封						

从一至四卷的报告中看出：直接订户的地域分布不仅包括江浙、华中等上海周围地区，就是较远的四川、云贵、华南、西北、华北、平津等地也同样如此，最多一地如江浙沪占总比例的 20% 左右，最少的地方如西北、华北也占总比例的 5% 左右。直接订户的职业分布包括学界、政界、军界、工商银行以及医务等各个行业，以学界为主，比例维持在 25% 左右，其他各行业不等。另外，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的储安平所写的“三百二十三位意见的分析与解释”一文中得知：“南京的高级政界，大都订阅《观察》。”“前次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先生认为本刊富有阅读价值，曾派人来社订阅本刊多份，分寄该行上海总行及各地分行的高级干部阅读”，“即在军警界中，本刊亦拥有很多的读者”。这个由第三方面力量主办的刊物，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如此多且广的读者群，实属不易。在共产党方面拥有多少读者，因资料缺乏而呈未知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家表面属第三方面的刊物却有许多地

下党员供稿。比如中共著名女记者解放后曾担任过《人民日报》副主编的杨刚女士，当时就以《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的身份给《观察》周刊发回多篇“国外来信”，另外一些有名无名的地下共产党员均曾以《观察》特约记者的身份，撰写过许多不署名的“观察通信”，在编辑部内也有一些地下党员在参加日常工作。

《观察》周刊在发现起用新人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从第二卷起每期新增漫画一页，通常都是由解放后著名的漫画家方成先生执笔，而当时方成仅是一个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业余学习漫画，是一个偶然的给刊物投去几张漫画而被储安平发现后起用为固定作者的。笔者还从目录索引中发现解放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蒋学模、著名社会史学家的陈旭麓两位先生的文章各一篇。遥想当年，他们也一定是名不惊人的后生晚辈或无名小卒而已。

以上这些办刊的枝节和侧面均可管中窥豹，看出储安平动用社会各界力量，竭尽全力办刊所取得的成绩。那么，当时社会的客观环境是不是比较好呢？恰恰相反，在《观察》第四卷的报告中，就社内半年的开支情况叙述到：“排印工及装订工的价格，在六个月内一律上涨百分之二千二百（即二十二倍）以上，纸的上涨虽然仅达百分之一千六百（即十六倍），但由于发行量的上升，纸在整个成本里所占的比率，愈来愈高，目前纸在每期全部成本中，已占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稿费的调整，上涨率为百分之二千（即二十倍）。员工薪金的增长，一方面包括待遇的调整，一方面也包括人员的增多，业务既繁，人手势须按比例增添，所以薪金的总开支也跟着增加。至于其他杂项开支，如水、电、电话、煤气、房租、文具、车费等，上涨的百分比也很大。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

半年之中，增加的百分比当在平均百分之二千以上，而刊物的售价，四卷一期是一千五百元，二十四期是二万元，上涨了百分之一千三百多。”这是物价上涨对刊物的影响，另外是战局的影响，造成发行渠道的不畅，尤其造成批销户几倍、几十倍抬高零售价格，在若干国统区，《观察》还遭到禁售等等，这些都已是普遍的事实。

在《观察》出版发行的两年半中，政治上也遇到过几次大的风浪。除了频繁普通的警告之外，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因刊载储安平自己撰写的《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盛怒，中统采取行动，派特务到寓所逮捕主编储安平，这是一个高潮；一九四八年七月，蒋介石的“御前”会议决定同时查封南方《新民报》、《观察》和一家通讯社，这是又一个高潮。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决定迟迟未能执行。据该刊解放后第六卷追记迫害经过中述：“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自身的腐败和矛盾，这家很有影响的刊物在糊里糊涂中一再延拖下来，终于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而最终被国民党查封掉了。当警车笛声驰骋于十里洋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

1998年3月

## 民主杂志《观察》封闭前后

唐宝璋

一九四八年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南京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就在这时，上海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新闻界的事件：《观察》杂志被查封了。受这一事件牵连的达一百余人，时间长达四个多月，波及上海、南京、北平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连南京最高当局的军事机关的一些高级将领也受到冲击。一份杂志，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真是前所未有的。《观察》杂志究竟触痛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哪根神经，致使他们疯狂地向这本杂志伸出魔爪？笔者根据亲身见闻，追忆如下：

### 民主人士议政的论坛

《观察》杂志创刊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创办者和主编是储安平先生。

储安平是一位爱国报人，曾做过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主笔。一九三六年八月，他曾随中国代表团赴柏林采访奥运会新闻，颇有声望。他同时又是复旦大学教授。由于职业关



系，他和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士多有交往，和大学教授以及社会各界名流有着广泛的联系。

一九四六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不久，国民党统治集团就推翻了政协决议。五月，国民党政权还都南京，紧接着就发动全面内战。内战、独裁的阴云笼罩全国。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到处奔走呼号，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当时，一大批知名新闻记者云集上海，《周报》、《民主》、《文萃》、《国讯》、《时与文》等进步刊物应运而生；《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等也成了民主的喉舌。当然，国民党也非常重视上海这一“执舆论之牛耳”的重要阵地，《中央日报》、《申报》、《益世报》奉旨与爱国民主报刊唱对台戏。一时间，左、中、右各派报刊都在上海大显身手。

储安平有着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特有敏感，他出于对国民党反动腐朽统治的不满，出于对爆发内战后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他想走“文章报国”的道路，尤其是在六月前后，上海不少进步刊物被封的形势下，他决心创办《观察》杂志。《观察》的原则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他声称，这一刊物“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尊重个人独立发言，文责自负”。

他想把自己的刊物办成“文人议政”的论坛。

### 《观察》的特色

《观察》是周刊，半年为一卷，二十四期。其重点放在专论和通讯上。专论作者都是一代知名的学者、教授、专家。从它公布的撰稿人名单可以看出：许德珩、费孝通、施复亮、张东荪、梁漱溟、吴晗、费青、潘光旦、朱自清、钱钟书、王芸生、马寅初、冯友兰、胡适、梁实秋……等近百人，都是《观

察》周刊的支持者。这些撰稿人当然不是每人都写过稿，而声势之大，为其他杂志所不及。此外，这个刊物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及海外还有一批特约记者，还有一些经常和刊物保持联系的作者，因此作者群是相当庞大的。

专论立场鲜明、尖锐，反映了当时各界民主人士的观点。许德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观察》三卷一期上发表题为《魏德迈回国后，美国将如何对中国》一文，明确指出美对华政策是要把中国变成“反苏反共的基地，获得广大而足以消纳过剩的资本与过剩的商品市场”；指明“中国政治在变，由政协时代的停战、和谈、团结变到总动员戡乱大打特打”。他引用一位美国教授的话，抨击国民党政府“是今天世界上最坏的政府，它无能、贪污、腐败、半法西斯”。朱自清写的《论不满现状》，文笔精炼、思想深刻，剖析人民不满现状的历史根源，怎样造成不满及其结局的论证，令人折服。此外，像费孝通所撰的许多精彩的国际述评，当时都很有影响。由于贯彻文责自负的方针，此刊也发了一些宣传第三条道路和迎合国民党需要的文章。如张申府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五卷十期上发表《呼吁和平》一文。那时，解放战争正取得重大胜利，辽沈战役已开始，国民党败局已定，张申府此时此际提出和平，正适应了国民党政权企求喘息的需要。此文发表以后，旋即遭到有识之士的严肃批评。

《观察》的通讯，特别是军事通讯，最受读者欢迎，但也更遭国民党的忌恨。因为它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道了大量的真实信息。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初期，一般人还不知战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此刊透露了国民党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失败，报道刘邓大军南下已危及徐蚌，直抵江边……等，更为读者所欢迎。

由于刊物办得有特色，读者从中获得的信息量大，可以见到其他报刊见不到的专论和通讯。《观察》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发行量也就不断增加。刚创办时，销五千多份，到一九四七年，已达三万份；一九四八年，又一批刊物被查封后，它的销售量更是激增，在北平有华北航空版，在台北有台湾航空版，在香港、澳门和海外都有订户，总发行量据说达到十万份，这是当时一般报刊难以企及的。

### 查封前的风波

《观察》既然是政治性周刊，又多涉及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国民党自然极为关注。第一次遭到公开警告是主编储安平写了《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

蒲立特是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一九四七年七月来华考察，十月发表长达万言的访华报告，其中核心内容是反苏反共，建议美国贷款卖军火给蒋介石，并替国民党训练军队以打垮共产党。储安平的这篇文章批驳了蒲的反苏反共谬论，揭露蒲的援蒋方案的罪恶目的是企图由美国来控制中国，尽管文内同时对苏联也有微辞，但主要锋芒针对着美蒋甚至公然骂国民党是“缺德的统治”，这不能不使国民党最高当局大为光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响彻全国的时候，蒋介石政权在前线吃败仗，后院又到处起火，一些批逆鳞的报刊，此时都已相继被封，受警告的受警告，而《观察》此时居然还敢发表这样的文章，矛盾就公开化了。储安平一方面遭到特务的威胁，要逮捕他“法办”；另一方面所有反动报刊对他群起而攻之，来势汹汹，大有黑云压城之势，预示《观察》这份刊物，随时都有被封的可能。

## 查封的导火线

而《观察》被查封的直接导火线则是连续发表几篇军事通讯引起的。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观察》五卷六期以南京特约记者之名开始发表长篇通讯《济南之战》。名为通讯，实质上是透露出真实消息的军事评析论文。

这篇通讯由“棋争一着”、“得失之差”、“今后战局”三个部分组成。头一部分阐明济南地位的重要性，说明济南得失是“整个军事棋局上有重要影响的一着棋”，透露了国民党失守济南的实际情况。在“得失之差”一部分中，说明济南之战中，国共双方的兵力、装备等力量已相等，指出民心向背是胜败的重要因素。最后一部分详尽地作了战略、战役的军事分析，画出了一幅解放东北、华北、西北的蓝图，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接着这位南京特约记者又在十月二十三日五卷九期上的通讯里，透露出蒋介石正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以商讨对策的消息，分析蒋的作战计划是忍痛放弃东北、华北，先保陇海，屏障江南，站稳住脚，而后静待国际之变。

还是这位特约记者，在十二月十一日五卷十六期上，以黄伯韬和陈布雷之自杀来讥评蒋介石，说：“黄伯韬之自杀和上月陈布雷之自杀，一文一武，先后辉映，在人心士气上的影响如何，深值研究。”“如果说陈布雷的‘感谢轻生’大大影响了政局和人心，则黄伯韬之‘慷慨捐身’也就大大地影响了战局和军心。”

这几篇通讯无一不直触蒋介石的痛处，老蒋看到这些军事通讯，还有储安平批评国民党币制改革给人民带来苦难，责币改是“一场烂污”时，怒不可遏。据说，蒋介石还特别指着《徐淮战局的变幻》一文说：“我们的军事机密已被人家在杂志

上泄露了，还打什么仗？”愤恨不已。他立即下手令查封《观察》杂志，捉拿储安平和南京军事记者，为抓到这位记者，特悬巨额赏金金圆券三十万元。当时国民党政府疏散政府官员，遣散费不过五百元金圆券，抓一名摇笔杆的人都肯花如此巨款，可见问题之严重。

“南京特约军事记者”是何许人也？外界不知道。他名张今铎，山东东平人。年轻时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后去广东参加大革命，在黄埔军校任教官，与周恩来相识。北伐时任冯玉祥国民党中将代表，冯玉祥任河南省长时，他是财政厅厅长。三十年代初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被捕，抓到南京坐牢，经冯保出。从此，他一生反蒋介石，矢志不变。以后又曾随周恩来去延安抗大任教，再转新四军叶挺教导队。皖南事变前离开。抗战胜利前，在昆明担任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顾问。他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也精读德国克鲁塞维茨的军事学说，又钻研哲学。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其子就是在电影《革命家庭》中演欧阳立安的张亮。

张与笔者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同在南京。

储安平因当时读者极希望了解国共战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听说张对军事极有研究，观察深刻，所以就邀张写军事通讯。记得有次储安平约张谈话，笔者与地下党某负责人同去，张对储说：“你约我写稿，如内容分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语气、态度极为坚决，使在旁的地下党某负责人大为吃惊，对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给《观察》写军事通讯的时间其实不长，前后不过两个多月。但由于掌握了大量实际军事情况，分析在理，每篇文章都如重磅炸弹，使广大读者知道了不少战局动向，蒋介石也就恨之入骨了。

## 查封《观察》的经过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储安平和不少文化人黑名单上有名，有些人出走香港。储于十二月十一日下午赶到社里编好五卷十六期后，十二日一早即飞北平。走前把经营《观察》的业务交给雷柏龄，编务则请编辑林元代他负责。

储到北平后的次日，解放军已到清华大学，十四日北平已进入围城阶段，北平各报刊出《观察》已被查封的消息，储急电告知上海，社里顿时紧张起来。储临行前又曾将报社托付复旦大学同事张志让、笄移今二教授，还有当时已来上海的张今铎照顾。（张志让是法学家，解放后任中央最高法院副院长）三人对雷、林说，《观察》有那么多读者，储不在，我们也要撑持下去。故五卷十七期、十八期在储走后，封门前照旧出刊发行。

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上海各报及各界人士已纷纷来电话、或走访杂志社，了解《观察》是否查封。《大公报》记者已看到查封《观察》的公文到达上海市府。二十三日晚报透露了查封公文的内容。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三个陌生人来到《观察》社。他们分属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社会局和警察局，手持公文说是执行查封命令。由雷柏龄签收公文如下：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近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戡乱政策，应依照总动员法第十二条及出版法十三条之规定，予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登记证送部注销。

《观察》职工要求援引《国讯》、《时与文》被查封的先例出休刊号。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来说：“什么休刊号？我们还没追究那个南京特约记者呢！”他们要查原稿，发稿费的账簿。雷柏龄解释说原稿随用随去，会计适已外出。特务看天色将晚，顺手把已打包准备发往南京的五卷十八期《观察》五千册带走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星期天，职工照常上班，作出休刊号的准备。林元写信将查封等事告知储安平。约在下午五时许，林穿雨衣准备外出寄信，突然有十多个彪形大汉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他们拿着手枪迫令职工排成队，不许走动，然后从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身上进行搜查。外界来慰问的人一并遭殃。约在晚上时，复旦大学笪移今教授来社商谈休刊事，一踏进社门见气氛不对转身就走，特务喝令“站住！你中彩了”。笪当场被捕。

特务强占《观察》社，打开了保险箱，把现金、期票拿走“代管”，还强迫供给伙食，大吃大喝。

由于封锁了消息，外界误入罗网的人越来越多，外面进来的，来一个捉一个，其中有来买书的、有来问事的、也有来看望朋友的、职工家属来探望亲人的，统统被拘禁起来，一共关了六十多人。

特务把林元、雷柏龄、笪移今，及编辑黄立天、周兴美、徐猷、朱宜咸、罗培根等八人押出，分乘黑色汽车，先到林元家搜查一番，然后直驶威海卫路纠察大队部。在科学印刷公司为《观察》校对的何一鸣也被捕关在一起。

其他员工夏建国、陈楚雄等十二人则与误入罗网的人监禁在社内，伙食由社供给。

经过审查，这批人有的关了几天被保释，有的关了一个月

才取保释放。除林元、雷柏龄外，关在纠察大队的笪移今等七人均由知名的救国会爱国人士王造时保释。

### 北平方面缉查储安平

特务从林元身上搜到林寄储的信是寄到北平灯市口大公报办事处徐盈收转。于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十时，十多个特务闯入大公报办事处，借口查户口，迫令办事处人员不准走动。把徐盈留在办公室，不准进卧室，连上厕所也有特务跟着。徐的卧室一夜之间被搜查两次。名记者戈衍棣、张高峰、高集、刘桂良等及其眷属也与徐盈、彭子冈一样失去自由，特务目的在抓储安平。储本来每隔一天要去徐盈处一次，幸事先得到消息转入地下，得到了清华、北大、燕大的许多名教授如费青、楼邦彦、许德珩、钱端升、袁翰青等的照料，才平安脱险。

为了突破特务对大公报办事处的封锁，北平新闻界托辞春节拜年，由中国记者找了几个外国记者一起去大公报办事处拜年，特务不便阻拦，封锁终被突破。被监禁的大公报职工声称要到“剿总”自动投案，傅作义怕事情闹大，只得下令撤退特务并派人赔礼道歉了案。

北平还有一个叫徐楹的也被特务监视，其友刘时平去看徐楹时被抓。特务误以为是储安平，因刘高大与储形象吻合。特务对刘施以酷刑并拉出去假枪毙，想证实刘即储以请功邀赏。最后弄清是捉错了人，而刘却已吃足了苦头（刘在解放后曾任上海《解放日报》采访主任）。

### 到处搜捕“南京特约记者”

《观察》的特约记者，一般都是储安平自己或托人邀请的，通讯稿凡是不具名的，文责都由社负，作者姓名从不外泄，社



里同人也从不查问。所以特务要查南京通讯记者，苦无线索。二十六日特务搜查《观察》时，从林元身上搜到有一页《徐淮战局的变幻》的原稿，立即把林元作为重要线索看待。事情也巧，林出于好奇找了这一页原稿来看，忘记还给储安平，这天正好穿了揣着这原稿的雨衣来社，被特务拿到“物证”。

原来这天林元、雷柏龄还约好晚九时去看望南京特约记者，因他已来沪，商谈休刊号的事。林既被抓，怕到时这位记者不见他和雷赴约，可能打电话到报社，而社里电话已被特务控制，这位记者要上特务圈套。他急中生智，给妻子写了一张便条：

“云：我现在被捕了，你应理智、镇定。请即到港务委员会找黄佑南组长，黄组长可以证明我的为人。”

特务以为这也许是条线索，把条子抢去找了黄，黄说：“林元靠编编写写为生，是个好人，你们不要为难他。至于谁写稿，这是文人的事，我是外行，不清楚。”特务走后黄立即电告那位记者，要他切断与《观察》社的联系。

原来黄是张今铎的朋友，他是袍哥大哥，上海的红帮头头，国民党上海市吴国桢市长找黄管码头，担任港委视察组长。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黄想为人民做点好事。胡厥文、施复亮与黄同是“民建”成员，他们都一同进行护厂活动。

二十六日深夜，特务对林元进行疲劳审问。假意说：“林先生，这事与你无关，你吃这行饭。我们只追查储安平和南京特约记者。储的去向我们知道了。你只要说出《徐淮战局的变幻》的军事通讯记者的名字和他在南京的通信地址，我们就可从轻发落，早点放了你。”林答道：“来稿都是寄给储先生，连稿费也由储代领代发。”他临危不惧，侃侃而谈。特务见软的不行，就把桌子一拍，给林元一记耳光，声嘶力竭地叫道：

“你们知道吗，这是什么案件？这是泄漏军机，是要杀头的。”

特务又从厨房麻袋里搜查到的撕碎的来信拿来与从林身上搜到的一页稿纸核对笔迹，发现字迹相同的信笺落款有“邨民”或“今”，信封上“张寄”或“今”寄字样。根据这些物证，他们主观推断：稿件是用国防部史政局稿纸写的。寄信人姓张名“邨民”，这位“张邨民”就是南京军事记者；从写作素材和分析战事能力来看，张邨民一定是高级将领。这样一来搜捕南京特约记者的注意力就放到了南京，上海方面暂时放松了。

查封《观察》捉拿主编和南京特约记者的命令是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顾祝同饬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承办的，顾接到上海的报告后，立即下令搜查“张邨民”。他要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自局长以下每人写张钢笔字，并派专门核查笔迹的技术人员核对笔迹。因“张邨民”用的是国民党立法院、监察院的信封，这两个院姓张的也都受到严格审查。可惜耗时两周，没有查到“张邨民。”

经过反复侦查，特务从储安平未成年的孩子口中，发现《观察》军事记者张今铎已在上海，住在五原路友人王家，于是就采取诱捕行动。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晚上，刘史瓚（杜聿明亲信，汽车制造厂长）开了吉普车，带张今铎和笔者，还有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罗延龄同去美琪大戏院看电影，事后弯到五原路王家。张前一阵确实住在王处，不过已换了地方。因怕戒严后行走不便，刘很快带张离开。罗和笔者留了下来。罗当时是一位常为人民做点好事的国民党军官。

约在戒严前不久，笔者在客厅里看到两个中年男子在亭子间与王先生对话。

“王先生，我放出来了，我想见见张先生。”说话的是雷柏龄。“呵！你放出来了……”王正想告知雷，张刚走，话还没出口，王夫人插话道：“张先生已送张老太回南京去了。”王立即改口说：“是啊，你早几天来还可见到他。”来人和雷听了回答，说声下次再来，就离开了。

原来，雷柏龄的叔父雷声甫在黄埔军校做过张的学生，特务了解这一层关系，故在搜查王宅之前，先把雷放出来作为诱饵。幸亏聪明机警的王夫人见雷柏龄神情沮丧，毫无高兴的样子。雷在问话时也做了暗示，王夫人又看到随雷来的陌生人身穿着长袍，下身却着了军裤和皮靴，产生了怀疑才没上特务的当。

特务一走，王先生回到客厅对我们说，特务已经知道张在上海住我这里，马上要来搜查。他从内室拿出一封由他收转的信要我转送，我看后立即撕碎丢入抽水马桶冲掉，还把一份重要材料藏好后，上了阁楼充作王的小车司机睡了下来。

果然，夜十一时戒严后，特务又来了，谎称有事，要向张今铎求教，要王请张到客厅相见。

聪明的王夫人客气地邀请几个特务头目进了她的卧室，拿出好烟、茶点等招待，特务们边喝咖啡边抽烟，在外室中东张西望，又看过亭子间、客厅的内室，再加在楼下搜查的特务的报告，了解到张确已转移他处，才灰溜溜地撤走。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笔者找到了吴奋飞老先生（这是一位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老共产党员，抗战时曾任第四战区张发奎的中将军法总监。解放后在广东工作），向他汇报王家的情况。他当即要他的儿子吴群敢（交大学生，地下党员）去刘史瓚家把张今铎接到金仲华家。

在金家，吴奋飞告知张今铎：留在上海已十分危险，要他

立即离开，他还怕张一人有闪失，要笔者护送，并一再叮嘱好好照顾。

张今铎与笔者离开金仲华家后，即赶到刘史瓚家取行李辞行。刘先是挽留，他说：“蒋要抓你，我这里比较安全，我现在是资委会火车轮箍公司总经理，特务只知我搞技术不问政治，张先生是杜聿明先生介绍与我相识的朋友，留你是义不容辞。”刘情辞恳切，但想到吴奋飞的分析叮嘱，我们还是向刘告别了。临走时，刘夫人陈文嫦还用手帕包了一包金首饰相送，以备我们路上救急，张满含热泪收下了。

顺便说一下，刘氏夫妇是宁波人。刘早年留学美国，为了抗日回到祖国，他不满蒋介石的腐朽统治，同情革命，掩护过党的地下工作者，又遵照原资委会孙越琦之命保护了重要工业器材，拒迁台湾，解放后即携眷去东北参加重工业建设。

离开刘宅后，夜间笔者陪张今铎挤上难民车，辗转到了衡阳，那里风声也紧。笔者和张找到原在昆明相识的粤汉铁路的一位列车员。这位列车员叫朱文秀，很讲义气。他得知张在难中，立即伸出援手。为了安全，他带我们去衡阳郊区铁路员工家属宿舍，躲藏在他家中，在夜间，他带我们登上了一列直驶广州的快车，把我们安顿在装邮件的车厢中，饭食由他送来，总算平安到达广州。

来到广州，盘费告罄，广州又不能久留，正在为难之际，在火车站附近巧遇张励将军。他见张今铎逃出，很是欣慰，听说缺少川资，当即送了五百港元并为我们买了火车票，送我们赶上一班广九班车。张励还写了一张名片交张带给香港亲戚，他的连襟张炎将军的遗孀，托她照顾。张励与张炎原来都是十九路军的旅长，抗日有功，但一直受蒋排挤，张炎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张励则参加“民革”。前文谈的史政局稿纸就是张励

提供的。

笔者陪张今铎抵港后，先住张炎遗孀家，旋即迁往九龙金巴利酒店，通过宋云彬请夏衍找到了党组织。那时，刘人寿已因李白电台被敌人破坏奉命撤退到港。他立即到金巴利酒店进行慰问，并在生活上给以照顾。

### 《观察》案的结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笄移今等七人保释后，林元、雷柏龄在一月二十八日除夕那天被关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直到四月三日才押解去南京。

在火车上，林、雷与押解他们的排长交谈，证实这一案件是蒋下手令饬顾祝同按军法办理的大案。难怪牵连那么多人，而且各方营救都无效。

四月五日，林、雷被关到南京羊皮巷国防部二厅的收押所，那是关押重大政治犯的地方。

四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打到南京郊区，看守所的特务来不及处治犯人就仓皇逃命了。中午二门大开，关在那里的犯人和地下工作者打开了牢门，林、雷终于获得自由，新华社立即发出《观察》杂志社被捕的林元、雷柏龄获得自由的消息。蒋介石政权制造的《观察》大案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1992年7月

# 从《观察》到《新观察》

林 元

## 一、《观察》的历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储安平先生在重庆办过一个《客观》周刊，受到重庆知识分子读者的欢迎。《客观》其实是《观察》周刊的前身。后来，储安平先生深感到《客观》虽由他主编，但不是主办，很多事情有诸多牵制，便考虑另办一个刊物。日本投降后，旧政协召开之际，储便和一些朋友，主要是《客观》的作者，在重庆商办《观察》。那时大家都要复员到沪宁各地，储便决定把刊物办在上海。一九四六年春，他从渝到沪，一心专志为筹备《观察》而辛劳。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观察》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上海问世。

《观察》的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

《观察》创刊后，最高的发行数字是十万五千份。每份刊

物平均总有几个人阅读，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十万人以上。这在解放前的旧中国是发行数量较多的刊物之一。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以至边疆省分的辽远角落。刊物每星期六出版，星期六下午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以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比如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

据《观察》二卷十二期刊登的一篇《三百二十三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读者的政治态度，中间的二百四十三人，偏右的四十六人；偏左的三十四人，中间的占大多数。

《观察》的立场和政治态度，正如该刊发刊辞《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开宗明义所说：“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别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放言立论的基本立场，是‘一民主’；‘二自由’；‘三进步’；‘四理性’。”《观察》的商标是 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显然，这是一个“自由思想分子”的论坛，是一个争取民主、自由的论坛。这也是当时大量知识分子的倾向。

刊物的性质和风格，也可以从它的作者队伍中看得出来。《观察》在创刊号的封面目录下，公开标出它的撰稿人。撰稿人均先征求意见而列其名。这是一支有吸引力的、颇为可观的作者队伍：

卞之琳、王芸生、王迅中、王赣愚、伍启元、任鸿隽、吕复、何永信、沈有乾、吴世昌、吴恩裕、吴泽霖、李纯青、李

浩培、李广田、沙学俊、周子亚、周东郊、宗白华、季羨林、胡适、胡先缵、柳无忌、徐盈、孙克宽、马寅初、高觉敷、许君远、许德珩、陈之迈、陈友松、陈衡哲、陈瘦竹、陈维稷、夏炎德、曹禺、梁实秋、张印堂、张沅长、张忠绂、张东荪、张德昌、笄移今、黄正铭、郭有守、章靳以、冯至、冯友兰、程希孟、曾昭抡、傅雷、傅斯年、费孝通、杨刚、杨绛、杨人楩、杨西孟、叶公超、雷海宗、赵家璧、赵超构、潘光旦、蔡维藩、刘大杰、楼邦彦、钱能欣、钱清廉、钱歌川、钱端升、钱钟书、鲍觉民、戴文赛、戴世光、戴镛龄、韩德培、萧乾、萧公权、顾翊群。

这里共七十八人，几乎囊括了全国重点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南开的许多著名教授和全国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作家、诗人、主笔、记者。给《观察》写过文章的社会名流就更多了。从政治态度看，这支作者队伍，有共产党员、有民主党派成员、有无党派进步人士，有国民党右倾分子。中间派和中间偏左的人士占大多数，跟读者政治态度的比例差不多，和刊物的宗旨是一致的。宗旨，作者，读者一致，这就决定了《观察》的性质和育成了《观察》的风格。

《观察》是个什么样的刊物，还可以从一个跟它有密切关系的作者——费孝通先生的一段回忆里看得出来：

《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



《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见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新观察》三十五周年纪念册《我与〈新观察〉》专栏）。

吴世昌先生是重庆《客观》的编辑，是筹办《观察》的发起人之一。去年吴去世后，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登的一篇他外甥的悼念文说：“他（吴）放不下政论之笔，他是《观察》最热心的撰稿人之一。（《观察》）我每期都读，我不完全同意《观察》的观点，但是它告诉我许多时局的信息，也使我知道了钱端升、费孝费、潘光旦、雷洁琼、樊弘以及其他许多教授的观点。舅舅的文章，我当然读得更仔细些。……看到他骂国民党独裁、贪污、腐败的文章，笔势纵横，淋漓尽致，真使人痛快。”这是对吴世昌文章的评价，也是一个进步读者对《观察》的评价。

《观察》对国民党蒋政权的独裁、贪污、腐败的揭露和抨击，确是淋漓尽致的。主编储安平的第一篇署名文章《失败的统治》（《观察》一卷三期）直至最后的署名文章《一场烂污》、《政府利刃，指向〈观察〉》（《观察》四卷二十期）等，都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蒋政权统治的二十年是“一场烂污”。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人民的一些具体暴行，《观察》也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强烈的抗议。比如一九四六年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先生惨遭杀害，《观察》创刊号上就发表了“本刊特约记者”的昆明通讯《李闻之死》；一九四七年底迫害民盟，《观察》三卷十一期上又发表了许德珩、雷洁琼、钱伟长、周炳琳、金岳霖、朱自清、朱光潜、俞平伯、冯至、李广田、余冠英等四十八名北大、清华、燕大教授的抗议文章《我们对于政府迫害民盟的看法》。

在紧要关头，《观察》是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主编储安平

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刊物要获得读者，必须在紧要关头敢于站出来说话。闻一多事件之后，反对派曾扬言要杀害三教授（许德珩、樊弘、袁翰青），北大、清华、师大、燕京四校的教授九十人发表公开信，严厉质询国民党当局：“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之中？”并坚决指出：“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人民对于现状的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和愤慨。”《观察》不仅全文刊载了九十位教授的这封公开信和全部姓名，主编储安平还在该期《观察》上特别写了题为《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的旗帜鲜明的社论文章（见《观察》四卷十期）。

又如一九四八年五月上海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停刊，《大公报》没有反映，《观察》却及时地发表了储安平写的《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坚决地表示了《观察》的立场。

《观察》也登过一些至少是在客观上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利的文章，比如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观察》五卷九期发表张申府先生的《呼吁和平》一文，就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利。一九四八年冬，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席卷南下节节胜利，势如破竹，毛主席正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时候，当蒋政权正企图借所谓“和平谈判”苟延残喘的时候，《观察》却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对谁有利，是很清楚的。听说文章发表后，解放区即作为反面教材学习。上海的一些民主人士也纷纷提出意见。跟地下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施复亮先生就请九三学社的笄移今先生把意见转给储安平。笄是《观察》的发起人之一，《观察》的积极支持者，是经济学家，在《观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蒋政权的经济、物价政策。他把施的意见传达给储后，又约储与施会面长谈，提出该文是和

共产政策撞头的。当时上海白色恐怖正烈，许多进步文化人已纷纷去香港，施分析了上海和全国的形势，劝储也到香港去，可是储当时已决定到北平去了。

虽然《观察》发表过失误之作，但它的大多数文章，它的主流是猛烈冲击、撼摇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尤其赢得最多读者的是《观察》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当时反动派严密封锁解放区的消息，对解放军在各战场上的胜利，国统区人民都得不到详尽、真实的情况，有时还颠倒胜败。《观察》却通过它的特约记者（许多是《大公报》的进步记者如徐盈、杨刚、彭子冈、戈衍棣、吕德润等）及时从各地作了较真实的报导，使国统区人民在漫漫的黑夜里看到了灿烂的曙光。这就引起反动派更加恐惧，他们迫害了《文汇报》、《时与文》、《国讯》、《展望》等进步报刊后，带血的利刃便指向《观察》了。

《观察》自创刊后，就不时受到特务的“警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因刊载《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盛怒”，中统特务便“光顾”了储安平寓所。一九四八年七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一家通讯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储安平迎着利刃上，他在七月十七日出版的《观察》四卷二十期的头条位置上，署名发表了《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单刀直入指出：“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晚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知是反动派忙于抵挡压境的大军，还是怯于人民的抗议，《观察》这篇以刃对刃的文章发表后，居然平安无事，直至五个月过去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风暴才终于来临。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为了反内战，争民主，我和西南联大的一些同学在昆明办了一个四开报纸《独立周报》。作者多数是联大的老师，如潘光旦、钱端升、费孝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这些作者也全是《观察》的主要撰稿人。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到上海，便请费孝通先生介绍我给储安平。储看了我办的报纸，立刻欢迎我到观察社工作。观察社当时有十多二十人，但除储之外，竟全是做发行等后勤工作的。有一位雷柏龄同志，是储的学生，卖掉了几十亩在四川的祖宗薄田，投资筹办《观察》。他除负责经理的事务外，还兼做点编辑工作。我到观察社竟成了唯一的一名专业编辑。一九四八年冬，淮海战役前后，上海形势更加紧张，储为了与许德珩、潘光旦、钱端升、费孝通等北大、清华的作者商量《观察》今后如何办，便于十二月十一日离沪飞平。行前将编辑工作交我代理。时局瞬息万变，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储走后的第二天，报纸便登载解放军已到清华大学，十四日北平便进入“围城”阶段了。就在这一天，收到储从北平发来的最后一次电报说，此间报纸已遍登《观察》被查封的消息。自此，我们和储的联系断绝了。但《观察》还未被查封，然而确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沪平的通讯联系切断后，观察社的工作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我和雷柏龄肩上。我们去找笄移今商量。笄又和我们到复旦大学找《观察》的特约撰稿人张志让先生。张说：“《观察》有那么多的读者，已经成为社会的事业，大家应该支持它，这是大

家的责任。”这样，通过笄、张的关系，我们又联系了一些上海的进步文化界人士，组织了一批稿子，编辑、出版了两期。

十二月二十一日起，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来电话询问是否已收到查封命令。二十三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为标题发表了第二天（二十四日）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派三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

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戡乱政策，应依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飭缴原登记证送部注销。

收到了勒令“永久停刊处分”文后，我们和笄移今等作者商量，决定援《时与文》、《国讯》等兄弟报刊被迫害的例子，争取出版一期休刊号，或出地下小册子，继续揭露、抨击蒋政权。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日，观察社的工作人员照常办公。当时发往北平的信件邮局还收，我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储安平，报告刊物被查封经过以及我们在争取出版休刊号等工作。我带着信正想下楼往外发，然后回家吃晚饭，观察社已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团团围住，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务已冲进办公室了。特务命令全体人员排队站着，一个挨一个搜身。在我身上搜出了给储的长信。这不但知道了我是“主犯”，还知道储安平已去北平和他在北平的通讯地址。当时社里新聘了一位

正式经理，由于风声紧张，他不常来上班，雷柏龄便主动站出来说自己是负责经理工作的，雷便也成为“主犯”了。半点钟后，笄移今来找我们，他也被捕了。当晚特务一面把我和雷、笄等六七人带往威海卫路警备大队部审讯，一面封锁住北四川路观察社，张开捕网，来一个扣留一个。封锁了一个多月，先后共扣留了六十多人。其中有来访的作者、买书刊的读者、书店的店员、报贩、职工的朋友、亲属等。由于我给储安平的信，是由北平《大公报》办事处徐盈先生转的，北平《大公报》办事处也张开了捕网。上海、北平两地被观察社案件牵连的人，达一百人以上，前后延续了四个月，是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新闻界的一个大案子。

这次查封《观察》，大肆捕人，爆发点是一九四八年十月间出版的《观察》南京特约记者的一篇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幻》。这篇通讯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真相；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役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兵来应急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而蒋介石却胡说这篇通讯泄漏了军事秘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他亲自下命令查封观察社，追捕这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

这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是什么人，蒋介石要追捕他，当时的广大读者也想知道他。原来他名张今铎，住在南京，是民主人士，救国会成员，曾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一个有名的军事人才，跟共产党的一些高级负责人熟，跟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国防部长王杰也熟。他了解战局情况，掌握大量的军事信息，又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写得一手好文章。在解

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在《观察》五卷六期上发表了《济南之战》一文起，以后又分别在十一期和十二期先后发表《大局的抢救》和《徐淮战局的变幻》等好几篇文章，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他本来是用“张村民”假名跟储安平单线联系的，储去北平后，他到上海来，便跟我和雷秘密联系。二十四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三人送来查封命令时，我们要求出休刊号，一个人失口说：“哼，想出休刊号？还要逮捕你们泄漏军事秘密的记者哩！”我们把这消息告诉张今铎先生，他一面鼓励我们继续出地下小册子，一面说如果发生什么事，可找××委员会的黄佑南组长。他暗示这个委员会是个高级特务机关，黄是我们的人。二十六日那天特务搜了我们身后，即追问写《徐淮战局的变幻》一文的“《观察》南京特约记者”是谁？在什么地方？当时社里的电话被一个特务专门把守着，张今铎先生到上海后常来电话要社里的汽车用，我生怕他打电话来，我焦急地想着怎样通知他呢？情急智生，我问那个特务头子：“我可不可以写个条子通知我太太？”特务定睛想了想，说：“可以！”我便写了个便条给我爱人说：“观察社已被查封，我已被捕。可到××委员会找黄佑南组长营救，黄组长可以证明我的为人。”结果，我一放下笔，特务便急忙拿着条子走了。在整个被捕期间，不管敌人怎样威迫引诱，疲劳审讯，我和雷柏龄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都信守编辑的职业道德，对敌人坚不吐实。解放后我们见到了张今铎和黄佑南先生，才知道特务拿到我的条子，果然径直去追问黄佑南。黄是特务机关里一位较高级的人员，追查的特务奈何他不得，他立刻就通知了张。张第二天便离开上海经广州到香港了。

我们在上海威海卫路的纠察大队部被扣押、审讯了一个

月。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笄移今和观察社的同仁全部被保释了，被扣关在北四川路观察社的人员亦先后全释放了。只有我和雷柏龄两人还被扣押着。一月二十八日，我们被解往江湾路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当南京的军政人员纷纷向上海——广州南逃的时候，我和雷却于四月三日被解往南京。先解往南京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部的监狱，后押在南京羊皮巷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的秘密看守所。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我和雷柏龄同志才庆幸出狱。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第二天我和雷柏龄便搭军用专列回到上海。很快上海和北平便恢复通邮了。我们和储安平先生取得了联系。由于全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北平，储便留在北平筹备复刊工作。上海观察社的工作由我和雷负责。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同志。上海解放后，储即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复刊了。复刊后的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观察社仍在上海北四川路旧址，负责发行及出版“观察丛书”等工作。

复刊号是第六卷第一期。这期的作者绝大部分还是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的教授，如钱端升、樊弘、翁独健等，只多了一个解放区的作者——新华书店副总编辑胡绳。复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本刊同人”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在这篇复刊辞里，强调今后的任务是学习，强调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因而第二期即发表了费孝通的一篇题为《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的文章，同时发表了艾思奇的《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在复刊辞里，总结了《观察》自创刊以来的政治思想历程，自我批评了《观察》的中间立场。但也应该说，虽然《观察》创办的宗旨，是办一个中间立场的刊物，但由于它的作者绝大多数是进步的，其中包括民主人士、无党派进步人士、共产党员；由于它发表的大多数文章，痛击了反动政权，反映了现实，揭露了黑暗，报导了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由于它拥有百十万以上的广大读者，因而在客观的实践上，有助于摧毁蒋家王朝，对人民是作出了贡献的。

## 二、《新观察》的开始

《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开始几期，还为读者所关注，由于“雄鸡一唱天下白”，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已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蒋政权统治下得不到的东西，已经得到；所关心的时局信息，已由全国报刊敞开介绍，《观察》的读者转移了。刊物的发行数量一落千丈，经济已不能自给。显然，《观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中央便决定将《观察》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五〇年五月止。

一九五〇年五月，观察社结束，胡愈之同志代表中央对社里的同志表示关怀；负责安排北京、上海两地同志的工作。胡愈之还亲自征求在北京的同志们对安排工作的意见。工作可自由选择。于是有的分配到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有的分配到新华书店总店，有的分配在上海《文汇报》。当时我还在上海负责结束观察社的工作，储安平先生把中央的关怀写信告诉我，征询我对工作的意见。我在中学时期，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就在广东办过名《怒吼》的抗日救亡的杂志；大学时期，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又在昆明办过名《文聚》的文艺杂志

和名《独立周报》的报纸。我喜欢办刊物，表示愿意继续在《新观察》做编辑工作。从观察社到新观察社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

《新观察》的主编是黎澍同志。一九五〇年四月，储安平即不断来信，催我赶快结束上海观察社的工作，说黎澍等着我来筹备《新观察》创刊。五月间我来到了北京，住在交道口北吉祥胡同二号一座四合院里。这是《观察》社的房子，《观察》编辑部就设在这里，储安平亦住在这里。第二天黎澍便来看我们了。黎澍解放前在上海办过《文萃》杂志，这是党领导的一个刊物，很早便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查封了。黎和储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黎不善于辞令，说话慢条斯理，像个学者；储为人精明，说话条理明晰，虽然是大学（复旦）教授，却似个事业家。储介绍我跟黎会晤后，第二天我便到新观察社上班。

《新观察》由新闻总署领导。新闻总署与新华社同在国会街国会大楼办公。黎是新闻总署研究室负责人，《新观察》的工作是兼职的，因而《新观察》的编辑部便在研究室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我到编辑部时，除黎外，只有我一个人。研究室有位陆浮同志，在南洋办过报，刚从海外回来，已决定调到编辑部，但未正式上班。我上班后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到市上刻一枚“新观察杂志社”的图章。有了这枚图章，便可以和各方面联系，展开工作了。

不久，来了杨赓、王致远、黄沙三位同志，他们是从四野新华总分社调来的。接着从解放前的武汉《大刚报》调来了欧阳柏同志，从金陵女大毕业在苏南新闻训练班学习后分配到研究室的朱宝蓁同志这时也调来了。这就是《新观察》最早的一帮人马。杨赓来了后，《新观察》逐渐由他负主要责任，他是

《新观察》的第二任主编。杨庚是一个好同志，对人诚挚，工作勤恳。杨来了后，《新观察》编辑部已和新闻总署研究室一块从国会大楼搬到罗圈胡同二号。研究室在前院，编辑部在后院。七张办公桌拼在北屋的中央，大家团团围坐着。每天一上班，杨就伏在桌子上工作，有时中午也不休息，一口气工作七八小时。《新观察》刚筹备时，储安平还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庚来了后，储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调到出版总署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五三年(?)，乔木同志指示储作为《新观察》的特约记者到新疆采访，写了几篇有关新疆的通讯、报导。此后储就和《新观察》完全没关系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新观察》创刊。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辞，也没有发刊辞之类的文章，只是在《编后小言》里简单点了一下刊物的性质和任务：

《新观察》是一个综合性的解说国内外时事的刊物，它的目的是要把当前全国在生产建设上，在社会改革上的重要的中心的问题，向读者作系统的介绍和说明，以便读者能对全国的各种重要事件，获得较全面较深入的认识。

刊物的任务是“解说国内外时事”，显然，办刊的方针已指向通俗、普及，面对更广泛的读者，内容也就与《观察》有所不同。显然《新观察》也是以时事政治评论和通讯报导为主，可是它的所论所报，主要是有关生产建设和社会改革，如土地改革和解放后全国城乡的变化等。千峰同志写的长篇游记《华北平原旅行记》连载（从第一期至十一期），就是报导华北平原解放后的一派新气象的，是乔木同志出的题目。为了“解说国内外时事”，刊物还开辟了“时事解说”、“时事小品”、

“报纸文摘”、“新闻杂记”、“读者来信”、“画刊”等栏目。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火燃起后，刊物所有栏目内容，便都以宣传抗美援朝为主了。

刊物的方针、任务、内容变了，作者队伍也自应有所不同。《新观察》创刊后第一卷的作者，以记者，特别是新华社的记者为骨干。在第一卷里发表过文章的记者，有李普、吴冷西、廖盖隆、李千峰、戈扬、穆青、陈笑雨、韦明、田林、齐语、林里、洪流、田流、徐盈、子冈、柏生、萧凤等。其中有些人发表过多篇。原《观察》的作者，有费孝通、潘光旦、张志让、冯至、冯友兰、楼邦彦、杨人梗、梁漱溟、雷洁琼等。此外，曾昭抡、华罗庚、杨振声、严景耀、宋云彬，这些教授、学者也在第一卷上发表过文章。在这些作者及其文章中，读者依稀看得出《新观察》与《观察》的联系。但《新观察》是在阳光普照下诞生的，是党直接领导的，从这点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崭新的刊物。

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新观察》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在《新观察》第一卷十二期上刊了一则《编者小言》：

本刊在读者的爱护和帮助下，第一卷已经在这期结束了。为了使刊物更能适合读者的需要，从第二卷起，本刊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将作适当的改革。

《新观察》第二卷第一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出版，这一期在《新观察》的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它奠定了三十多年来《新观察》的风格，它贯彻、体现了“活泼清新，图文并茂，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的十六个字办刊方针，这个方针是乔木同志指示的。这包括了刊物的内容，也包括了刊物的形

式。在這一期的“编者·作者·读者”栏里，具体指出：“这样我们就明确确定了它是时事政治、通讯报导、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的综合性刊物。”所谓“无所不谈”，是“我们可以随便的谈，随便的画，只要所谈所画的能够反映整个斗争现实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些具体事实，这些现象去启发广大人民爱祖国的情，去丰富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即使我们所谈所画的是古代的事，也离不开这一目的。”于是这期《新观察》一来到读者跟前，就使人有面目“一新”之感。

所谓“新”，首先是新的内容。当时全国解放不久，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燃起侵略战火，直指我国。为了涤洗百多年积淀下来的半殖民地的崇洋思想，中央提出了要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这一期的《新观察》便以这个刚提出来的宣传内容为中心。翻开刊物，大字标题的第一篇文章——胡绳的《爱我们的祖国》，就迎面扑来一股清新的气息。第二篇文章是胡风的《祝福祖国，祝福人民！》其他如金凤的《热爱祖国的华侨儿女》，萧乾的《我骄傲做毛泽东时代的北京人》，都是围绕这个主旋律的。这个主旋律的一篇“压轴”的文章，是冯至的《爱国诗人杜甫传》长篇连载。

这个主旋律的另一种声音，也可以说是这一期的另一中心，是一组有关抗美援朝的文章，这组文章有端木蕻良的信《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同志》，杨朔的“朝鲜通信”《平常的人》，林淡秋的“时事漫谈”《岁末年头话“战绩”》，袁水拍、丁聪的“诗与画”《两个耳光》，此外，还有老舍的杂文《周末游园》和陈万里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事实》。

第三组文章，是关于国内生产建设的“通讯报导”，有个汇川的《人民首都的新面貌》，林里的《访问琉璃河水泥厂》，郭亚林的《人民天山的欢笑》，叶浅予的《新疆速写》。

此外，便是属于“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的文章了。在“文学·艺术·生活”栏内，有叶圣陶的《写话》，卞之琳的诗《天安门四重奏》，孙伏园的“生活小品”《话说新年旧年》，宋云彬的“旧事新谈”《章太炎先生的一封信》，吴祖光的《青年盖叫天》，和邵宇的连载画《万水千山》，关于“谈外”的，有刘白羽的《坚强的幸福的苏联儿童》，黄宗英的《四百万人遭屠杀的博物馆》。

这一期，除了上述提到的美术创作外，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插图，有的配以画，有的配以照片。《爱国诗人杜甫传》是张光宇的绘图，人民首都的新面貌是吴宝荃的摄影，封面用的是张正宇的画。这一期的编排，也跟内容一样做到了清新活泼，因此，打开这期《新观察》，就使人感到这是一本文图并茂、活泼清新的刊物。

1987年9月

## 我的同乡

徐铸成

× ×：

我的老友张先生，也曾是新闻界的战士，阔别卅年，香岛话旧。他说，一九五七年曾梦见我蹈进大海，醒而赋诗志怀。那时，章行严先生由京抵港，说铸成殆将不免，因储安平亦宜兴人，主持《光明日报》，一南一北，有人恐其操纵舆论。

此说，我不相信。哪有以这样的封建眼光看待国事的？而且，既察及到乡属等细微末节，那就应该清楚，我和安平，从来就是过从很疏的。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还是在一九四二年。他在湖南蓝田国立师院任教，兼为附近一报写社论，道出桂林，曾来访晤。一九四五年他和吴世昌在渝创刊《观察》，抗战胜利后移沪出版，曾邀我担任特约撰述。我不同意他们标榜的“第三条道路”，未予答复。一九四七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同被国民党封闭。第二天，一位所谓“舆论权威”，在某报写一短评，题为“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报已封闭了，希望政府今后切实保障舆论。含沙射影，似指我们是“不

正当”的，是“为共党张目”的。当时，站出来忿忿不平的，据我所知，一是《密勒氏评论报》，说中国两张权威报纸，一是中间偏左，一是中间偏右；应该配合前进，不该相互攻击，更不该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另一即储安平，他写了一篇长文，说：徐铸成虽是我同乡，而为人极傲慢，《观察》请他当特约撰述，他一字不复，尽管这样，我们对于《文汇报》等遭到某报的暗算，亦不能不愤怒，这实在太不符合新闻道德了，等等。

这件小事也说明，安平这个人是很有股憨劲，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到一九四九年初，《观察》亦遭封闭，安平冒险逃至解放区，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不久被派至刚解放的新疆，游历、考察经年，遍及南北疆，写出了很有文采、见解的访问记。以后则主持《新观察》。一九五七年整风号召开始后，他以九三学社中央理事的身份，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当时，该报改为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以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云。

他不仅能文，而且口才辩给。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以及翌年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都曾侃侃而谈，见诸报端。

他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毕业，旋赴英留学。归国后，与光华大学“校花”结婚，常写文艺作品，在《新月》等刊物发表，后来，主编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当他孜孜埋头编报时，那位社长程先生却天天陪着这位“校花”去跳舞，不久，因而脱辐了，留下一个孩子，由安平艰难抚养。

他去新疆旅游时，又和一位少数民族姑娘结婚，结束了近二十年的鳏居生活。



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消息，耳闻在运动火炽中，他儿子曾登报声明脱离父子关系，他则赴边荒改造。前几年，故乡来人谈及，储曾子身到家乡徘徊过几天，当然是受尽了白眼和鄙视。

今年，则听说他在“四人帮”最疯狂时，由天津踉跄到塘沽，蹈海而死了。而后娶的那位姑娘，早“美人已属沙叱利”了。呜呼！

五日

## 寻找储安平

邓加荣

五十年代，鼎鼎大名、曾任过《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惨遭羞辱，自杀未遂。绝望后失踪了，传说他死了，但不见遗体。笔者奉命去寻找，处处“碰壁”。有人在江苏省一座寺院碰到一方丈，形象酷似储安平，上去问讯，那人摇摇头消失了。亲爱的读者，你说笔者还要不要找下去呢？……

储安平哪去了？

死了。

什么时候？

一九六六年。

怎么死的？

自杀。

这是社会上的普遍说法。

—

一九八五年夏末秋初，一位负责人要编辑《新观察》创刊

三十五周年纪念册。因为这本刊物是国民党时期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组而创建的，而且据说这本老《观察》在解放前影响非同寻常，以致惹怒了国民党政府，被查封。

从这位负责人言谈中知道，储曾经作为《新观察》的特派记者，赴新疆进行过连续报道，这在《新观察》还是首例。特殊的背景，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贡献，找储安平——了解关于他生前的经历和死后的结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很荣幸，这次“外调”任务，交给了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我。

到哪儿去找？储安平是哪个单位的？一概不知晓。

每张介绍信的开头，接待单位都是空白，内容却都准确：“了解储安平。”多亏储氏是不同凡响的名人，很快有人提供了线索——他曾是《光明日报》总编辑。

抓住这根稻草，我赶紧就上。

虎坊桥前门饭店的对面。我兴冲冲地走进那座米黄色大楼。但是，很快我又茫然地从那座楼里走出来。因为，我去访问的人（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对于储安平其人其事，知道的比我多不了多少。

“储安平与本报没有多大关系。”那人接过我的介绍信说。

“他不是你们的总编辑吗？”

“是，是，不过——”

“怎么？”

“他只在这里呆了七十天，以后就不知道去向了！”

只有七十天？！这是怎样一个七十天呀？而他在这七十天里又是充当了一个多么不寻常的角色呀！

后来，有一大摞子落满灰尘的材料铺到我的面前，我翻看那些材料，虽然都是历史往事，都已见诸报端，但却依然感到

心灵的震颤，感到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量。那七十天，可不是寻常的七十天，而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玉石皆焚的七十天；而他，储安平，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走进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光明日报》，并当上了那里的总编辑的。有人说，他将和胡风一样，注定要成为历史人物。然而，才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他就被人们彻底地遗忘了，连让他扮演那个重要角色的舞台，都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模样了。

从材料中我得知，储安平是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因为二三月份，毛主席发表了重要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央研究决定，将原为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交还给民主党派，以常芝青为首的中共党组从《光明日报》撤出，由各民主党派协商推出一名民主人士充任总编辑。当然，这个协议也是征得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的。

四月一日上午九时，这位新总编在社长章伯钧的陪同下走马上任。章伯钧向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介绍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这句介绍实际等于没有介绍，因为储安平是个作家，而且颇有些名声，是尽人皆知的事。人们想知道的是：这位旧社会办《观察》出了名的老报人，今后打算怎样办《光明日报》，怎样带领大家办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张民主党派报纸。形式是新的，内容也是新的，路子该怎样走，大家都没有经验，都想听听总编辑的施政方针。

储安平很坦率地向大家亮出底牌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

他还没有告诉大家，是胡乔木事前到了他家，请他出来主持《光明日报》工作的。乔木同志知道他同许多知识分子过往甚密，由他出面约专家教授撰稿，《光明日报》会办得更加有声有色。接着，他十分得意地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最后，他踌躇满志，稳操胜券似的向大家宣布说：“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我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这样，这位解放前在知识界中颇享盛名的总编辑，一上任就给一百多位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写了约稿信，让他们为《光明日报》写些有见解、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来。他还计划请人来作主笔，为一些学者开辟专栏，在社委会下设顾问团，在编辑部下设顾问组等等……

他的这番热情饱满、大刀阔斧的行动和设想，在知识界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旧日光华大学的同学为他摆宴庆贺，费孝通先生说他工作“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名记者子冈甚至还要写一篇《新总编辑上任记》。遗憾的是，这些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在几十天后都成了右派，这又从不同的侧面逆向地证明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四月三十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储安平这时更是全力以赴地扑到大鸣大放、鼓动那些对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的工作上。用他当时的原话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于是，他便派出了大批记者，到上海、武汉、南京等九大城市去找那些专家学者采访、座谈，鼓动他们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他唯恐人们在座谈会上提的意见不多，提得不尖锐，还指名道姓地提出几

个他认为意见最多的人。有记者临行前向他请示说：“社会上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在社会上有代表性但无事可鸣，另一些人敢于鸣放却没有多大代表性。如遇这种情况，该请哪一部分人？”储安平说：“要找后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出来，就登门拜访。”有的记者对他这番热情的话打了折扣，没有找那些最有意见的人，但绝大多数按照他的意见办了，而且还进一步做了发挥。例如去武汉的潘文彬，本来让他开一个座谈会，他却开了三个，没布置他写通讯，他却写了三篇，而且字字尖酸辛辣，诸如什么“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等等。后来，这些记者一一地被当地作为“纵火犯”给揪了出来，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这样，从五月初开始鸣放，到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光明日报》共组织了十一次座谈会，发表了二十二块整版将近十三万字的座谈纪要，还有大量的消息、通讯和专题报道。

最后，事情走向了高峰，也就像毛主席所说的“达到顶点”。储安平在六月一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已经临近尾声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放出了“党天下”的毒草（原标题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事情自然也就因此而走向其反面，储安平便由各民主党派公推出来的、受人青睐瞩目的总编辑，一下子变成了个大右派。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江苏组的会议上，许多代表揭发批判他是“江苏组三个右派中最坏的一个”。人们认清了储安平的真面目，口诛笔伐的烈火遍及报社内外、全国各地，使得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悔恨交加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邮递员给他送信，在门口喊储安平的名字，他不敢出去接，怕邮递员当面同他辩论。到医院里看

病不敢说是姓储。储氏姓寡，怕人一下子认出他是储安平来。最后，他终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长达四千余字的《向人民投降》的发言，几乎是用基督教的虔诚检查自己的罪恶说：“我今天在这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要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

六月八日下午二点，他向社长章伯钧提出了辞呈，不再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从此，他的生命旅程由沸点降至冰点。

“从那以后怎么样了？”我在《光明日报》问那位中年人。

“以后就不知道了。不过，他是民盟的人，你可到那里去问，他们也许知道。”

## 二

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我找到了民盟中央，填好空白介绍信，急匆匆地走进院内。

还在路上时我便想，这回一定能够找到储安平的下落。因为，这里曾经是在“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指示下，在中央一级民主人士中仅存的五名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仕炳、储安平的所在地。毛主席当年曾经指名地批评过它：“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潮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在我看到过的那一厚沓子揭发批评材料中，人们都说储安平是章罗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当初，就是章伯钧将他领到《光明日报》并推荐给编辑部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他

在事前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并让他看过发言稿的，还有人说，他是罗隆基、张东荪的得意门生等等。

不问不知，有章罗的地方，也必定有储。

然而，向对方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截然相反。接待者一句话就把我挡住了：“储安平在我们这儿只是挂个名，他的活动都在九三学社，你去那里问问嘛！”

这时我才想起，在看过的那些材料中有人揭发说：储安平在民盟中只是一般的成员，在九三学社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可他六月一日的发言稿没有向九三学社的任何人征求意见（主持会议的许德珩气哼哼地说：“我连知都不知道。”），可却去到民盟那里交给罗隆基看。可见，他是有意违背九三学社的宗旨，有意躲避学社的监督的！

那么，当年他为什么要一下子参加两个民主党派呢？

历史退回到北平刚见黎明曙光的时刻。各民主党派为了迎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而这时，又正是储安平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

一九四六年四月，他断然拒绝了南京方面的“高级公务员荐委”，只身躲在上海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里开始创办《观察》杂志。由于这份杂志都是由社会名流、民主进步人士撰稿，敢于抨击国民党政局的昏暗腐败和宣扬民主、自由的思想，很得一部分知识界读者的喜爱，很快便由创刊时的四百份上升到几万份，到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查封时，已经发展到十万零五百份了。一个发行到十万份的杂志，在当时的出版界中，就已经是相当大的刊物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观察》被查封时，储安平正潜藏在北平忙着搜集材料，准备发回一些透视这场使中国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的平津战役的文章。他有幸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但不



幸的是，却连累到杂志社另外两位同事锒铛入狱。

北平解放后，他从藏身的北平府学胡同里走出来，一下子就搬进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专门到饭店里来看望他们。使他感到特别荣耀的是，周总理亲自走进他住的房间，饶有兴致地同他谈了话。

正是在这种得意的心情下，他才一改平生不愿参加任何党派的素志，而且不参加则已，一参加就参加了两个。因为两个党派都争取他参加，两边都有他所尊重和交往密切的师友。他对朋友解释自己的这番举动说：“两边都请，不好意思拒绝，就两边都参加吧！”说话时，眉宇之间不无得意的神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之际，中共就首先想到了《观察》的复刊之事。中共党内两位主管宣传工作的老同志乔木和胡绳，专为此事写信给周总理。得到的批复是：“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复刊！”果然，十一月份储安平就又当上了《观察》杂志的主编。复刊后办了一年多的时间，《观察》杂志改组成为《新观察》，储安平离开杂志转到新华书店任副总经理，一九五二年又改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一九五四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后，他便常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到全国各地采访和视察，写回的系列报道不仅登载在《新观察》上，还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转载。储安平的名字在一个时期里还是挺响亮的。

在此期间内，他对九三学社的工作也确实是比较热心，因为主席许德珩是他尊敬的师长，其他如袁翰青、楼邦彦等也都是他多年交往、无话不谈的老友。他在九三学社不仅担任中央委员，还负责主编学社的机关报《社讯》。中共中央决定将《光明日报》归还民主党派主办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各民

主党派负责人开会，让他们各出一人组成社务委员会。代表九三学社出任社务委员的，便是储安平。

这样看来，储安平确定是九三学社的人。

### 三

在北京西四颁赏胡同，我找到了九三学社，见到了一位有关负责人。

“自从打成右派之后，他便一直挂在我们这里，直到自杀时为止。”那位有关负责人对我说。

“他自杀死了？”我急切地想知道准确的下落。

“自杀过，但没有死，他被人救上来了。”

“那么说，他没有死？”

“不——”

“死了？”

“不——”

“那么，到底是死，是活？”

“怎么说呢？他被打成右派后，就回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每月发给他一百元的生活费，没让他干重体力活，没让他按时画卯，也没训斥他。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只是在开头两年里随着机关下放人员一起到西山农场里放过羊，干过一点零活儿。回来后他便一直安静地住在自己家里。就是他那房子，也还是学社帮助他从街道上讨还回来的。”

“他的家在哪儿？”

“厂桥棉花胡同，他一直住在那儿，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每日除了读书写字之外，为了遣散闲暇，还在院子里养了几只羊。红卫兵走上街头时，他被横扫出去，作为专政对象，让他拿扫帚打扫街道……”

一九六六年深秋的一天，储安平扔下象征扫街的扫帚，不远数十里到北京西郊青龙桥，跳河求死，不想水浅未遂，被红卫兵小将押回九三学社。当时已是深夜十一点，院内临时工住的小南屋，暂借他当晚栖身。重返人间的第二天，他首先交上了检讨书，然后向小将们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儿”，最后要求把一些银行存款单交组织上保管。结果是——“不行”。

于是他消失了，在十月份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的女儿回家来看他时，家里的东西被抄得乱成一团，在房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那是他从九三学社刚背回来的。女儿找不到他，便汇报到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汇报给军代表，军代表汇报给中央文革，也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指定公安机关组成了一个专门调查组，叫他们一定要把储安平找到。调查组足足找了两年，荒山野岭，河湖港汊，这么说吧，凡是有人迹到过的地方和人迹没有到过的地方都找遍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任何踪迹。

两年之后，调查组做了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康生看到后极为不满地说：“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能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样一个拿得起来放得下的人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从人寰中消失了，杳无踪迹，犹如一丝清风，一缕荒烟？……

“以后，他家里人再没有到这儿来找过他？”我一片痴心一片茫然地问。

“没有。”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

“来过，要他的银行存折。”

“他们有没有就他的问题，请你们找上级部门，要求重作结论和解决？”

“没有，这么多年没人来为储安平说过话。”

“你们有没有为储安平问题的解决，做过努力？”

“当然没有。”

“如果连储安平都平反了，不就证明一九五七年反右搞错了吗？”对方非常不满地反问。

“《新观察》正在编辑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念册，储安平作为本刊前身《观察》的主编，《新观察》第一位特邀特派记者，你以为可以在纪念册中提到他一笔吗？”

“当然不行。”对方态度十分明确。

我终于不得不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了。

后来，在那本装帧精美的三十五周年纪念册上，果然没有任何笔墨光顾到储安平身上。

时光荏苒，一转眼又是几年时间过去了。

不久前，一次友人聚会上，我听说，有一位老者在江苏某山某寺中，见一方丈，形貌颇似储安平，他即上前拜见，并探询：“请问，您是储安平，储先生吗？”对方一笑，然后摇摇头，隐去。

我闻之，即发异想。

储安平消失已经二十多年了。公安机关为此事专门组成了调查组，一访就是两年，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一点点线索。看来，他未必就已死去，也许真像那位长者说的，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

可是，有人听说后立即驳斥了我的论断，说：“储安平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他决无这个本事隐遁二十多年，不等他做什么修炼，早就饿死了！”

可是也有人说：“也不一定！他虽然生活自理能力极差，但既已出家，便自然习惯于过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山菜野果，清泉甘露，也可充饥。更何况，他早有超脱的悟性和淡泊尘俗的念头。”

我记起一九五七年报纸上登载的一条揭发材料：六月八日，储安平到社长章伯钧那里递送辞呈。

章伯钧问：“你的负担重不重？”

储安平答：“不重。”

章伯钧：“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我没有。”

章伯钧：“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他真的在深山古庙里皈依佛门，修身养性，以超脱物质束缚的悟性去研究、思索人生哲理、天地玄黄和佛门的种种禅宗法事吗？

这可能？

这不可能？

……可江苏的山不只一二，该在哪座峰？

山中庙宇比比皆是，又是哪座佛门呢？

是否该继续——寻找储安平？

(本文系与王逸馥合写)

1995年10月

# 储安平和他的政论

谢 泳

## 一、储安平的《客观》政论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有过一个短暂的兴奋时期，这时国内出现的众多周刊，充分表明了所有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所以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储安平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创办了《客观》周刊。这一时期，他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这些文章是储安平思想成熟时期的产物，他后来为《观察》撰写大量政论文章的思想，都在《客观》专栏文章中流露过，他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的思想在《客观》时期已有雏形。综合起来看，储安平的《客观》政论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国的态度，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五，对内战的批评。以下我着重评述对国共两党的分析，其他各点大体与同

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言论相一致。

对于当时国内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这实际上是他后来对国民党“一场烂污”的总结性批评的另一种说法。对于国内出现“一团糟”的现状，储安平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他毫不保留地说：“我认为无可推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sup>①</sup>抗战胜利后不久，储安平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比《客观》时期的言论要温和。这时他对国民党改变自己的形象还抱有一定幻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总是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国民党的过失。他甚至认为，除共产党外，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就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没有好好利用，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事情。<sup>②</sup>他分析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二是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实际是一回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有种种腐烂的覆盖下，使许多潜在的新生力量不易成长。<sup>③</sup>

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批评和分析，储安平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思想表现在他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论评价，这是储安平比他同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

首先，储安平对共产党前途的判断是失误了，他认为：“我个人不相信共产党在最近的年月中即得政权，我认为目前

① 储安平：《一团糟的责任问题》，《客观》第1期第2页。

② 储安平：《一团糟的责任问题》，《客观》第1期第1页。

③ 储安平：《国民党的病症》，《客观》第2期第1页。

的中国共产党是败事有余，成事不足。”<sup>①</sup>虽然在具体前途的判断上储安平失误了，但在《客观》时期，他对共产党所作的理论分析却是相当深刻和极富远见的。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她的长处，但也有她的缺点。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在储安平看来就是过去崇奉外邦，一味视外邦为宗旨，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人格，此处指的是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sup>②</sup>

储安平对共产党作出这样的总体分析：他认为共产党有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她的社会主义。他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他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能完全实行她的主义。储安平说：“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sup>③</sup>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刻苦精神，这是她的可取之处，而这正是国民党的短处。就储安平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承认共产党在当时中国所获得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sup>④</sup>。他对共产党的前途是这样判断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之迟或早，是和以后中国的执政党的政绩如何互为因果的。”<sup>⑤</sup>

对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储安平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他认为共产党的崇尚苏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希望于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观点，《客观》时期，储安平在涉及内战、

① 储安平：《国民党的病症》，《客观》第2期第1页。

②③ 储安平：《共产党与今日中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第2期第1页。

④⑤ 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客观》第4期第2页。



国共两党的党争时，多次阐述过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舍此则一切都不好说，因为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

储安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之关系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储安平的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

储安平受英国的影响极深，一生论政，常以英国的事例为典型，也常援引英国工党获胜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国人。他对共产党不仅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而且指出他在自己统治区域的现实。据此，他质问道：“因为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sup>①</sup>“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

<sup>①</sup>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期第2页。

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的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sup>①</sup>

储安平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甚至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sup>②</sup> 储安平的希望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他过分早熟的对自由与民主观念的理想，给他带来了终身的的不幸。储安平早年由文学而报界，又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受英国人思想影响过深，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在大学教授这个范围内储安平的言论行事获得极大成功，但当他试图以此种思想影响政界及更多的人时，他便显得一筹莫展了。

## 二、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一九二九年初，当胡适在《新月》杂志上进行人权与约法论争时，储安平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虽然这时的他以资历和学识还没有资格卷入这场论战，但《新月》及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文学青年，但由于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十六年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

①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期第2页。

② 储安平：《中产阶级及自由分子》，《客观》第12期第1页。

动阶段：《观察》时期。

一九四六年春天，储安平匆匆搁下在重庆办了约半年的《客观》周刊，奔赴上海筹划《观察》的出版。这时的储安平从年龄上看，正是三十八岁，精力充沛，已经成为一个满怀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储安平，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思想深受着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整个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在重庆分别做过报纸主笔，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到来，使正在壮年时期的储安平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言论政，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sup>①</sup>。与储安平抗战期间一起办报的冯英子曾回忆说，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有极高的热情，他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sup>②</sup>五四以后，凡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可以理解为不仅是抽象地理解西方的社会制度，而且有直接生活的体验），二是年轻时期对文学有高度热情（可以理解为对人生、对社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三是在文学之外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是空发议论的政客），四是在政治上追求欧美的政治制度，在精神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可以理解为他们设身处地地比较过两种制度的差异后作出的选择）。

由于这样的特征，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特别容易联合的条件。四十年代执著于自由主义理想的青年一代，早期都或多或少地与胡适有过各种各样的来往。他们有较强的学术水平，但对于政治又抱有热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热情不表现

① 储安平：《政治失常》，《观察》第5卷第13期1~2页。

② 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黄河》1994年第2期，第76页。

在具体直接的政治活动中，而是在道义和言论上。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人，对于政治的态度都有相似的一面，在批评国民党腐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停止内战等重大问题上，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差异只在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应采取的方法。《观察》在创刊的时候，能将各类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体反映了储安平本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很明显是中间偏左的。

储安平不同于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等人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是他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也许当时的储安平尚未获得什么社会声望，还没有资格进入政治家的视野。但从储安平当时的许多言论看，他在不介入具体政治活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有资格有条件介入也不介入，这是他比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张君勱、梁漱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令人深思的一面。储安平的关心政治，是希望以超然的姿态，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对国事发表意见，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有资格批评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论代表。所以他在《观察》的发刊词中明确宣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议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sup>①</sup>在整个《观察》时期，它的言论确实体现了储安平的追求，是保持了独立发言精神的。

储安平在《观察》时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字，比如每卷的报告书及其他一些言论，我已有专文评述，这里只涉及他在《观察》时期的时评。储安平在创办《观察》之前已写出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专著，从这两本介绍比较性的专著中，我们可看出储安平对英法的政治制度是做

<sup>①</sup>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

过深入研究的，他认为那种政治制度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作为个人，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上信奉英国那一套，而且在为人处事，工作作风上都明显地带有英国人办事的作风和效率。<sup>①</sup>体现在他的政论文章中，更是严格以理性为判断事物的出发点，以公平为尺度，凡事都要分清是非而不计利害的。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部分：一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四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

《失败的统治》是储安平为《观察》写的第一篇时评，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首先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是一场“失败的统治”，储安平是以欧美政府的正常运作来比较国民党的失败的。他力陈二十年来国民党统治下国家在一切方面的毫无所成，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政权”。<sup>②</sup>他大声疾呼：“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二十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sup>③</sup>

在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这部分时评中，表现了储安平在政治上的态度和他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立的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在近半个世纪后，我每读他的这些时评，依然感到很激动。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这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

① 参阅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一文。

② 储安平：《失败的统治》，《观察》第1卷第3期第3、4页。

③ 储安平：《失败的统治》，《观察》第1卷第3期第3、4页。

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

作为时评，一般来讲，当历史发生变化，人们对具体事件不再抱有兴趣的时候，这些时评的价值也就只剩下历史价值了。只有对历史发生兴趣的人才会重新翻检。但在读储安平《观察》时评时，我却感到这些时评好像是为今天而写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时评，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一九四九年后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能再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个性。一九四九年后，几乎没有人能以自由的心态对国家发表独立的看法，所以也可以说政论这种文体也消失了。只有毛泽东的一些政论还能让人感到有独特的语言和思维，因为他是无所顾忌的。

当时对于民社党参加国大一事朝野多有物议，对此储安平发表了《论张君劢》一文，他在文章中畅论自己的看法，并同时阐明了作为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则，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气质。他认为，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

大，心平气和，<sup>①</sup>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sup>②</sup>类似的言论，还体现在储安平几乎所有的时评中。他的时评从语言上看不可谓不激烈，甚至有这样的话：“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sup>③</sup>“美国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sup>④</sup>但从文章的逻辑和气度上看，是平静的，说理的，反映了储安平一贯论政的风格：理性，公平，平心静气，据理力争。

储安平论政是以公理和法治为基本出发点的，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批评政府市政改革的失败，同时对当时政府赋予傅作义“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的权力也据理力争。认为这“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sup>⑤</sup>在储安平看来，政治失常是可以理解的，但失常也要有一个失常的限度。他认为要讲法治，就要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制度不要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因人授权。<sup>⑥</sup>

对于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但在每一次学潮之后，储安平都要发表时评，对学生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一、学生总是对的。二、教授总是劝学生读书，游行最终是没什么用的。三、当学生遭到逮捕以后，教授

① 储安平：《论张君劢》，《观察》第1卷第19期第4页。

② 储安平：《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观察》第2卷第5页。

③ 储安平：《一场烂污》，《观察》第5卷第11期第1页。

④ 储安平：《政治失常》，《观察》第5卷第13期1~2页。

⑤ 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第3卷第9期第3页。

⑥ 储安平：《国大评论》，《观察》第4卷第9期第6页。

总是要抗议的并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保释学生。四、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总是同情和理解的。

储安平认为：“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sup>①</sup> 这是储安平对历次学潮的基本评价。

在储安平的《观察》政论中，有三篇很值得注意，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我们对美国的感觉》、《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这三篇政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我们了解储安平及同时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 and 苏联的态度。

第一篇文章是针对美军驻华及参加调解所发的。储安平对美国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文章一开始对于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的两种成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英勇坚毅的牺牲精神，具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sup>②</sup> 就是在这样对美国的理性认识下，储安平依然对美国在华驻军和参预调停提出了批

---

① 储安平：《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观察》第4卷第10期第3页。

② 储安平：《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观察》第1卷第11期第6页。



评，他对美国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对国民党二十年来腐败统治强烈不满，由此延伸到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也有美国军人在华的恶劣表现的缘由。但这些都是具体的表面现象。在读这几篇对美国的评论中，我明显地感到在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甚至影响了他在判断美国和苏联问题上的清醒程度。他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sup>①</sup>他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立场来看待美国的。

储安平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中认为：“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sup>②</sup>从当时历史情形看，储安平在文章中对蒲立特访华报告所持的批评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其中明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倾向却值得人们深思，也许这正是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难以摆脱的某种局限。有时候，这种局限限制了他们长远的历史眼光。在《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一文中，这种意味也很浓。

---

<sup>①</sup> <sup>②</sup> 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第3卷第9期第3页。

# 四十年代中后期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参政意识透视

——由《观察》周刊谈起

徐思彦

中国知识分子有人世和参政的传统，鸦片战争以后，更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近代的参政意识。当中国近代历史进入尾声，即四十年代中后期，面对着两种势力、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最后决战，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为国家同时也为自己做出选择，他们带着不同的政见，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中国政治的最前台，形成了一股空前的参政热潮。在这个参政热潮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特别部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炽热的积极性，他们议论时局，抨击时政，发表政见，指点江山，大有扭转乾坤的气势。但历史却和他们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他们对自己影响时局能力的过高估计，与他们在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中的实际作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政治能力感和实际政治能力之间的反差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涂上了悲剧的色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参政意识有什么特点，又

是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治的,本文将通过对《观察》周刊的剖析,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自由主义是欧美风雨卷入中国的一个舶来品。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是一个独立于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势力之外的,信仰民主、法制、个性解放的松散群体。二三十年代,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四十年代中后期,则由储安平接过了自由主义这面大旗,他主编的《观察》周刊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宗旨,要求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要求以理性的态度解决各种纠纷,充分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信仰与追求。储安平等创办《观察》周刊,意在为他们那些“对于政治都是感兴趣”的“自由思想分子”“朋友”们,提供一个发表政见的阵地。该刊的作者队伍集中了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人物,如张东荪、梁实秋、梁漱溟、马寅初、楼邦彦、傅斯年、钱端升、杨人梗、任鸿隽、王芸生、冯友兰、陈之迈等等。因此,我们可以把《观察》周刊作为一个透视点,剖析参政热潮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

《观察》周刊创刊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此时,在中国的大地上,正孕育着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决战,《观察》在这个时候问世,决非历史的偶然,储安平在题为《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的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候,实在急需要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因此,“对

国事发表意见”，就成了“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sup>①</sup>。储安平们希冀以一纸刊物“挽救国运”，未免过于天真，但充分表明了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浓重的参与意识跃然纸上。这种关注已远远不是内心的反省和同仁间的清谈，而是变成了呐喊，他们幻想着这种呐喊能振聋发聩，左右朝野。

人民具有一定的参与意识，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所谓参与意识，即关心并要求参与政治决策，不仅关心政治决策的输出过程，更关心政治决策的输入过程，这种参与意识首先表现为政治责任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笃信民主政治，一向具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至四十年代中后期，更是有增无减，成为一种使命感。他们以摧毁封建社会，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为使命，立志要完成一个多世纪前法兰西自由主义者所完成的工作。储安平明确指出，为了国家的前途，“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sup>②</sup>。需要指出的是，与一般民主国家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感，主要不是表现在要求参与政府的政治决策，他们要求参与的是国家前途命运的抉择。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的大氛围，决定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责任感的这种特殊性，他们对执政的国民党已经失望，并不期望通过政府决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是要用自身的力量，直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选择道路。

中央大学教授吴世昌在《谁能替人民说话》一文中指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是不受任何党、团、派、系操纵利用的人士，他们

① 《观察》1卷1期，1946年9月1日。以下引文均出自此刊，不再注刊名。

②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2卷2期，1947年3月8日。

应该团结起来,表明意见,只有这些人团结起来,才能真正代表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意见,发挥人民的力量。但是在重重困难的限制下,到哪里去找能够得到人民信赖的无党无派人士呢?吴世昌认为,只有现在无党籍的大学教授。这些大学教授的工作性质、职业修养、生活状况、道德水准,都不至于与老百姓的利益冲突,而使他们存有偏心和私心。只要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各党派不得不顾忌,不得不尊重。如果像大学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所面临的难关熟视无睹,这个民族的命运真是可以预卜了;熟视而有睹,却只是用书本来“只图遮眼”,国家的前途也是不堪设想的。<sup>①</sup> 吴世昌既把希望寄托在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核心成分的大学教授身上,又表示出了某种担忧。事实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面临的难关”,不仅熟视有睹,而且要尽力扭转时局,正如施复亮在谈到自由主义者对内战的态度时所讲的那样,“自由主义者决不应支持这种内战,必须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设法结束或缩短这种内战。在这一点上,必须‘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sup>②</sup>。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以至《观察》周刊因发表反内战言论和战地通讯,屡遭国民党当局恐吓。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自己不仅看成是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也看成是进步势力的唯一代表,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这是因为,其一,“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其二,“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精神来从事民

① 1卷4期,1946年9月21日。

② 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3卷22期,1948年1月24日。

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sup>①</sup> 在他们看来,不仅现时的中国需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三十年五十年后的未来,“中国真正底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sup>②</sup> 正是由于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如此重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断言,如果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

他们这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不仅源于一种信仰的力量,同时也源于一种道德的力量。樊弘的《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一文对此有明确的诠释,“我既然在中国这个角落上,负有小小的文化的使命”,假如对一切时下的问题都一概静默无言,而不去“发表我的无畏的批评,我觉着便对对不起自己的地方”。<sup>③</sup> 这种心理平衡的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热情的涨落,使命感与心理平衡需求虽同样外化为政治责任感,但后者并不是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参与意识,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对这种参与意识有着负面的影响。因为促成心理平衡的因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人们时常会以某种特殊缘由代替政治参与调节失衡的功能,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烈的政治责任感,首先来自于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思想,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受过西方近代文明的熏陶,与传统士大夫又有所不同。他们投身于政治,与传统士大夫的人世不可同日而语。对后者来说,由士而仕,是社会提供给他们唯一的职业选择,其人世哲学中生存的色彩重于道德的色彩;对前者来

① 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3卷22期,1948年1月24日。

② 朱光潜:《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3卷19期,1948年1月3日。

③ 3卷18期,1947年12月17日。

说,他们追求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是因为他们信仰、崇尚这种社会秩序,因而表现出更明显的自觉意识。近代欧美的自由主义理念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世哲学同样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

## 二

实行民主政治不仅需要人民有一定的政治责任感,还要有相应的政治能力感即对自身所具有的影响政治的能力的知觉。只有具有一定的政治能力感,参与意识才可能变为参与行动,没有政治能力感的政治责任感可能归于幻想和清谈,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从《观察》周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发现,四十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政治能力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追溯半个世纪的历史,他们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旗帜引导中国前进。“半个世纪以来,在火药气味所笼罩下的中国之仍能有点进步,便得力于他,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事实上就是个自由主义的运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吻合”<sup>①</sup>。其二,环顾当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自己看成是稳定舆论、实现和平民主的决定因素。储安平在《观察》周刊创刊半年时,再次阐释了创办周刊的目的,是要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分子,有一个说话的地方。而之所以“想供大家一个说话的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是因为“我们深切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今日中国的言论界实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此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sup>②</sup>

① 杨人樱:《自由主义者往何处走》2卷11期,1947年5月10日。

②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1卷24期,1947年2月8日。

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与影响,施复亮与储安平有着同样的自信。施复亮坚定地认为,形成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强大的中间势力,是制止内战,尤其是在短期内制止内战的决定因素;在和平恢复以后,推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中间派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力量。<sup>①</sup>其三,瞻望未来,他们断言,“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这是第三种力量,也是一种民主力量,这一种力量的动向,对于中国前途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自由主义者坚决地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今天抨击自由主义的人,明天必然会改变他的态度”。<sup>②</sup>其四,对过去、今天、未来的中国的进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都自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对“被压迫阶级革命思想”会“发生酵母作用”,他们的抨击怀疑,使旧的社会制度、伦理思想及社会组织发生动摇;他们的冷嘲热骂,暴露了政府的无能、官吏的腐化和社会的黑暗;他们创造了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不可缺少的工具。总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革命星火蔓延提供了助燃器。<sup>③</sup>

无论是就历史而言,还是就现实与未来而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身力量和作用的估价都不尽符合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无需赘述。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对自身的力量和作用有着坚定的自信,就一般规律而言,人们以往的政治经验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其政治能力感。成功的参政经验会增强人们的政治能力感,反之,失败的经验通常会使人体的政治能力感削弱乃

① 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2卷9期,1947年4月26日。

② 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3卷22期,1948年1月24日。

③ 周钟歧:《论革命》,1卷22期,1947年1月25日。



至丧失。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资本家阶级的状况。就其经济力量而言,资本家阶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应该演出更丰富多彩的历史剧,但由于资本家阶级没有相应的政治责任感以及他们在政治斗争中较多的失败经验,使他们的政治能力感也大大削弱,从而制约了他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有另一种表现,他们自步入中国政坛以来,屡试屡败,然而他们却执著地屡败屡试。二十年代,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造就出一个“好政府”,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胡适等人虽然认真努力了,“好政府”却没有出现,他们最后不得不承认,谈政治已到“止壁”的地步,只好不再“努力”了。三十年代,胡适等人又创办《独立评论》,希望“永远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但这点“独立的精神”并没有真正保持下去,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走上了归依政府的道路。这些失败的经历并没有使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绝望。他们追求理想价值的完善和人格道德的完善,这二者的统一,使他们为实现他们所信仰的民主、法治、自由的社会秩序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并坚信这种努力对中国的前途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这种强烈的政治能力感,使他们的政治责任感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动。

### 三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参政方式分为“干政”与“执政”。所谓“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以舆论影响干预政治决策;所谓“执政”则是一种“组党的做法”,以政党参与政治角逐竞争。<sup>①</sup>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参政方式,基本是“干政”而不是“执政”。

<sup>①</sup>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1卷24期,1947年2月8日。

他们之所以积极于“干政”，而不热衷于“执政”，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他们认为，今日中国最急需的是“无畏的言论”和“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而不是再多一二个政党。他们虽然不一概反对政党政治，但认为中国热心于组党的人太多了，你一个党，他一个党，“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sup>①</sup>，他们要做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以舆论改变环境。其二，所谓“自由思想分子”，本身就意味着不属于任何政党。他们认为，有党就有约束，就会妨碍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在这些人看来，在党与党的纷争中，应该保持一个中立、超然、平衡的力量。这种平衡力量的存在，对国家对社会都有意义，只有“自由主义思想分子”，才能成为这一平衡的力量，因此他们愿以在野的地位，而且认为，唯有以在野的地位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是以这种“干政”方式参与政治的。《观察》周刊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创刊，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时评文章，涉猎所有的热点问题，如“和”、“战”问题，物价问题，学生运动问题，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美援问题等等。今天看来，这些文章的观点虽不尽正确，有的甚至有严重的错误，但表明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关切。特别是“观察通信”专栏所发表的文章，更是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正因为《观察》周刊如此切入政治生活，所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不断扩大，最高达十余万份；同时它也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而终被查封。

储安平等《观察》周刊同仁不仅把政治党派、政府当局、在朝文武官吏作为“干政”的对象，而且把那些不“干政”或不积极“干

<sup>①</sup> 储安平：《风浪·熬煎·撑住》，3卷24期，1948年2月7日。

政”的同业也作为“干政”的对象。一九四七年五月，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造成“五·二〇血案”，此后又查封了上海文汇、新民、联合三家报纸。大公报对这两个事件态度暧昧。储安平在《观察》周刊上撰文《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对大公报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储安平虽然认为大公报在此次学潮中的“灰色”表现，与主编王芸生北上不在沪有关，但措辞是严厉的。文章写道，“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五月二十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像南京五二〇惨案这样一个严肃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关于三报被封，大公报只平平淡淡地刊出“文汇等三报奉命停刊”的消息。对此，储安平辛辣地讽刺道，“凡是外国什么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些什么新闻，大公报照例要加上‘花边’登出来，在大公报的编辑标准中，大概像在一个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轶事。”储安平接着发出一连串的责问：大公报没有站在同业的立场上向当局抗议，而是默无一言，“是认为文汇等三报应该被封呢？还是吓得不敢说话呢？还是幸灾乐祸，坐视不救呢？”虽然在一些人看来，《观察》周刊的态度或许过于激烈，但储安平认为，文汇等三报的编辑人员，大都是些比较进步而有独立意志的民主分子，“一个国家若想进步，便需要多几个这种分子”，“假如一个国家的人民，个个都是唯唯否否，请问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生气？”正因为如此，《观察》周刊连篇发表文章，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查封文汇等三报；也正因为如此，储安平们要求大公报不能对此种事件不置一辞，要站出来“干政”，他们期望中国多一些进步而有独立意志的民主分子，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干政”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的舆论攻势对加速国民党的最后失败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干政”的方式，却大大削弱了“干政”的力量。无论是政党政治，还是独裁政治，独立的舆论都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仅有舆论的力量是不够的，在以武装斗争决定中国命运的四十年代中后期尤其如此。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台湾后，逐渐不再满足于舆论“干政”，而积极从事组织反对党的活动，希望参政议政，这或许可以看成是对四十年代舆论“干政”经验的一个总结。

#### 四

四十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表现出了较强的政治能力感，这种政治能力感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所具有的影响政治的能力的知觉超出了他们实际具有的影响力。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参与政治，但政治却不大理会他们的理想，他们幻想做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但却没有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集合在他们的旗帜下，他们认为自己是影响国共两党胜负之争的决定力量，但他们甚至不能作为独立的力量始终存在，反而最终分化了，或者站到共产党和人民大众一边，或者倒向国民党。这是他们不曾料到的结局，对一些人来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他们深信自己具有影响时局的能力，但这种知觉却没有变成现实。造成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没有充分的认识。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看法：今日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不同意国民党，但也不欢迎共产党，“希望在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中国政局。这种“新的力量”，则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莫属。他们认为，

在国共斗争中，“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尽管这种畏惧可能“出于一种误会”。而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同样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sup>①</sup>在这种形势下，“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所谓中间派，“就是智识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sup>②</sup>这种估计显然是错误地以自己的感觉和认识代替了绝大多数人，即一般工农民众的感觉和认识。正是基于对中国两大政治势力的这种错误判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事实却是，不是他们决定国共两党的命运，而恰恰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及其结局决定他们命运。

第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崇尚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方法无力解决中国问题。按照自由主义观点，政治是缓解因调整利益争端而产生的社会冲突的过程。一个社会的建立，不仅由于个别利益的对立，更由于个别利益的一致。正是这些利益的共同点，才形成了社会的联系。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找到各种利益能结合在一起的共同点。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了寻找、确定这个共同点的自由主义方法。因此，自由主义者注重调和与节制。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方法对解决国共之争显然无能为力。抗日战争结束后，经过八年战火熬煎的人民渴望和平，中国共产党也坚决反对内战，但国民党一意孤行，企图用武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国共矛盾已不可调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试图调和这种矛盾，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战争，当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所接受。他们把在国共之间寻找的第三条道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2卷2期，1947年3月8日。

② 周钟歧：《论革命》，1卷22期，1947年1月25日。

路,看成是可以结合各种利益的共同点,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唯一方法。由于国共根本利益的冲突与对立,这个共同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自由主义思想的方法就陷于“无用武”之地。

第三,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没有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机会,他们也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以自由主义思想方法解决问题,是通过调解各方利益实现的,因此他们需要的是西方民主政治运行的那种秩序。而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正处在混乱之中,不仅没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需要的那种秩序,也没有任何正常的秩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崇尚理性,过分相信舆论的力量,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最后决战的关头,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战争,中国人的生活与战争和革命融为一体,而自由主义不可能为战争与革命这两个重大问题提供任何答案。虽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信自己的价值准则,但却寻找不到把自己的价值准则变为全社会都能认同的价值准则的手段。历史没有为他们提供机会,他们又无力创造自己所需要的机会。因此,既往的中国政治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般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由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熏陶而形成的,他们的政治信仰、理想和行为是以适合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为基础的,所以常常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政治责任心,曾经为近代中国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是他们以理想代替现实,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也脱离了中国政治的传统和现实,所以除了严正的道义和人格力量之外,可以说一无所有。除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据以安身立命的这种道义和人格力量与主要的社会阶级的实际利益合流,形成绝大多数人公认的权威力量,否则他们只能作为一种可能的“助燃器”和“酵母”,可以对政府保持某种压

力,却不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旗帜和领导者,这也许就是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1993年

## 《观察》始末

——纪念《观察》周刊诞生五十周年

谢 泳

今年是《观察》周刊诞生五十周年。五十年前，储安平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在艰难中将这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后阵地维持了将近三年，一九四八年底，《观察》周刊被国民党查封，至此，《观察》及其同人所倡导的精神开始衰落。我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收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资料，始终对这本周刊充满敬意，我觉得无论岁月多么漫长，我们不应当忘记半个世纪前我们前辈曾经有过的理想。余英时在他的自传《我走过的路》中曾说：“我在北平期间所常常阅读的刊物包括《观察》、《新路》、《独立评论》等，基本上都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议论。”也许是青年时代的强烈印象，在一九八八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的著名讲演《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对《观察》作了这样的评价：“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和稳健立场，包括



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汪荣祖在《二十一世纪》上也曾撰文指出：“更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是储安平《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的重镇，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由于《观察》所持的客观公正立场，半个世纪后被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是当时“少数可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

《观察》的诞生可以视为第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刻所做的一次最大努力（严复、梁启超中经胡适、傅斯年）。虽然它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抗争了不到三年时间，但它的影响是巨大而长远的，它的精神可以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而这一代知识分子恰恰又正是中国各个学科中的创始人或最有创见的学者。虽然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六年埋葬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他们的知识分子品格仍在影响着许多人，不仅是在事业、知识上，而且是整个精神品格上。无论是《观察》创办者，还是聚集在《观察》周围的人们，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视为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储安平在一九四六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稳固……”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胡适、傅斯年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既有稳固的专业范围，又格外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发展，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参预过政治活动，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而青年储安平始终是以他们为精神领袖的，中国的自由

主义传统由《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直到《观察》，一直代代相连。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

### 一、《观察》的诞生经过

《观察》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上海创刊。《观察》为周刊，十六开本，每期六万字，主编储安平。一九四五年，储安平和他在上海光华大学的同学、著名报人张稚琴在四川重庆办了一个名为《客观》的杂志。这是一个八开的周刊，十六页，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每期约可以发六万余字的文章。曾与储安平一齐共过事的报人冯英子说：“《客观》实际是《观察》前身，因为它的重点在于评论。”林元则认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储安平先在重庆办过一个《客观》周刊，受到重庆知识分子读者的欢迎，《客观》其实是《观察》的前身。后来，储安平先生感到《客观》虽由他主编，但不是主办，很多事情有诸多牵制，便考虑另办一个刊物。”这种认为《客观》是《观察》前身的说法实际上来源于储安平。储安平在谈到《观察》的诞生经过时曾说过“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因为《客观》从刊名上过渡到《观察》，即可看出一点二者的渊源关系。况且两个刊物又都是由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与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对

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天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从储安平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大致想象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对于这个刊物生命能否维持，当时储安平他们笼统地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储安平在筹备《观察》之前所做的这个基本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可以说为《观察》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坛作了力量上的估计。另外，储安平一直认为今日中国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刊物，就可鼓励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出面说话，而他们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观察》

是纯粹的同人文刊，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同人文刊，在《观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

由于《观察》是同人文刊，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在支撑，所以，它一创刊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观察》的最高发行量达到十万零五百份。每份刊物平均总有几个读者，据估计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冯英子说：“《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储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国家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在一九四六年的环境中，储安平能够把《观察》设计为一个周刊，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不仅是周刊，而且储安平要让这份刊物成为全国的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分的辽远部落。《观察》每周六出版，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得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

想得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理想主义倾向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像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龄相仿的第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七十八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外，还有一批像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在研读《观察》的时候，我除了为《观察》所倡守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在《观察》前五卷中，每到出满二十四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一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读后令人感动。对于为什么要办《观察》及在办刊过程中的种种情况，一九四七年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储安平的重要资料，他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

讹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僨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筹，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

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储安平给胡适写信之前，曾有一信给傅斯年，他在信中说：“我自信能以相当长的时期主持这个刊物，长线放远筹，只好一步一步走，我是量力行事的人，我希望一切事情要‘水到渠成’，慢慢地实现理想，……假如能照过去的水准维持到两年以上，两年以后我想可以发生一点影响。”

储安平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其来有自的。三十年代初，他从上海光华政治系毕业后，所倾心的即是胡适他们的理想，《新月》关门之前，他曾写过许多散文，在思想上，青年储安平已经对自由主义理想有了强烈的向往。三十年代中期他曾在英国伦敦政治学院学习过，受到费边主义理论家拉斯基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储安平从英国归来，流落西南，其间曾在湘西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过英国史和英国宪法，后转赴重庆。台湾陈纪滢在《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中有一篇画家黄尧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一九四〇年曾和储安平、沈昌焕、黄尧等一些人在重庆参加周子亚组织“渝社”的情况，他对储安

平的评价是“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四十年代储安平对国内形势的判断也很清晰，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说过：“自由主义在今日的政治局面下是苦闷并苦痛的，……我想我们要紧的是立住脚跟，心无所求，假如不要做官，即无须迎逢国民党，假如不想投机，即无须迎逢共产党，心无所求，才能言所欲言，不偏不倚，不计功利，尽心为之。”由于储安平的理想和敬业，《观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荣祖在《自由主义在战后中国的起落》一文中说，当年的《东方杂志》、《新青年》都未曾达到过像《观察》那样大的销量。

## 二、《观察》的停刊

《观察》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上海创刊后，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出满第二十四期，是为第一卷。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第二卷，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九日出满第二十四期，是为第二卷。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出版第三卷，至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出满二十四期，是为第三卷。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出满二十四期，是为第四卷（第二十三、二十四期为合刊）。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满第十八期停刊，所以《观察》第五卷只出了十八期。为什么《观察》出到第十八期后无法再出版了呢？因为这一年《观察》遭到了国民党的查封。据《观察》杂志社的林元回忆，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三卷第九期刊载了储安平写的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这篇文章由于批评了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的对华政策，并激烈地批评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为此中统特务还光顾了储安平的寓所。一九四八年七



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讯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七月十七日出版的《观察》第四卷第二十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其中有这样的话：

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分子，献策献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己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

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是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髓所在。

.....

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拉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家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地想想，你们过去所做所为，对于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做建设性

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为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为建设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施行吗？我们一直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

.....

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

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储安平的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缘故，居然平安无事，直到五个月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观察》才遭不幸。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关于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询问《观察》是否已经收到查封命令。二十三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的标题发表了第二天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和社会局派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勘乱政策，应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当时储安平已离沪赴北平，找一些知识分子商量《观察》今后的命运了，在沪照料《观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龄和笄移今。此次查封《观察》的由头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版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喜讯，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兵来应急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蒋介石认为这篇通讯泄漏了军事秘密，

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追捕那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至此，《观察》杂志被迫停刊。一九九二年，当事人唐宝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观察》被查封的情况。

### 三、《观察》的复刊和终止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的第十四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六卷。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新观察》的第一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庚，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一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庚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三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所追求的理想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持的是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无党无派，走的是中间路线。在

《观察》时期，它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揭露和批判为当局所不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它失去了信心，政府腐败和无能加强了左派的力量。《观察》的言论以揭露国民党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左倾力量。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左倾力量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希望她健康地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我们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国民党明令查封《观察》，他敢于抗议，后来《观察》复刊，难道他就能那样很诚服地把思想转变过来？要知道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查封《观察》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观察》复刊，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他当年所说的自由多少与有无的问题将要成为现实了。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当年在重庆办《客观》都不愿受人管制的储安平，在一个很快变成舆论一律的环境中，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一九四九年后，作为刊物的《观察》消失了。一九五七年，它的编者储安平和当年聚集在《观察》周围的撰稿人多数也消失了，但《观察》的理想没有消失，它在四十年代末的遭遇，象征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为日后思考自由主义何以难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生长，留下了丰富的命题，正如汪荣祖所言：“历史仍在发展，我们还不能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终点’。”

1992年5月初稿 1996年8月修改

## 关于“《观察》丛书”的情况

谢 泳

《观察》周刊社成立后，除了出版《观察》周刊外，还出版“《观察》丛书”。

储安平是一个极有事业心的人。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他确是将这项工作作为一件长远的文化事业来做的，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在中国培养一点自由的种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做一点基本工作。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具备我们通常理解的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胸怀、知识和品质，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除了对学问的研究，他对于办报纸、办刊物这样的事业都有执著的追求。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即出版过小说集，后又做过大学教授，照理他完全有资格作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即在思想上保持绝对超然和独立，但对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和具体文化事业的操作则又缺乏热情。储安平在中国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中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典型，就在于他能够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一块生长的田地，甘愿舍弃自己在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设事



业，储安平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有这方面的热情和宽广胸怀，所以在四十年代末，《观察》才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镇。储安平是一个有清醒头脑和良好判断力的知识分子，他懂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的政局》末尾曾说过：“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sup>①</sup>这种博大高远的理想主义精神，不但体现在整个《观察》周刊上，也体现在同时出版的“《观察》丛书”中。

“《观察》丛书”，虽然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它和周刊是搭配平行的，成为《观察》社的两大业务，并同时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据储安平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是周刊只能刊载短文，而且多数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要出丛书，以便容纳有系统、字数较长的著作。二是有许多作者有出版物出版，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人，所以他们愿意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是当时一般出版界比较消沉，大家很少出书，而《观察》周刊略有盈余，《观察》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愿意以周刊的赢利来帮助丛书的出版，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前后一共出了十四种，分别是：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潘光旦/《政学罪言》

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

费孝通/《乡土中国》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sup>①</sup> 《观察》第2卷第2期第8页。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何永佶/《中国在戡星上》

费孝通/《乡土重建》

萧乾/《红毛长谈》

樊弘/《两条路》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神权》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

储安平/《英国采风录》

十二位作者，都是《观察》的主要撰稿人，除樊弘、朱自清和王了一没有列在《观察》封面下连署的“特约撰稿人”中外，其余都是。

“《观察》丛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好评。各位作者对于《观察》出书及时、印校认真以及支付版税迅速等都表示满意。“《观察》丛书”成为当时很畅销的一套书籍，今天看来，这些著作多数也成为研究每一位作者不可不读的重要资料。这套丛书多数再版，甚至连印四版，行销都在三千册以上，像张东荪的著作，一个月内销完五千册，在当时出版界萧条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得。

“《观察》丛书”基本上都是集子，新写的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动荡的环境和生活的不安，使许多学者难以安下心来写作系统的著作。储安平在当时也非常清楚这点，可当他设法改变的良好愿望尚未实现的时候，《观察》周刊既受到查封，丛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这套丛书的销路很好，但由于当时纸价的原因，对《观察》社来说，还是要赔本的。储安

平说：“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sup>①</sup> 足见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远大眼光和胸怀。另外，丛书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许多读者投书《观察》，希望发表书评，但储安平是受过西方民主精神熏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避嫌，他明确规定，《观察》周刊绝不发表任何《观察》出版社出版书籍的书评。虽是小事，但也可以见出储安平身上所体现出的真正民主风度。

---

<sup>①</sup> 《观察》第4卷第24期第6页。

## 《观察》报告书的意义

谢 泳

《观察》创刊以后，每出满二十四期，要由编者储安平写一篇详细的总结报告，为叙述便利，我以“报告书”称之。

在《观察》已有的历史中，储安平共写过四篇“报告书”，第五卷由于中途被国民党查封，所以空缺，第六卷为复刊后《观察》，由于基本方针已变，所以例行的“报告书”也自然消失了。现存四篇完整的“报告书”分别是：

第一卷报告书：《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第二卷报告书：《艰难·风险·沉着》

第三卷报告书：《风浪·熬炼·撑住》

第四卷报告书：《吃重·苦斗·尽心》

从“报告书”题目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储安平是想将“报告书”作为《观察》的一种风格延续下去的，这些“报告书”绝非一般应景式的总结，而是极其客观、严肃认真地向读者报告刊物的经营状况、发行情况以及编者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及一切苦衷和想法，这些“报告书”是研究《观察》最有说服力的

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储安平本人思想历程极为重要的资料。

作为一个笃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储安平在选择创办《观察》的时候，有过极为周密的考虑，他最终选定以办刊物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是在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支配下所做的严肃选择。

储安平在三十年代初即创办过《文学时代》，后来做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抗战时在湖南做过《中国晨报》的主笔，一生的事业与报刊结下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迈开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第一步。创办《观察》之后，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大年三十夜写的，由此可见储安平对《观察》的感情。在储安平的理想中，有一点非常可贵的精神，那就是他时时处处强调立言与行事的一致性。在记述《观察》创刊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得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发表的议论不相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储安平在《客观》周刊已初有影响的时候，毅然决定另立门户，创办《观察》，主要原因就在于《客观》只由他主编，而不由他主办，看到此事难有前途，所以他才果断放弃了《客观》周刊。从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所阐述的《观察》创办经过中，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主张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行事也时时以西方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冯英子在《回忆储安平先生》一文中曾说过，储安平一生最高的理想是

希望自己能办一份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靠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梦想缠绕了储安平整整一生，他的事业由这个梦想始，也由这个梦想终。储安平是一个极富浪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深远见识来自于对这种理想的执著追求，他始终认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可以在自己的手中变成现实。我们不能说储安平是天真的，因为《观察》在他手中存在近三年时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极其成功的。储安平作为一个成功的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远没有为人们所认识，他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参预政治的一个成功实践者，储安平是一个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上有过成功尝试的报人。

《观察》的“报告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年终总结，而是充满灵性、富有思想和创见的报告，虽然它是就某一具体时期刊物的整个情况而言的，但在其中，我们可以感到一个自由灵魂的跳跃，他是自由的，他是没有任何束缚的，他可以讲自己想讲的话，努力把整个刊物的一切都详细报告给读者，在报告书中，储安平每卷都做了极其认真的工作，他不仅统计了《观察》的读者分布，以地域分别报告，而且以行业分工为界，将《观察》的读者群详细地统计并报告给读者。

从报告书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储安平本人的思想状况，而且通过他翔实公布的读者情况，可以深入了解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储安平在第一卷的报告书中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清醒而客观的评价。这种认识是他创办《观察》的基本前提，也是《观察》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基本保证。储安平认为，当时国内已经拥有一批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也应当说话。他还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在此判断上，储安平认

定，《观察》确应当是无党无派的，说话公平，所以能够得到广大知识界的支持。他认为，像这样一种工作，有以全副精力努力的价值。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个刊物还可以鼓励一般自由思想学人出面说话。而他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实是因为他深切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当时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中国所极需。

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始终强调《观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而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允许各人陈述各人意见，他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自由”与“宽容”精神。储安平在整个《观察》时期，在言论的客观上，在识见的宽容上是有杰出表现的。《观察》的言论能够体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声音，与储安平的这种风度是分不开的。

储安平自己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他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以这种原则为基准评论国是，同时他所做的又是一种言论工作，而非组党工作。在这种信念下，储安平对于热心组党的人颇有微词，他认为“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他很赞同当时张东荪在《士的使命》一文中的观点，那就是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则是一种组党的做法。在此认识上，《观察》无意组党，所以没有具体主张，也无意去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储安平想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

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储安平在报告书中显得极有风度，无论报告财务还是本社同人的福利都很坦诚，绝无遮遮掩掩。尤其是对于自己，要求更是严格。在报告书中，他还专门报告了自己在办《观察》时期的活动情况。他说：“在过去的半年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刊物要维持它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理想，这个刊物绝不应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的为国家建设做长远考虑的理想是一贯的，在第二卷“报告书”中，虽然所说多为具体的刊物经营编辑情况，但这期报告书依然表现出储安平一贯的风格。他始终告诫读者，《观察》不仅是一个无党的刊物，而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的民营刊物。在经济上，《观察》的发行数是足以证明它可以自给，而无需仰求外援。储安平非常自信，对于《观察》的成功他有自己的评价，那就是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靠发行自给的。储安平还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不要消极，一面争取更大的目标，一面在自身的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一个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他希望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国家的生命。

《观察》出满第三卷时，由于储安平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时《观



察》面临被查封的危险，面对眼前的政治危机，储安平在第三卷的报告中坦言自己的心情，“在我们的心底里，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们另无其它。请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进，义无所辞。”

储安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观察》发生政治危机的时候，储安平对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来的有关民盟事件的评论都照发不误，毫不犹豫，没有任何利害得失的考虑。他所持的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这是何等的气度。储安平认为：“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到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了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煽我们，我们不会被人煽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

必能掌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仓皇中失去方向。”

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储安平为《观察》第四卷写了“报告书”，虽然有关查封《观察》的信息传得沸沸扬扬，但储安平的态度很坚决：“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 Nonparty 和 Independent 两字，Independent（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示出它的光彩。一九四六年，曾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的费正清在一篇报告中曾说过：“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储安平及《观察》在抗战胜利后的出现，可以说为费正清的判断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解。曾经留学英国的储安平详细考察过英国的政治情况，并分别写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书及许多介绍英国工党执政的论文。超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使命，使储安平在《观察》时期成功地为自由思想的传播作了很大的贡献。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储安平虽然没赶上像胡适年轻时那样开一代风气的历史时机，但他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不仅在思想上信奉自由主义的理想，而且身体力行，他没有像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跻身于激烈政治斗争的漩涡，也没像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有直接介入的兴

趣，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形象，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都有待于我们重新认识。

1993年12月

## 《观察》撰稿人简况与分析

谢 泳

我把当年《观察》撰稿人的情况列了一个简表，并做如下分析：

第一，从《观察》撰稿人的年龄结构上看，大体有两个年龄段，其中一个是以胡适、马寅初、许德衍、任鸿隽、傅斯年、张东荪、萧公权、冯友兰、胡先骕等一批十九世纪末出生的，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约占《观察》撰稿人的百分之十左右。在《观察》时期除部分人外，这批人不是最活跃的。在《观察》时期，胡适是年龄仅次于张东荪、许德珩的一位，但胡适在《观察》上没有多写文章，虽然储安平作为后学曾多次给胡适写信，请他为《观察》撰稿，而胡适只在《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人性格的信。从当年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几封信中，可以看出储安平在精神上是将胡适视为自己的前辈和领袖的。这可以说明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与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储安平是当年《新月》社晚期的一个撰稿人，而《观察》在整个办刊思想甚至具体的编务方面都带有二十年代《现代评论》、

《新月》的色彩，这种联系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承传关系。

第二，《观察》撰稿人主要是二十世纪初出生的人，具体时间约为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前后。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因为单从年龄上看这个阶段出生的人，在当时都在五十岁以下，其中多数人是未满四十岁，无论在专业、思想，还是勇气和精力上都是人生最佳年龄时期。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一九五七年，从那以后，《观察》撰稿人一个是年龄基本要步入老年，更重要的是来自政治上的高压和专制，已使他们那颗自由的心灵深深埋入了内心。为了生存，要么完全退入到自己的专业范围以内，要么是在思想上被迫作一些妥协，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发现一九五七年以后《观察》撰稿人一直保持平静，甚至偶尔也写一点违心文章的缘故。

第三，从《观察》撰稿人的受教育程度看，他们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主要范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

第四，从留学背景看，《观察》撰稿人除个别人是留日的以外（约有三入），其余全部是留学英、美的，约有四人是留学德国的。

第五，从《观察》撰稿人的职业分布看，除了个别人为政府官员如陈之迈、郭有守等人外，大部分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教授。从专业分布的角度看除任鸿隽、戴文赛、胡先骕、曾昭抡等少数从事自然科学外，多数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中尤其以从事经济、法学、社会学、新闻和文学的为多。

第六，一九四九年以后，《观察》撰稿人中约有十儿人离开内地先后到了美国和台湾，其中绝大多数人留在了内地。这

个统计非常令人深思，如果从个人生活的基本情况看，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一九四九年都绝对有离开内地的条件，但他们没有离开，他们虽然对时局的变化都有自己的看法，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都有清晰的认识。比如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可以说已经预见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对于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至少不会对未来没有一点自己的评价，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留下来了。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去解释他们去留中所隐含的文化根源，但只要相信大部分人留下来这个统计，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对国家民族所抱有的赤诚进行怀疑。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却没有理解他们这批人选择中所包含的民族感情，他们差不多都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摧残。虽然《观察》的撰稿人中有像杨刚、徐盈、李纯青这样的共产党人，但多数是无党派人士。

第七，一九五七年夏天，《观察》撰稿人中有很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其比例是相当高的。费孝通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的时候，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虽然文章已远不如《观察》时期的生动鲜活，大胆直言，但他也难逃“右派”的命运；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倒是仍能见出他的一贯性格，其命运也就最为悲惨；萧乾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结果难逃厄运；还有马寅初、雷海宗、曾昭抡、徐盈、傅雷、钱端升、潘光旦、高觉敷等人。对活跃的《观察》撰稿人来说，一九五七年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劫难，一方面执著的自由主义信念使他们不会在专业之外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国民党时期放言论政的经历，加上对引蛇出洞卑鄙伎俩的轻信，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结局再坏能坏到哪里？总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吧？然而他们过于轻信别人了，将要到来的灾难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到了一九六六年，

《观察》撰稿人中的许多人像傅雷、储安平、潘光旦、曾昭抡等就已先后离世了。如果再將没有列在《观察》撰稿人名单中，但给《观察》写过文章的浦熙修、彭子冈、徐中玉、邵燕祥等人的结局统计在内，就更能见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命运了。

## 储安平 费孝通 钱钟书： 《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

谢 泳

在研究《观察》撰稿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三人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思路使我不得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把他们三人的经历、学识以及政治上的遭遇加以比较。虽然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将这三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加以比较（特别是还有两位今天健在并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做法是出力不讨好的，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把他们联系起来。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大体代表了《观察》撰稿人中的三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他们三人都是有专业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储安平算是没有专业的），他们都曾做了《观察》的撰稿人，说明他们是关心政治的，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尚能对社会进步投入一部分热情，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起码条件。不过他们关心政治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来自于三个人各自性格和兴趣的不同，但也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价不同有关。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直到今天在中国政治生活



中的地位。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政治的方法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储安平属于这一种人。

第二种人即通常人们所谓的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第一种人超然，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费孝通属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看透政治并厌恶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绝非不关心，但这种关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退入内心，对政治冷眼旁观；一种是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中，当然他们不是借学术来抒发对政治的不满，而是从内心深处对政治存有一种戒心。钱钟书就属这类人。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都是一九一〇年出生的人，在《观察》时期，后两者都曾和储安平有过一定的交往。在《观察》近三年的历史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都是一九四七年作为《观察》丛书出版的），仅署真名的就有三十四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专业之外，不是关于社会学研究的，而是关于中国政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后来曾回忆道：“《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

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费孝通作为知名的社会学家，对政治却一直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受其兄长费青的影响，很早就参加过政治运动。他曾经试图退入纯粹的学术专业中去，但对政治的热情又总把他从专业中分离出去。他曾说过：“两年以后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一九五七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一九五七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一九八〇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在《观察》时期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

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五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封信。我们来看一下钱钟书这四篇文章的题目：

《说“回家”》

《补评英文新字辞典》

《游历者的眼睛》

《杂言——关于著作的》

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是完全远离政治的。储安平就认为：“钱钟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尤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但钱钟书在《观察》上却只写了几篇简短的可以说是学术随笔之类的小文章，由此可以见出钱钟书对政治的态度和他对政治特有的回避方式。这也能使人想到《围城》，在抗战结束以后，有多少作家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消解在永恒的日常生活主题中。难怪当有人跟钱钟书说到，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我不如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是一个比较 *retired 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虽是信口说来，倒也能见出钱钟书的真性情。在《观察》撰稿人中，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一九五七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一九六六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菜了。其实钱钟书对政治有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干校

六记·小引》中，他写到：“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钱钟书对于灾难的评价依然如此平静，这符合他的一贯性格。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如果单看他们一生中的某一段历史，那是令人敬重的，但如果考察他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值得尊敬，多变是他人生最大弱点。但人们评价一个人物，常常会以他们晚年的忏悔或逢人作揖，见人道歉而使人们不计较他的以往。我对这种人大不以为然。一些曾经迫害过大批知识分子的人在晚年的忏悔固然能够赢得一些人的好感，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懂得，你要对那些特别容易忏悔的人加以提防，他们有一次忏悔，可能就有一千次，对他们的忏悔给予正确评价的时候，绝不要忘记他们当年的作为，比如像周扬这样的知识分子。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同年出生，同为江苏人，同为受过比较严格的传统教育和完整的大学教育，又都曾留学英美。

事后分析，三人最终的结局或许从《观察》时期就已经预示了。

储安平热衷于政治，以办《观察》达到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以接任《光明日报》总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储安平是执著的。对自由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推上了历史的最前沿。在一九五七年几乎所有的“右派”言论中，储安平的言论是最清醒、最深刻、最能看出问题根本所在的人，这是他比他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更为人尊敬的地方。一九五七年一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储安平一九四九年以后写的唯一一本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虽然这本以歌颂一九四九年以后新疆新生活的通讯集可能真实地反映了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某些真实感情，但对储安平来说，这种纯粹游记性的文章从另一面说明了他的不得已，从储安平历来对新疆问题的兴趣看，他应该写的绝不是这类文章。储安平的悲剧说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选择中，深刻、清醒、执著的追求也是最不幸最艰苦的追求，纯粹的超然物外或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都比一味地按自由主义的理想行事要安全得多。从办《观察》的储安平到办《光明日报》的储安平都是一个人，但《观察》结束了，却没有结束储安平的生命，《光明日报》没有结束，而储安平的生命结束了。

# 自由主义在战后中国的起落

——储安平及《观察》的撰稿群

汪荣祖

## 一、前言

国人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若从严复算起，已有一百年之久，远早于另外二大世界性的思潮——法西斯主义与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但自由主义却是三大思潮中最失败的。探究失败之因，其故诚多，然最无可置疑者，乃是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一直未能与政治行动相结合。直到今天，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尚无一个完全以自由主义为政治理念的政党出现。

自由主义得以成长，须有条件，众所周知的，若中产阶级、有秩序的公众社会等等。但这些条件未尝不是按照西方社会量身裁衣，未必有当。其实，任何外来思想都须适应本土文化的土壤，始能成长、流行。史家陈寅恪于此早已有睿智明识，毋庸多赘。就自由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势力而言，八年抗战胜利后，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由于抗战，共赴国难，政治上自有较多的团结与容忍，党外人士亦获致参政的机会。二

次大战结束，法西斯轴心国家惨败，民主与自由的浪潮空前高涨，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自然受到莫大的鼓舞。国共对抗之势虽已形成，然而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党外，若能在国共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力量，无疑可能在战后中国，发展政治空间，参与政治建设。是以，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以及国内的小气候，都颇有利于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奋起。但是此一良机仍然失去，自由主义依旧失败。一般泛论，仍以条件不足为说。本文则试从具体史实，说明战后自由主义的起落。

关于“自由”一词的近代用法，应肇自严复翻译的“自繇（由之古字）论”，出典在唐代柳宗元的诗句：“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严复自称：穆勒（John S. Mill）所谓自由，即此意也。至于谁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既尚无自由主义政党，只能广义地包揽所有崇尚自由与民主，以及超越党派的知识分子。如严复与梁启超都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但严格而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梁漱溟在思想上根本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但他在政治上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努力，亦可将他归入广义的自由主义“族群”。

抗战胜利后，最“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结合，应是储安平及其主编《观察》周刊上执笔的一群。以自由主义旗帜之鲜明，聚集人数之众多，以及言论影响之广泛，实无出其右者。这一群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其活跃的时代里，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 二、储安平与《观察》

储安平成为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也能坚持其信念，亦因而命途多乖。他早年受到《新月》的影响，到英国留学时，更受到英国民主政治的启迪，成为一个心悦诚服的亲英

派，尤其信服英国人习以为常的自由、正义与公平竞争。总之，基于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英国“公众社会”，为储安平提供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具体模式。较之抽象的学理、学说印象当更为深刻。

抗战既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日深，储安平自英取道回国，与许多知识分子一同流转西南，曾在湘西的蓝田师范学院讲授英国史与英国宪法。到抗战末期，他已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聚集于重庆，讨论战后中国的重建问题。他与他的同道们热切盼望，新中国将建立在民主与自由的基础之上。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着力于舆论，以鼓励民主与自由的风潮，遂于一九四五年之冬，先创办了较为简陋的《客观》周刊。较为像样的《观察》周刊虽在重庆企划，却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始正式创刊于上海。

《观察》一九四六年创刊到一九四九年停刊，发挥了颇为强大的言论力量，有所谓报刊史上“储安平时代”的美称。《观察》对其读者也作了统计与分析，读者群从大学教授到军公教人员，包含了各类知识分子，销售量最高达到十万份。此一数字可作为《观察》具高度影响力的旁证，类似刊物如《东方杂志》从未达到此一销量。五四前后，名震一时的《新青年》也未曾超过三万份。而《观察》销数上升之时，正值战后经济破产，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的时候。《观察》虽不得已而一再调高售价，并未阻挡读者踊跃订阅，尤难能可贵。

《观察》的言论，标明是“自由主义刊物”，属于自由分子或自由主义者，并强调自由主义四大要素：自由、民主、进步与理性，以及明确号召全民选举、两党政治、言论自由、生活保障等。主要执笔者几包揽了当时最具名望的学者与社会贤达，其中不少是北京、清华、武汉等名校的名教授，诸如傅斯



年、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张东荪、樊弘、杨人梗、吴世昌等等。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具有共识，对于政治上的民主化，以及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科技的现代化，亦具有同感。只是将自由主义理念付诸实施的方式与途径，容或不同；政治立场有亲国或亲共之异而已。

然而不论政治立场亲国或亲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建设自由与民主中国，必然期望国民政府作出实在的政治改革、容纳异己、以及极力防止国共内战，而内战是否可以避免，与政治改革的成败，实有密切的关系。

政治改革有赖于国民党的诚意与决心。然执政的国民党，有鉴于战后的乱象，不愿放弃独裁，巩固政权较政治改革，更为迫切，于共产党尤不能信任。共产党固然拥有军队，但国军并非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国民党的党军。国共二党都拥有武力的现实，自由主义派以及所有第三势力人士，都认识到，并无幻想。但是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压力下，仍有改弦更张，走向民主改革的希望，而共产党在民主改革的压力下，也会不得不放弃武力，参与联合政府，从事和平建设。他们虽然没有军队，但在战后的环境中，颇有施展政治压力的余地，何况一旦联合政府组成，于民主协商运作下，更有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产生影响力，以及政治制衡的作用。至于说，国共二党既各拥庞大军队，除决一雌雄外，别无他念。以这种宿命论来否定两党之外人士的和平努力，绝非公允之论。

政治改革既有赖于执政党，则对执政之国民党的督促与批评，自属难免。《观察》望之切、责之厉的言论，也十分明显。但是执政党既无改革诚意，又对批评者十分敌视，视若共产党的同路人，并施加迫害，以至于将中间派逼上梁山。费正清即曾于一九四八年在《纽约时报》投书，惋惜国民政府将自由主

义者驱向对方的事实。按诸《观察》的言论，最初对共产党的疑虑，远甚于国民党，终于因国民党缺乏改革诚意，又提升政治迫害而转变，甚至寄希望于共产党，可以为证。若谓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一鼻孔出气，自宜镇压之；后来遭清算，更属活该，以此否定他们当年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胆识与努力，不免一偏之党见，殊非正论。至于说，自由主义派之批评导致国民党的垮台，此种“热情”，更难以符合冷酷之史实。即以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之死，有谓不亚于授人军队五师。纵非夸张之言，其主要威力并非言论之犀利，实乃军特谋杀之反弹。执政之党，不听净言，一意孤行，卒遭惨败，竟归罪于他人，更绝非公允之论。

国共和谈破裂之后，内战全面爆发，无异是战后民主建设的致命伤，凡属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分子，无不强烈反战。此一态度于交战的国共二党都不讨好。国民党方面认为反战是帮共产党的忙、拆政府的台；共产党方面则认为反战是反革命，中立派乃骑墙派。无拳无勇的自由主义分子，遂沦入极其无奈的窘境。……

### 三、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影响

美国政府曾积极介入国共和谈，以战后美国国力之盛、马歇尔之尊，竟无法阻止中国的内战，必然有故。其症结或可于美国与中国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关系，略见端倪。就意识形态而言，自由主义应是美国的宠儿，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未提供任何实惠，甚至并不站在一条阵线之上。中国自由主义者亦因而对美国由失望到批评，甚而严厉谴责。主要原因乃战后冷战格局已逐步形成，在此一格局之下，美国国家利益，并不在中国扶植自由主义，而在支持明确反共的蒋

介石政府，在此一考量下，美国调停国共和谈，固然不可能公正，也无余力施展有效的政治压力，促使国民政府改革。蒋介石显然对美国的政策，洞若观火，知道美国为了反共，不会太难为他，大可摆摆架子，让马歇尔六上庐山，欲迎还拒。国民政府若不作彻底的政治改革，容纳异己，筹组联合政府，则内战势不可免，而对国民党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因受制于其本国利益的考量，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

同时由于冷战的发展，美国国内的右派反共势力大盛，麦加锡主义亦已抬头，形成强而有力的亲蒋“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国民政府有此后盾，更无意妥协，遂一意打压反对势力，欲一举而歼灭“共匪”。如火如荼的内战，一战而不可收拾。

内战既起，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仅在国共之间两面不讨好，而且遭美国之遗弃。他们对美国的失望，甚至怨恨，显而易见，并见之于《观察》杂志上。他们指责美国一意袒护不民主的政府，想以中国为美苏决战的战场，不惜将中国的利益，作为美国战略的牺牲品。他们对于美国为了冷战，扶植日本，亦大为不满。

此一情况，毫无疑问地导致不少自由主义者向左转。而此一左转，不仅仅是政治态度，而且是思想趋向。自由主义原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而地主与官僚仍垄断经济命脉。傅斯年即曾因公开批评官僚资本而声名大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因而得到一种结论：社会与经济必先解放，然后才能谈政治上的民主与自由。这就与中共的看法有近似之处了。

南京的国民政府迟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政治改革仍无具体结果，予人有“空谈”的印象，更令自由主义者深

信，当前要务已不在政治改革，而在于“封建社会”与“剥削经济”的解放。此一思想上的左倾，对共产党的疑惧亦大为减弱。罗隆基即曾对美国人说：共产党固然不会比国民党更容忍自由主义者的活动；至少共产主义对极大多数的群众而言，是很好的，因而值得支持。他认为受到压迫的大多数推翻少数特权阶级之后，才能真正走自由与民主之路。这无异说：自由来到之前，须先有平等。实质上已认同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亦因而有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信念与共产主义之间，并无矛盾；即使有矛盾，也可以化解。连偏右的萧公权也主张“自由社会主义”。

战后中国自由主义在思想上与共产主义妥协之余，也开始与传统中国文化妥协。梁漱溟一直对西方民主制度持保留态度。国民党宪政试验的失败，至一九四八年已极明显，似乎证实梁氏是对的。张东荪的学术背景原与梁漱溟极不相同，但此时却赞同梁氏所说，不能轻言假借西方制度，并因而主张一种介于美、苏之间的“新民主”，以及赞成计划经济，实已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连张东荪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所想保留的仅是“文化自由主义”，主要内容只是言论自由。张氏似乎没有想到，在极权体制下，言论自由也谈何容易。

当国民党在内战中转为劣势时，全国社会经济更形混乱，政府对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异己分子的政治迫害，亦随之加剧。有许多人逃往香港避难，还有一些人因怕迫害而屈服，有更多的人已向往共产党，希望中共早日胜利，以利早日结束内战恶梦。

储安平自沪飞平，在围城北平遭通缉。至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三日北平解放，作为自由主义者储安平的“自由”，却因而获得。《观察》亦随之复刊，更名为《新观察》，但是《新观

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可能再成为自由主义的象征了。

中共的军事胜利，以武力统一，使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第三势力，政治筹码全部输光，不再有中间活动的空间，政治影响力亦迅速消失。

回顾历史，战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固有其严重的弱点，但对情势的发展，看得很清楚，并无幻想，只是他们的命运并未操在自己手中，万分无奈。自由与民主为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欢迎，反对内战更是极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但自由主义者无法将此一共识，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更起不了领导作用。所以如此，除了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外，外在的恶劣环境，更不可忽视。国民党的专政固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亦属不利。至于内战爆发之后，日渐恶劣的社会与经济危机，更迫使自由主义者放弃许多自由民主的原则。最后在内战中成为“夹心饼干”被迫放弃中立。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选择左倾，其实，他们对共产主义，并不曾一厢情愿地接受，只是觉得战乱中的中国，自由主义已不相干。与社会主义妥协，不仅可行而且是正确的。就储安平本人而言，当国民党政府通缉他时，已别无选择。一九四九年以后，储安平及其自由主义伙伴，大部分留在内地。他们的命运，很可以说明自由主义在战后的命运。

不过，历史仍在发展。我们还不能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已到了“历史的终点”。内地的改革开放，应可结束将近百年的“革命中国”，自由主义在百花齐放中，亦应有其再起的契机。

台湾在八〇年代到来之前，也是自由主义的“黑暗期”，可以从胡适、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不同遭遇，看到自由主义的命运。但是近年政治改革与开放，也给自由主义在台湾再起的希望。

我个人并不迷信自由主义，我赞成萧公权先生早已提倡的“诸子配孔议”，也就是文化与思想上的多元化，中外兼容并包。西方的自由主义亦自应有“生存的空间”，但是如何使外来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不同的文化土壤上成长，仍然是一个没有过时、值得深思的问题。

1993年8月15日据讲演稿撰成

## 《观察》的前身《客观》周刊

谢 泳

四十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都成了《观察》周刊的特约撰稿人。

《观察》的前身即是由重庆《客观》周刊而来的。储安平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sup>①</sup>

<sup>①</sup> 《观察》第1卷第24期第3页。

《客观》周刊一共出了十七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sup>①</sup>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与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份《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sup>②</sup>

储安平是一九四六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十二期《客观》周刊，从第十三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十三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十二期。当时他们以为一九四六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十二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十二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sup>③</sup>

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特约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

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

① 《观察》第1卷第24期第3页。

② 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黄河》1994年第2期，第74页。

③ 《客观》周刊第12期第2页。



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sup>①</sup> 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

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

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不久他要创办《观察》的消息就已传开。据当时出版的《上海文化》记载：“伍启元编《观察》周刊定于九月一日出版”。<sup>②</sup> 虽然误将储安平说成伍启元，但可以看出《观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说：“储安平为主持《观察》周刊，辞去一切职务，并对于撰稿人及到沪者一律负招待之责。”<sup>③</sup> 储安平对办好《观察》充满信心。

① 《客观》第1期第1页。

② 《上海文化》第8期第25页，上海文化服务社出版。

③ 同上第9期第6页。

《观察》的栏目设立，基本上延续了《客观》的风格，只是没有了像“《客观》一周”这样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的这个专栏，在前十二期中都由储安平执笔撰写（第六期为吴世昌撰写），是了解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言论。

## 《新路》与《观察》

谢 泳

《新路》与《观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将两个几乎同时期出现的刊物连在一起，是从其内在精神的一致性着眼的。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的命运更引人深思。

由于《新路》比《观察》更少为人所知，我想先介绍一下有关《新路》的情况。

先从萧乾与《新路》的关系说起。

萧乾在晚年回忆起一九四八年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曾这样说：“足足三十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在一九五六年解下过几个月。”（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

从萧乾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对于《新路》周刊，过去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

萧乾回忆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

半载再回沪。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到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

萧乾是一九七九年说这番话的，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于他为自己辩解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以萧乾当时的处境，让他承认《新路》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刊物也不现实，从高压下生存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境是常人所以难以想象的。不过萧乾在回忆中的第一条显然是记错了，《新路》的封面上并没有标明是“吴景超主编”。对于萧乾的这番辩解，巴金在一九七九年写给萧乾的一封信中倒是保持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巴金说：“还有关于《新路》(?)的那段话不大好。说到自己，如能检查，就诚恳地讲几句，如想不通，或不服，就避开不提，最好不要替自己辩护。要辩最好等时机到来，一下子讲清楚，吞吞吐吐比不说更坏。”（《巴金书信选》）

事实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底，萧赴北平参加社会经济学会。会上决定筹办《新路》杂志，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刘大中负责经济栏，萧乾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二栏。（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第二十三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凌宇《沈从文传》中所述萧与沈的矛盾与分歧，与当年沈未参加《新路》的筹办有关。见该书四一三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现在我们再回到《新路》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在三月二日的会员大会上，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了著名的“三十二条主张”，并决定

主办《新路》周刊。《新路》的创刊号是一九四八年五月份出版的。创刊号在第二页刊载了《发刊辞》，在封底以附录形式，全文刊载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即“三十二条”主张。创刊号在文艺栏中刊载了萧乾的《柏林那趟》，楼邦彦在“专论”专栏中发表了《当前中国的行宪问题》。他们两位同时是《观察》的特约撰稿人。

《新路》周刊完整地出了第一卷，共二十四期，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卷出至六期，即停刊，时间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新路》在第二卷第一期上曾发表过一篇《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是针对国民党令其停刊的决定而发的，从中可以看出大学教授创办刊物时的心情和不计个人私利为国家前途着想的急迫心情，我将全文抄在下面：

#### 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

本月二日，本刊接到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崇三（37）字第二三四五号通知，原文如下：

“奉市政府交下内政部三十七年叁字第一五五一六号代电内开：查新路周刊九月四日出版之第一卷第十七期所载：‘新金圆券发行总额的规定’，‘总统有命政院有令地方遂执法以绳’，‘北平大捕学生记’，‘小休局面中的华北情势’，‘天堂噩梦’各文，言论反动，诋毁政府，同情匪军，袒护匪谍，破坏币制，煽惑人心，实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项之规定，应予严重警告。又该刊原登记系在北平出版，近复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核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五条之规定不合。除分电上海市政府，通知其停止刊行外，相应电请查照转知警告并见复等由，节飭办等因，奉此，合予严重警告，特此通知。”

在北平市社会局转给我们的通知里面，转来内政部对于本刊的严重警告，并责备我们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关于这两点，我们愿意在这儿公开答复。

在内政部所指摘的五篇文章中，有两篇是短评，三篇是通讯，前者是批评时事的文章，后者是报道事实的文章。关于批评时事，本刊素来抱着一个见解，就是在宪政之下，政府是公仆，人民是主人，公仆所做的是否对于主人有利，只有主人知道得最为清楚，因此主人对于公仆的行为，有尽量批评的权利，公仆对于主人的意见，有虚怀接受的义务。这是宪政的国家中，政府与人民所公认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我们的政府，过去在一党专政之下，养成了一种傲慢的心理，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政府是服务人民而设，以致一切的行为，多与人民的利益脱了节。过去在专政之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总算持起宪政的招牌了，但是政府中的公务人员，还没有把他们那种傲慢的心理扭转过来，还不知道虚怀的向人民领教，还想以威力来压迫人民言论的自由，这实在是可以惋惜的。我们愿意忠告政府，批评时事，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政府只有接受人民的批评，才可避免更深的腐化。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不知反省、不求自新，只知压迫逆耳的正义，长此下去，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前途，是谁都可以预料得到的。

关于报道事实的文章，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客观的事实，告知全国关心国事的读者。事实发生在全国的各地，各地也有人在那儿观察。这种观察，因为个人的耳目难周，所以本刊对于各期所载的通讯，决不把他与实验室的报告同样看待。实验室的报告比较更为客观，因为在实验室中所观察到的事实，要经过好几次的审核之后，才发表出来的。我们对于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无法作审核的工作。因此，凡是读者

发现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有与实际情形不符之处，只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把他公开，以供读者的参考与判断。譬如我们曾登过一篇通讯，是报道开滦煤矿情形的，负责办理开滦的人，指出其中有几点与事实不符，我们便把这封来书登出，表示我们对于事实的报道方面，完全采取求真的态度，不歪曲事实，也不隐蔽事实。政府方面，假如觉得我们的通讯中，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只要来函更正，我们是愿意登出的。同时，更正的事实，是否即是事实，我们也不加判断，那种工作，应该是由读者自己担当起来的。

以上是我们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通知中还有一点，完全是出于政府的误会，我们应当在此声明。本刊的编辑及发行工作，都在北平。但以目前交通不便，邮运很难，为节省物力起见，为减轻读者的担负起见，所以我们在上海印航空版，由北平打好纸型，在上海印刷一部分，供给南方本刊读者的需要。我们这种做法，一可以节省航空公司的吨位，二可以使本刊在南方售价，不致高于北方，因而可以节省本刊读者的费用。这种办法，有百利而无一弊，现在不但本刊有这种办法，同业中采取这种办法的，也有好几家。假如政府是爱护舆论的，我们看不出政府对于这种办法，有何反对的理由。我们要问政府的，就是在另一地加印航空版，是否即算是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如此种行为，并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内政部要我们在上海停止刊行，便等于无的放矢。如政府以为加印航空版，即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请政府立即允许我们在上海出版发行。北平与上海，都是中华民国的版图，我们看不出一个刊物，为什么可以在北平发行而不能在上海发行的理由。

最后，我们愿意借本刊第二卷开始刊行的时候，重申我们在发刊词中已经表示过的态度如下：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以谩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在以往中国的现代史研究中，对于《新路》，都未能从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命运的角度出发，深切理解他们的苦心，对他们所阐述的主张都笼统地以走第三条道路，不切合中国的实际，过去中国的国情没有允许它实现，今天更没有实现的可能了等观点加以否定，而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观察》将要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新路》才创刊。当时国内的形势，这些大学教授绝不会毫无察觉，如果有一点为个人考虑的投机心理，完全可以作另外的选择；即使不投机，做静观的姿态，也不会去创办《新路》这样的刊物。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除刘大中去了美国后赴台湾以外，留下的吴景超、钱端升、萧乾全都成了右派。《新路》在一九四八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和热情，也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这种愿望的最终落空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首先我们有足够的历史事实证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四十年代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其次，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于他们中未能产生一个既有现代思想，而又扎根



传统的有魅力的领袖人物，更在于没有找到将现代和传统连接起来的東西，从短暂的历史中看他们似乎失败了，但从更长远的历史看，我们又可以说真正鼓舞后代人的理想主义正是由他们开始的。

储安平本人没有给《新路》写过文章，但《观察》对于《新路》的创办是有反映的，在《观察》第四卷第四期上曾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新路》的创刊给予充分的肯定：

编者先生：本月一日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定名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同时公布三十二条工作纲领，计分为政治主张，外交主张，经济主张，社会及其他主张四个部分。此会领导的人颇多知名之士，包括实业界教育界中坚分子，于是社会上便发生种种的传说，说这是中国“新第三方面”者有之，说此会是司徒雷登所支持者有之。它已相当引起人们的注视。

关于这个会的一切详细情形，固然尚有待今后报道，不过它的性质及主张目标，大体上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以为这个会并非政治团体，更非政党，所以说它是“新第三方面”，似乎离题尚远，可是说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团体，恐怕也非事实。或者说它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个新社会团体，似乎近于事实些。

在现在这种沉闷、各阶层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时候，只要有人肯出来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我个人一概赞成。因为再长此窒息下去，人们的精神的痛苦超过物质的痛苦，的确是国家的最大危机。所以由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先站出来拿出鲜明的主张，号召更多的民众，使政治上的空气流通流通，客观上大有必要。同时，我个人一向很恭维英国的费边社同工党的关系，可惜中国还没有一个费边社，学术

界的朋友们是有其责任的。……

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显得更专业化一些，尤其偏重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但这两个刊物除了内在精神上有相近的一面外，在刊物形式上也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时评刊物，两家都设有专门发表文艺作品的专栏，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增加刊物可读性考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文化修养，因为给这两个刊物撰稿的许多人都对文学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在《观察》“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专栏中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教授，而且其中有些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两本周刊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同时在办刊宗旨上也几乎完全是以欧美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为基本规范的。

1993年12月

## 储安平的《英国与印度》

谢 泳

上海张新颖先生知我对储安平有兴趣，他在复旦图书馆查到一本储的旧著《英国与印度》，复印后寄给了我。

储安平的这本书，据我所知，过去有关储安平的资料中都没有提及。从储安平给该书写的序言中知道，本书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完成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同年六月由科学书店发行。科学出版公司原在武汉，抗战时迁到桂林，公司老板是宋乃公。储安平说，他这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两个人，一是陈之迈，一是俞颂华。宋乃公系俞颂华旧友，本书的出版可能全赖俞颂华的介绍。查《俞颂华文集》中俞夫人钱梅先写的《纪念颂华》一文，其中提到俞颂华在重庆南温泉时，“储安平、俞庆棠等到重庆时，都要到南温泉来看他”。可见储安平和俞颂华的交情。

这本《英国与印度》是储安平在蓝田师院的讲演稿。储安平说：“他自始至终未尝蓄意在本书标题下撰制论文，因他深知他对于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并无充分之知识，只因他所执教的学校邀他讲演，一时的兴会终使他草成此稿，因之，本书的题

材自不能如通常所希望的那样严谨，而材料的出处亦多未能一一注明。”储安平自己可能对这本书也不重视，所以一直不为人知。这本书虽多是介绍性的文字，但从中能看出储安平对英国历史的熟悉程度。储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过，对英国的方方面面都很了解，他的《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二书多留意英法两国的政治制度，而从《英国与印度》一书中，可以看出储安平对英国的历史是做过较为深入研究的，这些素养直接影响着储安平一生的事业，他的整个思想状况与他对英国的研究有密切关系。

1996年12月23日

## 储安平与他的前辈

谢 泳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很留意储安平这个人物，理由是在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储安平是一个很看重言论，并试图为言论界闯一条路出来的人。抗战胜利不久，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很快又回上海，为《观察》的诞生做准备工作。四十年代的储安平在传播自由主义的理想方面，有很强的自觉意识，《观察》周刊后来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与储安平有意识地要延续自由主义的传统很有关系。《观察》创刊不久，他曾给胡适多次写信，表明自己的理想，渴望求得他的帮助。《观察》周刊后来的风格，大体是继承了《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的办刊传统的，在储安平创办《观察》的时候，他的重要撰稿人中，他所寄予厚望的就是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这样的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储安平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交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页）从给

《观察》写文章的数量看，陈衡哲、任鸿隽夫妇也是热情很高的。过去我们已知道储安平致胡适的信，近年又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辑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见到储安平给傅斯年的信，这几封储安平给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信，传达的是一个声音：希望你们支持《观察》，《观察》是延续你们当年办刊风格的。储安平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法可想。”（该书第229页）储安平是晚胡适、傅斯年一代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前辈却有比较健康的心态，《观察》在兴盛时期有那么多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给它写稿，与储安平的这种气质是分不开的。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这样的前辈，固然与和他们的思想上的一致性有关，但也与他们的人格有关。同样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对罗隆基就有看法，他并非反对罗隆基的思想，而是对其为人有看法，他在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就说过：“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观察》2卷2期）按说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本应该和罗隆基接近，因为罗隆基曾是光华大学的教授，而储安平是该校的学生。储安平在前辈知识分子中真正看重的还是那些学问和人品都高的人，这是储安平一生中很重要的性格特征。除了胡适、傅斯年等人外，他和梁漱溟、张东荪这些极有风骨的知识分子都有较好的关系。《观察》创刊不久，时在美国的任鸿隽就给储安平写信：

“敬悉此刊已如期诞降，以先生之精神与努力，定能为我国言论界放一异彩，树一特帜，谨此道贺。”几乎同时，陈衡哲也给储安平写信：“日前拜读创刊号中之《我们的志趣和态度》，感到无上欣慰。国事如此，社会一般情形又如彼，若非有后起英秀如先生者，我等之灰心将更无法挽救矣。来信殷殷以哲等之同情为念，感与惭并。哲等之所以感到兴奋，亦是同声相应，欣遇同志耳。”（《观察》第1卷第9期第23页）此后陈衡哲对《观察》和储安平很是关心，储安平发表《中国的政局》之后，梁漱溟曾对其中的一个观点提出批评，而陈衡哲却对储安平立志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苦心表示理解，并给他写了长信予以鼓励。

从储安平对前辈知识分子的敬重，可以看出他是立志承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言论界的职责的，他的这一理想也得到了许多像陈衡哲夫妇那样前辈的热情鼓励，而且从《观察》存在的近三年时间内，它所做的努力证明储安平也是能担得起这个责任的。

1997年

# 士气与正气

## ——储安平致傅斯年的两封信

程肇父

今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艳阳和煦春物骀荡，我到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去看九十高龄的邓广铭先生，见到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逯耀东教授刚刚给邓广老寄来的一册《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心艳羨之。这是由“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主持印行的，编者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汎森、杜正胜两先生。不久，我赴山东聊城参加“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讨论会”，杜先生竟托王先生带给我渴望得到的这本书，使我大喜过望。傅斯年先生一八九六年出生，一九五〇年卒，享年五十五岁。他的生命虽短，却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界开宗立派的人物。在“友人书信选”部分，我发现了一封储安平致傅氏的信，这又是使我大喜的一件事。我的朋友谢泳是研究储安平的专家。他撰写的《〈观察〉研究》书稿，我在一九九四年就读过了。我鼓动他在该书的基础上再为储氏编年谱、写传记。此话说说轻巧，而冷静一想，对当事者来说，岂不戛戛乎其难哉？谱（传）主失踪已经三十年了。而失踪以前彼人又是患的政治麻疯病，故其最后约十年的情况几乎无人得知，亦无人可



访。他的消失，恐怕就像建文帝的消失一样，永远是个谜，永远没有一点线索，永远无迹可寻。他的门人、学者张啸虎十年前曾感叹道：“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都重新活跃起来，每当我从报刊上读到他们的言论，通过荧屏重睹他们的面容，备感亲切和欣慰，但又往往涌起一点怅惘，不禁心中默念：‘安平老师，您到哪里去了呢？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储安平老师的文章，但究竟是‘怀念’还是‘悼念’呢？老是捉摸不定，因为我至今尚未确知他的下落，也不能断定他是否尚在人间。”谢泳留心有年，迄今尚难以获得令人振奋的新材料。傅斯年在保存信件什物的习惯方面有些像他的老师兼挚友胡适。而胡适飞离北平时，只随身带了有关《水经注》版本的资料，书信、手稿都未带走。傅斯年居然在那样的乱世将他的五大箱信件什物带到了台湾。而在这批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人典藏整理的五千多件资料中，居然保存了储安平当年的书信原件。荆棘铜驼，雪泥鸿爪，我不知道这遗札的存世是不是这位大不幸的哲人生命史上的一点小幸？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这个储安平迷的幸运？是不是研究者的幸运？抑或是关心储氏生前身后事迹的读者的幸运？在多年来史料史实难以有突破性发现的情况下，竟然由海峡彼岸传来了储氏的真史料！知堂先生曾经慨叹“教训的无用”；胡适、傅斯年在南京行将堕为危城的一九四八年除夕之夜沉痛地吟诵陶渊明的《拟古》：“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当年每天平均工作十二小时编辑《观察》周刊，要“尽心尽力替国家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的储安平，他那孤惨的游魂设若有知，亲睹他这天壤间绝少的手迹的时候，是略感欣慰还是凭添一番感慨呢？从情感上说，我倒希望这信件能给他那凄冷的心灵带来些许的温暖和慰藉，而试诸理

智又只怕是一厢情愿，伊人无觉。呜呼！卅年一瞬，逝者如斯；魂兮归来，重览君书！

为了不使读者产生遗憾，我不采取引述的方式介绍储氏的信件，我将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将之抄录在这里：

孟真先生赐鉴：

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力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大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及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到；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撰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从可想。我们又不能在上海随便找些人叙会；这是我们主要的苦痛。我只能这样说：我自信能以相当长的时期主持这个刊物，长线放远筹，只好一步一步走。我是一个量力行事的人，我希望一切事情要“水到渠成”，慢慢地实现理想。目前，只希望这个刊物在大体上能立得住。假如能照过去的水准支持到两年以上，两年以后，我想可以发生一点影响。现在在业务上可以自给，一般论者对于我们也都有很好的反应与感情。只要我们自己不自暴自弃，谨慎从事，这个事业或者可有成就。最近五六个月，我每天平均工作十二小时，几乎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刊物上，如兜拉广告，买纸，调度款项，人事管理，核计账目，校阅大样，都是我的工作，虽然终日疲乏，但精神上还是十分宁静愉快。我们应当尽心尽力，替国家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

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政治局面下是苦闷并苦痛的，先生所

言极具同感。我想我们最要紧的是立住脚跟，心无所求，假如不想做官，即无须迎逢国民党，假如不想投机，即无须迎逢共产党，心无所求，才能言所欲言，不偏不倚，不计功利，尽心为之。

目前最困难的还是稿子。稿子总不够，同时又要维持这个水准。回顾二十期来，大体上还能维持原有水准。先生所附《内蒙自治问题》一文，应当使国内各方面都能读到，所以想在《观察》发表一下，先生想可同意（《观察》有四分之一的读者都在西南西北各省）。顺便附致薄酬四万聊申谢忱，务望哂纳。一卷即将告终，二卷正待开始，先生因病因忙，尚未为《观察》写过稿子，我们很迫切的希望先生能给《观察》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以为支持，并乞于二月十日以前掷下，务乞俯允为禱！

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

储安平敬上

一、十三灯下

储安平写这封信时，《观察》第一卷第十九期已经付印，第二十期正在他的案头编辑之中。王火先生在《忆储安平教授》一文里尝写到当年：“他的辉煌年代该是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到上海才开始的。在上海他创办了《观察》周刊，自任社长兼主编，当时，《观察》引起读者注意和重视，较为畅销，储教授又在复旦新闻系兼课，他的名字在知识界、文化界的影响面就扩大了。”

储安平生于一九〇九年，别名储平，笔名海风、安平（见

一九二九年《北新》)。抗战前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早年于《流沙》、《奔流》、《北新》、《国闻周报》等刊发表作品。曾任《中央日报》记者，编该报副刊，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两年，抗战爆发时尚在英国，因救亡而归国，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任教授，教文学与写作方面的课，并给《中央日报》写社论。后曾参加桂林《力报》，一九四五年春在湖南任《中国晨报》主笔，旋去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实为《观察》周刊的前身。后来，储安平曾当面向王火说他办这两个周刊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及时评点国事，及时反映时局。王火尝目睹了当年《观察》社的情形：“同班同学张啸虎，是储教授很欣赏的学生。……从他那里，得知储教授与姓端木的夫人离异后，独自一人生活，住在八仙桥青年会宿舍，在生活上既节约又简单，他家庭生活不顺心，但事业心极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观察》杂志社，实际办公室在虹口狄思威路附近的一间简陋破旧的平房里，拥挤不堪，全社一共仅数人。……”

关于他的家庭生活，与端木夫人的伉离，尚不在此时，是在抗战期间。冯英子先生回忆说：“《中国晨报》的社长叫李宗理，这是一位湖南大学的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了几年税务局长，发了财，投资办报。他也听说储安平能办报，那时安平在蓝田师院教书，李通过关系，把储重金礼聘来《中国晨报》作主笔。到我们在辰溪出版的时候，储果然聘来了。他是宜兴人，储南强的侄子，皮肤白晰，长身玉立，一副秀里秀气的知识分子腔调，温文尔雅之至。那时他已与端木露茜离了婚，身边带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中国晨报》的编辑部设在铜湾溪，而营业部则在辰溪的街上，从铜湾溪去辰溪，隔着一条辰水，辰水上没有桥，靠小划子摆渡，上坡下坡，上船下船，安

平都背着他的孩子，父亲而兼母亲，生活非常艰苦。有时我们觉得他很累，帮他背背孩子，他总含笑谢绝。我们发现他有一股坚忍之气，有时也觉得他有一种涯岸自高的知识分子的傲气。”

冯英子对他的文风则有深刻印象：“安平的作品，通晓扎实，说理明晰，逻辑思维很强，但常有他自己独特的意见，为他人所不及。”

冯先生也写到《观察》产生的影响：“这时安平的《观察》办得很有声色，在当时死气沉沉的上海杂志界大出风头，他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大失民心的作为，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弊政，以敢言著称，极受知识界好评。到一九四八年时，《观察》的声望已到了它的高峰，储安平这个名字，在上海也非常响亮，他那干净利落，情文并茂的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正印证了储安平在一九四七年初致傅斯年的信中自己所预期——“假如能照过去（二十期以前）的水准支持到两年以上，两年以后，我想可以发生一点影响。”——的奋斗效果。

据王火说：“《观察》开初创办时，发行数仅数百份，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当局查封前，发行份数竟逾十万份，当时刊物印数达到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观察》在上海和蒋管区各地确成了一本大有影响的刊物。”由此不难看出，当时身处乱世而忧国虑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计功利，尽心为之”，是能够干出一番事业的。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在编辑上有这样一条规定：“‘傅档’有大量来往书信，《选辑》只发表一小部分，虽以一人一信为原则，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也只能选取部分人士而已。”我要肯定储安平研究者的幸运和关注储安平事迹有良知有興味

的读者朋友们的幸运！傅斯年平生交游广阔，学界、政界朋侪契友极多，而在“只能选取部分人士”的“友人书信选”这寥寥三十八位入选者之中，储安平就占了一席；而“以一人一信为原则”的编辑方针之限中，储安平的信件又意外地溢出一封，也就是他一人独居两席。在《选辑》第一部分“生平文物资料选”的第五专辑“生命后期”栏里，还有储安平致傅斯年的一封信。我仍然原文抄录：

孟真先生赐鉴：

在京晋谒，辱承留餐，畅聆教益，欣幸无似。翌日即返沪，未能再谒，甚为怅怅。金祸泛滥，纸价暴涨，印工倍增，本刊经营益增艰难。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谏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如承俯允，曷胜感禱！

敝刊第二卷第一期之最后付排期为二月二十二日，甚望先生能于二十日前付邮寄沪。

此次在京无意中闻一谰言，谓本刊与孔有关。今日之世，乃恒以小人之心度人。鉴于本刊过去批评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并曾抨击宋子文，遂推测或与孔有关。此事原不足辩，惟觉先生文章中针对孔亦施以激烈之抨击，则外间谰言，本刊亦将因先生之文以洗清矣。

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

储安平上

二、十六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及文本科国文门。一九一七年受《新青年》影响，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新申义》，响应陈独秀、胡适等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同年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新潮》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他是五四运动主要的领导人物，当天在天安门集会被各校推为主席团成员，并任游行总指挥。同年夏毕业后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翌年入伦敦大学研习实验心理学。三年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及马赫哲学，又兼攻德国传统的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一九二六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并历史、中文两系主任。他是中央研究院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人和终身所长，延揽了大批第一流的人文学者，使史语所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文学、语言学研究的重镇和国际汉学的权威象征。他本人则是精通文、理多门而以史学见长。他还兼任过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及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任过中研院总干事和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以大学者而办事能干著称。一九四九年初任台湾大学校长，次年冬殉职在任上。

杜正胜先生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前言》里写道：“傅先生不是蛰守书斋的学者，大学时期他就是学生领袖，任事之后国事螭蟾，内外交迫，他怀着忧国忧民的胸怀，秉持传统读书人的志节，为民请命，评论时政，深获人民及朝野人士的敬重。‘傅档’保有大量珍贵的政治史料，有些也许可以解答政治史的谜题。”杜先生就“傅档”内容所作的史料价值的估计是极其允当，而并不过高的。傅斯年正是以“秉持读书人的志节”才赢得了储安平的重敬，储安平才虚心请教，热切约稿。

储安平的这两封信的史料价值极高，它提供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两代自由主义者沟通、交流和传承的实证，证实了第二代自由主义者的卓越代表储安平是胡适、丁文江、傅斯年（当然不止他们）等第一代自由主义者最有资格又最富实绩的传薪人。余英时先生以他史学家、思想史家的慧眼卓识作过这样的评估：“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等观点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钱穆与中国文化》）人事云烟，碧血苍弘，余先生的预言能否为那“种子”的后效应所证验呢？此乃士心所系。那位上帝是冷酷而又固执的，其渺在士人，其速亦在士人乎？

这两通书信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报学史上的史料价值，将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

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日记：“今天报纸（世界、益世）大登傅孟真昨天在参政会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话。《世界日报》标题为《傅斯年要革命》，报纸又大登昨天立法院攻击宋子文的言论。”参照此信（二月十六日）内容可以推知：一、参政会开会是在二月十四日，傅斯年“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二、储安平自沪赴宁不专为拜访傅斯年，是为采访参政会新闻。三、储安平应当在十三日到达南京。四、“晋谒”、“留餐”，储、傅谈话当在十四日傅斯年参加参政会的当天。五、“翌日”——十五日储安平“返沪”。储安平写这封信的时间当在十六日午前，傅斯年的第一



篇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已在《世纪评论》第七期刊出，第七期出版于二月十五日的南京，还没有运到上海，而《观察》周刊又不是一家记者满天飞的大报大刊，故储安平的消息不可能很及时，乃有“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之请求。何廉的回忆录里记载了当时这件事：“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即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以《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在《世纪评论》上。”（《何廉回忆录》二七六页，中国文史版）根据何廉的这段回忆，可以推定几点：一、他与傅相遇，傅要撰文抨宋，给他印象很深；因此，几十年以后记忆仍很清晰。二、由此可以无疑地推定，他们的相遇是在二月十三日，此时傅的文章还未写。三、十四日傅在参政会讲话，留储安平吃饭、谈话，这些活动都在晚饭以前，这时文章还未着笔。傅斯年的性格具有山东人的爽直，他在南京街上与何廉谈到写文抨宋，在家里接待储安平不可能将写好了的文章藏着不露口风。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相交无诈的君子。因此，傅斯年的文章是在十四日当天夜里写的。中央研究院在鸡鸣寺路，《世纪评论》社在西华门三条巷，说不定记者就在他家客厅里候稿。因为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新闻，第七期的其他文章早已备就，预先留出了“专论”的首栏，只等傅文一到即刻检字排版，上机开印，连夜装订。次日此文一出，监察院于翌日举行全体紧急会议，立法委员群起质询。一潮未息，仅及一周，傅斯年又在《世纪评论》第八期（二月二十二日）上刊出《宋子文的失败》的长文。宋子文终于挡不住朝野舆论的巨大攻势，遂于三月一日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这期间傅斯年又要应储安平之约，于二月二十日前写成《论豪门资

本之必须铲除》，寄给上海《观察》。他是长期患高血压症的人，在一周之内竟连写三篇重要的政论长文，岂止是不顾利害，连性命也不顾及了。可见他当年刚肠的激烈和精神的亢奋。尽管他在《新潮》时期于创刊号上有过一人独写十五篇文章的宏绩，但那时他是未满二十三岁的血气青年，而现在已是五十二岁的孱弱老者，竟迸发出如此惊人的生命能量，恐怕只能是一股浩然之气的支撑、驱动和激发？加之《世纪评论》、《观察》这两家迅捷反映时局、评点国事的周刊又敢于共同担待政治风险，综而观之，则既能见到当年政治的腐败，又能看到彼时“士气”的激昂。

傅斯年在第一篇文章中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长期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傅斯年的政论风格，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不遮不掩，正气逼人，说论耿言，掷地作金石声！

紧接着刊出的《宋子文的失败》一文，说孔宋“前者贪欲过于支配欲，后者支配欲过于贪欲”。他说宋子文“对于经济的无知与私心，是使中国经济非总崩溃不可的”。他为文并不止于愤慨和指斥，尤善击中要害。他揭露宋家的“中纺”公司说：“中纺公司的组织，原与国民党历来标榜的口号‘轻工业民营’违背，他的说法是增加政府收入。去年一年，他平均每月输政府一百亿，全年一千二百亿。今年列的数字是每月三百亿，全年三千六百亿。社会上估计，去年赢余是一万亿。……”

然而仔细看看，（政府）何尝有赚钱这回事？第一，美棉以法价结外汇，在中纺，利益极大；在国家，担负好大外汇。第二，机器（一百五十万锭子）全无代价，房子生财全是拿来的。第三，补充机件，外汇取之裕如。这样算赚钱，以裕财政欺人乎？欺天乎？政府为他的收入之益，远不如为他外汇负担之害。”

他又举宋孔两家压低外汇，以肥私囊，侵蚀国家的倒行逆施：“在这样外币贱、国币贵的情形下，入口极易，出口极难，一悬数倍，简直要断绝中国货的出口，大开外国货的入口，岂特入超而已，简直要一个是无限人，一个是零，这真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了，何年恢复，真不可知。谁开创这个局面？孔祥熙。谁继承这个遗志？宋子文。他俩这一着，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第三个要害是他揭举了工商贷款的流弊，其结果于正当的民族工业不是扶植而是摧残。他最后写道：“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外国。”

一周以后，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不仅在“观察文摘”专栏全文转载了这两篇文章，而且又刊出傅斯年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举出宋孔两家危害国家经济的事实，来论证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的理由。他说：“孔氏有些土货样色……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利则归己，害则归国，例如某某几个私家银行，在战前不能支持了，由政府入官股维持，两三年前他准许这几家银行退还官股，以当时一元当战前一元！所有这些银行在收到官股所获的利益都不算

了，这简直是拿国家的利益直接的、毫无掩盖的送人；其实并不是送人，而是送己，因为其中某某几个银行他都有支配力。”

他指责宋氏的作风是“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将公的变为私的，“国营”变为“宋营”，国营的工业、厂矿在他的管理下都弄得亏损、瘫痪，而“宋营”的都盈利巨万，国家不受其益而受其害，而宋氏则形成了托拉斯。举出这些弊病，怎么办？他将了当局一军，说：“政府若对得起人民，该去清算的。”在结论部分，他提出了一个挽救国家经济的最最彻底的办法：征用宋孔产业十五年，十五年以后还本付息。“清算”、“征用”宋孔二家资产，在国民党当然办不到，但舆论的震慑力是不无作用的。还在一九四〇年，傅斯年最初抨孔之后就看出了邪、正态势的变化：“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 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侮耳。士人之节，在国以此维纲常者也。”（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四日《傅斯年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四七九至四八〇页）傅斯年这种毫无拘束的批评政府、抨击豪门、权要的政治言论，比之于美国反对党的参议员们批评总统、攻击联邦的施政举措的言论之激烈程度，恐怕亦不稍逊吧？回忆历史，可以作一个最低限度的评估：尽管政治百弊千病，腐败到了极端，然而“士气”终未遭摧杀。此不止傅论一端，《观察》、《世纪评论》以及其他一大批报刊的敢言敢论，教授、学者、知识分子群的关心时政、放言恣议，都反映了“士气”犹存，良知未泯的另一面事实。如《观察》的七十八名撰稿人的

真姓名就是列在封面上的。它办刊的第二条原则就是：“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傅斯年以有根据的言论，将前后两任谋私祸国的行政院长轰下了台，而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公职地位、行动自由均未受到威胁，可见即使在那样的乱世、衰世，“正气”犹有一隙存留之地。这些年“反思”的课题学人们做得很多，我们研究历史，从邪气与正气的比量切入，或许也是可以一试的角度或方法吧？测量一个恶性社会或良性社会（不言“天堂”社会），或借摄氏、华氏的度，或借用音量的分贝，或借用江河水位的警戒线、危险线、安全线以为标志，我想也是可以一试的途径或方法吧？不知治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和历史学的权威专家以为鄙议何如？

傅斯年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动的倒孔之役中，蒋介石曾请他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那一次傅斯年赢了。这一次倒宋大胜，他又赢了。这一次蒋介石对他没有任何干预。“言路者国之命也。言路芜绝而不能不乱者，未之有也。”蒋介石不一定直接读过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总结的这一条历史上的治乱定律。但纵观他的施政举措，他基本上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因而他也算是聪明的。他与胡适、傅斯年等在野自由主义者数十年的交往，也还是尊重和爱惜他们的“诤臣”之节的。

## 梁漱溟与储安平

谢 泳

梁漱溟是长储安平一辈的人，在储安平开始打天下的时候，梁漱溟已是知名的学者了。储安平是一九〇九年出生，比梁漱溟小十七岁，但储安平这个人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很能团结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朋友的，他一生的事业与他的这个特点密切相关。储安平开始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在他的期待中是想把当时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出来。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尤其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观察》周刊写重要的文章。《观察》当时有七十八个人的名字是作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虽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当年像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眼里是中间偏左的，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作为第三方面活跃的人物，他们曾一度不是学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动家了，他们一

生的荣辱都与此相关。

储安平是一九五七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闻界的，此前他的两位前辈张东荪和梁漱溟都因为毛泽东的原因，而成为被批判的人了。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敬重的几个前辈，除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与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的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培养起了一种用言论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在无论那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一下子消失。张东荪未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过，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泽东要有容人的雅量，还有陈寅恪、周炳琳等一大批从旧时代走来的知识分子，根本适应不了新的生活。适应了的知识分子不少，但历史正是由于那少数不适应的知识分子才使人觉得沉重。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一个比较硬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当时他的这种态度就受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敬佩。在储安平的一生中，他早年倾心的多数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虽然五十年代初储安平一度丢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了能让《观察》尽快复刊，他曾被迫放弃了过去《观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从梁漱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储安平的友谊是一直保持下来的，梁漱溟对储安平也很关心。他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曾提起过和储安平的交往。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

所写的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東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功夫写它。”（《忆往谈旧录》第一六七页）五十年代初，梁漱溟和储安平还常有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今天不容易见到了。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梁漱溟日记中有：“收储赠《观察》合订本全部，答谢一信。”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记有：“收学习会图书室送来《观察》两册。”（《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四五三、五〇一页）从梁漱溟和《观察》的关系中，可以说明他是很看重储安平的，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日记中说：“张歌今来谈同去广州事——张云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六三〇页）当时梁漱溟对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很赞赏的。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说：“储安平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六三七页）梁漱溟日记中脱漏二字，但这二字从上下文看并不难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这个日期，因为第二天（即六月一日），储安平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给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的发言。六月一日梁漱溟的日记空缺，我们难以了解他的感想了，但从他五月三十一日和储安平议论时事，谈及出版界的情况看，很可能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征求过梁漱溟意见，而以梁一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这样想来，我们未尝不可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 钱钟书与储安平

谢 泳

钱钟书极少为同时代故去的朋友和师长写悼念文字，这是他独特个性中一个令人遗憾的缺陷，因为这使今天的研究者少了许多线索，少了许多资料，也少了钱钟书多少好文字。钱钟书对悼念文字自有看法。《围城》中写汪处厚死了夫人，作者便有一段议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可见他对悼亡文字的态度。至于对回忆录、传记，他在《魔鬼夜访钱钟书》中则言：“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这或许就是钱钟书既不写自传，也不为朋友写悼念文字的缘故。现在说钱钟书和储安平的关系。

钱钟书和储安平是朋友，一九四九年后两人遭遇不同，储安平一九六六年莫名其妙地死亡之后，同时代的朋友故旧极少有悼念文字。

一九四六年九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这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政论周刊，当时先后列在每期封面下的“撰稿

人”有七十八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和社会名流，钱钟书、杨绛都在其中。以钱钟书一贯远离政治的态度看，他本不应列在这个撰稿人名单中，可见他与储安平确有交情。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钱钟书曾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当时储安平也在该校任教，钱储的交情大概即开始于此。

储安平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办《观察》，当时钱钟书也在上海。《观察》创刊不久，储安平即向钱钟书约稿，《观察》第一卷第四期曾刊出过一封钱钟书致储安平的信，他在信的开头就说：“《观察》两期奉到，感谢感谢！拙文承惠许延期，真如债主宽限，大慈大悲；具见大编辑笔政不苛，钦佩何极！”并在信中对潘光旦的一篇文章进行了补充。整个《观察》时期钱共给《观察》写过五篇随笔。储安平在《观察》第二卷第一期的编后记中曾说过：“钱钟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加起来，他是今日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尤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独具一格。”

《观察》从第二卷开始，增加了方成的漫画，储安平在二卷二十四期的报告书中说：“相熟的朋友如钱钟书、萧乾先生都曾表示称赞。”可见钱、储确是朋友。

钱钟书和储安平属两类知识分子，钱潜心学术，储热衷政治，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

1994年10月16日

## 储安平与胡乔木

谢 泳

一九九四年的《读书》和《中国作家》杂志连续登过几篇回忆胡乔木的文章，其中王蒙和韦君宜写的两篇都很给人启发，在怀念已故领导人的文章中，他们的文章是别具一格的。

我近年研究储安平及《观察》周刊，也特别留意这位党内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我注意到的一些资料与王蒙几位对胡乔木的评价是一致的。

一九四八年底，《观察》被国民党查封后，很快上海就解放了。储安平对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极有感情，所以他很希望《观察》能复刊。据《观察》的编辑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胡绳、范长江。查《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年七月载有：“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在这个名单中，储安平的政治观点显然与其他几位不同，另几位是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后来，胡乔木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作过汇报，请示复刊

问题，周恩来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才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复刊了，以《观察》解放之前的政治倾向，复刊是没什么希望的。从中可以看出胡乔木对储安平和《观察》所持的宽容态度。一年之后《观察》改为《新观察》，储安平才离开。这一段时期，储安平基本未介入新闻工作。但一九五六年夏天，许多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有意见，中央决定改组《光明日报》，这时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建议由前《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去接管，但后来接管《光明日报》的却是储安平，是谁在他离开新闻战线多年后还记着他呢？是胡乔木。我在原《光明日报》主编常芝青向中央汇报的一个材料中查到这样一段话：“我个人认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看法与估计（那次谈《光明日报》问题时说的），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一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据说，八十年代初在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胡乔木谈新闻工作时，仍说，为什么不能请一些老同志出来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可见胡乔木对储安平的评价一直是很高的。

作为党内多年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胡乔木是很值得研究的，他毕竟是一位知识分子气很浓的领导。虽然他最终没有从清华大学毕业，但他是考入并读了一年书的，清华无形中影响着他的一生。从胡乔木的经历中我想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批极有特色的知识分子，如范文澜、吕振羽、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何干之、邓拓这一批“延安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他们早年都有过非常好的教育背景，像范文澜，是京师学堂（北大前身）出身，艾思奇读过教会中学，邓拓是上海光华毕业，初期的教育背景与中年的信仰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们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但后来的结局又都留给后人以无尽的

思索……“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同样值得作深入的探究。

1995年2月4日

## 储安平与方成

谢 泳

从朋友的书架上见到一本方成的专著《高价营养》，顺手拿起翻了翻。我对漫画并无兴趣，留意方成这本书是因为他和储安平的关系。

我在读《观察》周刊的时候，见到过储安平谈方成的一些资料。方成现在是著名的漫画家，而储安平由于一九五七年的经历，也不大为人提起，至于方成和他的关系就更不为人所知了。

方成在他的书中说：“我是一九四六年开始从事漫画工作的。投稿到报纸，第一幅发表在北平《新民报》上的就是政治讽刺画，讽刺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后来在上海《大公报》、《文汇报》等发表的漫画，都是和新闻密切相关的讽刺画。我为《观察》半月刊主编漫画版，又兼特约撰稿人，画的也都是从新闻取得的题材的政治讽刺画。期刊的新闻性比不上报纸，但我这些画都是对时事的评议，有一定的新闻价值。”

方成这段话中虽然把《观察》周刊误记成了“半月刊”，但所言基本是准确的。

储安平和方成的关系有点传奇色彩。《观察》周刊的用稿原则是很公平的，储安平一生受英国影响极深，做事对人颇有

绅士风度。《观察》在用稿上一向毫无偏私。在《观察》第一卷快要出完的时候，他们收到方成的两幅漫画。这两幅漫画并不好，但其中略有一点点“味道”。储安平就约方成来谈，并让他把过去的画稿全部带来。方成的通讯处是由一个朋友转的，他没有按时来，而在几天以后才到《观察》社见储安平。方成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化学，毕业后曾在黄海化工研究所干了五年实验工作。后来他想在漫画方面发展，便闯到上海来。他对储安平说，他在上海人生地疏，在上海第一次关照他的是西风社的黄嘉音先生。储安平看了他的画稿，大部分都不喜欢。但他发现有两幅造意和技巧都已够得上英美报纸上的漫画标准。储安平考虑之后，答应在《观察》周刊上给他一页地位，并对方成说了一句话：“我希望你能了解，像《观察》这样一个刊物，给你一页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方成当时很感动地说：“我了解这点。”他走的时候，储安平劝他，希望他专心替《观察》画，不要再向别处投稿，并说：“一个人的意思只有这么一点。一个人的精力应当集中，集中便有成就。”此后《观察》周刊每期都有方成的漫画，方成的漫画风格大体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事后，储安平回忆：“我当初决定给他一页地位，仅仅是因为我在他的漫画里发现一种‘希望’。我们在生命中奋斗了多少年，可是我们很少遇见有力量帮助我们的人，给我们热情，给我们鼓励。在这个社会上，不知有多少青年，仅仅因为无法得到一个机会让他一试，就此埋葬了他的天才。”《观察》周刊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它的撰稿人基本上都是当时的知名教授，给这样的刊物作漫画，方成自然很快就成名了。

## 储安平与徐铸成的一段交往

谢 泳

储安平在关于《观察》撰稿人的情况中所提到的“不克担任”的撰稿人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著名“右派”的《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对于这件事，戴晴曾写道：“一九八八年，笔者就此节直接请教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八旬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 John 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徐铸成在《我的同乡》一文中则这样写到：“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还是在一九四二年。他在湖南蓝田国立师院任教，兼为附近一报社写社论，道出桂林，曾来访晤。一九四五年他和吴世昌在渝创刊《观察》（应为《客观》），抗战胜利后移沪出版，曾邀我担任特约撰述。我不同意他们标榜的第三条道路，未予答复。一九四七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同被国民党封闭。第二天，一位所谓‘舆论权威’，在某报写一短评，题



为‘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报已封闭了，希望政府今后切实保障舆论。含沙射影，似指我们是‘不正当’是为‘共党张目’的。当时站出来愤愤不平的，据我所知，一是《密勒氏评论报》，说中国两张权威报纸，一是中间偏左，一是中间偏右，应该配合前进，不该相互攻击，更不该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另一则即储安平，他写了一篇长文，说徐铸成虽是我同乡，而为人极傲慢，《观察》请他当特约撰述，他一字不复，尽管这样，我们对于《文汇报》等遭到某报的暗算，不能不愤怒，实在太不符合新闻道德了等等。”徐铸成对于此事的说法大体没错，但由于是多年后的回忆也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当时的情况是储安平在《观察》上写了一篇《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储安平在文章的最后说：“我和联合晚报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八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里面，我仅和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六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这就是当时储安平和徐铸成之间的一段交往。历史的发展

真是奇妙，当年储安平请徐铸成做《观察》的撰稿人，徐铸成“不克担任”，两人最终未能合作，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天，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放言“党天下”，而最终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而徐铸成也由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成为右派，所幸徐铸成的命运比储安平要好，虽然经历了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但最后还有一个安好的晚年。储安平与徐铸成的经历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最终结局的不同也有某种必然性，我曾详细比较过一九五七年储安平被迫写的检讨《向人民投降》和徐铸成的检讨《我的反党罪行》，虽然都是出于无奈所做的，但即使在这种类型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两人性格和思想的差别，徐铸成的检讨比储安平的要具体得多。不过由于储安平和徐铸成都曾经历了一九五七的夏天，都曾给自己人生经历中增添了一些不平凡的东西，我也就不愿再以两个人思想根源上的差异去臧否两个都已作古的老人了。

## 储安平的编辑生涯

谢 泳

严格地说，储安平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在编辑方面。虽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很有见解，也热心于言论方面的工作，但从他年轻时代到最后的岁月，都与编辑工作联系得很紧。

储安平是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学生（过去许多人误认为他毕业于英语系或新闻系，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看了他在光华的档案，告诉笔者），从其性格和才能看，青年时期热爱文学，壮年以后关心政治。他的编辑生涯，也以这两个阶段为其特点。

一九三一年，储安平二十一岁时，就开始编文艺刊物，当时他还是光华大学的学生。刊物虽然已经印好，但由于别的原因，没有正式出版，此事是储安平在发表方玮德一首诗时加的注解中说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储安平主编的文学杂志《文学时代》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刷发行。其时储安平大学刚毕业，时年二十六岁。《文学时代》是一本纯文学的刊物，一共出了六期，

常在上面写文章的有老舍、张天翼、王统照、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臧克家、梁宗岱、陈梦家、余上沅等，均为一时之选，可见储安平在编辑方面的才干。储安平在一九三六年去英国采访，刊物也就停了。储安平曾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维持的。我们虽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诉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

储安平后来一度做过《中央日报》文学副刊的主笔。抗战军兴，随报馆迁往长沙，曾和冯英子先生一起在《中国晨报》共事。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得到著名报人张稚琴的帮助，创办了《客观》周刊，一时影响很大。《客观》周刊是一个政治性的刊物，也设有副刊。储安平在办《客观》周刊的时候，所写多为政论文章，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他曾在《客观》上写过一篇《动荡中的国民党》，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觉醒、新生，而新生者即是使开明进步的国民党优秀分子起而执政，这篇文章很受读者好评，当时陈诚读了后也很欣赏，并派秘书前去打听储安平。一九四六年三月，储安平由渝返沪，筹备《观察》周刊的创办，同年九月，《观察》在上海诞生，在后来近三年的时间里，以言论的力量在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言论阵地。《观察》一九四八年底被国民党查封，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后复刊，但不久就停办了，改为《新观察》出版，储安平也就离开了。

纵观储安平的一生，从学生时代编辑文学刊物，到壮年时期主政《观察》以及一九五七年接任《光明日报》总编，基本上是以一个报人的身份活跃在中国社会，他一生重要的活动时期都没有离开过编辑的岗位。《观察》周刊在当时不仅出了台

湾、西南航空版，而且发行到了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在战争的环境里，发行量超过十万份，可见刊物是很有读者的。储安平一生的理想是希望能办一张类似于《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以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但他的这理想一直未能实现。储安平编辑生涯中有几个特点值得今日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学习。一是他编刊物，首要的是选好作者，他办的《客观》和《观察》，主要撰稿人基本上都是当时著名大学的教授和社会名流。二是刊物的读者对象非常明确，比如他就明确告诉读者，《观察》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中学生不在读者范围内。三是以客观的立场对待作者，无论什么意见，只要言之有理，都提供版面，而决不以个人的政治倾向取舍稿件。四是有严格的求真精神，他明确人类言论的一些基本规则，比如他宣布《观察》在任何情况下不发表不署真名实姓的作者的论文，而且绝对不在自己办的刊物上评论《观察》社编辑出版的任何书籍，体现了很强的民主作风。

储安平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位卓越的出版家。

1994年5月

## 想起了储安平

谢 泳

去年的《读书》曾有人说过周扬、胡乔木、张东荪、何家槐等人，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个人，储安平。

关于储的生平以及主要活动情况我不想多说了。储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年轻的时候写过许多小说，后来在赵家璧的帮助下，一九三九年良友文库出版了储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说谎者》，此书一九九二年上海书店作为新月派文学作品专辑中的一册影印出版了。储在文学上的成绩，有小说一项，但成就就不大。他的主要成绩在散文一项。这包括两方面，一是储的一些抒情散文，二是政论文字，其中尤以《观察》时期撰写的大量专论最为精彩，不仅观点鲜明，充满勇气和激情，而且行文的讲究，文字的干净简洁和富于感染力都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部分作品最能见出储的才情和整个人格的力量。一九五六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一九五七年一月在作家出版社又出了他一本关于新疆的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虽然文字上还能见出老到的功力，但整体看，储的才情未能发挥出来。一九八

九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王孙编的一本《新月散文十八家》的集子，收有储的四篇散文。近两年一些散文集子中偶然也收储的一两篇散文，但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储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今天看来都是值得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的。储在《观察》时期以西方的新闻观点来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客观地评价，《观察》这本刊物在许多方面，可以看作是西方新闻理论在中国的一个成功事例。曾和储共过事的著名报人冯英子在《储安平的〈客观〉和〈观察〉》一文中曾说，《观察》在上海出版后，“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冯英老的评价，我以为是客观而准确的。由于《观察》的巨大影响，使储成为新闻界的重要人物。《周恩来年谱》载：“七月十二日，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时在一九四九年，周恩来请的人中多数是共产党员，由此可见储当时在国内新闻界的影响。

从许多资料来看，储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有专业知识，又颇具管理能力，从《客观》到《观察》，可以看出他在新闻和出版方面的才干。冯英老说他“自视甚高，从来不做第二人想”。曾在《观察》时期和储共事多年的林元临终回忆，对储的评价是：“储为人精明，说话条理明晰，虽然是大学（复旦）教授，却似个事业家。”1989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五期上有李韦一文，其中曾说胡乔木说过，储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戴晴的报告文学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说胡乔木不知储已在“文革”中死去，想请他出来办报，可见胡乔木对储的评

价不低。储虽然为人孤傲，但冯英老说过一件事，储为《中国晨报》写了第一篇社论，发表之后，他不同意储的观点，第二天自己写了一篇社论，纠正了储的观点，“不过这也并没有引起储的不快，他是很有点西方民主风度的”。台湾陈纪滢在《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中有一篇记画家黄尧的文章，其中谈到了他一九四〇年曾和储安平、沈昌焕、黄尧等一些人在重庆参加周子亚组织“渝社”的情况，他对储的评价是：“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近几年来，我看有关中国文化名人的传记，有一点感想。我觉得这些人不论后来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在评价他们的时候，应该留意这么几点：一、人物的个性特征。二、年轻时的信仰。三、走红和背运时的人生态度。特别是青年信仰这一条，我觉得差不多是判断一个人一生变化的基本前提。储在一九六六年“文革”时死了，关于他的死有很多说法，有的说跳河死了，在北京；有的说，跳海死了，在天津；还有说是在青岛跳海。还有一种说法是储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两年还有人写文章说储没有死，而是出家做了和尚。种种说法中，以传说为多，多不可信。以我个人对一些资料和联系储的个性及文章风格作推断，觉得以自杀的可能性为最大。

1994年9月



# 論政平安儲

## 觀 察

· 光緒六年舊曆 · 日四十月二十年五十三 · 張出六期星

期六十第



卷一第

投寄

科舉、和平  
關於新讓

門爭中的沙士比亞(二)

Thomas More 著

文藝、藝術、戲劇、音樂

梁實秋譯

美國人和癌症的抗爭

科學雜誌

海南島的台灣人

(溫爾島通信)

本報特約記者

蔡壬侯

派與匯(二)

特稿選載

關於一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吳世昌

論上海民亂

語言的宗教

高名凱

效先

三次通

左運

梁實秋譯

本報特約記者

蔡壬侯

本報特約記者

蔡壬侯

潘光旦

吳世昌

高名凱

諸安平

高名凱

吳世昌

潘光旦

蔡壬侯

本報特約記者

高名凱

諸安平

撰稿人

梁實秋、左運、三次通、效先、蔡壬侯、潘光旦、吳世昌、高名凱、諸安平、本報特約記者

撰稿人



## 自由与守法

近几年来，政府一再告诫人民，要求人民养成守法的精神，谓人民守法，国家始能成为现代的国家；在人民一方面，则又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常常呼吁政府不要过分限制人民的自由，自由与守法在中国似乎成为相对的名词，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

自由与守法并不是对立的。洛克、卢梭等倡天赋人权之说，谓人生来即有若干权利，此若干权利既非国家所赋予，亦非国家所能剥夺。这种天赋人权之说，在十七、十八世纪曾极一时之盛，但不久即告失势。因为个人的自由若无适当的限度，各行其是，则社会的安宁无法维持，而个人的自由亦仍不能得到保障。所以后来一般论者，都认为每个人为他自己的发展计，为他所处的国家社会福利计，应当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这个范围由国家以法律来规定，在这个范围以内，国家应该保护人民的自由，超过了这个范围，国家便须限制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我们称之为法定自由，谓自由并非天赋，实为国家法律所赋予。现在最新的思想虽又更进一步，谓自由不

仅是一种权利，且为发展人格所必要，但仍承认自由并非毫无限制而有一定的范围。十九世纪以来，一般国家的宪法都避免引用“人权”字样，而用“国公权”或“公民权”等名字，如一八一四年法国宪法内关于个人自由的规定，称为“法兰西人民的公权”，一八三〇年比国宪法内关于个人自由的规定，称为“比国人民的权利”，一九一九年德国宪法关于个人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称为“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等，一方面固表示该国宪法所规定之权利仅限于该宪法所属国的国民，同时也表示那些规定的个人权利，为国家法律所赋予而非与生俱来。

个人自由既由国家法律所赋予，可见自由并不能超过法律所许可的范围。进一步言之，自由与守法且应表里合一，因为维护法律即所以维护自由，而要使自由得到保障，亦非人人遵守法律不可。不过要达到这个地步，须先做到两点：

一要人人守法，不可有一人例外。近代论法治，无不推崇英国；英国宪政的精髓之一就是法律主治。英国的法治分析言之，可得三义：一、自君王以至庶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二、自君王至庶民，受治于同一法律；三、自君王以至庶民，受治于同一法院。在法国，除了普通法院之外，另有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起源于行政法。行政法有两大要义：一方面本三权分立之义，行政不干涉司法，司法也不干涉行政，所以行政诉讼不由普通法院受理，另设行政法院受理之；另一方面则以为国家与人民的地位不相等，国家有若干特权而非人民所能有者，官吏既为国家的公仆，代表国家施政，所以官吏与人民发生行政纠纷时，官吏与人民的地位也不相等，而不能由普通法院管辖，故特设行政法院管辖之。这是法国的法律。英国不然，在英国，官吏和人民是完全平等的，官吏和人民，官产和

私产，都由普通法院受理，任何特种法院，有如英国历史上的星座法院，始终不能重现于近代的英国；全英国的人民都受通常法的支配而另无特殊的法律，自君王以至庶民，都不能逃避于法律之外；这是英国的法律主治。这几年来，我们的政府一再嘱咐人民守法，人民也热望励行法治，但要人民守法，官吏也须守法，要行真正的法治，便须人人守法，不可有一人例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阶级。凡人民不应享受的权利，人人不能享受，不可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凡人人均享受的权利，不可另设各种限制，使一部分人因此不得享受。如其自上至下，人人守法，没有一人利用权势而自处法外，则必无一人不乐于守法。中国人民有一种传统的精神，就是反抗“不均”的精神，“不患寡而患不均”，假如有少数特殊阶级，逍遥法外，政府听之任之，而独欲人民守法，其不可得，彰彰甚明。我们以为政府对于那些依仗权势不守法纪的人，管制须特别严，惩戒须特别重，苟能如此，则民心大快，纲纪大伸，无形之中，人民自然而然会养成守法的习惯，而法治的精神亦得树立良好的基础而弥漫于全国。

二要法律的内容为保护人民的自由而非侵犯人民的自由。这一点极其重要。个人自由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个人自由也只有经国家法律规定后，才能巩固，才能得到保障。所以争取自由的人民，不仅不拒绝法律，而且要求有法律；不过人民所追求的法律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法律。我们纵观英国历史上的宪政争斗，争取自由的运动也就是拥护法律的运动。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是英国人民自由权利的磐石，数百年来，英人爱之护之，惟恐不力。君主侵犯了大宪章，忽视了大宪章，人民即起而争抗，不达目的不休，一部英国的宪政史，无一页不是争取自由维护法律的灿烂记载；所以在英国争取自由和遵守法律是

相成的，不是相反的。我们以为法律只是要增进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权利的，决不要怕人民不守法。抗战以后，我们的国家进入于军事状态，政府所颁限制人民的法令甚多，在政府看来，这些法令都是必要的，在人民看来，也承认时期非常，有此需要，但于条文的内容，对于人民的自由权利，有时殊有束缚太多之憾。我国不久将行宪政，五五宪章第一章中承认人民之各种自由权利时，辄附“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一句，将来政府对于人民之自由权利，除在宪法上作原则的规定外，自将另有其他补充的法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这句话，在表面看来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的，但反过来也就可以说“依法律得限制之”。限制的标准，在同章第二十五条虽有规定，但极空洞。所以将来宪法上虽承认人民之自由权利，而实际上中国人民究能得到多少自由，不无令人发生忧虑之感。我们愿意在此提出上面所说的原则：法律的内容若为保障并增进人民的自由权利者，人民自必乐于守法，而且勇于守法；如其政府希望人民守法，也便须在制订法律时，尽量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1944年2月3日《大公报》重庆版)

## 蒋主席的一篇新演说

杜鲁门总统私人代表洛克，于十月八日自美来华，考察中国经济状况，历时月半，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离华返美。在洛克离开中国这一天，中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最高经济委员会，其目的“在实行民生主义，帮助人民使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今后伟大的和平建设及发展的工作上”。在这次战争之中，中国所受的破坏糜烂，时间最久，程度最深，范围最广。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已较现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为低，而经过八年战争的消耗，人民生活的能力，益觉艰难。战争结束，国家人民，都望徐图苏复，不料又起内争，人民怨愤，友邦失望。然而中国之亟需建设，民生之亟需改善，又为不可再缓之事。政府成立这个最高经济委员会，表示政府正在努力打开目前这种阴霾的局面。

在最高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会上，蒋主席发表了一篇长达五千言的演说。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篇新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具体问题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人民生活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物质建设的演说。也可以说，这是一篇象征我们的国

家在结束战争以后必须步入的另一个新的时代的演说。一个国家固然不能缺乏道德生活的标准，但是一个国家也不能缺乏物质生活的标准。假如一个国家缺乏物质生活的标准，那也将无法建树道德生活的标准。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社会一般道德生活的破产，也确乎可以说就是因为人人不能足衣足食安居乐业之故。今日中国亟需全力加紧，用种种经济建设的方法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来滋养国家的生命。

### 人民的才干

蒋主席这篇演词里有三篇提及“人”的问题。（一）蒋主席述及“我们现在没有充分的有训练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去接收并经营以前日本人所办的事业”。（二）在这次经济建设中，蒋主席表示“绝对不能容忍缓慢、贪污或自私自利的人来榨取人民，以图谋个人的富贵。这种人员必须铲除，并严加惩办”。（三）蒋主席承认“私人的才干及经营能力是一个民主国家经济进步的原动力”。

上列三点引起我三种感想。第一，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政府固应注意培育人才，政府尤应使有能力的人能够自在地循其才智，自我滋长。有天赋的人，即使不得到政府的培育，也是能自发地得到成就的，只要环境不加阻碍，不加限止，不加斫伤。同时，培育人才，应多培育“管事的人”，少培育“管人的人”。假如在一个社会里，“管人的人”多于“管事的人”，则这个社会，建设的速率必定降低，而停滞不前及财政消耗的程度必定增加，此实大违现代“经济与效率的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 and Efficiency）。第二，贪污舞弊侵公饱私的人，必须严惩。但事后惩罚，究为下策，与其事后追惩，不若事前预防。任用人员，能力固然重要，操守尤其要



紧。今日天下非无洁身有为之士，只看政府如何使他们除奔走钻营之外能有以自见。目前用人，既大率用推荐之制，则至少在消极方面，一员失身违法，推荐的人也应连带负责，俾推荐用人，可以不致过分徇私。第三，社会乃人之积。国民能力愈强，国家力量愈大，所以政府总要曲尽公道，鼓励人人向上，使人人的智慧的及身体的能力能作充分优性的发挥，使社会因而得到健全的发展，国家亦可日新又新地向前迈进。

### 交通启蒙运动

交通是流通金融传播文化的血脉，必须全力加强。但是建筑公路铁道，不要太着眼政治价值，应多注意经济价值。同时，不要只顾到全国性的大动脉，应同时顾到城与城之间，城与镇之间，镇与镇之间以及乡与乡之间的短途交通。乡村城镇之间的交通发达以后，农村间的养鸡、种菜、水果等种种作业，自可逐渐发展，而农村经济亦得日渐苏复，此实大有助于一般农民的生活；生活富裕后始能谈教育，讲卫生，增加常识。所以这种乡村城镇之间的交通，就整个国家的进步与安定而论，其重要性并不在全国性的大动脉之下。这种地方交通，可由地方政府负责，只须中央政府加以督促与指导。

但是单单造路浚河还不够，必须以政府的力量来改革一般民间的交通工具。不要说自国民党执政的二十年来，就是自康、梁变法图强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般民间的交通方式，固未尝有何新的改革。河流上航行的依旧是用竹杆与木橹的旧式民船，路面上的交通工具依旧是两人肩抬的轿子。这种一般民间的旧式交通工具，实为使中国社会不能加速前进的另一原因。行五六十或七八十里之路，即须消耗一天的光阴，这在时间上精力上是何等的浪费，政府必须用全力来推动一个交通启

蒙运动。乡村间的公路上即使还不能行驶汽车电车，但至少可以制造大量的自行车及三轮车，以行驶于乡村间的道路之上。船舶也应竭力利用比较简单的摩托机器，以增加航行的速率。这些事都须政府来做，大量制造，低价出售，在自然淘汰的原则下，一切旧式的交通工具自然会淘汰。我们应当设法将“机器”插入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 耕种方法的改革

蒋主席在演词里又提及农村里的情形，说“我国没有充分的现代农业原料，例如肥料、杀虫剂与良好的种籽，也没有充分普遍的现代耕耘知识”。蒋主席认为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应立即筹划一个增进我国农业的切实方案，并付诸实施”。这一个方案当然应当包括改进农民的耕耘方法在内。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不能和现代各国社会同样进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做到“以最少的金钱做最大的事业”，“以最少的人力得到最大的效果”这一个原则。在一百多年以前，英国农民的耕耘方法，无论是耕地、下种、收成、储藏以及运输分配等，固无不是依靠人力，依靠手工。但是今日英国农民已知充分利用机器，用机器耕田，用机器下种，用机器翻土，用机器收掘蕃芋或收割麦子，甚至就在收割麦子的机器上，一面收割麦子，一面将麦穗和麦秆分开，而分开后的麦秆在同一时候经过同一架机器，捆成了一捆，并砌得四四方方。这种科学的耕种方法简直令人观止！大约估计，在这种机器化的耕种方法之下，一个英国农人的工作效率至少抵得上三百个中国农人的工作效率。这种耕种机器化的改革，当然不是一个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同时，我也不相信在最近的二十年

内，中国农村可以大量利用机器。因为这种耕种方法的改革，所需的条件很多，非像我们在纸上所想像的那样简单。但是今日我们对于农事的改革，至少应当具有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下，向农村机器化的方向进行。我们一时之间固无法完全仿照高度工业国家之那样什么都用机器，但是我们应当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以达到节省人工增加效率的目的。举例言之，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橡皮管输水的办法，以代替完全用人工戽水的办法？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简单的器械，以马或牛来拖行，从事翻土耕地以及收割谷子？是不是我们可以相当地扩大农村田亩的平面，减少交错在田亩与田亩之间的田埂，一方面减少废地，增加耕种的面积，同时可以适宜于利用各种比较简单的器械或车辆，以从事耕种。凡此种种，在技术上都有赖专家的研究与设计，我们在此地所贡献的就是一个原则：“用最少的人力求最大的效果。”

### 卫生状况

蒋主席又提及人民的卫生状况，认为最高经济委员会“应该集中精力以改善国内的卫生状况”。在中国的建国工作中，卫生状况的改善应当占据重要的地位。前天还有一个英国人问我，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弄得清洁，在一百年以后中国能不能弄得清洁？这种公用事业，自然应当由政府出面主持，一切污水池塘的填平，内地河流的开濬，垃圾的运输及消灭，传染病的隔离，时疫的扑灭，鼠的杀灭，公共厕所制度的建立，以及医学的研究，药品的研究与制造，医院的设立，医师的培育，护士的训练，等等，都非任何单独个人能力所及。国家必须对于这种卫生费用，给予很大的预算，并能认真从事，勿徒作为门面的点缀。但是上述种种还都是治标的办法，我们

必须同时从根本上着手，来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国民的健康。因为若是只从医病着手，而不从防病着手，则一面医治疾病，一面制造疾病，不仅对于国家财政是一重永无尽期的负担，并且亦不合乎近代政治的意义，近代政治的意义是要提高人民的知识，使人民能自发地追求其幸福。所以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从事广大的卫生消防工作，同时我们要在根本上改变人民的生活头脑，使他们明了日光、空气及水的价值，使他们觉得卫生的重要，而养成一种自我清洁的习惯。假如一般人民对于卫生生活甚至一般生活能有一种新的观念，一种新的头脑，他们自然而然地会爱好清洁，减少疾病，提高一般国民健康的水准。

### 住宅问题

与卫生有密切关系的是住宅。现在中国除了新式都市里的一部分住宅以外，在一般城市及乡村间，对于住宅的结构与布置，大都没有什么新的改革。这种情形亟需加以注意。对于一般人民的住宅，我们至少应当先做到三事：第一，应力求每一幢住宅的独立，勿与他人的房屋接连，如此可以增加房屋四周的空地，减少污浊的空氣的密度；第二，应当增加窗户的数量，并改大窗户的尺寸，使室内容易吸收较多的日光与新鲜空气；第三，在一般农村之间，应竭力设法使厕所和猪圈和正屋分开，以减少臭味及疾病的传染。

我认为我们既想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府似乎应当至少推行一个温和的社会改革运动。今日中国社会亟待改革的事情当然很多，但不妨先就几件较为迫切而实在的项目，认真做一下。就说建设房屋，现在各地地方政府也有工务建屋的管理，但事实上，那种工务管理，恐怕不仅无助于社会的改进，

容或反有扰于人民。我认为，一方面，城市应有城市的建筑设计，乡村应有乡村的建筑设计，这些设计总应力求其合乎现代社会的要求，同时，对于一般人民的住宅，也应加以指导，这种指导决不是问他要几个钱才肯给他建筑执照，应是在房屋的结构上，如式样的美丽，避寒避暑的程度，日光的吸收，空气的流通，耐久与安全，对于外部风景的调和等等，作合理的指导。近代政治原则，所以要求政府指导人民的生活，是因为政府能集国内外专家的研究而得到比较完善的途径。所以政府必须发挥这种任务。

此外，我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与监督下，可以运用地方造产所得，帮助人民改建新屋，或者全部由政府建筑，再以低价租给人民，或者以分期归还的方法，贷款给人民，在政府规定的条件下自建房屋。房屋问题实在也是今日中国民生问题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凡上所述，都是我读了蒋主席最近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上所致的一篇演词以后的意见。我相信，凡是对政治有抱负的人，对于这些有关民生的问题，都是应该感到极大的兴趣的。

三四，十二，四。

（《客观》第五期，1945年12月8日）

## 敬告马歇尔元帅

马歇尔元帅奉命使华，日内可抵重庆。以马歇尔元帅的身份与才识，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出使一个情形极其复杂棘手的国家，美国及全世界对于马歇尔元帅信仰之隆，以及马歇尔元帅此行使命之重，殆可想见。中美友好，已成为一个传统。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中国所得力于美国之援助及鼓励者独多，而美国关切中国来日的命运之较他国为尤甚者，亦为情理之自然。我们于马歇尔元帅莅临陪都之日，愿以一个在政治党派关系上无所属的自由人民的身份，为国家前途，略贡所直，以为参考。

国民党一党执政，前后垂二十年。二十年专政的结果，使国家的生命愈来愈脆弱，人民的生活愈来愈艰难。则至今日，使友邦的元首，也不得不对中国多年以来这种一党专政的局面，表示“必须修改”。中国政治上的改革兴替，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到今日，弄到友邦元首虽不欲出面一言而竟不可得，就我个人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国家的耻辱。在历史上，必有人负这种国耻的责任。但是经过多年的一党统治的中

国，从各种要求上看，必须进行改革。中国民生之苦，已超出了时代所容许的程度，但是要改善民生，先须有一个有较好行政能力而又有良好政治道德的政府；世界经过两次大战，必须进入于和平稳定的局面，但要使世界和平稳定，必须消除一切威胁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的分裂和混乱，足以威胁到世界的和平。所以，我们必须希望并使中国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民主、强盛的国家。

## 统 一

中国需要统一。但是：第一，所谓统一，是指在一个国家版图内的最高立法权、行政权（包括外交权和军事权）及司法权属于这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但这个中央政府必须是建筑于大多数的人民的公意之上的。这个政府中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如立法机关的议员及行政部门的行政首长等，必须容许人民或其代表对于他们的进退任免有最后表示意见的权力。这个政府的一切施政，必须以国家及全国人民的福利为目标。统一不是将国家的各种最高权力给予任何一部分少数特殊阶级，而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权力以达到他们这一批少数人物为谋取他们自己的特殊权势及特殊利益。

第二，“统一”的本身不是一个目的，“统一”只是一个条件，一个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的条件。国家的政治目的乃在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快乐，文化进步。我们要求国家统一的目的，乃在使国家能于统一以后得以励行其所应负的各种责任；“统一”本身并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

## 民 主

中国必须走民主的路。我认为：

第一，从事民主的运动，不应当仅仅视之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应更进一步视之作为一种文化运动。我们当然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一种民主制度，但是要使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根基巩固，必须使人人在日常生活及日常意识中，充分有民主的修养。要人人爱好自由思想，人人有容忍异己的态度，人人能凭理智讨论及处置一切事务。假如人人有民主的头脑，及有一种民主的思想方法，则在我们的国家中才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根深蒂固而不致徒有其名。

第二，要实行民主应先使人民能自由言论。中国目前第一步应使知识分子能充分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其次再求一般人民能有自由表示意见的能力，应先从改善他们的生活能力着手。要一般人民食能饱衣能暖之后，他们才知什么叫“意见”，才能进而希望他们表示意见。所以，来日的中国政府必须实事求是，选几件与民生最有关系的事情，下决心，立勇气，大规模地改革一番，这是充实中国国家生命的一个根本办法。

## 自 由

任何一国的舆论，大都均系出之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其在今日中国从党治到宪政的过程中，对于知识分子之出而领导舆论，尤感切要：

第一，要使人民有言论之自由，须先能切实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假如人身自由没



有切实的保障，则其他一切自由都不会真正存在。

第二，言论自由包括在公共场所演说的自由，出版报纸及刊物的自由，采访新闻及拍发新闻电报的自由，私人通信的自由，印刷著作物的自由，演戏的自由。凡上种种，俱不受官方或半官方之任何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限制、干涉、压迫及威胁。行使上述种种自由权利时，如有触犯法律之处，政府得依法于事后追惩之。

我认为，国民党为表示其倡导民主的诚意起见，应于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后及国民大会召开之前这一段时间内，通知国民政府废止一切限止上述各种言论自由法令，并明令允许人民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自由出版报纸，出版刊物。

## 改组政府

为求国家进步及加强进步的速率起见，政府即须加以改组，以容纳有下述四种条件的人才：

1. 有现代的头脑者；
2. 有良好的行政才干者；
3. 有良好的政治操守者；
4. 能将国家及全国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的利益之上者。

但是，我们应当充分注意：今日中国的人才并不完全吸收在各党各派之间。在多年的反常的统治之下，有操守，有政治才干及政治抱负的人，大都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今日中国各党各派之间，人才固然不少，但网罗人才并不能完全就各党各派求之。我们应尽量鼓励在党派以外的民间人才参加政府，使他们得到机会以增加其种种有关实际政治的智识与经验，以为将来的国家之用。

## 中产阶级及自由分子

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

十二月十九日

(《客观》第七期，1945年12月22日)

## 杜鲁门声明中的三句话

这一周，重庆的政治洪浪正急剧地向上涨。数月来密云不雨的局面似乎已到了必须打开的阶段。两周以前（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发了一篇长达一千五百言的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这篇声明不仅非常明确，而且相当硬性。据未证实的传闻，杜鲁门总统这篇演词，就是奉命执行这一声明的马歇尔元帅所起草的。这篇美国对华政策声明，拆穿了讲，只有三句话：

1. 中国内战必须停止；
2. 中国政府必须改组；
3. 能够做到 1、2 两点，美国就借钱给中国。

马歇尔元帅来华的使命，就是促使中国实现上述 1、2 两点。

## 马歇尔元帅来华与中国

我们对马歇尔元帅的使华，有三层观感。

第一，马歇尔元帅的使华，对于中国及中国的人民，是有益的。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建设，不希望再有内战；中国人民希望改组政府，俾政治上可以有一种新的刷新：政策的刷新，作风的刷新，才干的刷新，以促进国家的进步、繁荣及强盛；马歇尔元帅此行的任务，正与中国人民上述的愿望相符合，并可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其愿望。所以中国人民对于马歇尔元帅的来华，不仅表示出衷心的欢迎，而且满怀期望，希望马歇尔元帅的任务能圆满完成。

第二，现代文明国家已很少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的政治纠纷，独中国为例外。民国以来，几乎年年有内战。经过八年抗战，世人对于中国的耳目一新，以为中国从此变成了一个新生的国家，向现代政治迈步猛进。不料日本甫告投降，中国即起内争，实在使全世界大失所望。不该发生内战的，竟发生了内战；内战应由中国人起而制止者，竟还要劳神友邦，从中调解，可谓丢尽国家的体面。至于政府改组，更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多少人早就要求结束党治，开放政权，铲除贪污，吸收贤能，可是执政当局，一意孤行，置若罔闻，弄到现在，外国人也出来说话了。虽然杜鲁门总统声明“美国政府素来主张一个原则，即内政处理是主权国家的人民自己的责任”，又说，“美国政府认为关于中国团结的必要的详细步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拟出来，任何外国政府干涉这类事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大家看看这几天来重庆的局面：马歇尔元帅抵渝后，今天接见这一党的代表，明天接见那一派的代表，目的虽为交换意见，而一般印象，马歇尔元帅俨然成为了一个有关今后中国政

治前途的中心人物。而且，当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发表了，马歇尔元帅已启程来华后，我们就听到已有人在作“行政院改组不成问题”的表示了。自己人作合理的要求，硬是“相应不理”，一定要“洋大人”来了，局面才有打开之望，中国人的自暴自弃，想不到竟一致于此。

第三，话虽如此，但目下毕竟是中国政治改变的一个机遇。我们为国家前途着想，就不得不希望在这样一个难再的时期中，朝野各方，相忍为国，和衷共济，不要太重视自己的一党一派的利益，能为国家开一个新局面，打出一条新出路。我们希望在野各党各派不要太诉诸感情，趋向极端；同时我们更特别希望专政二十年了的国民党能反躬自省，检讨这二十年的大好光阴中，究竟替国家做了些什么事情。不满国民党的潮流，现已泛滥全国，泛滥各阶层，甚至泛滥于大多数超然于政治以外的人民的心底。国民党应当平心静气地检讨：为什么会弄到这样一个局面？是不是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纯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得失、利害或野心，或者国民党执政的成绩确实难以令人满意？国民党还是有前途的，只要党能够去旧布新，淘汰渣滓，提携有操守有才能的优秀后进党员，以最大的勇气来一次革新运动。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马歇尔元帅的来华，谋促进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进步，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不过，能够达到民主、和平、团结、进步，也正就是目下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正是平行的，相符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目前这个机会，以促进国家的安定与进步。

### 政府组织问题的核心

改组政府这一原则，现在大体上已不成问题；问题是在政府如何改组。国民党与反国民党之间的政治斗争，目下不仅已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澎湃的程度，而且在内容上，甚或在性质上，似乎已进入了另一种新的阶段。执政党方面似乎倾向以“改组行政院”作为“改组政府”的解释，而在野党派对此恐难接受。因为就在野党派的观点而言，单单改组行政院并不能达到实现民主政治的目的。改组行政院仅仅是各党各派，说得好听些是共同参加政府，说得不好听些是彼此分赃，与所谓“民主”者，固仍相去甚远。今日在野各党派，似乎已经认清“政治精神之改组”较之“政府形式之改组”尤为重要。说得明白些，在野各党派企图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其目的在使人人能服从这一个民主制度，受治于这一个民主制度，无有一人能高出于这个制度而站在这个制度上。这是今日所谓“改组政府”问题的核心。

抑有进者，仅仅是形式上的改组，如传说中的行政院改组等，对于今日之在野党派是大不利的。因为行政院改组的结果当是各党各派共同参加政府，在各党各派参加政府后，未必能贯彻他们原来的政策及作风。经久之后，他们在各种实际的环境里，反而失去主动，同时将因他们在政治上的无作为而失去人民对他们的原有的信仰。这一点，大概也是今日在野各党派所已经看透了了的。

##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败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乍寒乍暖，已酝酿了好几个月，现在大概快要举行了。一般人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前途，看法不一。有些人悲观，有些人乐观；甚至有些人且表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些意见都不免失之偏激。我觉得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或失败，是一个程度问题，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所以我们即使退一步说，政治协商会议若能召开，其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亦无不可。民主政治本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英国今日的民主传统，实为千百年来之进步所造成，而小自古代之贤人会议，以迄今日之国会，亦莫不是一步一步演进而来。民主会议的目的，乃是以多数制服少数，以公道制服利害。中国素乏此种传统 (tradition)；故传统本身的建立，在历史上亦自有其意义。政治协商会议究将得到何种结果，现在言之尚早，我们对于出席会议代表的希望是：第一，固然不宜太迁就现实，但也不宜过分诉诸理想；第二，总要先把一党一派甚或一己的小利益放在旁边，然后能发言出乎至诚，论事顾及大局。政治协商会议是一种争取民主的会议，我们实不欲漫无标准地评其为成功或失败，而只希望它所争取得到的“民主”愈多愈佳。

十二月二十五日

(《客观》第八期，1945年12月29日)

## 又是一年开始

又是一个年度的开始。我们在岁尾年首，总不免要对过去有一番检讨，对未来满怀若干希望；这也是人之常情。以我们的国家来说，去年后半段，真是一段富有戏剧性的日子。日本的投降在不到一个星期的短促日子之内，骤然而至，使我八年抗战，也骤然宣告结束。一般人民的欢腾情绪在意想不到的环境下升腾到了极点。可是接着而来的失望也就够惨。最初以为在极短的日子内即可还乡的，到现在还是一步不能动；甚至有些人过分乐观冲动，竟将衣物用具悉数变卖，到头弄得在重庆过不得冬！又有些人对于传说中的胜利奖金抱大希望，结果只落得春梦一场。而且各种恼人的消息接踵而来，物价则又于回复到了八月投降时候的指数以后，再作努力上涨的趋向。人民从大高兴跌到大失望，又在大失望中，渐渐麻痹了起来。

然而局势终于在穷则变，变则通的公式中开始放射出新的希望。政治上风云际会的人物，目下都集合在重庆。民主运动已达到空前高涨的程度。杜鲁门发表了一篇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五星大元帅马歇尔奉命到了中国，最近的三国外长会议又



对中国大局下了一道虽然简短而极硬性率直的“眉批”。客观环境现在已充分成熟，只待我们变，向好的方向变了。

### 以万变应不变

国家政治，从政党的角度看，是一种看法；从人民角度看，又是一种看法。我个人对于“政党活动”的兴趣十分淡薄，而对于“福利政治”的兴趣异常浓厚。政府的组织可以变，政府的政策可以变，政府的人选可以变，但政治的目的不能变；政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并增进人民的自由、权利与幸福。不论哪一批人来，哪一个党来，总要认认真真拣几件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业，在为民谋福利的原则及目标下，大刀阔斧做一下。“福利政治”在各国都是占第一位的，而“福利政治”在中国的需要尤为迫切，因为中国一般人民的生活实在太无保障，和现代国家的生活水平实在相差太远！在我们的记忆中，在中国，政治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少数人，并且也只是做给少数人看的。因为只是做给少数人看的，所以在这一批少数人的心目中，他们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是好的；他们觉得他们所用的人员，也都是有为有德之士。因为国家的政治都只是为了少数人，于是这一批少数人便越来越肥，而全国的百姓便越来越瘦。为卡莱尔所称的“人民状况问题”，是历来的英国内阁的第一件大事，而在中国，则很少从事政治的人注意这个问题。若问我的良心，我仍然相信在中国，绝大多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都乐见中国之强盛，都期望中国之强盛。盖事实上，未有民穷而国可富者，亦未有民弱而国可强者。“以不变应万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以后应当“以万变应不变”——什么都可以变，而“以民为首”这一原则不可变；在政治上应以人民的公意为第一，在经济上，应以人民

的生活为第一。政府总要使人民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食粮吃，有工具用，有工作做！

假如在野党派能采行我这个具体的建议，  
即可达到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一月十日举行，大家希望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时，能够允许新闻记者自由采访，让人民能够知道政治协商会议每天在讨论些什么，各党各派或无党无派的代表们在会场上说些什么话，表示些什么意见，从而使人民对于这些代表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发表的意见，有批评及建议的机会。据报纸所载，在野各党各派都不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新闻公开。政府方面则有人表示恐怕会场狭小，不能容纳新闻记者。这个理由当然极牵强，如因会场太小，则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做会场好了。所以看上去，大概是政府方面不愿新闻公开。我以为单单“希望”新闻公开或“要求”新闻公开，仍嫌过于消极，我们应当想一个有效的办法，使新闻非公开不可。我现在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便可达到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我认为假如因为政府的反对，致使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时，不能允许新闻记者自由采访的话，则在野党派可以每天在会后自行招待新闻记者，因为政府可以不许新闻记者旁听政治协商会议，但政府可不能禁止各在野党派自由招待记者。这种在野党派招待记者，可以在野各党各自单独招待，或在野各党联合招待。假如是前一种办法，则决定每天在会后招待记者的各党派，可于事前自行排定各党招待记者的时间，务使彼此不相冲突，并将各党招待记者的时间稍加限止，以便让各报记者回到报馆后有充分的时间写稿子。如甲党定下午八时至八时三十分，乙党可定八时三十分至九时，丙党可定九时至九时三十分

等（假定招待记者在同一地点举行；如不在同一地点举行，时间便须另行酌量排定，使记者们有交通往返的时间）。当日会场经过的本身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各党的解释和观感彼此不同，新闻记者及全国人民便可从这些不同的各党记者招待会上对于当天的政治协商得到一个轮廓，并从不同的党派的报告，得到一种比较与研究的机会。假如是后一种办法，则可由联合招待记者的党派互推一人，对当天会议情形作一叙述报告，各党可以各派代表在场，如有需要的话，可再补充该报告员报告之不足。这两种招待办法，各有得失，但只要能采行一种，即可使每天的会场详情，传布全国。新闻记者纵使不免太为辛苦，但职责所在，这种招待会即使迟至午夜十二时，也必不会放弃机会，宁愿减少睡眠出席采访的。

当在野各党派自行招待记者，报告当天会场经过时，在报告中，各在野党派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或多或少地宣传他们本党的观点；这不仅是不可避免之事，而且是极自然之事。这样一来，政府就决不会“相应不理”了，因为假使只让在野党派天天向记者宣传，而自己反而不急起直追，未免吃亏太甚，必不甘心，于是其结果必定：（一）既然这样，那就不如干脆新闻开放，让各报记者直接到政治协商会议来旁听，自由采访；或者（二），在野党派每天招待记者，政府亦规定时间招待记者。不论出于哪一种，总之，我们完全得以实现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假如在野党派有诚意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话，他们应当不具任何成见，认真考虑我这个切实可行的建议，而很乐于接受去实行。

三十四年除夕

（《客观》第九期，1946年1月5日）

## 我对于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的非政府代表的一个重要进言

政治协商会议开过以后，政府殆将进行改组；改组的方式和程度，尚不详知，我愿就此事，对所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进重要之一言。

我认为在未来的改组中，所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能竭力避免参加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为最上策。这有几个理由：

第一，中国社会上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以为在野的人批评政府，其目的即在“做官”。这一种观念当然是不正确的。一则所谓“做官”，就是参加政府；参加政府是对国家的一种服役，并不是一件坏事。二则批评政府的人，不一定是为了想“做官”，自亦有人确以国事为襟怀，以民生为痛痒，作为放言发论的目标。但这种观念虽不正确，而却极普遍。并且不幸在中国，做官虽非坏事，而做官人的德行，而常不为人民所器重崇服。假如现在这些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在野党派领袖，在政府改组时，立刻参加政府，而此一事实，极易被人民误解，以

为这一批人之所以高喊民主，其目的即在“做官”，使向为一般人民所有的那种虽不正确而却普遍的传统怀疑，得到了新的证实。而且，许多内心反对民主的人，借此亦可大肆宣传：“你们看，这一批人今天民主，明天民主，结果还不是想做官？”这种误解和破坏，其不足取，固无待论，然而对于整个的民主运动，却将发生极不利的影晌。今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都是以实现达到民主政治为任务的，为了“民主运动”的前途，他们似乎应当考虑他们的出处，务使不要因他们之参加政府而使民主运动遭受误解与打击。

第二，从事政党活动的是一种人才，从事实际行政的又是一种人才。前一种人才的条件是头脑敏捷，口才伶俐，文笔锋锐，胆识果敢；后一种人才的条件是精细周详，宁静任怨，有条理，有效率，有操守。这两种才干可以兼长于一人，但不一定为人人所兼有。故今日之从事政党活动者，以之引组织，策纵横，事宣传，或绰然有余，如一旦身负实际责任，是否能有条不紊，洁身自持，尚难断言。国事体大，从政者幸而成功，国家人民两受其赐，不幸失败，国家人民两受其累。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其最高目的是希望将国家弄好，因之我们每人在有机会参加政府时，仍不得不慎审自省，自问其行政才干是否胜任，其立身操守能否自持，而勿眩于功名，贸然决定。我们总当以国家的得失为前提，视一己的富贵如浮云。

第三，一年以来，我们若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虚心承认，今日之非国民党党员，其言论实较之一般国民党党员为自由。这有两大原因：一、一般国民党党员未必对本党执政的成绩感到满意，譬如前年湘桂战役的失败，以及去年接收人员的不法等等荦荦大端，都使一般国民党党员无法为其本党作正面的辩护；二、国民党党员在党内种种环境及顾虑下，反不

能自由发言，不论此项发言是批评本党或攻击敌党。倒是在野党派或超党派的人，可以对现局自由评论。可是政府一旦改组以后，这种情形便将发生改变。再说实际参加政府，并不如想像中那样单纯。要具备许多条件，参加之后，始有成功之望。就今日在野党派言，恐怕只有共产党推举出来的人，参加政府以后，较有站得住的把握，因为共产党在组织、群众及主义三者，均有根基。在组织、群众及主义三事上没有根基的人，一旦参加政府，则向之处于主动地位者，必一瞬间而处于被动地位；向之批评他人者，恐不数日即将成为被人批评之对象。若无把握，与其进，不如不进。此中机微，似宜慎审而熟虑之。

但是，平时要求政府改组，政府真正改组了，又辞而不入，言之似难成理。因此，我有一个较为具体的建议，即各党派如决定参加政府，可由今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党派代表，就他们本党或党外，推荐他们所熟知钦佩的贤能，参加政府。果能如此，则一，仍达到了各党派参加政府的目的，二，推选出来的人才必定更为客观，三，各代表虽替国家开了“民主之门”，而自己并不走进这扇门去，亦不足表示吾人平时批评政府，要求政治进步的胸怀。好在各党派都是济济多士，所网罗的人才，必不仅限于今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这几个代表，而此种推贤选能的风气若能形成，则亦大可一扫多年以来争官夺爵的现象。我作此进言，容不免有浇冷水之嫌，然其初衷，确是为了爱国家，爱民主，爱人才。若有不以余言为是而急功好利者，则他们将来之得失毁誉，吾人可以拭目待之。

## 内战停止

内战终于一月十日宣告停止，化干戈为玉帛，这实在是天字第一号的可庆事！共产党提出无条件立刻停战后，政府曾提出一个对案，其后共产党又提出了一个对案，凡此报端均有记载，此处不须复述。据传，政府方面对共产党所提的对案，原拟再提一个对案，但当共产党的对案提出后，中间人即认为已到了可以谈判的程度，所以终于能在七日上午十时，在“重庆东端的石屋”中，由政府及共产党的代表协同驻华特使，就有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协议讨论。据悉，内战的停止，并不单单依赖命令行之——不单单由冲突双方的司令部下令停战，并且将由美方派人会同双方代表驰赴每一战场，切实执行，使从书面上的“停止内战”造成确真的“停止内战”。

我们真是欣幸内战终能停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反对内战。完全凭藉武力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时代，业已过去；此路实不可通。我在本刊第二期《客观一周》里说：

凭藉军事究竟能解决得了一切吗？否则打了一半，终出于

妥协，则所有死者伤者，以及遭受军灾者，他们所受的痛苦损失，究为何事？岂非天下之大大滑稽？

现在翻读前文，再看到报上所载胜利大厦的一片干杯声，真是感慨系之。这次内战总算停止，我们现在应当更进一步，从根本上想法不使将来中国再有内战。截至八日止，大局趋势虽已极明了确切，而热河方面的战事依然激烈，甚至有些人认为非进占承德，不足以保军事形势上的需要，只此一端，即可见凭藉武力来控制政治的意识，在今日中国，仍极浓厚。今日中国的政治家，应贡献其智慧，替国家打一个千秋万世之基，希望这一次的内战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内战。

(《客观》第10期，1946年1月12日)



## 谈人力车的废止

报载交通当局即将废止人力车的通行，拟分十期，至三十七年底，全国禁绝。此一计划，其动机及目的何在，不甚详知。人力车当然是一种不人道的交通制度，所以在原则上，予以禁绝，无人异议。但此事牵涉到许多有关问题。若说为了人道，则今日中国，比人力车还要不人道的制度和情形，恐怕还不少，假如政府的眼光确已转向到了这一方面，准备一一改善，这自是人民之大福，大可额手称庆。人力车这种交通工具存在东方各国，自有其社会背景。落后的国家缺乏购用机器的能力，依赖人力的交通工具，自然应之而生，同时，欧美人力比较珍贵，东方国家，民生凋敝，生活困难，用人力来拉车，亦即成为一种生活的方法。所以，在国家既一不能负责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二又不能供给人民的交通工具，则人力车的存在，也是一种极为自然的现象，而人力车夫不仅以此解决他们的生活，对社会言，抑亦不失为一种服务。政府现在既想禁绝人力车，则第一，政府对于这一批失业的人力车夫，应有一种合理的处理。一方面不要使这一批人力车夫因之而生活发生问

题，另一方面也不要使这部分有用的劳力，旷费不用。第二，对社会言，政府既想废止人力车，在废止人力车以前，政府应设法供应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假如来日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以电车及公共汽车为主，则政府应负责供给这种交通工具，务使这种供给能符合实际的需要为止；否则，必致引起社会秩序的扰乱，影响人民的工作效率。至于私人的交通工具，政府要是鼓励人民用小汽车、三轮车或自行车，则政府应有计划地大批生产这些交通工具，以供应人民的需要。单单在报纸上说以后人民交通工具以自行车等为主，而事实上，人民并无自行车等可购，此不啻解除人民所仅有的交通工具，而使他们不能利用交通工具以节省他们因步行而耗费的精力与时间。我是最注重“经济及效率的原则”的，我认为国家应当负责来改进我们的交通工具，使我们可以以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工作，但要改进我们的交通工具，乃是提倡并供应比人力车更有效率的交通工具，而非单单消极地废止人力车的通行。

一月十日

(《客观》第10期，1946年1月12日)

# 动荡的国民党

##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国民党

### 一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它所反映的第一件事是国民党政权的中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其中一部分代表着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上的新力量，另一部分则代表着二十年前若干旧力量。先说旧的。除国共两党的政协代表以外的政协代表，其中有不少在国民党尚未执政以前，即已活跃于国内的政治风云之中。国民党北伐，奠都南京，革命的潮流把这些人物打了下去，他们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蛰伏了十多年，而终于在二十年后的今日，重复抬头。何以他们在二十年前革命的浪花下动弹不得？何以经过二十年的时间，迄于今日，仍能东山再起，重复成为了风云际会中的注目人物？此中起伏，绝非偶然。再说新的。共产党的代表全部代表着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上的新生力量。社会的改变和演化，诚非人类所能预先安排，然而今日中国共产党力量之日趋膨大，其症结究在何处？

究竟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之下，始使共产党的宣传和活动深入民间？这次参加政协的非政府代表，他们是最近二十年间所跳出来的新人物也好，或是二十年前的旧人物也好，新的旧的，经过了多时的激荡酝酿，迄于今日，终构成了一条反对派的阵线。然而我们要问，究竟是因为反对派力量之日见强大，始使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日见削弱的呢，还是因为国民党自身的力量日见中落，始使反对派的力量日渐抬头的呢？

政治势力的消长，本是相对的，互为因果的，我们原不能单从任何一面来作绝对的论断，但就上述两点，比较说来，作者的答案宁愿倾向于后面一点。现在反对派阵线的重心在共产党。今日国民党之以共产党为其第一敌党，为其威胁生死存亡的敌党，自不必说；今日国民党之心心念念想打倒共产党，消灭共产党，亦为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这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会膨胀到这般地步？究竟是什么人在培植共产党的势力？据我看来，“培植”中国共产党的，既非苏联，也非中国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己。苏联在某种角度下之乐见中国共产党势力之膨大，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替共产党及一切左倾思想安排一个客观条件的却是国民党。我不能相信假如国民党前后垂二十年的执政，是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教育发达、社会安定，即使今日中国不免有共产党的组织，而共产党会得有如今日这样大的社会力量！二十年来国民党专政的结果，使偏激的人趋奔延安，使中和的人渐渐左倾，使一部分即使不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为了改造时局，也终不得不与共产党接触，采取并行的策略。这一股反对派的洪流，迄于今日，国民党已失去控制的力量，但是这决不是因为反对派的力量庞大了，才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权力，而是因为国民党的本身日趋腐烂，其统治的能力日见衰弱，这才助成了反对力量的扩张。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上的压力。但是国际上何以有压力来？国外的压力也好，国内的压力也好，其原因还是一个，就是起于国民党本身的衰落。假如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还非常强，老实说，他是不会理会国内一切反对派的反对的，假如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还是非常强，他也无庸理会来自国外的压力，或者说，对外也不会有压力来。凡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绝对是已控制全国者，任何来自国外的压力都是插不进来的。

## 二

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何以会日见衰弱下去？原因虽不简单，而其过程却很寻常：这是前后垂二十年的统治成绩的总结。二十年来一党执政的结果是：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困，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堕落。二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未见一丝改善，而且每况愈下，一般人民每日所看见的，所听到的，无一是处，如此局面，焉能长久，焉能不使人心涣散？有一部分人提及对日战争，谓经过八年战争，国困民穷，自然益增政府的困难，人民亦应公平设想，互忍互谅，不要过分责难政府。其说固未尝全无情理。但我们若加研究，则因战争而增加的困难，实仍不足为多年以来统治败坏缓颊。一、假如国民党奠都南京以后，果能一心一德，励精图治，则日本侵华之战，究否发生，何时发生，如何发生，仍为一个历史问题。纵使日本终不免侵华，我国在对抗的力量上，其国力（广义的）是否可较民国二十六年时代为强，亦为可供大家讨论之事；二、再说战争爆发以后，失地之广，失地之速，士兵伤亡之众，人民的生命及财产牺牲之重，流亡之惨，公教人员生活之苦，国难商人之暴富，亦官亦商者之活跃，通货之膨胀，政治

之腐化，文化出版事业之萧条，教育程度之低落，人民基本自由之蹂躏……凡此种种，假如我们的政治上轨道，政府人员清明贤能，是不是可以减轻其所受伤亡、损失、苦难、混乱、腐化、退步的程度？今日之痛，非自一朝；如此局面，焉得不败？

### 三

通常都认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国内国外各方面压力的结果。这是事实。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此因素为一般人所忽略者，即军事上的力量问题。“军事”在中国一向是一种“秘密”，并且也有所顾忌，非人人所易谈，与能谈，但若冷静观察，这也是一个症结所在。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为其统治的根据的；但这完全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若出以唯实的观点，无可否认，二十年来国民党的政权实建筑于他的实力之上。不幸多年以来弥漫于全国各阶层的腐化的道德生活，现已全盘地传染到了军事的领域，其结果，使军事的纪律和机动性均受到严重的打击。中级以上的将官大都耽溺于物质欲望的追求，下级军官及一般士兵的情绪和意志则日趋于消沉恶劣。我用上面两句话来概括今日中国军队中的一般情形，实在还是一种非常保留的描写。因此，我们看最近四五个月以来，在每一个国共两方军事冲突的区域中，我们几乎不难发现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胜利的保证”究竟寄托在什么地方？用政治解决，还可以协商妥协，用军事解决，则还须有绝对把握。所作这类观察，自承非无根据，但此种现象应该获得我们的注意。大政治家大都是现实的，蒋主席对于全盘事实，自然了如指掌。国民党是一个执政的政党，他自必竭尽其力，维护其既有的政权。两害相权取其轻，蒋主席之不得不决定和反对派共

同协商，并开放其一部分政权，绝非偶然之事。

#### 四

国民党在党外所遭遇的困难，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已因政治协商会议之闭幕而得到暂时的解决，目前则又开始遭遇到党内自身所发生的困难。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后，国民党党内政见颇为激荡。我们临空观察，这些激荡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为顽固保守派，一为不满现状派。

先说前者。这派代表着目前在中国所有的极端的顽固力量。他们不是批评协商的内容，何者善，何者不善，何者可以赞成，何者不能容忍。他们乃是在原则上彻头彻尾的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否认政治协商会议。他们不满意这次决定召开政协的人，他们抨击这次出席政协的代表。他们实咆哮多而思考少，感情浓而理性淡。

大凡一个国家与一个社会，从旧的转向新的，从落后的转向进步的，总有一种极端的反动力量出而阻挠，为他们自己的利害和感情挣扎，这种反动力量，有，才是常态，无，才是变态，所以一起沧白堂的骚乱，校场口的纠纷，俱不足奇。但潮流之事物，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震撼人心；潮流之所趋，总会冲刷过阻挠的乱石头向前奔放。我不相信这些极端顽固的人物，能在二中全会发生扭转乾坤的力量。坦白言之，假若在现实的环境下，可以不开政治协商会议，蒋主席也必不会召开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既然弄到非开政治协商会议不可，也就决不是少数固执分子的偏激气愤所能改变事实的。我相信就在国民党之内，大多数人对于政治协商会议必取一种颇为合理的批评态度，而不取全盘否认的态度。在党外，我相信举国舆论一定拥戴蒋主席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国民党代表在政治

协商会议中所表现的精神。

再说另一派。这一派对于政治协商会议大体上也是不满意的。不满意的原因，容有深浅不同，不过比较能了解国民党蒋总裁的用心，而且木已成舟，不能纯粹诉之于感情冲动。他们的情绪，至少有一半因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而忧虑到本党的前途，这一派，大体上对于党内多年以来的作风表示不满，他们不满意的地方很多，而比较集中的意思是：“国民党既对党外的人讲民主，为什么自己党内倒不讲民主？”他们要求党的新生，党要有新的血脉，后近的优秀党员应当有机会跳出来，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才干，从而增加党的活力。

要求党的本身民主化，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如何见之于具体的表现呢？

第一，每个党员对于党内的事情有自由发言的机会和权利；

第二，所有代表党参加政府的高级人物，应出之于选举而不出之于指派。

因之，我们对于这一批要求国民党党内民主的人物，假如再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他们要求党内民主的动机，则似乎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的为党，一类是多多少少为了自己一派一系或一己的势力。前者不必解说，他们目击国事的演变，本党势力的消长，深觉党必须得到新生。党若能得到新生，对党好，对国家也好。后者则因为他们在党里已经是一个多数派，假如党内实行民主，代表党参加政府的人物一律出于选举而非出于指派，则他们即可大肆活跃。我们从旁冷观，觉得这一部分人在党内，所以获得地位，原系出之于“非民主”的办法，而他们现在之呼吁“党内民主”，是真正为了党的前途，抑是利用“民主”作为他们的党内竞争的手段，实有研究的余



地。

## 五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一方面反映着国民党力量的中落，另一方面则使国民党内部的冲突斗争因此更加上了一层复杂的因素。国民党究将因此而趋于团结，抑或趋于分裂，目前言之尚早，但我们就整个大局观察，现在的中国，无论外交、内政、经济、教育，都是危机四伏，百病丛生。国家弄到今日这样的局面，国民党要负最大的责任，而收拾这种局面，补救这种局面，其责任也在国民党的肩膀上。在权力上，国民党自必不会甘心完全放弃，在责任上，国民党也无所规避，但是国民党以党自身居国家，却非过去那一套作风所能做得到的。今日之国民党，非无前途，非不可为，今日中国大多数人都不满意国民党，不满国民党的腐化，不满国民党的自私，不满国民党的偏狭，不满国民党的低能，但尚未到非把国民党打垮不可的程度。这并非特别有所偏爱于国民党，这实在是今日中国还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来代替国民党。国民党有二十年执政的历史，他的力量（包括成事的力量和败事的力量）分散在社会各阶层，我们没有办法忽视这些力量，至少在后此十年的中国政治中，国民党仍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如其希望国家弄好，也就希望国民党能先弄好。

现在国民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更换国民党的细胞。关于这一问题，事实上几乎存在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国民党需要使后近优秀的党员在党内表现力量，发生作用，而另一方面，在目前情形下，后近优秀的党员几乎没有机会能在党内抬头。国民党以蒋总裁为中心，而围绕在蒋总裁四周的，则有由党内各派各系所构成的一道铁圈，虽有德而无凭藉的后近党

员，竟无法冲过这一道铁圈。假如一个党员能冲过这一道铁圈，那必因这一个党员已属于构成这一道铁圈的任何一部分；易言之他必须通过某派某系，成为了某派某系的“人”，始能见用于蒋总裁。但今日国民党所需要者，显为既存派系以外的优秀有为的党员，因此我认为，在消极方面，凡是党里面（一）体力上已不足胜任大事者，应使之退休；（二）思想上不能追随时代的潮流者，应使之退休；（三）做事的方法及作风上已不适应现代的标准者，应使之退休；（四）多年从政，无任何成就者，应使之退休；（五）声名败坏，不满众望者，应使之退休。国民党应有一次以能力及道德为标准的大清党，使优秀有为的后近党员有更多的机会以表现他们的才能，因而增加党的活力。在积极方面，国民党则应多鼓励、收不属于今日党内任何派系的超然党员。特别是那些在学术、教育、文化以及工商各界中已有所成就的党员，使他们有机会能多为党的前途努力，间接以服役其祖国。我并不主张将现存的派系完全忽视，因为国家要有重心，党也要有重心，现在党的重心是寄托在各派各系的共同的力量上的。但一方面承认现存派系的力量，以求党的安定，一方面则重用有为自重的优秀党员，以培植党的新生命和新希望。

国民党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振奋全国的人心。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执政的成绩和作风，失望痛苦，已到极点。国民党必须痛痛快快来做几件事情，一新全国的耳目。在消极方面应当从速惩办汉奸，惩办贪官污吏，惩办奸商，取消特务。这四种人，他们不时出卖祖国，假公济私，为非作恶，蹂躏人民，现在应该请他们偿付代价。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及活动，也应受到约束和限制。国民党不应再只顾到有钱的人而不顾到没有钱的人，那就使天下日乱而自毁其政权，同时也就替他的敌党

共产党制造机会。这几天各地物价飞涨，今天（二十五日）报上已有杭州所有米店，被激愤的平民捣毁一空的新闻。经济如此混乱，民生如此困难，真是如何得了！但要顾全平民的利益，就得牺牲一部分财阀地主的利益。国民党必须有勇气来面对这一现实，必须有决心来制裁一切为了少数私人的利益而垄断工商市场的行为。在积极方面，当政的国民党更应以全力，简简单单规定几件与全国民生大有关系的事情，如房屋、交通工具、耕耘工具、医药设备、衣服材料、公共娱乐等，来改革建设一番以苏民困。国民党如其不能大刀阔斧，彻底地做几件大事，只靠一些党老爷演演说，喊喊口号，贴贴标语，那只是自欺欺人，自弃弃人，绝不足以挽救今日的颓局。

（《客观》第15期，1946年3月2日）

## 失败的统治

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二十年。二十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国民党有主义，有理想，当初也是满怀热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何以执政二十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是国家社会，也给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症结，实堪研究。

一个政党执政的成败，原因既多且极复杂，非执一言所能论议；然其成败之关键，必有最基本的原因可寻。作者以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但欧美政党，恒以施政的政绩来维护其政权；国防务臻安全，外交总替本国说话，政治力求清明，经济尽量求其繁荣，一切在交通、教育、治安、卫生、房屋、休闲各方面，无不用最大的力量向最好的目标做去。所以欧美各国，无

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就是苏联，其政体虽然另树一帜，但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励精图治，倒底把国家弄得像个样子，在国内，能使人人衣食不愁，在国际上，能够打退强敌的侵犯。只要政绩良好，人心自然归附；人民拥戴政府，政权自然不愁动摇；而朝野分头努力，国家因亦可抵昌盛康乐之境。

不幸中国国民党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我们先看这二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有什么进步？言军事，我们根本谈不上“国防”，人家已走进原子和雷达的世界，我们还停留在步兵和机关枪时代。言政治，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言交通，二十年来我们曾铺了多少铁路，造了多少轮船？甚至到现在为止，不仅还不能制造一架飞机，甚至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言教育文化，二十年来我们的科学发明在哪儿？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在哪儿？音乐和绘画有何成就？其尤甚者，一般的教育水准及文化水准是在向上升还是往下降？至于经济建设，土地改革，这一切有关民生的大问题，大都空言多于事实，计划多于实效。然而二十年来我们的执政党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一言蔽之，这二十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养许多兵，是为了巩固政权；一切党团的组织、活动、训练，是为了巩固政权；特务和各种检查制度的施行，是为了巩固政权；就是公路的开辟、电话网的布置，也无一非出自军事及治安的观点，其目的仍是为了巩固政权。二十年来，只有这项消极的政治控制工作，吸引着国民党无比的兴趣和重

视，表现着国民党最大的勇敢、决心和魄力。二十年来，我们做百姓的，只有这一个项目，使我们到处听到、看得见、嗅得着，并感觉到它的紧张、严密、认真和不放松。但是也就在这一个项目下，这二十年来，不知消耗了国家多少金钱，雇用了国家多少人力，浪费了国家多少智慧，糟蹋了国家多少光阴！当前的执政党既倾其全力于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大大影响他在积极方面的种种建设工作。所以，二十年来，我们的交通和水利没有高度的建设，土地制度没有革命性的改革，耕耘的方法和耕耘的工具依旧墨守陈规，种子和肥料毫无新的改进，人民的居室依然黑暗而污秽，民间的代步工具仍然滞留在原始阶段，一切近代的机器生活从无机可插入乡村，保健事业和社会救济有名无实，疾病与贫穷仍弥漫全国，一般人民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观念，毫无改变，毫无进步。凡上所述，俱属琐碎，而无一非建国元气所系，但从来没有见到政府有兴趣和决心推行过任何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二十年来中国的执政者，只有在征税和壮丁两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治生活中本来潜有物理的作用。政绩腐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须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

抑有进者，太重视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时促成道德的堕落。政治控制是以力取人而不以德服人，主使这种政策及执行这种工作的人，必为无道不德之徒，流风所至，遗害难言；

这是一层。其次，在一个以力而不以德治人的社会中，有骨气的人，心难甘服，于是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洁身自好，柔弱者颓靡消沉。国家尽失梁栋，社会无复正气。其三，在唯力是视的社会上，断无是非公平可言。我们看这几年来，国人的意见，政府置若罔闻，而美国一言半语，当局无不重为考虑，因为美国有飞机大炮和金钱；无党无派小党小派的人，喊破了喉咙也是白费，而共产党的意见，就不能相应不理，因为共产党有枪杆；甚至教授罢教，政府可以听其自生自灭，而工人罢工，有司不能不管；一切只讲强力。只讲强力的社会必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同时亦即为一个乱的社会。其四，要求政权巩固，自然不愿政局发生不必要的波澜，于是老朽之辈，虽庸碌一无成就，亦可尸位十载而不易，“忠实”之徒，虽恶行多端，众口所诛，亦仍能安如磐山，行其所行。贤不肖不复有别，而国家取士之道尽失！

在一般国民党人的心目中，以为今日党的生存问题，其重点莫过于敌党之消灭。作者则以为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今日国民党的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党，自然更不是如何消灭敌党，而是自己能不能认认真真硬硬扎扎实实赶快做几件像样的事情。今日一般人民所要求者，是（一）没有房子住的能有房子住，（二）没有衣服穿的能有衣服穿，（三）没有饭吃的能有饭吃，（四）能让他们和平的安于他们的工作，乐于他们的工作。今日一般知识分子更进而希望国家有尊严，有前途。假如大家有屋住、有衣穿、有饭吃、能乐业，人心自然归附，社会自然安定，国家自然结实，国际上自有地位，整个国家的前途自然充满着光辉与希望，而今日批评政府者，亦必将拥戴政府之不暇。今日之世，未有国家垮台而政党可以站住者，亦未有人民贫穷而国家可以富强者；富国先富民，兴党先兴国。要挽回党的颓局，

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二十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个执政的政党，必须以政绩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能如此，国家有利，党亦有利；否则，国家也许有前途，而党决无前途。

九月九日

(1946年9月14日《观察》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 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 一

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达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美国一般社会平时所有的那种浅浮、放狂、享乐的生活方式，向不为世人器重，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勇敢坚毅的牺牲精神，俱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罗斯福总统不仅使大局从逆势中扭转过来，并且赖有他所独具的崇高的人格和理

想，使这个战争，从一个实际上纯然是一个利害冲突的战争，变成一个有理想、有原则、有灵性的战争。他所领导的大西洋宪章以及他所号召的四大自由，成为了无论在前方后方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生活的千万男女心灵上所共有的一个神圣的鸽的，当中国的政府、人民、军队，依然被驱于中国西部的山谷地带时候，罗斯福总统去世的噩耗传来，不知引起中国多少男女的悲悼哀思！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

但是这种感情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复杂的，然而却是苦痛的。我们不满意目前美国种种对华做法，但我们不忘情在战时美国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援助；我们无可抑止地仍然缅怀着已故罗斯福总统的崇高伟大，但我们明白今日之美国已非昨日之美国。这诚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

## 二

在过去数月中，美国对华政策，引起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摘。美国在华活动，大致可分两项，一为美军驻华，一为参加调解。先说美军驻华。美国驻华的理由，根据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声明：

为了继续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此次战时经常的合作，为了符合波茨坦宣言，并且为了清除在中国境内日本势力残留的可能性，美国特定一种确定的义务，使日军缴械和撤退。

因此，美国曾经，并将继续，协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被解放地域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美国海军现留华北即是为了这个目的。

在同一声明上，又说：

美国已经为了恢复因日本侵略东北而首被破坏的和平，被迫付出巨大代价。除非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除非中国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则太平洋的和平即使不被破坏，也将遭到危险。这是美国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的目的。

我们根据上引美军驻华的理由，陈述下列意见：

1. 在理论上说，世界和平不可分。美国牺牲了多少生命，耗费了多少物资，其目的在求世界的和平。凡足以威胁或破坏世界和平者，美国有发言的权利和义务。这个理论，我们不欲否认之。在战时，中国和美国同为盟国，并肩抗敌，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之。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承认美国有在中国境内使用武力以协助中国国民政府使日军缴械和撤退的权利和义务。

2. 美军驻华的理由，既为协助中国国民政府在中国境内使日军缴械和撤退，则我们认为，此项使中国境内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显然应以中国国民政府为主体，美国处于协助的地位；充其量，中美双方并肩协力共同合作，使日军缴械及撤退。

3. 但是我们愿意知道，在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上，中国国民政府有未充分发挥他全部的心力和能力，以尽他应尽的义务？我们同样愿意知道，日本受降已逾一年，日军的缴械和遣散的工作，迄今有未全部完成？如已完成，是否美国即可认为“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而撤退驻华美军？如其尚

未完成，何以中国国民政府不先尽其全力以从事他应负担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反以其力量从事于国内其他与日军缴械撤退工作无关的军事行动？

4. 假定美国容许中国国民政府不先尽其全力以从事他应负担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分用其力量从事于国内其他与日军缴械和撤退工作无关的军事活动，我们不得不认为：此即足以表示美国谅解、默认，甚或鼓励中国国民政府得先不履行其对同盟国并肩对日作战中所应负责任，而以其全部力量从事于自相残杀的内战。

5. 中国现在事实上已是一个全面内战的局面。在这一个内战中，无论美国有未在任何形式之下给予内战中两造之任何一造以任何直接的支助，但至少，美国有未考虑过：美军驻华、物资转让、经济贷款以及其他行为，在事实上，足以使今日中国内战中两造的任何一造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倾向内战的鼓励？美国有未考虑过在这方面美国所负有的道德责任？

6. 假定美国认为：即使“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而中国尚未“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美国是否仍将“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统一与民主是两件事，假定中国业已统一，而并不民主，则美国是否继续“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直至美国认为中国既统一而亦民主时为止？

我们即使在十分心平气和的检讨下，亦不得不说：美军继续驻华确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行为。美国也许认为，在华驻军，可以有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但事实上，这个假定无法成立。这几个月来，中国的“和平”绝无任何足以令人安慰的进步，内战的范围和程度反而与日俱深；这足以表示美军继续驻华绝无助于中国的缔造和平统一的工作；美军继续驻华这一行为，仅仅使在中国内政上业已非常复杂混乱的局面，因此增加若干

更多的意外的纠纷，同时并因此引起许多在中美国民邦交上所不必要的批评和指摘。在理论上，除了战胜国驻军战败国以外，我们亦绝难承认，乙国之国内和平，可以以甲国之驻军而赢致之。

### 三

其次论参加调解。根据上文所引同一声明，美国参加调解中国内争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强盛、团结、民主的中国”。调解的原则则为：

“美国认清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假使这个政府基础能扩大，包括国内别的政治分子，则中国的和平、团结与民主的改革将被推进。因此，美国强调主张国内各主要政治分子的代表的全全国性会议协议办法，给这些分子在国民政府中一种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

这一段文字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修改二十年来中国一党训政的政治，使之从一党专政的国家变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该声明最后并说：

“中国如照上述路线走向和平与团结的时候，美国准备以各种合理的方法援助国民政府，重建国家，改善农工业经济，建立军队组织，足以为维持和平与秩序而尽其国防上与国际上应有的责任。

在推进这类协助之中，对于中国在合理条件之下为了用于中国全国的健全经济及中美间的健全贸易的发展而计划的向美要求信用贷款及借款，美国准备加以有利于中国的考虑。”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发表的对华声明，确是非常公正、合理、友好的；它符合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的愿望。今日中国人民所要求者，在政治上是民主自由，在经济上是民

生改善。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除了这些基本民权的要求，中国人民并进而要求政府（无论执政的是甲党或乙党）能对人民负他在政治上应负的责任。消极方面要肃清贪污、提高效能；积极方面应有所建设，这些建设并应与他执政时间的久暂成为比例。在经济生活方面，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政府能施行若干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限制一切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人民非常切望在政治及经济方面都能得到改革，发生不流血的革命；而要努力寻求这些改革，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和平安定。内战绝对打不得。打内战要死人，要烧房子，要掠夺农民嘴里的米粒，打内战使币值愈来愈贬低，工商业愈来愈萧条，一般国民的情绪愈来愈消沉，整个国家因内战而陷入于恐惧、怨愤、悲观、麻痹、苦痛、绝望的境地。这是全无意义的大消耗大浪费，这是误国、害国、灭国的大悲剧！

上面这一段最简单的陈述，我们相信就是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呼吁和要求。但我们正视今日中国的大局，不要说毫无开国规模，甚至亦无建国气象，一切活动作为仅仅是在撑持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当前中国政治上的最有声色的滑稽杰作，

就是政府说的都是甜的，做的却是辣的。当政的人物嘴里天天在喊民主，但是一切真正的民主活动，在中国却普遍而无例外地在各种不同方式的压迫下，遭受限制、阻碍、取缔和威胁。这简直是不可理解并亦不可信的作风。在现行政治风气下，贪污已经成为常态，不贪污反成为变态，公家机关的腐败黑暗，已至难以想像的程度。然而人民除叹息并默默地忍受外，竟无一点有实质的反抗能力！经济生活愈来愈恶劣。蒋主席今夏在牯岭声称，如若中国尚有一人无衣无食，即是国民党的革命使命尚未完成，这真是仁者之心！可惜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的结果，本来有白米吃的，现在已无白米吃了，本来一天可以吃两餐饭的，现在只能吃一餐饭了；本来穿长衫的，现在不穿长衫或是穿不起长衫了；本来有房子住的，现在没有房子住了！我们看，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不知有多少人沉沦在饥馑和寒冷的死亡线上。就是在这不夜的城市里，街头巷尾，也到处都是无食无宿的流民乞丐。在这样一片锦绣山河的土地上，竟有万万以上的人民，过着与畜生生活无殊的生活。而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下，还要从事内战，活生生地把人民的血、肉、皮，掺着人民的汗、泪、血，建筑少数人的“权力之殿”！人道！人道！人道何在！政治家的良心何在！

一如上面叙述的这样一个落伍、黑暗、悲惨、无人道的国家，假如美国确是关切中国的前途，关切中国人民的幸福，显然不是美国所希望，并所能坐视的。美国参加中国的和谈，在政党的纠纷上，企图调解国民党及其反对党之间的冲突；在统治的精神上，企图使中国变独裁而为民主；在国家的內容上，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繁荣。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中国之幸，美国之幸，世界之幸。调解党争的本身显然不是一个目的，调解党争的目的，仍在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进步、

繁荣。同时，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的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解决中国党争问题仅仅是改革中国政治问题的一项，甚至可以说，这一项，确是非常迫切的一项，但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项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劳苦大众的生活，培植中产阶级的力量，鼓励开明进步而有现代化头脑的民主自由分子的抬头。中国的乱，在经济上的原因，是大家太穷了，绝大百分比的人民都沉沦在生活的水平线之下；在政治上的原因，是中产阶级没有力量，没有组织；在道德上的原因，是有抱负、有操守、有能力的人无法为国家服役。（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即在一个部长之下。）对于这样一个总括的目的，美国既然过问中国问题，就须一方面调解目前中国政治上最迫切的党争问题，一方面亦须从根本上压迫政府作事实上的种种改革。一切民主活动，只要合理而无损于社会的安全，应当容许其存在。但是我们回顾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对于为作者所重视的一部分，可谓一无努力。在法律上，美国承认的中国政府是国民政府，美国当然尊重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我们绝对非常公道地同情；美国之欲支持国民政府，诚亦事理之常。但是，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应该是有条件的。易言之，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必须这个政府真能向民主之路进行，而我们历观往事，面视实际，我们实难发现任何足使美国必须支持今日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的理由。

四

再进一步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



问中国的内政。但是我们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没有能力，二十年的统治造成了今日这样一个局面，到头要外国人来“调解”，使外国人要来“调解”，甚至使中国问题竟成了莫斯科三国宣言中所包含的一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人格尊荣，实在给那些台上的人物剥光剥尽了！但是尊荣是一种感情，而政治却是一种现实。我们很含羞地说，假如因外国的插入过问，而使中国人民获得和平、民主、自由，则亦不失为一项“满意的交易”。不幸今日中国人民，已被动地做了一次“无所获的抛出”。1766年美洲的独立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的美国，但历史家告诉我们，1766年美洲的独立革命，同时也促成了一个近代的自由民主的英国。乔治三世时代的英国是最反动顽固的。美洲殖民地的税收，要由威司敏斯特决定，这一原则，广泛的说，就是人民的意志权利一无保障，统治权悉操于少数专制人物的掌中。赖有英国军队在美洲殖民地吃了败仗，于是皇党的威风大杀，人民的力量抬头。在中国，单说抗战期间，亦有同样的事实：“武汉时代”在当时中国政治上，却成一个局面，另有一番风气，时实正承南京沦陷，徐州被围之后。三十三年中国军队自长沙至贵州作疯狂的溃败，日本进叩贵阳之户的时候，政府威风稍敛，民气一度昌扬。历史说明：一个以军队为统治资本的政府，当他每打一次胜仗，他那捏紧不放的心理亦必随之增强。所以鼓励这种政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就无异鼓励这种政府加强他加紧控制的倾向。在另一方面，现在美国是有钱的国家，中国是贫穷的国家；美国是强大的国家，中国是衰弱的国家，假如美国在此时间，欲使中国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尽友邦之道。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美国人横冲直撞，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我们的政府，在外交上，一味的跟着

美国走；在经济上，没有钱就向美国要；在内政上，请美国参加和谈，我们几乎可以夸张地说，今日中国在精神上实已亡于美国了！我们不欲否认，美国之过问中国政治，到头还是为了美国利益。但是美国一方面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同时也须真为中国的幸福前途公道打算。能如此，中国人民会得在心底里感激美国，否则，美国必将失去众多中国人民对于美国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就是多年以来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家所要获致的。

三十五年十一月上海

(1946年11月9日《观察》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

## 大局浮动 学潮如火

大局浮动到了极点。到处不安，到处忧惧。旧局面正在瓦解之中。

一个局面趋向瓦解，总由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所致。一个局面的瓦解，非日一之事。在开端时，昏庸之统治人物恒不以为意；但当它挟狂风以骤至的时候，台上的人物遂惊惶失色而莫知所措。近一月来泛滥全国的米潮和学潮，无不表现当前局面之岌岌不可终日。我们早就认为这次政府的改组，无甚意义。现在改组已逾一月，改组后的政府在任何方面尚无任何作为。张群内阁一上台，物价就抢先贺喜。米价在半个多月内陡涨一倍以上。上海、杭州、无锡、芜湖、宣城、合肥、吴兴、衢县，以及远至四川的成都，无不有抢米的风潮；甚至堂堂首都，亦竟不免。孑孑小民，不惜冒一死以挣扎其生命，这说明民间疾苦已严重到什么地步！抢米行为不限一地，竟然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已经乱到什么程度！到处骚动，到处愤怒。政府害怕人民革命，然而政府似乎无一天不在逼着人民要起来革命。

这次各地学潮，原因不一。教育经费问题，教授待遇问题，学生副食费问题，男女分校问题，会考问题，人权问题，校长问题，迁校问题，护校问题……一连串的“问题”。本来是一些个别的局部的问题，经过多日蔓延演变的结果，据今天（十九日）报纸记载，似又进了一步变成为一个更扩大更严重的问题，在南方变成为一个“抢救教育危机”的问题，在北方变成为一个“反内战”的问题。这次学潮开端于教授的要求改善待遇，“停教待命”，其后接着几个大学的学生为争取他们本身各别的目的，请愿游行，而现在则在一种更大更普遍的呼吁与要求下，形成一种狂风暴雨式的全国罢课局面。从中国的南部到北部，东部到西部，几乎整个的国家都受到这种学潮的激荡，沉沦在一种无底的动乱与忧惧之中。我们无意在此就每一学潮一一论评，我们认为从整个大局的观点来观察这如火如荼的学潮，其意义远为重要。我们首先要问，这种汹涌澎湃的学潮，其包含的政治意义究为何如？我们认为在这些学潮的底层，都潜伏着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现状的普遍的不满。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当前局面实在怀有一种彻头彻尾的高度反感。我们先就教育本身来说，为什么多年以来，军费党费团费以及一切有政治性质的费用，动辄巨亿，而独独对于教育经费如此吝薄？为什么那些达官贵人，汽车洋房，享受优裕，而一般公教人员却不能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生活？为什么教育不当教育办，要任命那种有党办党有官作官的人物来做大学校长？为什么不能让青年的智慧思想自由发展，而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加以限制？为什么不能在根本上来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整理课程，充实设备，增加经费，培养学风，使青年在校四年，在知识上能有所得，在做人上能有所立？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是衣履不周，三餐不

饱，身体疲乏，精神萎顿，而一想到来日，则尤中心彷徨，莫知所往，在快要毕业的阶段，没有一个人不感到自己空虚，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前途茫茫。这些还是在学校范围以内分析。要是再将视线放远，看到国家一般情形，更是绝望苦痛，欲哭无泪。八年抗战，幸未覆亡，国家总算乘此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努力，埋头建设？没有一个国人不在呼吁和平，没有一个国家同情中国这种内战，为什么内战不能停止？物价这样涨，涨到骇死人，为什么一天一天的过去，政府当局总是没有一点办法？为什么有些人的财产越来越大，而一般人则越来越没有饭吃？为什么政府对于那些最大多数的穷苦百姓，总没有一个办法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在今日这种社会上，那些一肚皮草的逐臭之徒，反可招摇过市，优游自如，而一切有智慧有人品的人物，反而在水准之下的生活中挣扎？这是不是社会的不公平？为什么政府允许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为什么汉奸大到像周佛海，竟然不死？为什么只要有枪杆子的人，翻来翻去总是“忠实同志”？为什么种种贪污不法的事情，报纸抨击，众口指摘，而政府对于这些案子总是雷大雨小，不能痛痛快快惩办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只要愿做尾巴，便可分到洋房，配到汽车，做到大官，占到地盘？整个局面，混混沌沌，良心丧尽，道德荡然，纲纪废弛，人心麻痹，人人只知混水摸鱼，取巧为私，国运日敝，民生日蹙，凡此种种，对于那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青年，请问何能使之甘心！请问何能使之甘心！……无论从国家大事，或者到个人生活，今日一般青年的情绪是苦闷，彷徨，失望，愤怒。他们看不到一点光明，看不到一点希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在内心中渐渐郁成一团怒火。这一肚子气，这一肚子火，碰上机会，自然得发泄出来。这是多年以来他们耳闻目击身受种种反感所累积

而成的一种反应。反感越多，累积越久，在发泄的时候，其情绪也就越激烈，其态度也就越倔强，其意志也就越刚毅，而其汹涌澎湃，奔冲激荡的力量，也就越凶猛而难于遏止。

英大交大两校学生的赴京请愿，在当时看，实已构成极度紧张剧烈的场面。但事态发展到今天（十九日），英大交大事件在这个还在发展的学潮中，显然业已退到次要的地位，而仅仅成为这次整个学潮中的一个序幕。但我们即使就以旬日以前当局对于英大交大两校学生的请愿，彻夜奔走，如临大敌，甚且不惜拆断铁路，阻止请愿学生的前进为例，亦可想见这种“恶性学潮”是如何的使南京当局心惊肉跳。各校学生请愿，都有他们各别的请愿目的，这些目的，若就整个大局的观点来说，大都是微末不足道的。但是当局对于当时英大交大的请愿，所以心惊肉跳，乃是因为这些学潮，在表面上，虽然只限于它本身所揭示的要求，但从一种更广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它还包含着更重要的政治意义。英大学生在杭州车站所表现的力量，并非纯粹来自那几百个英大学生；同样，交大学生在上海北站所表现的力量，亦非纯粹来自那一二千个交大学生。几百个甚至几千个，那是看得见数得清的。看不见数不清的是在那些学生的后面，还有着更大更不安的社会。为学潮所连带反映的那种社会的不安，才是使当局所以为之震颤恐惧，日夜不安的原因。他们深恐此波引起彼波，尤怕因学潮而引起其它更可怕的风暴。果然如他们所恐惧的，这几天的学潮比英大交大请愿时，范围更扩大，性质更严重，来势更凶猛。照这两天（十八、十九）报纸消息，学潮显然已从局部的变成为全面的，从分散的变成为团结的，从不公开提到政治问题而趋向公开提到政治问题。历史上的事实，有时恒非当时所能预料者，共产党的拆毁铁路竟亦大有助于国民政府，目下以京沪杭为中心的

学生运动，业已携手，若非津浦铁路不通，恐怕南北两地的学生亦已携手同行。这次这个全国性的学潮，南方先走了一步，现在北方正在接踵而来。照蒋主席的谈话以及国府公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政府对于学潮似将采取严峻处置。我们除了感觉当前的学潮似乎正在发展扩大之中，尚未达到最高阶段之外，尚难预料这个学潮将在什么时候以及何种情形之下始能结束。只是我们愿意向政府进一言者：凡是一个社会现象，必有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补救解决，一切处置徒然使事态更趋恶化。要知今日中国的学生已非严厉斥训或强力弹压所能骇退得了。政府必须在学潮中获取教训。政府必须明白，无论学生本身承认或不承认这点，这次学潮的主要意义乃为对政府过去及现在的作风表示不满。他们显然在示威，在抗议。用着愤怒的呼声，愤怒的眼光，并以一种挨饿吃苦的精神，来诉斥并鞭策台上的人们。他们明言或默言，大家一致地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使国家像样，而进入于康乐富强之境。在台上的人们要知今日中国没有一个人不讨厌你们，仇视你们。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绝大多数人在心底里都以白眼报答你们。只是你们有权有势，有枪杆，有钞票，一般老百姓虽然受你们压迫，受你们欺骗，受你们侮辱，受你们剥削，但在你们的淫威之下，无可奈何你们。在这种局面下，学生挺身而出，对国是表示一种抗议，实亦为他们在这一时代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他们所以能肩负这个责任，一方面因为青年都怀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种不平则鸣的性格，一方面亦因他们幸而能有一种组织，在集体中表现其意志，以幸免头颅与身体脱离的危险。每当我们目击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无不衷心激动，热泪盈眶。这些青年何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

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曾不顾一己之疲乏与饥饿，凭着一股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南京学生饥饿请愿的主席团说：“现在公教人员和老百姓不敢喊；他们不敢喊，我们要替他们喊出来！”（十六日《文汇报》）这是多么勇敢的一句宣言！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二十年或十年以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在多年多种的锻炼下，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像。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政治上的种种现象诚然常常使人失望悲观，然而赖有这批青年，才使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一点国家新生的希望。我们承认学潮的起伏足以增加社会的不安，但要使社会得到安定，先须使人心能平。要使人心能平，决不是大官的训话或一纸命令所能奏效，这要执政当局拿出良心和办法来，一一见之实行。今日中国最迫切需要者，实莫过于执政当局之能够牺牲他们已得的一部分权利，唯有这样，人心才能平，社会才得安定！今日这批青年都是来日建国的梁栋，如何使这批青年的力量不致在消极方面消耗，就全看政府当局如何的领导这批青年。

五月十九日

（1947年5月24日《观察》杂志第二卷十三期）



## 学生扯起义旗 历史正在创造

我们在上期本刊论评学潮，叙至五月十九日止。我们当时陈述三点：一、这次学潮的主要意义是对现状不满；二、目下尚在蔓延之中；三、学生非强力所能慑服。现在忽忽又过一周，在这一周间，大局发展，和我们前述三点，大致吻合。就第一点论，学潮已从非政治性质转入政治性质；就第二点论，不仅在京沪平津一带，罢课声援的学校越来越多，就是远至昆明广州各地，最近亦均纷纷响应；就第三点论，国民政府虽于十八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而十九日上海依然有五千余学生饥饿游行，二十日南京六千余学生依然在水龙、皮鞭、木棍之下冒死请愿，同时北平万余学生亦仍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下游行全市。日来各地当局虽已开始以行动来制止学潮，学生被捕被殴之事，继续发生，但是学生情绪依然高涨，心中愤怒只有更甚。

这次学潮，最初是局部的、个别的、分散的。自从中大学生倡导“吃光运动”以后，遂使学潮在横的方面发展开来，形成一个学生间的共同问题。京、沪、杭、平等地学生大都响

应这个运动。其后上海学生又改名为“抢救教育危机运动”，俾使这个运动的目标更加扩大，意义更加严肃。“吃光运动”和“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多少已牵涉到了政治问题，因为学生没有饭吃与当前教育的种种危机，无不与内战问题有关。北方的学生在这个时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认为“饥饿源于内战”，要活非先停战不可。这个“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立刻为南方学生所接受。南北两地的学潮发展到这个地步，目标趋于一致，步骤亦见统一，而真正成为有一个历史意义的学潮，遂开始在南北两地，并肩迈进。

当学潮公开涉及政治问题以后，政府即认为学生的行为已越出应有的范围，并认为此次学潮，完全受人利用。政府对于学生这种指摘，我们难于同意。一个青年在求学时代，他虽然是一个“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法律并未规定，一个人要是入了学校读书，他就将丧失他公民的资格。现在的大学生，大都已过法定年龄，他们绝对有过问国事的权利。今日国人，大都不满现状，对于内战，尤其痛恨。因为在这种内战的局面下，无论是国家的，或者是个人的前途，都被内战打得一干二净，没有一丝生路。我们曾在上期本刊分析今日青年学生苦闷失望愤怒的种种原因，并谓这种种原因逼得他们不得不挺身而出；而最近王芸生先生在《我看学潮》一文（见本期观察文摘栏）里，叙述这次学生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背景，尤其针针见血。学生在中国业已传统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寒暑表，在过去，学潮的激荡无不反映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在这种全国怒吼的局面下，当局不反躬自问：为什么那些学生要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为什么全国的学生都那样万众一心地游行示威？还是一味训斥学生；训斥不足，施以残暴；这种态度，绝对不能使人同情。我们亦绝不承认，此次学生请愿，

系受他人利用。学生目击国家危急，身受饥饿苦痛，痛中思痛，一切罪恶皆源自内战，起而呼吁，起而反对，为什么一定要说他们受人利用？老实说，在今日这种局面下，假如还要受了他人的利用，才喊“反对内战”，我们真要向苍天呼号：“人心何在”了！

政府又用了许多大罪名加诸学生，认为学生的行动，破坏交通，妨害秩序。关于破坏交通，姑以交大学生赴京请愿一事为例，交大学生实难担负破坏交通的罪名。交大学生本拟购票乘车（十四日《大公报》第四版），晋京请愿。为什么政府不准他们购票？公务员可以购票，商人可以购票，农人工人可以购票，为什么学生就不能购票？赴京游览可以，赴京访友可以，赴京经商可以，为什么去教育部请愿就不可以？从法律观点看，交大学生购票赴京，并不犯法，为什么政府要命令车站拒绝购票？政府禁止学生购票，在我们看来，无宁说是政府在破坏交通。交大学生认为政府剥夺他们购票乘车的权利是非法的，自然心有不甘。政府既然蓄意破坏交通，他们只好自己出来维持交通；自驾火车，离沪驶京。本来只要他们的火车一开，交通亦即不难恢复。不料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又拆起铁路来，致使交通陷于停顿。无论如何，交大学生绝无存心破坏交通之意，事实上破坏交通的是政府，而现在政府反将破坏交通的责任，加诸学生，孰能得平！再说社会秩序，政府定出了一个“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维持社会秩序”而要“临时”定出“办法”来，大家想想看，这个“社会”还谈得上什么“秩序”。在我们看来，所谓“社会秩序”，决不仅仅是指汽车可以在马路上驶行，火车可以在铁轨上驶行而言。“社会秩序”的意义非常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使人人安全，都有饭吃。去年五月上海的客饭只有五百元，今年五月上海的客饭涨

至四千元，请问政府有没有维持这个“社会秩序”？深夜捕人是维持秩序吗？任意搜查是维持秩序吗？现在有许多人消失得无形无踪，亦没有看见政府负起责任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社会本来是比较安定的，就因为政府无能缺德，所以弄到今日，社会越来越没有秩序。今日扰乱这种社会秩序的决不是那些学生，制止了学生的请愿游行，也未必就算维持了社会的秩序。政府不尽其本身的责任，停止内战，稳定经济，而独独以妨害社会秩序的罪名加诸学生，是不能使学生心服的。

政府认为学生请愿，是“聚众威胁”。我们认为“聚众”则有之，“威胁”却未必。学生手无寸铁，政府有的是骑兵宪警，学生对于政府何“威胁”之有？乡间的百姓，看见军队来了，要米不敢不拿米出来，要柴不敢不拿柴出来，要他们去挑箱挖土，他们不敢不去挑箱挖土，这才是“聚众威胁”。政府认为学生请愿，便是“聚众威胁”，未免夸大其辞。有人又劝学生要体谅政府。老实说，假如政府处处体谅人民，不要人民去当炮灰，不要征人民的食粮，人民哪有不体谅政府的道理。“体谅”是相互的，在过去，人民“体谅”政府已“体谅”到有许多地方的人民连裤子也“体谅”光了，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赶快体谅体谅人民，先把这个万恶的内战停了下来再说吧。现在人人饿得慌，他们一天到晚只想吃饱，他们还有什么闲心情来和政府有意为难？

总之，我们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学生的意志绝对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他们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钱端升先生说“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痛苦，已与人民痛苦连在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

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我们完全同意钱先生的看法。我们在上期本刊就说过：“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二十年或十年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老年人或中年人所能想象。”从前的学生运动，是学生跟了先生走，现在则是先生跟了学生走了。我们看这次学潮，在南京，中大的教授虽然发动于前（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等等），结果是学生一开动就跨过了教授一大步。在北方，学生走在前面，教授不甘落伍，虚心而又热情地牢牢的钉在学生的后面。在上海，教授似乎永远被学生所遗弃了。这是青年人的骄傲，也是中年人的悲哀。也就这一点，更足证明今日学生之绝不轻易受人利用。在这次学潮之初，学生似乎都是为了自己的问题，然而经过水龙先生、皮带先生、木棍先生、石子先生的教训，学生在心灵上又骤然跨前一步，孕育出一种更为崇高更为伟大的精神。他们了然他们在今日这个时代中已肩负一种新的任务，亦即历史的任务。他们现在正企图以他们的热血来转旋这个天地！南京学生饥饿请愿团的主席曾说过：“现在公教人员和老百姓不敢喊。他们不敢喊，我们要替他们喊出来！”本刊北平通信亦说，北平的学生都以为这一次的学潮，就是一个“新五四运动”的序幕，他们要替人民呼喊。他们已深深觉得，单单为了自己的利益争，这个争是渺小的，必要替广大的人民争，这个争才是伟大的。现在全国的教授，特别是北方各校的教授，都站在学生的后面，全国的开明的进步分子，也都站在学生后面，这是一个坚强的阵线，一幅动人的图画，一首伟大的史诗。从各种形势看，当局显已开始用铁腕来冲散这一个阵线。我们尚难逆料一切前途的演变。但是我们相信，当学

生在极端的团结之下，意志坚定，组织严密，胸脯挺起，脚跟站牢，这一条铁链，绝不是木棍所能打得断的，这一股洪流，绝不是几辆警备车所能拦得断的。我们绝不相信政府能把天下的学生都捉进监牢。我们看，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被捕的学生宣传队，那样义无反顾，从容地走上警备车的神情，这是多么壮烈的场面。被捕的八九十位学生，在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依旧慷慨高歌，声闻户外，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情景。我们坚信，在当前这种黑暗危急的局面下，学生将永远发挥其力量，以挽救国家的命运。在这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终会爆出光彩夺目的火花，而新的中国就在这火花中孕育生长！

五月二十六日

1947年5月31日二卷第十四期《观察》杂志

## 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 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 所表示的态度

五月二十四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另文如下：

查该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本市为戒严地区，应予取缔，依照戒严法规定，着令该报于明日（二十五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这被封的三家报纸，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是左翼报纸。所谓左翼报纸，大体上是指这家报纸在思想上比较前进一点，在言论上比较激烈一点。按着出版法规定，报纸的负责人是“发行人”。据我们的看法，这三家报纸的发行人，大都只能算是经营商业的人物，他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还是如何能够多赚几个钱的问题——进一步，希望多赚几个钱，退一步，至少希望收支平衡，能够维持这一张报纸。若说他们有“颠覆政府”的意图，那真是捧了他们。至于这三家的报纸的编辑人员，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大都是些比较进步而有独立意志的民主分子。这是很正常而且很自然的事情。一个国家若想进

步，便需要多几个这种分子。假如一个国家的人民，个个都是唯唯否否，请问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生气？我们所以能够抵抗日本，苦战八年，不为暴力屈服，就靠我们国民有这一点独立意志。若说“左”，老实说，这三张报真不够“左”；若说激烈，这三张报也不激烈。要是比起南京那位泼妇骂街的反共专家某大炮，文汇新民等两报上的文章简直是“温吞水”。我很坦白地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我不常看联合晚报），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

我认为这三家报纸被封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的言论，而是由于他们的新闻。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为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无奈今日发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情，都是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政府所愿让大家知道的事情，统统已归中央社独家发表了；假如这三家报纸专门刊载中央社的消息，我敢拍拍胸脯担保这三家报纸绝不致被封。无奈中央社的消息许多人不要看，而且不要看中央社消息的人愈来愈多，而这三家报纸的编辑部的同人，又都不识时务，自以为负有神圣的新闻使命，拼着命要在中央社的新闻眼以外去找新闻。不幸他们所登的新闻，政府越顾忌，读者越要看。政府既无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

这次学潮，当局弄得焦头烂额。查封报馆，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报载中国现在正由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主席领导我们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投无路，绝不致走此一着。不过我们不承认这被封的三家报纸有任何



“阴谋”要煽动学潮，甚至“意图颠覆政府”。当然，报纸在任何公共生活中都是要发生一种消息传播的功效的，但我们不承认，有了这几张报纸，就可以掀起学潮，没有这几张报纸，就可以消弭学潮。据我们所知，文汇报屡有查封之说，恐怕还是因为上海幸而有这位开明民主的吴国桢市长，所以文汇报至少还能出版至五月二十四日。这次大概正如 *The Evening Post* 主笔先生所感觉的“政府的重要领袖们多少有点孤注一掷的情绪”，而终致出此一着。三报被封的理由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及新闻”，对于这个理由，各有各的看法，我们亦无意在此辩论。只是我们要公开宣称：我们在同业的立场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查封已经是一个事实，我们希望政府善为补救，设法使上述三报早日复刊，以恢复民主国家新闻事业的常轨。

※ ※ ※

关于大公报对这次学潮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愿略加论列。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英大事件和交大事件都是局部问题，姑且不说，就是十五、十六两日南京中大金大两次饥饿游行的新闻，不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亦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可是五月二十日南京发生了这样的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强烈的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按：二十一日该报第二版因参政会开幕，新闻确极拥挤，但假如大公报重视这次学潮的话，该日该版其他零星新闻，都是可以腾让出来的。）同时，像南京五二〇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

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五月二十一日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卒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五月十九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的请愿为“暴力的革命”，五月二十二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而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十几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当然，我不能不在这儿提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如此灰色，不能领导当前的潮流，亦许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芸生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的言论决不致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两地的采访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于他们的报道中见之。他们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读者的感情。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不能不出一言。在五月二十五日大公报第四版上，大公报只以三号字的标题，平平淡淡地刊出文汇等三报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报的编辑先生大概对于电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发生兴趣的，凡是外国什么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点什么新闻，大公报照例要加上“花边”登出来（请阅最近数月大公报第三版下半面，其事数见）。在大公报的编辑标准中，大概像在一个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轶事。大公报对于文汇等三报的被封，始终未发一言，以示同情。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该

报例刊“星期论文”，但为什么不写一篇短评呢？二十五日不写短评，为什么二十六日不写一篇社评呢？今日为二十八日，文汇等三报已被封四日，大公报对于此事始终不置一词。且不说别的，至少站在同业的立场上，大公报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大公报所以默无一言，还是认为文汇等三报应该被封呢？还是吓的不敢说话呢？（文汇报被封后，大公报对于学潮的新闻，已有改变）还是幸灾乐祸，坐视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觉得大公报这次的措置，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最后我不能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八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里面，我仅和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六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五月二十八日

## 读孙科谈话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六月二十日在南京接见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同月二十二日在同一城市，又对新民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内容先后见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上海大公报。我们披诵孙氏谈话，滋多疑惑，谨评论之。

一、根据六月二十日对合众社记者谈话，孙氏认为：（一）目前中共在东北反攻，系受苏联之赞同与指示。（二）中共军队优良之军火均为前日本军队之配备，盖胜利后日本军队向苏联投降，苏联遂将日军配备移交中共。（三）中国军事当局业已获得证据，有半数受苏联训练及配备之韩军参加中共作战。（四）旅顺及大连现被中共用作关内外军需之给养转运口岸，故苏联不允中国军队开入该两地，实违反一九四五年八月之中苏条约之精神。二十二日孙氏对新民报记者的谈话，则称：“余日前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在唤起英美之注意，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该条约上订明苏联应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而苏联容许中共军队前往，不许国军登陆。

大连虽为自由港，然属中国之商港，中国军队自海道前往，因苏联阻碍，乃拟改道营口登陆，而苏联忽在国军欲登陆之前夕，自营口撤退，交与中共，致国军不得已始改由葫芦岛登陆。又如外蒙问题，阿尔泰区显为中国领土，外蒙军队如无苏联支持，亦何能侵入。故国军之不能接收大连，反让共军先行入据，均在于苏军之占领期间内，其责任应由苏联负之。大连为我领土，我们为何不能在大连登陆，这是根据什么条约？苏联已违反中苏条约，亦等于否认大连之领土主权属于中国。苏联支持中共、韩共、外蒙，为人人皆知之事实。因此东北已成为国际问题之所在地。中国军队至今不完全接收东北，除中共负直接责任以外，苏联应负间接责任。”孙氏接着说：“中国若失东北，即对美国为威胁，对世界和平亦为威胁。美国应有所表示。”归纳上引孙氏两谈话，可得三点：一、孙氏认为“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二、孙氏认为“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三、东北既已成为国际问题，美英两国领导下之西方强国，应加以注意，特别“美国应有所表示”。我们要提出来的问题是：孙氏既认为“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并称：“中国军事当局业已获得证据，有半数受苏联训练及配备之韩军参加中共作战”，然则孙氏有无向国民政府建议：由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假如没有，孙氏为什么不提出这个建议？假如孙氏已提出这个建议，政府是否业已采纳履行？这是一层。其次，假定我们承认孙氏所述“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但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中国的交涉对象是苏联而非美国，我们应当找苏联说话。孙氏于指摘了苏联种种罪过以后，除了忽而上下文不接气地说了一句“深信建立中苏间之友谊与合作为可能者”之外，并未

对苏联作一句正面的责难，却侧过脸来专门向美国说话，可谓文不对题，找错了对象。其三，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中国显然居于最主要地位。假如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居于最主要的地位的中国，不首先负起责任来直接和苏联解决困难，却只希望美国有所表示，我们认为此种态度，既不勇敢，亦欠公道。我们应当自己先挺起来，然后希望人家来支持我。自己挺不起，只想人家来替我们撑腰，替我们收拾，这种心理和作风是要不得的。

二、孙氏在谈话中所希望获得美国（或美英两国领导下的西方强国）的“援助和鼓励”，包括军事给养、借款及政治支持三项，其中尤以军火为最重要。孙氏说：“中国之美式训练及配备军队，现缺乏军火，故亟需自美国获得接济。‘东北之得失’端赖于此。”又说：“华盛顿与伦敦之支持南京政府之宣言，当有裨益，然亦不能代替军火。”这恐怕是孙氏谈话中最实在的一部分。我们的意见是：孙氏有无考虑，美国所愿意“援助及鼓励”之中国政府，究为何等情形的中国政府。照我们的意见，美国所愿意援助及鼓励的中国政府，必须为一个健全的及民主的政府；健全系指行政效能而言，民主系指政治作风而言。现在的南京政府是否符合这种条件？本刊本期所载 N. Peffer 这篇论文，官方想必早已读到。美国官方及一般舆论，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形，相当了解。近一年来，南京政府天天在喊宪政，可是宪政宪政，实际上哪儿有半点宪政的影子？在这次学潮中，世界各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现存政权的真面目，必可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麦克阿瑟在日本事半功倍，把日本人统治得乖乖的，而马歇尔在中国，七上八下在大热天跑庐山，花了这么许多冤枉钱，到头悄然而去，反弄得一般民间对美国的友谊，一落千丈，美国所为何来？费孝通先生说得好：“马歇尔

应当已经明白，他本来扶植的对象实在不太扶得起。”“更使他（马歇尔）失望的是在这个政治权力下，连美式装备都全失其效力。”（阅本刊二卷十六期文摘栏费文）。近来国内国外都有美式配备落入共军手中的传说，一方面希望美国供给军火，一方面原来慷他人之慨，将整批的美式配备送给中共，这个问题美国不能不考虑。现在据一般的看法，认为即使美苏不幸终致战争，美国也不是非中国不可。政治家策划国家大事，不能失之“幻想”；自己这样腐烂，这样堕落，一味巴望别人援助，实在近于“一厢情愿”。孙氏关于这一部分谈话，仅仅公开了一个秘密，即今日南京政府军火的缺乏已到了如何严重的地步！政府大员在谈话中如此露骨地表示切望美国军火的接济，尚以孙氏此次谈话为首。

三、在孙氏二十二日一次谈话中，记者曾询孙氏，如其美国反响冷淡则又如何？孙氏答称：“美国反响冷淡，即等于放弃中国，现在中国之外国势力，惟有苏联，则政府将重新考虑态度。”我们认为孙氏此言，甚不得体。孙氏所谓“将重新考虑态度”是指什么呢？这可分内政外交两部分来推敲。若从内政上说，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当系指目前的内战而言。目下的事实是“战”，则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在逻辑上当系指“和”。但中国的内战，公平地说，并非美国所要求者，故我们不能认为“战”即为对“美国支持”的一种义务，“和”即为对“美国不支持”的一种报复。况且孙氏已斩钉截铁地说：“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所以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当不是指内战而言。就外交上说，按照孙氏语气，在逻辑上似乎是：假如美国放弃中国，则中国只好倒到苏联怀抱里去了！我们觉得此种谈话，甚成问题。在常识上，孙氏一面表示“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

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一面又假定假如美国放弃中国，中国即将倒到苏联“势力”中去，其事是否可能，实可怀疑。再进一步说，中国自有其主权，自有其独立的国格，对于任何一个外国的对华关系，根本上谈不到什么“放弃”“不放弃”。按照孙氏谈话，不啻公开认为中国已是别国“势力”之内在的东西，所以假如甲国放弃中国，中国只好投到乙国的“势力”中去。我们相信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孙氏这种论调。在国际社会中，外交运用，当然极尽奥妙，但如公开宣言，便近似无赖。我们很坦白地说，我们认为孙氏此种谈话，已经迹近一种 blackmail “敲诈”。孙氏为今日国民政府的副主席，以国府副主席的身份发表此种谈话，孙氏个人声誉的损失，其事小，国家国格的堕落，其事大；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郑重提出，表示异议的。

四、只有一项实事我们尚能判断：即孙氏此次谈话究竟是授意的，还是自发的？假如是授意的，那就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假如是自发的，那只是代表孙氏个人的。但即使后者，孙氏既身为国民政府副主席，我们亦不得认为他在这样严重的政局中发表这样露骨的重要谈话，仅仅是代表他个人见解，而一无政治意义。照我们的看法，这次孙氏的谈话，只有一个意义，即孙氏谈话的目的显然在观测美国官方及一般舆论的反响。因为从技术上说，假如南京政府真正不能支持，它尽可以最机密的外交通牒照会白宫，正如英国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照会美国它不能继续担任它在海外的任务，要求美国先来接受它在希腊的任务一样。南京政府派往华盛顿从事外交接洽的人员很多。假如仅仅是对杜鲁门和马歇尔等呼吁，实无须孙氏公开发表那样毫无掩饰的谈话。美国朝野对于孙氏谈话，将做何种反应，须由日内的电讯报导说明之。不过一个国



家由其副元首发表语气如此坚决，无甚转圜余地的谈话，事不多见。然而我们亦正可从孙氏的谈话中，明了今日南京政府业已面临如何严重的政治关头。

六月二十三日

(1947年6月28日《观察》杂志第二卷第十八期)

## 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 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七月一日纽约下午报（PM）刊载合众社中国区经理伦道尔所撰一文，指责“蒋主席之姻亲使美国公司遭受损失而致富”，其言有曰：

蒋主席之姻亲能获得二万五千美元之外汇以输入化妆品，而化妆品为中国政府所颁布之紧急经济措施中所严格禁止入口者。同时美国进口商则无从获得三十一万美元之外汇，以输入能使中国工厂复工之机械器具。中国政府之购料机关，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车、收音机、电气冰箱及照像材料，以供私下分配。同时美国公司则申请中国煤矿复业所需之抽水机之入口执照，而竟未获准。中国豪门第一家，即蒋夫人之昆仲及远亲等所办公司，则能借其与政府之关系获得特权，并向在中国历史悠久之美国公司之经销商勒索，豪门利益之支派不胜枚举，例如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及孔祥熙所办之中孚公司，宋氏弟兄皆蒋夫人之手足，而孔氏则为其姊丈，宋子文所经营之南洋烟草公司，其另一兄弟宋子安之中国建设银公

司，蒋夫人之弟兄姐妹合办之金山公司，宋子文、宋子良所办之中美橡胶公司，宋子文所控制之扬子电力公司，宋子文之中加公司，蒋夫人之外甥孔令侃所经营之扬子建业公司，其他远戚疏亲所办之公司，亦不胜枚举。遭受不道德方法失去代理人之美国厂家，据悉计有西屋电气公司，该公司之经销权已由历史悠久之店号转予中孚公司，威利斯汽车公司可贵之吉普车经销权，亦由其美籍代表让予宋家。美国安纳康达铜矿公司则在宋家压力之下，取消其美籍代表。其他类似情形尚不知凡几。

年来美国报章杂志所刊指摘中国局势的文章很多，而伦道尔此文，其性质实较其它指摘中国现状的文章为严重。第一，伦道尔此文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广泛空洞的指摘，他文内所涉及的都是有姓有名的人以及其具体事实。第二，伦道尔此文所涉及的不只是政策上的问题，而已涉及了政治道德上的问题。第三，伦道尔此文所涉及的人物，包括曾任中国前后十年以上的两任行政院长，并涉及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我们认为此文已经不能仅仅视为是一个批评任何私人的问题，它实已涉及中国国家的荣誉。正因此种理由，我们对于此事不得不出而一言。

我们认为国民政府以及“蒋主席之姻亲”，其中以孔祥熙、宋子文两氏为代表，对于伦道尔此文，不能不出而有所表示。伦道尔此文的主要动机当然是替美商争取利益，但该文所涉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商的利益问题。孔宋两氏虽然先后曾任中国行政院长长达十年以上，但我们不能谓为一个行政院长卸任以后即无经商之自由，但伦道尔此文所涉及孔宋的部分，并不是一个行政院长有无经商之自由的问题。伦道尔此文所涉的问题，约如下述：

(1) “中国政府之购料机关，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以供私下分配”的问题。

(2) 有助于中国工业建设之正当器材，无从获得外汇及入口执照，而用以购买化妆品及奢侈品者反能获得外汇及并能入口的问题。

(3) 豪门“借其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特权”，向外商“勒索”，并以“不道德方法”压迫正当商人的问题。

我们认为伦道尔文中所述，或者是事实，或者是虚造，二者必居其一。假如是虚造，我们认为伦道尔此文对于孔、宋两氏及蒋夫人，已构成严重的毁谤状态，孔宋等氏对于伦道尔应即提出法律控诉，借以维护其私人的名誉。同时，因为孔宋两氏曾先后担任中国行政院长多年，而蒋夫人则为今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国民政府应即循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责令伦道尔及刊载伦道尔此文的下午报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假如伦道尔此文所述，确系事实，国民政府应对此事严格惩处，俾在外交上维护国家荣誉，在内政上以申政府的纲纪。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对于此事应即迅速采取适当步骤，以澄清国内国外因伦道尔此文所引起的混乱的观感。我们建议由监察院单独组织，或由监察院会同立法院及参政会会同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办理此事。在欧美，当国会自身发现国家机关或政治人物发生重大过失或不道德的行为，或外间舆论对于国家机关或政治人物的行为有所指摘时，不论此种指摘发国内或来自国外，而那种过失或行为足以损及国家的尊严及荣誉者，国会常常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澈查此事。我们认为政府应当采取下列步骤：

(1) 澈查国民政府购料机关自胜利以后自国外购入器材用

品之全部单据，查究是否有为伦道尔文中所述“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车、收音机、电气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之情形，并公布澈查之结果。

(2) 政府曾经明令禁止奢侈品之输入，但事实上，奢侈品之输入并未绝迹，其中单单汽车一项，最新式之汽车时有输入。上海报纸对于此事屡有记载。政府应澈查此种明令禁止之奢侈品究由何人在何种方式下输入，并追究其责任。

(3) 政府应即公布自胜利以来核准外汇之全部情形，其中包括：(一) 申请人全部名单，(二) 核准购买外汇者之全部名单，(三) 核准之数目（包括申请人原申请之数目），(四) 核准之理由。

(4) 政府应查究为伦道尔文中所举之豪门，有无“借其与政府之关系”获得“特权”，其所获得之“特权”，其内容与性质又如何？

(5) 政府应令伦道尔负责供给更多之材料与证据，以证实其所指摘之事实，并要求伦道尔文中所涉及的若干外商如西屋电气公司、威利斯汽车公司及安纳康达铜矿公司等，提出材料及证据，借以决定伦道尔文中所述者是否为事实。

无论如何，对于伦道尔此文，即使为了政府自身的名誉，政府亦应采取步骤，表明态度。除非政府默认现政权的存在确是仅仅为了维护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政府对于伦道尔一文不宜默无一点表示，我们愿意借此向政府进告一言：八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健康，以及他们应有的幸福，从事抗战，以争取国家的生存。但是我们争取国家的生存，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要替少数特权阶级保护并扩充他们的利益。现在中国的一般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被摒弃于购买圈外，沉沦在生活的水平线

以下。不仅民怨沸腾，到处是“反饥饿”的吼声，据我们所知，就是在国民党党团内部，最近也发生了“这个党到底是代表哪几种人的利益”这样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现实环境，看来是越逼越紧了，事实上已不容许豪门逍遥自在。假如政府自身缺乏勇气，不能采取剧烈措置，其结果那就势必只有等待别人来采取措置。只是要铲除豪门，须知孔、宋只是豪门的代表，豪门初不限于孔宋两家。一切既成的豪门及正在生长中的豪门，俱应在铲除之列。同时铲除豪门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单单消极的行为无补于今日国家的大局。豪门在性质上是一种特权阶级，我们必须同时在根本上消灭一切足以产生特权的制度。豪门的象征是少数人饱死，多数人饿死。我们一方面铲除豪门，一方面需要努力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今日中国政治，如其不从解决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下手，则社会将永远不能得到安定，一切建国的工作亦即无从获得成功。

七月十七日 北京旅次

(1947年7月26日《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 评蒲立特的偏私的、 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 (William C. Bullitt)，本年七月，衔《生活》、《时代》发行人亨利鲁斯之命，来华考察，十月十日在《生活》杂志发表访华报告 (China -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长达万言。中央通讯社不惜工本，全部用电报拍回，各报纷加披露；官方及官方的报纸一致颂扬。吾人披诵之余，谨述其意见如左：

第一、我们统观全文，蒲氏的中心思想是反苏防苏。蒲氏以这一个中心思想为出发，他认为目前最有“统治中国的威胁者”就是苏联；他认为中共是“苏维埃强权政治的工具”，他认为苏联意欲利用中共这一工具把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他痛责故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会议中的错误；他认为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杜鲁门总统演说以前的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着“可笑的态度”；他叙述马歇尔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使中国政府与共党签订了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协定，但是“苏联的计划是利用马歇尔所斡旋的停战时间，尽量把共军自华北运往东北，而把接收自东北日军的大量武器，配备共军，利用停战时

间，到中共军队装备齐全的时候，苏军再行撤退”；他又叙述马歇尔使华失败返美后，美国对华抱旁观政策，停止在军火上及财政上支持国民政府，但“苏联在另一方面却装备了我们的敌人”——蒲氏此处所谓“我们的敌人”，显系指中共而言，这表示蒲氏业已认为中共同时亦为美国的敌人——，蒲氏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政策”；蒲氏认为假如斯大林控制了东北，“对于中国将来的发展，关系异常重大”，最后对于美国本身也有严重的后果；因此，蒲氏认为美国必须对于国民政府作立刻的全盘的援助，“仅仅取消美国对华禁运军火的命令还嫌不足”，蒲氏认为杜鲁门总统应该像罗斯福总统在邓克尔克撤退后英法严重缺乏枪炮弹药时所做的一样，采取迅速的行动；蒲氏述及现在美国有数十万吨积存的弹药，弃置在世界各地，任其霉烂生锈，他主张将这些物资宣布业已不适美军使用，作为废弃，然后以一元作价五分，售给中国。同时为避免中国的“通货膨胀瞬即会像脱缰之马”起见，美国政府应即在后此的三十天内贷给国民政府七千五百万美元。除上述立刻的援助外，更就经济财政军事方面作全盘的援助，以三年为单位，在三年以内，由美国贷给国民政府十三亿五千万美元，其中六亿元作为三年计划中的信用贷款，用以购买美国的物资，如美棉、烟草、小麦、石油、汽油，以及机车、铁轨、卡车等，另六亿元为三年计划中军事方面所需的费用，用以装配旧的军队，训练新的军队，再加一亿五千万美元作为外汇平衡基金。这是蒲氏援华方案的纲要，而所以要全力援华，其目的乃在“把每一个武装共产党徒驱除于中国领土”，“阻止史太林霸占中国”。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蒲氏所攻击苏联的种种事实是否正确以及蒲氏所建议的各项办法能否实现，我们在此所欲讨论者，乃是蒲氏的议论的动机和态度，是否健康，是否公道？其间牵涉



到许多问题：一、蒲氏不愿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然则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二、在过去几年中，到底是苏联控制中国的色彩浓厚，还是美国控制中国的色彩浓厚？三、今日美国，如蒲立特先生者，因为恐惧苏联，主张全盘的援助国民政府，反苏反共，但过去几年中，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膨胀，以及这次像蒲立特先生这种建议，是否可以使苏联感觉愉快，感觉安全？凡上三题，蒲氏一字不着。蒲氏一开头就说：“防止任一国家统治中国而动员其四亿五千万人民来对抗我们，这是最关美国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既然可以如此说，苏联又何尝不可说“防止任一国家统治中国而动员其四亿五千万人民来对抗我们，这是最关苏联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可以说：目前有统治中国之威胁者是“苏维埃帝国主义者”，苏联又何尝不可说：目前有统治中国之威胁者是美国帝国主义者？蒲氏可以说“我们（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苏俄统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我们”，苏联又何尝不可说：苏联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美国统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苏联？假定苏联亦发表与上列蒲立特所宣称的相同的议论，至少在我们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间并无任何轩轻。然而假如每一个国家，都恐惧别的国家控制中间某一个国家，大家都要“采取行动”以防止对方国家统治这某一国家，则世界还有什么和平？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美国之在各方面牢牢的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自主，业已成为一个世人共同感觉的事实。蒲氏在他的文章中，建议由美国贷款给中国，卖军火给中国，替中国训练军队，帮中国打垮共产党，监督贷款的用途，管理军队的给养，而且主张“派麦克阿瑟将军于现有职务及权力以外，加上大使衔的总统私人代表的称号，飞往中国，和蒋主席拟订一个共同的计划，以防止苏联的征服中国”……蒲氏

之企图由美国来控制中国，已极明显。蒲氏一方面不愿中国陷入史太林的“掌握”，一方面却企图使中国陷入自己的掌握；一方面在事实上美国业已独霸中国，一方面蒲氏却还在大声疾呼，宣称苏联企图“独霸”中国，蒲氏这种议论，实在有欠公允。就我们中国人自身来说，我们久已苦痛于我们有这样一个落伍的腐败的政府，在二十年的统治中，把国家搞得越搞越穷，越搞越弱，越搞越乱，以致引起邻强的窥伺。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一个略有野心的国家，不论是过去的日本和英国，或者今日的美国和苏联，那一个不对中国转念头，打主意？不过彼此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罢了。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权利指摘对我们有野心的国家。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而在这种情形下，蒲立特先生有什么面皮猊猊然一面倒的抨击苏联？蒲立特先生为什么要援助中国，他有什么理由要独爱于中国？拆穿了说，他不过是要利用中国，正如他在他的文章里开头所说的，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对抗苏联，以保障美国的利益吧了。美国有钱，美国企图用金钱来收买中国，要中国人替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理由要独厚于中国，要借钱给我们，援助我们？统观蒲氏全文，我们认为蒲立特先生的整个出发点是偏的，而他的动机是自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第二、蒲立特先生主张援助中国，实际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国民政府。理论上，政府本来是代表国家的；但在历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国家的；目前的中国，就处于后一种情形。就对外关系上讲，今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反美，也不愿意反苏，都主张同时与美苏友善，甚至希望中国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中国有无能力成为美苏之间的

桥梁，这是另一问题，但至少表现于近两年来中国的言论者，大多数人都不愿中国成为美苏双方任何一方的尾巴。但是中国的现存政府，因为要维护他们个人或集团的权势利益，他们坚决排斥共产党；因为排斥共产党，连带仇视苏联；因为仇视苏联，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国怀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拨美苏之间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做法，并不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附和。至于在内政上，中国现存政府之业已失去人心，其明显确切，一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无须我们再在此处浪费笔墨。魏德迈将军在致美国援华会柯立芝夫人的函件中声称：中国人民只求能供给粮食与居住之任何政府，对于倾向苏联一举所包含之种种复杂问题，不暇顾及。（美国新闻处华盛顿十月十六日电）魏德迈将军这种观察是正确的。对于中国一般穷苦的老百姓，国民政府也好，共产政府也好，或者其他什么政府也好，他们都“不暇顾及”，他们所急切关心的是能让他们活得下去，让他们有果腹之粮，御寒之衣，以及躲避风雨的房屋。这同时也就说明：这二十年来的中国执政的人物，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尽其应尽的职责；甚或根本对于这种基本问题，没有作任何有分量的努力。二十年来南京的官员所发生兴趣的，是政局的演变，权势的得失，而非一般社会经济生活的改革与改善。今日中国人民生活的艰苦与凄惨，业已到达为一个大文学家所无法描写的地步。在内地城乡以及偏僻的角落里，民生的艰苦，更不必说，就是在这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一到晚上十一点以后，许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门汀走道上，躺着手脚蜷缩的无数贫民，就在这萧瑟的秋风之中，获取他们为维持他们像游丝一样的生命所必须的睡眠。这些人本身并无罪孽，然而他们却过着罪孽的生活；即使我在此叙述我每晚所目睹的这种凄凉景象，我亦仍

然不禁热泪盈眶，悲从中来。然而一切对于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真正具有兴趣具有抱负的人物，他们无法获有机会为祖国服役，而掌握权力的人，则仅知如何巩固并发展他们自身的权势与利益。在政治生活方面，我们依然不能获得我们应有的各种基本的公民自由，而且一般反对派人物经常生活在恐怖与不安之中，政府经常用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来限制反对派的活动和存在，而其方则花样百出，巧妙无穷。然而政府还要扯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大旗，表示政府的倾向民主和决心实行宪政。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二十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没有路轨，可以向外国买钢轨枕木，无法耕耘，可以向外国买种籽肥料，要发展工业，可以向外国买机器原料，要改革币制，可以向外国贷款，惟有道德的堕落，非一时所能回复，也非向外国借贷所能改善。因此我们很公平地说，这个政府确已与人民脱节！与人民的需要脱节，与人民的福利脱节，与人民的意愿脱节。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国内国外所公认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能满足中国人民。这个政府不仅已与人

民脱节，而且照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脱节的程度，也将愈来愈深。在它的统治下，人民将愈来愈没有希望，饿死的人必然愈来愈多，自杀的人也必然愈来愈多，而原有一块钱的，在它的统治下，亦将渐渐变成五角，变成二角五分，变成一角二分五厘，以至终于变成赤贫。这个政府业已成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政府，但这样一个政府，就是蒲立特先生主张美国支持援助的。蒲立特先生建议援助的，就是这一个“政府”，而并非中国这一个“国家”。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要使这个政府成为美国的工具，代美国来驱使中国的人民为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

蒲立特先生的动机既然如此，既然企图利用国民政府为保护美国利益的工具，因之便大捧其国民政府及其领袖人物，一面倒的敌视中共。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政治清明，民生康泰，中国何致弄到今日这样民穷财尽的地步，替共产党造机会？假如二十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声势？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率直地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制造共产党培养共产党的因素不先消灭，哪里能消灭共产党？照现在的样子，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在蒲立特先生的建议里，他建议由美国来训练中国的军队，供应中国的军队，指挥中国的军

队，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膨大，并非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脆弱，反过来说，并不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增强后，共产党就将消灭。今日中国的问题之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者，已为识者所公认，而这个曾经两度做过一个大国的外交大使的人，仍然这样近视，这样糊想，我们真是替近代人类社会文化水准的低落伤心！蒲氏又建议大宗贷款中国，以解救中国的财政危机。他主张在三年内贷给中国信用借款六亿美元，用以购买美国的食物、原料与机器；他实在是间接替美国货做买卖。我们不相信在这种混乱的行将崩溃的局面下，单靠外国的贷款就可在根本上稳定中国的财政，改革中国的币制。在抗战中，政府曾经发行大批关金，企图稳定当时日益贬值的币制，但今日的关金价值如何？前车不远，昭昭可鉴。我们认为整个的局势不趋稳定，一切改革币制的努力都属白费。因之我们认为，在蒲立特先生的访华报告里，不仅他的动机是偏私的，就是他的看法也是不健康的。

总之，蒲立特这篇文章并无任何可取的建议。他是一个反苏人物，他之有他这一套，实极逻辑，而他之能洋洋洒洒发表其意见，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下，亦极自然。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他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却是一种投机。照最近各种趋势观察，美国殆将改变自马歇尔返美以后以迄于今的那种袖手旁观的政策。美国政府之将积极援助国民政府，虽其方式、数目、条件如何，尚不可知，但援助之来殆无异疑。蒲氏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种建议，又于来华以前，先访东京，其间机微，至堪寻味。

十月七日

## 白报纸

最近物价腾涨，其中以纸价涨得最凶。当前几天其他各物逐渐回跌时，纸价仍然继续上跃，冲出一百万元大关（每令），最高叫到一百二十万元。这种上涨的情形，实已超乎情理。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纸价约在二十七八万左右一令，到九月十五日前后，纸价就涨到五十三四万左右，在短短一个月中，上涨百分之百。这时出版界已经透不过气，许多刊物不得不被迫提高售价。一直到十月五日，纸价尚逗留在六十万元一令之数，但自十月七日起，纸价即作高速度的上升：

十月七日	六十八万元
九日	七十万元
十一日	八十万元
十三日	八十七万元
十四日	九十万元

自十五日起，报纸的商情表上已无纸价的记载。十六日大公报第二版报导纸价已涨到一百十几万元一令，同日我们向纸商打听纸价，已叫到一百二十万元。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尚

未在报纸上看到主管当局对于纸价的抑制的消息。十八日大公报第四版始有警察局出动彻查纸商的记载。并载纸商同业公会的理监事，于十七日召集同业，决定切实减低纸价，并规定门市售价每令为八十五万元，只许减低，不准上涨。

中国杂志界的力量大都非常脆弱，没有巨额资本可以购存用纸。期刊又例不作新闻纸论，享受不到官价纸的配给，只得向市面纸商购用。本刊用纸，存底素薄，最近恰巧用完，而在这种疯狂上涨中，又无法购买。但本期在二十一日必须付印，我们在十八日动员全社同人，出外购纸，经整天的努力，结果还只买到二十二令，只够一期印刷需要的三分之二。（因此本期只出二十页）我们在河南路、交通路、福建路、山东路、广东路一带的纸店都问过，有的说九十五万一令可以卖十几令给我们，有的说八十五万元一令，限购一令，有的则干脆说没有货。结果我们在山东路的怡成纸号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时间去买到了三令，在山东路汇丰纸号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时间去买到了四令，在广东路涌生泰纸号买到一令，交通路震泰丰纸号买到一令，福建路义昌兴纸号总算卖给我们三令，广东路万亭和纸号买到二令，广东路德泰丰纸行买到两令，以上都是八十五万元一令。另外一家江西路五马路口的程梅记纸号，最初去时，说九十五万元一令，可卖十几令。但因看见我们出门时抄录他们的店号，再回去买时，他们便说没有货了。吵了好久，最后大概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抄录他们的店号，不晓得我们什么来路，好歹总算以八十五万之价卖了五令给我们。广东路河南路口的志成纸号，我们过去一年来，大部分的用纸都是向他们买的，最初讨价九十五万，后来我们说报载同业公会限定不得超过八十五万元时，他们便说“没有货”了，最后顶多只肯卖半令给我们。而且许多纸号都要我们出具正式函件，他们才肯



卖“一令”给我们。

照目前这种纸价，实非中国的杂志界所能忍受。假如一个刊物的发行数是五千份，则其成本为：

纸八令（以八十五万计）六百八十万

排印工及装订约五百五十万

（排印工日内又将加价）

稿费及行政费约八百万

广告费及杂费约二百万

共计二千二百万左右，假定每册售五千元一册，再扣除一个七折的批销佣金，即使完全收足，也只能收入一千七百五十万元。假如一个刊物的发行数是一万份，则共成本：

纸十六令一千三百六十万

排印工及装订约七百五十万

稿费及行政费约八百万

广告费及杂费约二百万

共计三千一百万左右，如完全收足，亦只能收三千五百万元。事实上，上数估计，在支出方面是最节省的，实际上的支出或者不止此数，而收入方面，绝无每期可以一本都卖得不剩，或每一本的钱都可以收得回来。而且支出都是现款，收入则常常在一二个月以后，甚至三四个月以后或永远收不回来，收入时与支出时，其间的币值又不知要打了什么一个折扣。因此杂志的经营，在这种惊风骇浪的物价中，苦痛不堪。印刷所是做买卖，纸商老板也是做买卖，但杂志的发行人，他和读者的关系并不是纯粹一种商业关系。这是一种文化事业，他们要顾到读者的购买力。

我们总希望民营的报纸或民营的刊物越多越好，同时亦希望每一个刊物都能逐渐增加他们的发行数，替我们国家的出版

纪录增加光彩。但是要希望民营的刊物多，要希望已有的民营刊物能够存在下来，就得使它能够自给，能够收支平衡。要希望刊物的发行数增加，就得顾到读者的购买力。刊物的售价越低廉，购买的人越多；购买的人越多，成本便可减低。我们不希望看见一个一个民营的刊物都垮下去，到后来只剩了官营的或党营的刊物；这不是国家的体面。我们不希望各种物价的重压，使每个刊物隔一个月或几个星期就得要涨一次价，弄得读者都买不起。现在一般刊物的发行数，向不公开，我们不知其他刊物的发行确数，但现在大多数刊物的发行数，均在一万份以内。按照上述成本，可见今日中国一般民营的刊物，都在极其困难之中撑持着。有许多刊物，确是成绩显著，极其努力，假如政府眼看这些优良的刊物一个一个消灭，政府有道义上似亦未能尽其维护文化事业的责任。在纯粹民营，纯粹依赖发行收入自给的许多刊物中，如《世界知识》，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在社会上素负声誉，而且他们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确可矜式，但他们在一个月前，即已从每册四千元增售至六千元，在最近的纸价上涨中，恐怕他们又非涨价不可。刊物为了要平衡收支，不得不涨价，但读者的购买力有限，其结果势必使发行数降低，而且在上海售六千元，在华北便须售七千元或八千元，在后方恐怕售至一万元甚或一万数千元。以后方生活程度的低，要读者以一万元或一万数千元来买一册刊物，实已超过他们的能力。又如《时与文》周刊，虽只出版半年，但是极其努力，业为目前许多领袖刊物之一，我们虽不知他们的经济情形，但在这种纸价的狂涨下，想亦深感艰难。就是已有三十年历史的密勒氏评论报，在昨天（十八日）出版的一期上，第一篇社论就是陈述该刊在纸价暴涨下的压迫（该刊现已售一万元一份）。许多优良的刊物，都困于经济，不能维持。我觉得政

府对于有成绩的文化事业，不能漠视不顾。虽然政治上的看法彼此不同，但大家同样都是抱着一腔热忱，为祖国的前途努力。目前对于一般刊物的生存最大的威胁就是纸价。以本刊而论，现在每期纸的费用，即使照八十五万元一令的价格，亦已达三千万元左右，占到每期总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纸价的波动，简直影响到一般刊物的能否生存。本刊在五月间曾向中央信托局申请购纸四十吨，公事搁了两个月，到七月中旬才批下来，准购两吨。纸是日本报纸（纸质较劣），但须照加拿大报纸的市面行情七折购买。五月间我们申请购纸时，市价仅二十万元一令，七月间批准时，市价已超过三十万元，即使打了七折，还比五月间申请时的价格为高，而两吨纸不敷本刊一月之需。最近上海市书业公会才准分给我们三百美元的配额，这批纸何时可到，尚不可知，而三百美元的纸，亦仅敷本刊半月之需，因此本刊过去所有用纸，纯系照市价向纸商门市零购。本刊发行数略较其它刊物为大，其间已比其他刊物稍占便利，然而在最近纸价的腾涨下，亦已难于支持。其他发行数较小的同业，其困难更可想见。这次纸价的暴涨，显然出于人为。我们希望政府，一方面使纸价回复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希望能回复到九月底以前价格，同时对于官价纸的分配，亦应求其公平。外间早有传说，说政府听任纸价上涨，间接以陷与政府政见不合的言论刊物于自行消灭之境。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传说。

十月十九日

(1947年10月25日《观察》杂志第三卷第九期)

##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送立法院审议。本刊函约韩德培先生撰文评论，以供当局参考。韩先生这篇文字，是从政治的和法律的两个角度上着笔的，所论极为详尽，我们极望立法院审议这个《草案》时，对于韩文所论，能予采纳。我现在再就条文的本身，就韩文未触及的地方，补充意见如下：

一、《草案》第二条：“出版品分下列三种：（一）新闻纸，指用一定名称，其刊期每日或隔六日以下之期间，继续发行者而言。（二）杂志，指用一定名称，并装订成本，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间，继续出版者而言。（三）书籍及其他出版品，凡前二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属之。新闻纸或杂志之号外或增刊副刊等，视为新闻纸或杂志。”

上文发生下列疑义：

1. 用一定名称之出版品，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间，继续出版，但并不装订成本，在此种情形之下，是否即不作为“杂志”论？

2. 用一定名称，并装订成本，其刊期在三个月以上，（如每一百日出版一期，或每四个月出版一期）继续出版之出版品，是否即不作为“杂志”论？

3. 有一种出版品（如市上流行的一种“丛刊”），其编制与杂志相仿，其刊期大体上每隔十日、半月或一月出版一次，但并未明白规定，在此种情形下，该出版品究为“杂志”抑为“书籍”？

4. 《草案》第二条最后一句：“新闻纸或杂志之号外或增刊副刊等，视为新闻纸或杂志。”所谓“视为新闻纸或杂志”，其义含糊不清：视为“新闻纸”或“杂志”乎？抑视为发行该项号外、增刊、副刊之该新闻纸或杂志之一部分乎？如系前者，则该“号外”“增刊”“副刊”之出版，必须按照《草案》第九条规定，于事前申请登记，非奉核准，不得发行。如系后者，则报社（新闻纸）即可出版各种副刊（即“杂志”），杂志社亦可每日出版增刊（即新闻纸），或其他副刊（即杂志），而不须另行申请登记。

上举四点，足见原文用字，颇多含糊。立法院于审议时，应求其明确清楚。

二、《草案》第九条前半段：“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者，应由发行人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于十日内转呈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核准的，始得发行。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项登记申请书后，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十日内予以核定，并转请内政部发给登记证。”

上文发生下列几个问题：

1.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核准与否，其权在省政府或直隶行政院之市政府；但同时又须获得内政部发

给的登记证。这儿发生的一个问题：即省政府或直隶行政院之市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的“核准”，是否即为最后之决定？抑或须俟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以后，才算获得合法的发行权？如系前者，则内政部登记证之获得与否，便无意义，即使没有内政部的登记证，亦无碍于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果系如此，则又与“草案”第十条，第十五条所规定者不符。如系后者，即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须于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后，才算完成依法申请登记的最后程序，才算取得合法的发行权，但“草案”只说“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项登记申请书后，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十日内予以核定，并转请内政部发给登记证”，而对于内政部发给登记证的时间，却无明文规定，实有不妥。因为既然认为要俟取得内政部的登记证，才算取得合法的发行权，则该新闻纸或杂志，虽因省市政府的核准，可以先行发行；而如内政部的登记证迟迟不发，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始终在一种尚未获得合法根据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势必影响该新闻纸或杂志的业务计划。按照过去情形及“草案”规定，内政部的登记证应当是依法申请登记证程序中的最后一步，因此我们认为：修正的出版法对于内政部发给登记证的时间，亦应有明文之规定。我们认为内政部于接到省市政府的公文后，应于三十日内发给该项登记证。

2.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人，应于发行前填具登记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地方主管官署，于十日内转呈省市政府，而后者应于十日内予以核定。是则自声请至核定，前后仅有二十天的时间，不能谓不迅速。新闻局董局长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并特别提及此点，谓以前的规定为“十五日”及“二十八日”，现在一律均为“十日”，使核定期

间缩短一倍以上。但是问题不在核定时间的缩短，而在假如不在限定时间以内核定，又怎么办？按照过去经验，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最感苦痛的，是依法声请以后，常常石沉大海，迄无下文；甚至有经过六个月以上而仍不见批复者。因此，为解除这种情形，并减少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的困难起见，我们认为：修正的出版法应当规定：假如在向径行发行所所在地方主管官署，声请登记，于三十日后仍不为核定者，该申请人即可发行该声请登记呈文中所指之新闻纸或杂志。

3.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核准与否，其权在省市市政府。但细查《草案》，关于此项核准与否的标准，只有一条，即：“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十日内予以核定。”这个规定的反面应当就是：只要不是与规定不符者，即应核准。但是问题不在此，问题在假如声请登记，与规定并无不合，而省市市政府批驳不准登记，则其补救办法应为如何？在原则上，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其核准与否的权力，完全操之于地方政府，是否妥善，很可研究。在京沪平津一带，地方政府在各种顾虑下，人民要求发行报纸或杂志，比较上或尚容易，而内地及后方边远省区，如将此种权力，完全交与地方政府，则人民发行报纸或杂志的权力，恐将遭受更大的限制。因为内地的民主空气比较稀薄，中央也不能处处顾到，在此种情形下，恐将发生亲我者予之，不亲我者拒之的情形。就理论上说，宪法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之自由，行政官吏如侵犯人民这种权利，是为违宪，人民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诉讼。实际上，今日中国人民是否能行使此种方式，殊为疑问。因此，我们认为，是不是在修正的出版法中，应当更积极地明文规定：只要与规定相符，即应核准；同时规定：地方官署无故批驳，不准发行新闻纸或杂志，申请人可以向更上级的机关诉愿，以为补

救？我们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供立法院审议此案时的考虑。

三、《草案》第九条后半段：“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之事项如下：（一）新闻纸或杂志之名称（二）发行趣旨（三）社务组织（四）资本数目，器材设备及经济状况（五）刊期发行新闻纸者并载明其版数（六）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七）发行人及编辑人之姓名、年龄、籍贯、经历及住所。”

《草案》第十条：“第九条所定应声请登记之事项有变更者，其发行人应于变更后七日内，按照登记时之程序，声请变更登记。……”

《草案》第二十八条，“……不为第十条之声请变更登记，而为发行新闻纸或杂志者，得于其为合法之声请变更登记前，停止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

按照上列条文，凡第九条所载各项，如有变更，便应声请变更登记，否则即遭受停刊之处分。我们参以实际情形，此种规定，困难滋多：

1. 资本数目，器材设备，经济状况。先说资本。在币值这样不稳定的状态下，任何事业，它欲继续支持，势须时时增资。其事至明，不必举例。再说器材，譬如一家报馆，本来没有汽车，今年买了一辆汽车，这算不算增加了“器材”呢？至于经济状况，含意更不清楚，上一个月稍有盈余，这一个月勉强可维持，下一个月或者亏折甚多，这算不算经济状况有了变动呢？假如上述的例子都算，则一家报馆或杂志社，恐怕一年到头，每个月都要声请变更登记。其事之不易行，昭昭甚明。

2. 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所谓“所在地”，不知如何解释。“所在地”之变更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形：

a, 自甲省甲市甲县迁至乙省乙市乙县。



b, 在同一城市, 自甲街甲巷迁至乙街乙巷。

c, 在同一街道, 自甲号门牌迁至乙号门牌。

条文中所言“所在地”之“变更”, 不知究系指上列情形中之那一种。若系第一种, 则犹可说。但因为发行所所在地既自甲省甲市甲县迁至乙省乙市乙县, 则照本“草案”第七条第二十九条等之规定, 其“地方主管官署”业已变更, 自应变更登记。但若包括第二种第三种, 则对于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 便极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 所谓发行所所在地之变更, 包括第二种第三种情形在内。)譬如在上海这种大都市里, 搬个家是极寻常的事情, 而且照一般租赁契约, 都规定期限, 期限满后, 房主可以叫你搬家。在此种情形下, 关于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 即须声请变更登记, 未免使新闻纸或杂志之经营, 太不稳定。至于印刷所之变更, 也属同样情形。特别于杂志, 它可以这一个月交甲印刷所承印, 下一个月交乙印刷所承印, 再下一个月又交丙印刷所承印。假如每换一家印刷所, 便须声请变更登记, 亦未免骚扰太甚。

因之, 我们认为: “登记声请书应载明之事项”中, 当应求其简单。即以第九条第六款而论, 需要在登记声请书中载明印刷所之名称, 但事实上, 办一个杂志, 核准与否, 尚无把握, 还那儿谈得到交那一个印刷所承印呢? 至于变更登记, 应当仅限于发行人之变更为限, 因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名称”若有变更, 则一方面对于旧的是“注销登记”, 对于新的是“声请登记”, 不应作为“变更登记”论。其余社务组织、资本数目、发行所在地址等若有变更, 应令发行人呈报备案, 不宜作“变更登记”论。关于此点, 我们希望立法院审议时, 能作合理的修正。

四、《草案》第十五条: “新闻纸或杂志应记载发行人之姓

名、登记证号数、发行年月日、发行所、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我们以为关于“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并无记载之必要，我们认为新闻纸或杂志，其责任已由发行人负之，印刷所不应再负任何责任。既不负任何责任，亦即无将“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记载之必要。这次上海市节约运动委员会通过杂志用纸节约的办法，不正正当当的通知各杂志社，（本社至今未收到任何用纸节约的通知）却规定叫各印刷所不得承印超过页数之杂志，企图通过印刷所来控制杂志，我们甚以当局不走正路而走邪路为可惜。印刷所和杂志社的关系是业务关系，除此以外，即无其他。我们希望政府在合法合理的程序下管理出版事业，而不要企图通过商业性质的印刷所来控制言论性质的出版物。

五、《草案》第十七条：“新闻纸或杂志登载之事项，本人或直接关系人请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者，在日刊之新闻纸应于接到请求三日内更正或登载辩驳书，在其他新闻纸或杂志应于接到请求后第二次发行为之。……更正或辩驳书之登载，其地位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

上文最后一句，发生困难。举例言之，假如一个报纸的头条新闻，有记载错误，被记载错误的本人或直接关系人请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是否应在头条新闻的地位，将该更正或辩驳书登出来呢？按照“草案”，是应当这样办的，因为“草案”规定：“其地位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但考诸古今中外，从未有一个报纸，其头条地位是登载更正或辩驳书的。因之我们认为“草案”第十七条最后一句，应予删去。

同时又可能发生一个问题（虽然在事实上不致于发生），即假如有一项记载，被记载的人认为记载错误，提出辩驳书一篇，竟长达十万字，则这个新闻纸或杂志应否予以刊载呢？如

不刊，则违反法律。如刊，则照目前报纸或杂志的篇幅，恐非为之出一特刊或专书不可。（假如是杂志，则它又违反了“纸张节约”的规定。）关于辩驳书字数的问题，亦应有补充的规定。

六、关于《草案》第四章（第二十一条至二十七条）出版品登载事项的限制，韩德培先生文中已有详论，我们完全同意。其中关于第二十六条：“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规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项之记载”，此条假如不能完全取消，我们主张在这条条文之后，加上下列文字：

“中央政府此项禁令或限制之命令，应于命令发布后一个月內，咨请立法院追认；立法院应于接到咨文后十日内决定对于此项命令之追认与否；如立法院不同意此项命令时，该命令应即作为无效。”

关于《出版法修正草案》的批评，本人仅补充陈述几点意见，主要的部分均包含在韩先生一文之中。在根本上，我们反对另设“出版法”来约束出版事业，出版品的一切责任问题，尽可照民刑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假如在实际的情形之下不能达到这个理想的地步，则出版法的制订，应力求其合理。我们竭诚希望立法院审议此案时，能考虑并采纳我们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九日

（1947年12月6日《观察》杂志第三卷第十五期）

# 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 准其入学之不妥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新闻报载该报十一月二十日南京专电：“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开除后，必须呈报教部，并由教部通令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对此项开除学生，不得准其入学。此项规定，因日久不免忽视，现教部已重申前令，飭令各专科以上学校今后应严格执行，绝不准通融，以整学风。”我们认为此事深有不妥，爰为文论述，并为青年学生呼吁。

一、学校开除学生，总不出下列两种原因：或者认为该生学业太坏，不堪造就；或者认为该生品行不端，不堪训诲。社会生活中不能没有惩戒，超过了某种限度，自然应该予以处罚。但是今日中国一般大学，关于课业及训育的标准，并不一致。先说课业。有的学校学术水准高，有的学校学术水准低；有的学校功课严，有的学校功课宽；有的学校以学生有无特殊心得，是否能融会贯通来衡量学生的造诣，有的学校只以机械的考试、学生是否能背熟笔记或教科书来决定学生的成绩……在这种差别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日中国的一般大学之间，甲校与乙校之间，乙校与丙校之间，丙校与丁校之间，甲

校与丁校之间,在学术水准及学生的程度上,是有距离的。因之,在甲校或许是一个“低材生”,但这个在甲校不过是一个“低材生”的学生,可能转到丁校之后,却变成了丁校的“高材生”;至少,这个学生在甲校是被认为成绩低劣者,他到丁校后不一定同样被认为不堪造就。这一点,我相信无论教育部当局或一般供职教育界的人士,不致认为我们这种说法为无据。因之,在甲校因学业太坏而被开除的学生,他的实际程度,不一定比丁校的在校学生来得坏。但程度还不及这个甲校开除学生的丁校学生既然仍可在大学读书,而程度比在丁校在校学生程度好的学生,反而因甲校之开除而不得转入其他学校,永远剥夺了就学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是不公道的。再说操行。今日中国一般大学,由于各校的历史、环境,以及主持的人物不同,在训导方面,其标准和作风,也并不全国一致。有的学校采取严格管理制,有的学校采取自由发展制;有的学校所希望培植的学生就是上课下课、按步就班的学生,有的学校所希望培植的学生就是有创造力有新理想的学生;有的学校对那些对于国家大事关怀热心的活动学生,总是不甚放心,处处加以管束,有的学校则对于有领导力有活动力的学生,中心赞赏,处处予以鼓励和指导……因此,同样一个学生在甲校可能成为校方最顾忌的学生,但在乙校可能成为校方很赏识的学生;同时同样一个行为,在甲校校方可能认为这个行为超越了常轨,破坏了本校的秩序,但在乙校校方,可能认为这个行为是无所谓的,可以原谅的。在这种差别之下,一个学生在甲校可能是一个“败类”,但到了乙校可能变成一个“人才”;在甲校,他的才智迄被埋没,在乙校,他竟然获有机会发挥他的才干。同时,一个学生,他的品行(包括他的思想、胆识、组织能力、服务精神等等),在甲校可能被认为不堪训诲,而到了

乙校可能被认为后生可畏、大有作为。因之无论从学业或操行的观点看，要使一个学生，被一个大学开除后，全国其他大学便不再准其入学，这是不合理的。教育的目的在发挥理性，理性的目的则为求合理，求公道。因之我们认为教育部规定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的学生，全国其他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这一规定，与“教育”本身的意义，背道而驰。我们希望教育部对于这种规定，能重作考虑。

二、在从前君主时代，地方上出了一个命案，就成为了一件“大事”，有司可以因此丢官甚或搬动脑袋。共和以后，民命反而越来越不值钱了，试看今日，民命与蚁命，究有何异！在学校里，情形亦正相仿。在我们做学生的时代，可能一年之中没有一个学生记大过，两年三年中没有一个学生被开除；开除了一个学生，那就全校骚动，极端严重。可是现在，学校开除学生已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而且现在又有了新名字，叫做“集体开除”，一开除就是十几个或几十个；学生成了韭菜根，一刀切下去就是几十根。我们不知道这还是教育的权威“涨价”了呢，还是学生的“价格”“贬值”了呢？从前开除一个学生那样郑重，现在开除一个学生甚至几十个学生这样轻易，难道现在的学生，无论就学业的原因或品行的原因，真的那样不堪造就了吗？假如说真的学业不行，为什么不在录取的时候，将录取的标准尽量提高？假如说品行不端，然而各校训导，平时对于学生在做人做事方面，究竟有没有切实的指导。三四十年来中国的新教育，名为德智体三育并重，但体育不过做到开运动会，德育不过做到上纪念周。现在的学生，伙食这样坏，有的学校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合住在一间宿舍，基本的营养、空气、日光都不够，还讲得上什么体育。要学生帮政府忙的时候，如发动青年从军等类，于是把学生大大捧一阵，学

生要是为国事有所表示,而不利政府时,便把学生大大打一阵,这样讲得上什么德育。三四十年来中国的新教育,大体上说来,不过是一种“书本教育”而已。按时上课就不扣分数,考满六十分算及格,读完多少学分升级,读完四年还拿文凭。请问今日中国有几个大学能注意到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些大学,比较有一种优良的传统,学生沐浴在这种传统里,经过四年的熏陶,使他在做事做人上渐渐地得到一种正常的训练;或者一个学生幸运地亲近了一位优良的教师,受了他的影响,在性格上渐渐定型。但就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看,这种情形是占极少数的。(这也就近似牛津导师制的精神。中国有许多人很向往这种导师制,后来教部也规定各大学设立导师,但是中国大学里的导师是“带兵式”的,或者“保甲长”式的,凡是教师都是导师,每个导师带上几十个学生。不说在各种条件下根本无行“导师制”的可能,因之有导师而不知其所属的导生有多少者,导生经年犹不知其导师为何人者,就是中国导师制的真正目的,亦不过是要叫这个导师管管几个学生,不要他们乱惹是非,闯出乱子。所以结果中国大学里的导师制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至于一般大学里,除了上课、考试、分数、文凭外,还有什么做人做事的训练?一年复一年,墨守成规,一批一批的毕业,糟踏了青年的生命,糟踏了国家的光阴。现在许多学校,这样容易地开除学生,可是学校当局是否已经尽了“教”与“育”的责任?在目前这种教育制度之下,大学的主持人,纵然有这方面的理想,但事实上又是否能够有所作为,贯彻他们在这方面的理想?同时政府当局所行所为,又是否能够激发青年向上,能使青年身心安定?大环境恶劣如此,却希望学生乖乖如彼,其可得乎?青年容有错误,也当网开一面,让他有条路走。越是开除学生容易,越不能实行一校开除他校不收的

办法。这种一校开除他校不收的办法，是迫人堕落，迫人自杀，迫人走险，其结果与教育的本义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对于教育部这个规定，不能赞同。

三、但是教育部为什么要有这种规定，而且认为此项规定，日久不免忽视，又要重申前令，饬令各校严格执行，绝不通融，以肃学风？假如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学术水准和训导作风都是一致的，则施行这个统一的办法，犹有可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此事教育部非不知之，但仍有此种规定，而且重申前令者，据我们的观察，其动机不是教育的，恐怕仍然是政治的。政府显然企图用这种严峻的措置，以压制对于现实日益不满的学生情绪，希望学生只管书本，不管国家。我们认为政府用这种严峻的手段来对付有热血而无凭借的学生是不公道的。而且在原则上，我们反对政府用一切以政治控制为出发点的办法来控制教育。政府应当让大学学生在学术上自由发展，在思想上自由发展，在公共生活的训练上自由发展，只要这种发展是合理的，合法的。我们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样保守消沉，我们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中年人那样稳定谨慎，青年人可贵的就是那一股活力，这种活力就是国家的活力。没有活力的国家是一个死的国家，没有活力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社会。政府应当自疚自省，尽量刷新政治，缔造一种光明而有朝气的社会风气，使一般纯洁而有理想的青年在这种有光明有朝气的大环境下，潜移默化，培养成为建国的良才。我们对于年来各大学学生的活动，素极注意，对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竞选这一类事情，亦不惜篇幅详加报道，这就因为我们认为：今日这一批青年在这种校内活动中所受的民主的训练，与二十年以后中国政治的趋向大大有关；历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务就在要能看到每一个社会现象它在日后所可能发生



的社会影响。我们衷心希望政府当局能创造一种新的风气,以这种新的风气来积极地激发青年的抱负,熏陶青年的操守,而不要单在消极方面以种种方法来限制青年的活动,削弱他们的活力。

十二月五日

(1947年12月13日《观察》杂志第三卷第十六期)

## 我们建议政府调查 并公布白报纸配给情形

最近英商字林西报、美商大美晚报和上海报业公会，因为白报纸配额问题，引起严重纠纷；上海报业公会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召开的第四十二次会员大会决定第四季白报纸配额时，认为字林西报和大美晚报在纸张篇幅上，未能遵守公会公约，故将字林西报的白报纸配额，按照第三季配额减去百分之九十，即自九千四百十元美金减为九百四十一元美金；大美晚报的配额按照第三季配额减去百分之五十，即自八千四百五十八元美金减为四千二百二十九元美金。被处罚的两报连日以极大的首页新闻地位及社评地位，向报业公会提出抗议。在性质上，这本来是一个同业公会之间的内部问题，但在趋势上，几乎变成一个涉及国际性质的外交问题。输管处主任委员张公权于十二月二十日致函大美晚报，谓白报纸配给额之最后决定权，在输管处而不在报业公会，并谓该处对于字林西报及大美晚报之配额问题，将有公平之解决；遂使情形略趋缓和。我们现在愿就一年白报纸配给情形，陈述意见，希望政府能使白报纸的配给制度合理公平。

白报纸的价格在三十五年一年中，极其平稳。从三十五年年底起，开始波动：经常在二万五千元一令的白报纸，五万、十万、十五万，跃涨不已。在白报纸曾经最高涨到一百五十万元一令的今天来看，十五万一令的价格，不啻是黄金好梦，令人恋忆不止。但在三十六年二月间，一般文化事业的经营者，对于这种涨无止境的白报纸价格，已都惶惶不安。在这时候，政府决定以国家的力量来扶助文化事业，遂有白报纸配给制度的施行：在政府每三个月一次的进口限额中，以一定的数目，配给文化界出版界，使得到配额的出版机构，可以向政府购买外汇，订购报纸。其后白报纸的价格，一日千里。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八十万、一百万、一百二十万，一直到最近最高的一百五十万（一令），白报纸的价格越涨，白报纸配额的重要性便越增加。正如字林西报在这次的配额争端中所说的，假如他们不能获得他们原有的配额，他们势必被迫停刊；这话既非夸大，也非威胁，在实际上确有可能。事实上，今日中国的出版界，无论是报业、书业，或杂志业，无不为此高涨的纸价压得透不过气来。以本刊论，我们在三十五年九月创刊时，纸价只有二万五千元一令，现在涨到一百五十万元左右，约涨六十倍之多，但是我们创刊时的售价，只有五百元一份，即以本期增售七千元一份的售价言，本刊的售价亦仅上涨十四倍。这个在同一时期内，纸价已涨六十倍，售价只涨十四倍，都是确实的事实，而其对比的强烈，则令人看后不仅心弦震荡。除非报纸、书籍，或者杂志，它的销路或者它的售价能与白报纸的价格作比例的增加，否则终将血干汗尽，垮了完事。但是报纸、书籍、杂志，无论是销路或者售价，要和白报纸的价格作比例的增加，均不可能。普遍的贫穷使报纸、书籍、杂志的销路越来越呆滞，一切出版物的销路，不仅无增加之望，

反有下跌的趋势。经营门市的人都在叫苦：看书的人多，买书的人少！肚子都吃不饱，还有什么钱买书呢？支出的增加，使出版品的售价必须增加，售价的增加使买得起的人越来越少，而销路越少则售价更越须增加；如此循环，出版业的前途便越来越黯淡消沉。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获得白报纸的配额，借以减少出版品的成本，勉力撑持，以维护文化事业的生存。

过去一年中政府所实行的白报纸配额制度，我们认为其中最可批评的地方，即上海一地在全部配额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大。据我们所获得的材料，即以最近这一季，即第四季（包括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及三十七年一月）的白报纸配额分配情形说：第四季的配额总额是二百五十余万美元，但上海一地的书业分到八十余万美元，约占总额的三分之一；上海一地的报业分到六十余万美元，约占总额的四分之一；国民党党办报纸刊物分到三十五万余美元，约占总额的八分之一弱，上海的纸商业分到二十余万美元，而除上海以外的全国各地的非国民党党营报业，包括北平、天津、汉口、广州等地，一共亦不过分到三十余万美元。易言之，在全国的白报纸配额中，上海一地所分配到的，几乎占到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三十六年夏天我在天津旅行时，平津同业大都表示上海报业享受的配纸数额太多。在同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李俊龙副部长视察河南一带时，当地的同业也一致呼吁，要求享受白报纸的配额。这一年来，内地报业因受纸价的重压，被迫缩小开数甚至停刊者，时有所闻；西安纸荒的严重，几乎使西安全体报业解体。再以上海报业的分配情形而论，即以本季（第四季）而言，据我们获得的材料，其分配情形如下：

新闻报	一四七、五四四元（美金）
申报	九一、五七七元

大公报	八三、五三三元
正言报	二九、一〇〇元
东南日报	二八、七〇〇元
和平日报	二六、二六二元
前线日报	二二、一五七元
益世报	二二、一五七元
商 报	二二、一五七元
大陆报 (英文)	二〇、九一九元
华美晚报	一〇、二二三元
新夜报	一〇、二二三元
时事新报 (晚刊)	一〇、二二三元
大晚报	一〇、二二三元
新民晚报	一〇、二二三元
大众晚报	一〇、二二三元
自由论坛报 (英文)	九、一七二元
中华时报	七、九一一元
金融日报	七、〇六四元
立 报	五、九三五元
大美晚报 (英文)	四、二二九元
俄文日报	二、七六四元
字林西报 (英文)	九四一元
英文回轮日报	四〇〇元
铁 报 (小报)	五、九六〇元
飞 报 (小报)	四、三〇五元
小日报 (小报)	二、五〇〇元
力 报 (小报)	二、五〇〇元
罗宾汉报 (小报)	二、一〇〇元

诚报 (小报)	一、六〇〇元
活报 (小报)	一、五〇〇元
风报 (小报)	一、五〇〇元
东方日报 (小报)	九五〇元
亦报 (小报)	九二〇元

上列数字可以帮助我们明了目前上海报业白报纸配额分配的一般情形。但以整个国家为单位来看，我们不能同意这个分配是公平的。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汉口、开封、西安、兰州、迪化、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南昌、广州、福州、沈阳等地，各有其优秀的报纸，在各区域的地理岗位上，负其传播文化的使命，我们绝不能如此厚于上海一地而薄于全国各地。我们认为这种分配比率，未免太偏。政府应以全国为单位，就各地报业与出版业的需要与贡献，衡量实际情形，作合理而公平的分配，不宜将感情完全侧重于京畿附近的一二个都市。

再就上海一地而言，在过去一年中，白报纸的配额情形，物议甚多，最通常的两个毛病：第一个是分配不平，有的人家配得多，有的人家配得少，多的多到超过其实际需要，少的少到远不敷其实际的需要；第二个是分到白报纸配额的人，当他利用所分到的白报纸配额时，不一定能符合国家所以要分给他白报纸配额的本意。国家所以要给各报馆各书店各出版机构白报纸的配额，其目的乃在减轻报业、书业、出版业在用纸方面的负担，亦即间接减轻读者的负担，用以传播有益于社会的文化及思想。白报纸配额的目的，并非借此以补贴各受配对象的庞大而近于浪费的行政开支，或借此以肥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囊。白报纸的配额不是一种分赃、救济或补贴，受配对象应当将所配到的白报纸，用之于印刷报纸或出版书籍，不得将配

到的白报纸作为受配对象在业务上的一种资金，发生买卖行为，以此周转或以报业或书业，有些人借此赢利。但一年以来，实际情形与原定目的，未必能完全符合。无论所分到的配额，是否不超出其实际需要，不免令人怀疑。在报业方面，据我们所知，曾有人提议在报业公会内组织一个小组委员会，调查各报的实际发行额，用以决定该报所得到的白报纸配额是否超过其实际需要，但这个提议始终行不通，因为大多数的报纸都不愿公开其实际发行数。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密勒氏评论周报第一篇社论中就有这样的叙述：上海每一家报纸都虚报他们的发行额，用夸大的发行额以便招揽广告。密勒氏评论周报甚至怀疑，上海有些报纸，为了要求配纸，夸大他们的发行数。密勒氏评论周报的记者说：他们曾经听说，有一家报纸自称日销六万份，但报业公会于分配配额时，知道其数不确，所以打了一个对折，只给了那家报纸相当于日销三万份的配额，那家报纸发行人，一方面向报业公会抗议其决议的不合理，一方面心里却十分高兴，因为实际上这家报纸仅仅日销二万份（密勒氏评论周报一〇八卷四期一〇八页）。张君劭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他们所需要的白报纸是一家半官方报馆分给他们的。一般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印象，即单就上海一地言，白报纸的配额并不是完全公平的。这种不公平的情形同样见之书业方面。我们甚至又可以说，书业分配白报纸的情形，比报业更坏。报业每一次决定配额后，其配额清单虽不向社会公开，但在报业公会的会员之间，是公开的，各会员还有机会知道每一家所得的配额。书业公会则除了理事们之外，其他会员很少知道每一次白报纸配额的实际情形；一切都操之于少数理事们的掌握之中。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先生，曾有一次口头要求书业公会公开白报纸配给的清单，但被询问的人则要求巴金先生用书面

提出来。其后文化生活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万有书店三家联名正式致函书业公会，请求公开白报纸配给账目，但书业公会迄无只字答复。有许多人都怀疑书业公会的理事会员，利用其自身为“理事”，都能分得相当多的白报纸配额。这种怀疑有无根据，只须书业公会一方面公布其理事名单，一方面公布其过去各次配纸的清单，便可证明。在书业中，有许多的的确确在认真出版有价值的书的出版业，他们所分到的白报纸配额，非常微小，远不敷其实际需要，以致有许多稿子，业已排好，打好纸型，而没有白报纸付印。但有些出版色情书籍的书店，却可以获得为数甚大的白报纸配额；又有些书店，白报纸配额虽然分到不少，但极少出书，就靠分到的白报纸“坐吃”。所以现在上海有一个新名字，叫“吃白报纸”。前几天，上海新民晚报上有一段新闻，说有一家书店，要抛出白报纸，价达二百亿之巨。这个消息假如是事实，则大可证明书业中的确有人配到了白报纸而并不用以出版书籍。政府以国家外汇购进的白报纸，配给出版业，原是鼓励并帮助出版书籍者，而受配者却用以作为他们的业务资金，移作非与直接付印有关之用；这实大违政府施行白报纸配给制原意，更进一步说，我们认为白报纸的利用，应以有益于社会的文化事业为限。我们绝不同意以国家艰难的外汇购进的白报纸，浪费在印刷大篇幅的商业广告或娱乐广告，或者印刷色情海淫的文字。前述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三家致函书业公会，一方面要求书业公会公布配额清单，一方面曾质问书业公会为什么出版黄色色情书籍的书店却可获得极大的白报纸配额。我们认为这种质问极其重要。白报纸的配给，既要公平，亦须合理。一切分配超过了其实际需要，或用分配到的白报纸去印刷无益于社会文化的图书，或者干脆分到报纸而不出版书籍，“坐吃白报纸”，这一切情形我们都认为



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不仅浪费着国家的外汇，并且间接剥削了全国学术界文化界的作者读者的利益，有害于整个国家的文化事业。我们更须进一步地明了，目前白报纸价格的如此飞涨，亦与这种配额制度有关，因为绝大部分的白报纸配额都给“既有对象”分去了，所能剩给纸商的数目也就有限，所以纸商在供需不平的情形下，囤积居奇，高抬售价，其结果，使一切不能获得政府配额的出版业，统受其累。

关于本刊自身，我们亦愿在此略陈数语。我们过去的用纸，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我们在三十六年五月曾一度向中央信托局购纸，请求购买四十吨，公事至七月才批复下来，准购两吨。中央信托局的纸是日本纸，但须照加拿大纸的市价七折计算。事实上，我们申请时，市价仅二十万元一令，但批准购纸时，市价已超过了三十万元，即使打了七折，其实际支付的价格，还比五月间申请时的价格为高，而纸质则远不如市上所购的西报纸。据说最近上海有二十几家科学期刊联合向中央信托局购纸，只批准了一吨，每家只分到二令左右，我们觉得这简直是滑稽。我们于加入书业公会后，书业公会在第三季配额时，曾给我们三百美元的配额，仅敷本刊半月之需。我们因为书业公会的配额不敷本社实际需要远甚，故于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双挂号公函一件致书业公会，正式请求该会派员惠临本社，调查本刊的实际需要。我们的挂号信收据是上海第五邮局第 0147 号，并于翌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收到书业公会的“收件回执”。但迄今一月，书业公会既未接受我们的请求派员调查，亦未有只字之答复。我们致函书业公会的态度是诚恳的，而且我们认为我们这种请求乃是基于一种合作的精神，愿意协助书业公会明了其会员的实际需要，以作为该会下次决定配额时的参考。本社现除出版周刊外，并将出版丛书，

丛书的原著且已陆续寄到，本社对于配纸的需要，比以前更为迫切。我们绝对不能承认，那些色情的书报，在整个国家文化生活中，比本刊所作的贡献更为重要。那些色情书报都可获得为数可观的配额，为什么我们所分得到的独如此之少！我们对于这种不公平的情形，难于缄默！

白报纸的配给制度已行一年，现在又是一个年度的开始。我们认为政府对于过去一年白报纸配额的情形，极应加以调查：究竟过去一年中的白报纸是如何分配的？其实际用途的情形又如何？在书业方面，到底过去一年中出版了多少书籍？哪些书籍？其用去的纸量与配给的纸量是否相符？我们希望政府加以调查，并公布其调查结果，使一般社会都能明了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形。对于过去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形，政府应根据调查所得，作进一步的改善。

十二月三十日

(1948年1月3日《观察》杂志第三卷第十九期)

## 国大评论

### 一、训政问题

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很糟，糟到连国民党的党报都不得不出面指责。据我们所看到的京、沪、津各地报纸所载有关国大会场情形的记载，字里行间，大都含讽带讥，印象不好。有人认为国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开会，会场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难望理想，这次第一次的民主学习，大家应将期望的尺度放宽一点。不过我们应当指出，天下的事情，不像样也有一个不像样的限度，在限度以内，大家可以原谅，超过了某种限度，便使人难于默许。像这样一个二千多人的会议，更希望每一议事，每一发言，都按规就矩，有条有理，自然未免求之过高。但是动辄起嘘，随便喊打，亦未免失之过分。国大代表来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们亦不能希望每个代表的发言礼貌，都能符合水准，但报载居然有人高喊“妈他民的主”，则未免相去更远。本人目睹会场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气之徒，直奔讲坛，若无职员劝解，定必扭成一团，偌大一个

会场，东一簇，西一簇，乱哄哄，气冲冲。尽管主席嘶哑喉咙，要求维持秩序，可是无人理会，一片喧嚣，一团乱糟，使我们这些旁听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简直无感可想。我们细加分析，造成这种不体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识问题，一部分是修养问题，而两者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教育问题。就知识言，本人亲耳听到一个代表发言，谓“国大有修改宪法之权，如其我们这次不修改宪法，就是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此种逻辑，不知何来。修宪之案，均须三读通过，举行二读会时，有一位代表大嚷，说上次业已通过（所谓“上次”，实际上是一读会），为什么还要讨论？有人告诉他议案需经三读，始能通过，这位代表还是不服。国大代表，不远千里，进京开会，而不肯在事前稍为补充补充自己的知识，严格言之，可谓有亏职守。就修养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讲理，喜欢打的朋友何必竞选国大代表？要讲理就得听反对的意见，不愿听反对的意见的人何必竞选国大代表？民主国家的的会议代表，都应具有某种水准以上的教育素质。我们应维持这种水准，我们应提高代表的素质以符合这种水准，我们不应降低这种水准迁就代表的素质！

这次国大开会之糟，业已众口一词。但是大家都在议论国大代表的品质，而很少有人追究这一个失败的国大的责任应由谁负。本人认为这次国大开会情形如此之糟，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国大代表所负的责任小，二十年实行训政的国民党应负的责任大。议会的成就如何，就得看议员的素质如何；议员的素质如何又得看选民的素质如何以及国家政治上的风气如何。选民的素质高，产生出来的代表的素质自然也跟着高；国家在政治上的风气好，选举的成绩自然也跟着好。国民党训政前后二十年。经过这二十年，本来是三十岁的人，现在已经五十岁

了；本来二十岁的人，现在四十岁了；本来是十岁的孩子，现在也变成了三十岁的人了；至于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在国民党的训政阶段中长大的。在这次的大选活动中，无论选民或竞选人，大多数都是在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的公民，这些选民与竞选人的素质的高下，不能不说与二十年来国民党训政的成绩无关。当初中山先生遗教，认为“由国民革命所产生之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生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所以训政的目的，即在训练人民如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然而我们现在从国大的选举以及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来看，国民党训政二十年的成绩究竟在什么地方？众所周知，这次国代和立委的选举，弊端百出，弄到发生命案、选官被控、绝食抬棺，笑话之多，开中外古今记录。选举的成绩如此，国民党对于这二十年来“训政”的这段历史，何以交待？再说代表素质，今日国大代表的素质，难道都是理想的吗？难道都够得上国家的水准吗？假如国内还有素质更好的公民，何以那些素质更好的公民无法产生，因之使国家的政治水准得以随之提高？国民党对于此点，有何自解？我们很坦白地说，从这次国大选举和国大开会情形来论，国民党二十年的训政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国民党要是有勇气，对于这点应当坦白承认。也许他们看到这二十几天来国大的情形，内心里也有惭愧。但惭愧是消极的。过去的虽然过去了，假如国民党能够从过去的失败中得到一种教训，则过去的失败犹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失败。行宪以后，实际上掌握权力的党还是国民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只有以国家为第一，才能大公无私；只有大公无私，才能在政治上

有所成就；只有有成就的人、团体，才能在这时代的洪流中立脚！

## 二、总统问题

关于总统问题，我们要分几点来议论。

第一，在现实政治里，第一任总统是蒋主席，几乎成为一个不移之局。四月四日蒋主席正式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一笔惊人，于是各方揣测丛生，有的认为这是一种姿态，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表示。据我们所知，蒋主席这一着绝对不是一种“姿态”，这也不但不是一种消极的表示，而且相反，正是一种最最积极的做法。这是一着棋，一种政策，绝不是“姿态”，而是一种“决定”。何以言之？原来在政协时代，大家制宪，都以蒋主席为对象，想用各种方法来限制他的权力，因为当初大家假定，将来的总统一定是蒋主席。蒋主席宣布不出任总统，这是一种战略，企图使围扑他的人扑了一个空。据说这是蒋主席的枯岭静思以后的决定。蒋主席是喜欢负责任的人，宪法给总统的权力加上种种限制，这一点，就蒋主席的性格来说，是他受不了的。同时，至少在蒋主席看来，在目前的政治局局面下，仍须由他来主持，总统既无权，他只好改任有权的职位，这就是早在一个月以前，本刊四卷四期所载蒋主席可能不做总统，改长行政院这一报告的根据。所以，不做总统做行政院院长，绝不是消极的表示，而是十分积极的决定。无奈国民党的党人不了解他这一政策，这一谋略，还是哭哭啼啼的认为要是他们的蒋总裁不出任总统，他们的党就完了。听说蒋主席这次非常生气，认为他的党人不仅不能帮他的忙，甚至还不能了解他。但是结果呢，各种实际形势，仍然要求非由蒋主席出任总统不可，而其救济的办法是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

款”，授总统以非常的大权，蒋主席不愿出任总统，本来是为了总统的权力太小，现在“权力”的问题既然有了补救办法，蒋主席自然可以“俯顺輿情”，出任总统了。这就是这次总统之选所生的曲折的一个最客观最正确的分析。而在这个分析之中，我们应可得到一个结论：蒋主席不拟出任总统，改长行政院，这多少还近于“人迁就制度”的精神；现在，为了要蒋主席出任总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以大权，则就又走着“制度迁就人”的老路了。

第二，大家都说，现在中国，除了蒋主席，还有什么人可以出任总统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着两个问题：一，在现实的国民政府政局里，还有那一个人能有像蒋主席所有的那种通筹全局的权力呢？二，竞选就是一种比赛，也可以说是一种挑战（Challenge）。现在有哪一个人敢起而与蒋主席挑战（竞选）呢？（陪选另作别论）由这两个问题，引起了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这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进而研究的，即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除了蒋主席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声望和权力方面，可以勉强和蒋主席齐与并列的地位呢？十几年来，社会上对于中国的政局有一种笼统的印象，认为当局御人，常采“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办法。我们看，在党务和教育方面，这一面有一个陈立夫，那一面有一个朱家骅；财政经济方面，这一面有一个孔祥熙，那一面有一个宋子文；军事方面，这一面有一个何应钦，那一面有一个陈诚；派系方面，这面有一个CC，那面就有一个政学系。使各方面都造成一种均势的局面，大家都环绕着一个人，任何方面都再也跳不出第二个全国性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形，据我们所能了解的，对于要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实在是一种基本的、十分严重的缺陷。因为在

一个民主国家中，全国性的领袖必不能仅限于一人。所以我们看，在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党魁，工党有工党的党魁，两个党魁在个人的才能上容有高下之分，而在国家的活动中，都能保持独立的地位，所以一旦邱吉尔内阁垮台，艾德礼也一样能起而组阁，掌握国家的大舵。在美国，现在正忙大选，我们看，共和党、民主党、第三党，都各拥有全国性的领袖，一旦事势需要，均可起而执政。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领袖，或者只容许产生一个领袖，这种国家绝不够条件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现在蒋主席已当选为总统，我们希望以后政府当局，能多替国家培养几个政治领袖，特别是反对派的领袖。

第三，纯粹从政治制度着眼。这次我们选举总统，是很滑稽的。我用“滑稽”两字是因为我想不出其他任何更适当的字眼。总统选举法里虽然规定可以自由签署提名，实际上那是给无党派独立人士一种机会，以便没有党籍的独立人士亦可竞选总统。至于政党方面，按照各国通例，其候选人仍应由政党提出。这次国民党没有提总统候选人，由签署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也没有发表竞选演说，这些已是出乎常例，而最妙的，国民党内竟然有两个人出来竞选总统。这算什么一回事呢？我们学政治学的人简直没有法子解释。而尤其妙的，居正最初表示竞选总统，其后又说不要竞选了。不竞选，且罢了，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余不揣庸朽，偶听朋友劝告，出面竞选总统。嗣经记者围绕，率作片面谈话，虽曰吹笙引凤，识者已窃笑矣。兹幸经本党全会深切研究，郑重决议，一致恳请总裁出而应选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舆论既有所归，说论终于一是，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再不作竞选言说，以淆视听”。读了这个声明，简直使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居氏身为司法院院长多年，总统之选，何等郑重，而忽竟忽不竞，真是使人迷惑，而



结果呢，读者也许不免要捧腹大笑，因为居氏仍旧是竞选了！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即今日政治上的人物，是如何的随便！政治如此，安得不使今日一般青年对于政府失望！

第四，这次参加国大的政党，除国民党以外，还有青年党和民社党。这两个党这次都没人参加竞选总统，这也是奇怪的事情。组织政党的目的何在？曰，希望掌握政权俾可实现本党的政策耳。竞选总统，本党不提候选人，而却去支持他党的领袖，政党史上，事不多见。去年四月，国、民、青三党共同执政，共同拥戴蒋主席，是犹可说，现在行宪，三党各自独立，法理上的立场已变，那还能承袭三党共同执政时代的作风？曾琦还要发表声明，说什么总统要具五个基本标准，五个附带条件，真可谓“其臭不可闻也”。假如这批臭虫都赶不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请问中国的政治哪有清明进步的一天？

### 三、副总统问题

第一，关于副总统，国民党一党有四位候选人，其不合理，正如国民党一党有二人竞选总统一样，已详前论，此外不赘。严格言之，国民党应当只提一个人出来竞选副总统，现在搁起不管，听他们去自由竞争，无非顾全事实。由此可见，今日中国的政治，一切还是以顾全事实为主，以顾全制度为次。在这种政治作风之下，还谈得上什么实行“宪政”！

第二，关于选举副总统，在国大代表之间，我们最容易听到的一种论调是：“糟糕，这几位候选人都是朋友，叫我到底选了哪一个好呢？”我们愿意告诉代表诸君：“你们错了！人民选举你们，是委托你们，要你们替他们挑选一个最好的副总统，你们不应当从‘朋友交情’的观点来作投票取舍的标准。你们这种话，初听好像没有什么，细加研究，就十分严重，因

为这牵涉到你们对于‘代表’职责有无基本的认识了。”

#### 四、宪法问题

第一，国大一开，就有许多代表要求修改宪法。宪法不应修改，此处不谈。而会场上所以闹得如此一团糟，归根结底，还是吃了宪法一百七十四条的漏洞的亏，宪法一百七十四条文云：

宪法之修改，应依下列程序之一为之：

一、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之提议，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四分之三之决议，得修改之。

二、由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得特拟定宪法修正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

此项宪法修正案，应于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之。

上文第二款，立法院依法议决之修宪案，应于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半年公告之，这是十分合理的。其目的在使国人注意，有充分讨论之时间，并使国大代表及政府当局都能明白一般舆论的背向。但是同条第一款为什么不作同样的规定呢？这是一个漏洞。宪法是国家大法，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机会表示意见。由二三千个代表一下子便就可随便修改宪法，这是很危险的。假如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也规定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所提议的修宪案，应于国大召开前半年公布，至少这次国大召开后，便不致因修宪问题弄得“满屋皆嘘”了！

第二，政协时代，按照张君勱的主张，将四权散布于人民，人民直接行使四权，是谓国民大会，即所谓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之国大。其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国民党与非国民党终于妥协，保持国民大会之形式，而削减其权

力，使其职权仅限于（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修改宪法；（四）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这次国大召开，总统副总统尚未选出，第二款“罢免”一项自然谈不到；新的立法院尚未成立，第四款复决立法院的修宪案也谈不到；宪法尚未实行，利弊得失尚不可知，一般意见都不主修改，所以真正的任务，乃在选举总统副总统；除了选举总统副总统外并无其他权力。但国大代表，不甘寂寞，一开会就要求讨论国事，听取施政报告。从法理的立场言之，凡此皆与宪法规定不合，在宪法的条文中，国大代表并无此种权力。政府当局宣称，此次召开国大，即为行宪之始，而不料国大一开，国大代表本身即做了破坏宪法的行为，同时政府居然接受国大代表的要求，各部会首长一一到会报告施政，亦即不啻政府也跟在国大代表的后面，从事破坏宪法。所以这次的国民大会，在政府的原意，也许视之为行宪之始，而事实上，这次的国民大会，却变成了毁宪之始，国大代表和政府步伐一致，领导毁宪，这一点是使一切爱护宪法的公民，都引为遗憾的。

第三，国大代表要求修改宪法，主要的动机是认为国大的职权太小，要设法增加国大的权力。就人情言，他们这种心理我们是极能了解的。可惜国大代表忘了一件事，即他们只站在“国大代表”的角度看国大，而没有从整个的国家制度看国大。为欧美民主国家上下议院所有的种种职务和权力，在现行宪法上，已分由监察立法两院行使，无需再半空中杀出一个国民大会来分权。这个国民大会在现行宪法中，本来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为什么有这个组织呢？最初因为中山先生的遗教中，有“国民大会”这一名目。张君勱主张人民直接行使四权即之为，称“国民大会”，其实，人民行使四权，就是人民行使四权，

直截了当，还叫什么国民大会不国民大会？这无非是为了顾到国民党的面子，保存了中山先生的“国民大会”这一名称。后来因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对，故仍使国民大会变为有形，而改变了它的职权。这就是现在“国民大会”的来历。现在许多人，包括国民党和政府里的许多开明分子，想来想去，还是张君勱的办法高明，即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认为国民大会是不需要的。这次国大代表的选举，已在宪法颁布之后，既然竞选国大代表，理应当对于国大代表的权力，有一了解。假如认为国大代表的权力太小，太空，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则当初为什么不不去竞选立委，而却竞选国大代表？在国家的整个制度中，国民大会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不站在国家整个制度的角度来看，却仅仅站在自身权力的角度来看，闹着要增加国大职权，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合理的。

第四，国大通过了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理由是现在是一个“戡乱”时期，应当给与总统以非常的权力。我们对于这种理论，不敢苟同，理由如下：（一）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算不算是宪法的一部分呢？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宪法一部分（四月十九日王世杰在国民大会上解释，谓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一种宪法的补充条文，既称为宪法的补充条文，当然也就构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则我们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个根本大法理应笼罩到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平时的一切统治的原则，决不能说，这个宪法，平时可行，战时不可行。美国在最近三十年中，两次参加世界大战，我们也没有看到一到战时，美国宪法就要增加补充条文，授总统以特殊的权力。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是宪法的一部分，则为什么要由国民大会来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欧

美各国在非常时期，虽亦有授权行政首领以若干特权，但此种权力，均由立法机关所赋予，国民大会非立法机关，由国民大会来授权行政首领，于制不合。（二）目前政府已把共产党称为“共匪”，动员戡乱。我们现在即从政府的立场来说，则我们认为，政府出兵清剿“共匪”，和政府派一团兵到太湖去剿匪，在性质（Nature）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匪”的数目的多或少，“匪”的组织的松或严，至于政府出兵剿“匪”这一行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假如今日政府打“共匪”，要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非常之权，则岂不是将来政府要派兵到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去围剿湖匪时，也须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大权吗？要是这样，则我们的国家也就永远没有回复到平时的可能，我们的宪政也永远不能走上正轨了。所以就纯粹的法理立场，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理不通。（三）中国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来推动，使这个国家进入于法治境界。要讲法治，即须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不是制度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权，假如我们随随便便，今天一个特殊条款，明天一个特种法律，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不能达到法治的境界。所以在任何理由之下，我们认为国民大会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都和宪政的精神不符。

四月二十一日

（1948年4月24日《观察》杂志第四卷第九期）

## 第二个闻一多事件 万万制造不得

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九十人的来函，已刊本期投书栏。编者另接北大一学生来函，内云：“目前的情势愈来愈严重，陈雪屏吴铸人一再扬言学运由共党操纵，并竭力分散师生之间的团结，煽动学生与难民之间的仇恨。吴铸人并公开警告出席学生集会的三教授（指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先生）。这虽是恫吓性质，亦未始不可能造成闻一多事件之重演。”这个学生又说：“各种事实的教训，已充分证明：要在现政府下改革，只是一个幻想。”

这一年来国内的情形变化相当大。军事上的变化和经济上的变化是大家看得到觉得出的，大家看不到觉不出的是一般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情绪上的变化。去年五月六日，南北各地都沉沦在排山倒海的学潮之中，那时参政会正在南京开会，一部分参政员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希望促成国共之间的和谈。一般社会，包括学生在内，亦都衷心希望和谈恢复。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害，大家都是为国家着想。其后参政会开会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使人悲观，极端分子在会场中占着

压倒的优势。那时我们就接到北平方面的来信，说这是大家（包括教授和学生）对和平最后一次的呼吁，这个阶段一过，学生的情绪可能要转入另外一个更积极的阶段了。去年七月作者在北平耽了三个多星期，听说许多学生都“走”了！其中甚至有快要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丢开一切，头也不回一回地走了！他们觉得在“这一个”区域里耽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已不愿再将精力和时间浪费在那种毫无实际效果的呼喊上，他们决定去做一点更实际的工作，做一点更有效的工作。当一些朋友谈到这些情形时，一方面在心底里佩服这些青年有勇气，有决心，一方面都叹息当前的环境竟把青年逼成这个样子。有一位先生恋恋地说：“走的都是最优秀的！走的都是最优秀的！”

这一年来，就学生一部分说，最触目的现象，是学生与政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敌视的程度越来越深。在政府一方面，只要学生一有什么活动，就恶意相视，咬定他们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在学生一方面呢，则对于政府，已老老实实，直截了当，指这个政府是一个反动的政府。政府和学生，实际上已俨然成为敌人。为什么会弄到这个样子呢？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实在使人太失望了。作者对于国民党二十年来的执政有一个一贯的看法，用一句话来点穿：即政府什么都不管，只管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他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条铁路或筑一条公路，那就因为这条铁路公路可以给他运兵；假如政府要兴建一个广泛的电话网，那就因为这个电话网可以加强他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财政制度上有什么更张，那就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多征一点税，多弄一点钱；假如政府颁布一个新的法律，那就因为这个法律可以防止人民若干活动，或作为政府某种行动的一种法律根据。总之，

一切都为政府自身设想；凡是和这个政权没有直接利益的事，它都没有兴趣，或者装聋作哑，或者敷衍了事，或者干脆不管。人民没有饭吃，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衣穿，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房子住，他管吗？他不管。政府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政府只管束穷人，不管束富人。在重庆时代，威尔基·华莱士要来了，就实行清街，一切没有饭吃的穷人都在被清之列，以免有碍观瞻；国大开幕了，下关和浦口的难民都被驱逐出去，以致发生蚌埠的抢案。大家痛恨豪门，要求动用他们在国外的财产，可是政府不敢碰一碰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大家要求实行民生主义，使耕者能有其田，可是政府没有决心，不敢有损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统治怎能叫人拥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没有一件事使人看了顺眼，没有一件事使人听了高兴。一切公共的舆论都不能改变政府的作为，官做他的官，党办他的党，脸皮老老，肚皮饱饱，这叫人怎能服气！不仅一般青年学生越来越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据我们所了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的在转向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政府“不望”（不再存什么希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的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利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这一种变化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变化，然而却是一种重大的变化。这一种变化，决不是基于任何个人的利害而发生的，这是一种客观的环境所促成的。而且，我们还应该说，这种变化正在“时间”的推进中加速其程度。本刊四卷七期刊有一篇读者投书，说：“北方情形已成等待局面，倒过来了！一般空气很紧张，但在



表面上却很平静。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似的。”这最后的一句，极堪玩味。据我们所能感觉到的，现在北方一般青年的心情，都在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为什么大家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就因为今天我们所见所闻，不满意的事情太多了，社会上各种恶势力、恶习惯的根基实在太深了，这使我们简直不敢希望在这个现状下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改革过来。最近国内一般言论界，大都非常消沉，这消沉是一种可怕的消沉，这转向也是一种严重的转向，可惜政府不努力去了解这种消沉，不在根本上设法挽救人心的转向，而仍然走着老路，一味的想以强力去压伏人心！

在这一个无声的变化中，惟一可以觉察到的，就是学生的态度。在这一年中，学生运动有几个引人注意的特征：第一，学生已经成为了人民利益的发言人。综观年来学生运动所争取的，归纳之不外两点，一是人人要有饭吃，能够活下去，这就是他们所喊的“反饥饿”；一是人人应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不能无故遭受迫害，这就是他们所喊的“反迫害”。他们所争取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他们自身的权利，他们的呼喊业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第二，在学生运动的技术上，他们业已到达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是他们所常常歌唱的“团结就是力量”。他们的团结程度，确为前所未见。政治是有物理性的，压迫愈大，反抗亦愈大，他们的如此团结亦可反证当局压迫的厉害。不仅是一校一地团结，他们业已做到了全国团结的程度——至少在精神上，他们的团结是全国性的。所以一校出了事，他校立刻响应，几个学校宣布“联防”；一地出了事，别地方的学生立刻响应，呼吁、控诉、捐款、全力支持。第三，勇敢，坚定，他们完全成熟。他们在对现实的分析，理想的追求，办事的能力，奋斗的精神上，均已表现出惊人的成就；他

们已隐然成为一个推动时代的巨轮。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政府如何对付学生呢？据我们的观察，政府对于学生已怀有一种超出常态的恐惧心理，因之政府对于学生的态度，完全陷入一种变态的状态之中。政府业已有一种牢不可拔的成见，认为学生的一切具有政治性的行动，都是受共产党利用的。在这一个大前提下，于是政府对于一切“闹事”的学生，完全不把他们当“学生”看待。我们看，这一年来，只要学生有什么公共集会，政府便是出动大批军警，架起机枪，如临大敌。上海（同济）的案子，成都的案子，北平的案子，政府用刺刀、枪柄、麻绳、木棍、石子、机枪、马队、飞行堡垒来对付学生，造成极度紧张的气氛，引起社会极度的不安，发生令人难以相信的残暴行为。学生无论闹得如何凶，讲到后来，学生总还是徒手的。以有武器的军警来对付没有武器的学生，无论如何总是残忍的。成都的警察甚至用刺刀在女学生的阴户里拌搅一下（见本刊上期成都通信），实在凄绝人寰。只要一个政府稍为有一点人道的精神，我们相信绝不致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去对付学生。

我们认为政府遇到学生有所抗议时，应当很冷静地考虑学生的抗议有无理由。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句话都是对的，或者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他们希望人人能活得下去，难道我们可以说他们错吗？他们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难道我们能够说他们做得过分吗？他们不满意这个政府，难道这个政府是能使人满意的吗？今日政府所要做的，所应当做的，不是防范学生，不是压迫学生，不是打击学生，而是自己反省，自己改革。政府应当自问，你

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可以使人民满意，如其不能，人民当然有权利表示反对。这是现代政治潮流中的不移之论，没有什么稀奇。假如政府希望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应当多听一些人民的意见，多做一些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尽量减少人民的苦痛，增加人民的福利。政府果能如此，还有什么人要反对政府？就是有少数被野心家利用的学生，要闹也是闹不起来的。

这次北平和成都两地所发生的暴行，实在使我们难于缄默。而据北平来信，似乎第二个“闻一多事件”正在制造之中。我们认为这种事件，即使替政府着想，也是万万再发生不得的。政府希望安定，但是政府难道觉得今天的局面还不够动荡吗？政府今日的处境还不够危急吗？政府已经做了许多错事，远者不论，即以近事而论，国代和立委的选举，都增加了政府及国民党自身的离心力量，这次副总统选举，又发生了这样大的风波，这事的后果目前还没有露骨表现出来。假如什么地方还要再发生类似闻一多的案件，我们敢说立刻要闹出大乱子来。我们希望政府及各地地方当局，能够审慎处置，不要躁切用事。闯祸容易，收拾乱子就难了。

四月二十七日

(1948年5月1日《观察》杂志第四卷第十期)

## 评翁文灏内阁

从五月二十日总统就职的一天算起，经过十天以上的时间，到五月三十一日，所谓“行宪首届行政院”的组织工作，才告完成。我们仅就此事发表评论如下：

一、在这次行政院的组织过程中，这个过程本身，饶有政治教育作用。如众所知，这次行政院院长一席，总统本来属意张群，其次则属意何应钦。张何都谦辞不就，才邀翁文灏出长政院。在过去，我们看到外国一些国家（最好的例子是法国），总统邀张三组阁，张三辞谢，邀李四组阁，李四辞谢，或者一个奉命组阁的大臣，邀此人入阁，此人辞谢，邀那人入阁，那人辞谢，心中十分罕纳。因为在中国，照过去大家所看到的，只见你抢我夺，惟恐做不到大官，那有请他做大官而居然不做的道理？这次请张群做，张群不做，请何应钦做，何应钦也辞谢不就；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说是新鲜的事情。张群何应钦为什么辞谢不就，原因很多，此处不暇详论；我们在此处至少有一点可以说的，即张何两人都觉得这个行政院院长，不容易做，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就不敢随便受命，这点极为重

要。所以这次张何的坚辞不出，至少使一切热衷仕途的人物，或者我们应当更广泛一点说，使一切人民，认识一点，即做官要负责任。调子高一点说，做官要对国家负责任，调子低一点说，做官也得至少对自己的声名前途负点责任。没有把握做好，干脆还是不做。对于国家政治而言，这是一种新风气，这是一种新教育。同时，十余年来，中国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当然是蒋先生。想做大官的人，最后一关都得要获得蒋先生的同意；蒋先生要派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在通常情形之下，也很少有人辞职不就的。但是，这次希望张群蝉联，张群却坚辞不就，请何应钦出长，何应钦也表示万难胜任，弄得这个行政院院长，一天两天三天的过去，始终提不出人来。对蒋先生言，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经验。

二、我们在这次行政院的组织过程中，看到中国的政治，毕竟还落后得很多。总统虽然是五月二十日就职的，但是总统的选出却为四月二十日之事。新总统产生后，旧的行政院即提出总辞。按照欧洲各国常情，新阁应该在一两天之内组织完成。假如在时局特别动荡的时候，新阁甚至希望能在数小时之内组成，使国家的神经中枢不致因政潮的波动而中断太久，俾可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我们的新总统和过去的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是一个人，按照正常情形，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应于总统就职的当天或第二天，由总统咨文立法院，请求同意。这次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直到总统就职后的第五天（五月二十四日）才提出来，这种情形假如发生在外国，早已构成为极度严重的政治危机了。不仅如此，院长人选的提出，既已如此迟慢，而翁文灏院长的组阁工作，竟达一周之久，亦属少见。而且这次翁氏的组阁情形，与欧洲一般内阁制国家的组阁情形，很不相同。在外国，我们以法国为例，总统授命某人组阁，此

一拜命组阁之大员，必须在数小时或十数小时之内，决定他的“内阁”组得成或组不成，以便向总统复命。假如组得成，他当然是首相，假如组不成，他便必须辞谢，由总统另邀他人组阁。所以此人是不是首相，还要看他的组阁工作顺利不顺利而定。这次翁氏出长行政院，是先做“定”了行政院院长，然后再进行组阁的工作，这是和外国一般情形不同的。

三、因为张何不干，结果跳出了一个翁文灏，这在一般人说来，是出了冷门。就一般观感而言，翁氏出长政院，要比张何出长政院，情形好些。现在一般人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八面玲珑、遇事敷衍的官僚。官僚最不愿意得罪人，但是怕得罪人就干不出什么事情来，大家总觉得张群圆道有余，劲道不足，所以不一定希望他再做下去，希望愿意做一点事情的人上台做一下。何应钦本人的性情，尚称平和，但他是一个军人，中国人现在都不愿军人过问行政，所以何应钦出长行政院，一般人也就不欢迎。翁文灏的廉洁，是没有问题的，他过去的作风，亦比较朴实。由这样一个人来试试，就事论事，在现局面下，还不失为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不过这次翁氏组阁，不仅没有引用新人，而且完全是旧瓶旧酒；除了副院长顾孟余和秘书长李惟果两位有重量的新人外，其余几乎全是原班人马，这点实在使大家失望。我们并不是说，在翁氏所发表的这一个名单之中，完全没有清廉自守、饱学有识之士，但是这里面也不见得个个都有良好的政绩，能孚国人之望。不管人民对于政府的观感如何，至少政府自己总应当利用这一个时机，调整人事，使人耳目一新。大家都希望有新人出现，并希望新人越多越好，因为大家对于当前这个局面实在厌倦灰心，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可是搞了十天，结果还是这样一个名单。是不是没有新人可用呢，还是现在这一付班底就是最好的班底了呢？我

们对于这事，简直弄不明白。我们甚至不能了解翁氏这次出长行政院的目的是究竟何在！我们看这个名单，哪儿有一点“翁文灏内阁”的味道？不仅人是旧人，最妙的是大都蝉联原有的部会，这样一种组阁，可说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个性（Character）的组阁，或者我们也可说，这个内阁，就是一个没有张群的张群内阁。为什么翁文灏上台，而带领的仍然是一个张群内阁呢？一个新的内阁总理上台，带领的竟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旧内阁，我们很少听说过。组了一个星期的阁，到头还是这样一个名单，真是怪事。

四、关于行政院院长成败的问题，我们一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任何人来做行政院院长也都是没有办法的；谁上台就谁倒霉，谁来做就谁牺牲。现在分两层来说。第一，我们认为，除非行政院院长有左右大局的权利，否则他就没有办法来打开当前的局面。在理论上，行政院院长在国家的制度里，是一个负有极大责任的人，也就是说，执有极大权利的人，但是实际上，他到底有多少权利呢？现在政府要打共产党，要打共产党，自然就非得用军事，在外国，首相对于军事的得失是负全部责任的，而在中国，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对军事方面有权利过问吗？没有。假如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打垮共产党，为了爱惜国家的元气，解除人民的痛苦，就应当和共产党和谈，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今天做行政院院长的，有这个魄力使这个战的局面变成为和的局面吗？不像。假如真正要实行宪政，最起码的条件就得使宪法上面所规定的各种基本民权，获得有效的保障，但事实上，人民究竟有无真正的人身、居住、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的自由，其权操于党部及特务之手，行政院院长有办法把这种权力从党部和特务的手里转移过来吗？没有办法。行政院院长是一个政务官，而且是政

务官的头儿，然而事实上，中国的行政院长常常只是一个事务官。他所能有的权力，远比他所应有的权力为小，他所能做的事情，远比他所应做的事情为少。假如一个行政院长，他没有权力来决定整个的局面，他怎能有力量来维持这一个局面，或者打开这个局面？第二，我们认为，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要建设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值低落，物价日涨，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的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到全盘的改革。战火不停，政府只能消极地东拉西扯，剜肉补疮，谈不到根本建设。建国，建国，哪里会在烽火中建起国来！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但是由于前面所述，行政院既没有决定大局的力量，他有什么办法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既没有力量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有什么办法来稳定物价着手建设？现在的行政院长只是一个账房先生，他充其量只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零用中，撙节一点，他有什么权力可以使这个破落的门户变为一门昌盛的人家。翁氏出长政院后，做事情也许可以认真一点，一切中国官场的虚文俗套也许可以减少一点，整个的行政情绪也许可以提高一点。但是要希望翁氏来转捩乾坤、改变一个局面，那假如不是一种幻想，就是一种奢望了。

五、事实的分析是令人悲观的。但是就国家的前途看，我们今日有一点事所能做所应做的，就是我们应当使一个行政院



院长是一个行政院长。这就是说，行政院长应有其独立的政策。就行政院长和总统的关系言，应当是总统支持行政院院长的政策，而非行政院长执行总统的政策，就行政院长和立法院的关系言，按照宪法，行政院长应对立法院负责，但行政院长仍然可以在“坚持自己的政策”和“辞职”之间选一条路走，自己的政策不为立法院同意时，即挂冠而去。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上台又下台，两个上台又下台，政策才有改变的可能，局面才有打开的希望。行政院长固然要努力赢取总统的信任和立法院的支持，但行政院长最要紧的是要知道人心的向背，得到民间舆论的拥戴。假如前前后后的行政院长都能有这种作风，合则留，不合即去；则即使总统的意志和立法院的意见，不与人民的要求符合，迟早也会迫使他们跟上民间的公意的。整个的局势和人心业已动荡到了极点，我们当然希望内阁能够稳定。但是希望内阁不要和人民脱节，较之无条件的企求内阁的稳定，尤为重要。翁氏出长政院，一般说来，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当然希望翁氏多少有一点成就，但是假如翁氏失败了，我们也不一定就认为是翁氏个人的失败。大势如此，这已不是翁氏等一两人所能撑支得了的了。

六月二日 中山医院

(1948年6月5日《观察》杂志第四卷第十五期)

## 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而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

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分子，群策群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己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而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则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于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于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于消灭，尤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言英国，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诋，以求工党政府之垮

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邱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人杜威华莱士于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称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折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茅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拖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个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就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地想想，你们过去所作所为，对于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作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谓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今日政府又是一个建设性的政府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

发为建设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实行吗？我们一贯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住，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一一见之于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并誉为一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八阅月矣，政府果会采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福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惧乎民间舆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缔一切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效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了！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1948年7月17日《观察》杂志第四卷第二十期)

## 一场烂污

在全国空前骚动、朝野争议多日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他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限价政策！这是二十年来这一个政府第一次在人民面前低头的一个纪录！在这二十年中，这一个政府，凭借他的武力，凭借他的组织，凭借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的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终于屈服了一次！

过去一个月真像是一场恶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丧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更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着的土地。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像大洋上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抢购是一种“无言的反叛”。这是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压迫、

欺骗、剥削，在种种一言难尽的苦痛经验中所自发的一种求生自卫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自发的，所以这种行为能同时发生在政府统治区域中的大小各地；因为这个风暴已是全国性的，所以这个风暴已经威胁到政府政权的安全。中国的人民是可怜的，在政府种种秘密的监视下不能有什么大规模的组织，因之也不能发生任何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有效力量。这次的全民抢购，骨子里的意思是人民不相信这个政府，然而可怜的久在淫威之下的中国老百姓从来不能正面站起来对政策表示不信任；全民抢购从政治的观点来说也只是一种人民不和政府合作的消极反叛。然而只要是真正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即使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或者如我前面所用的一个名词，“无言的反叛”，但也足够震撼政府的命脉。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崭新的教训。

“纸币”本来只是一张纸，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都系于发行这个纸币的政府的信用。有一个“市民”曾在上海各大报纸登载大幅的广告，质问一般市民：为什么美国人民有了美钞不去抢购呢？为什么英国人民有了英镑不去抢购呢？为什么中国人民拿了金圆券就要去抢购呢？这问题真是问得漂亮！可是我们反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人在以前（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有了美钞英镑并不一定要去抢购物资呢？为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英国人有了中国的金圆券，也一样地要把它用掉，不要放在手里呢？稍稍一想，这里面自有道理。严格地说来，要以改革币制来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幻想。发行法币的是这个政府，发行金圆券的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币的信用既然不能维护，难道金圆券的信用就能维持了吗？有人认为这次的改革币制和最近的放弃限价，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老实说，无非因为当前的经



济情景实在太不像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暂时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抢购，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弃限价。这一切，说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而在改革币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将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钞，一律兑成金圆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转几转，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们在敌伪时期所经过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没有弄到连饭都没有吃，连买大便纸也要排队的程度；日本人逼得更紧，也没有把民间的金银收完——就靠这点元气，胜利后各地慢慢恢复各种小工商业的活动，现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个吃亏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咒诅，有一肚皮眼泪说不出来！

七十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七十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良善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圆券已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对折了！惨啊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1948年11月6日《观察》杂志第五卷第十一期)

## 政治失常

最近政府有几件事情做得实在不成体统。第一件我们要说的当然是十一月十一日行政院通过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政府在八一九发行金圆券时，规定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二百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四元，这次的修正办法改为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一千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二十元，将金圆券贬值了五分之四。政府在发行金圆券时，大唱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调子，并且说谁破坏了金圆券，谁就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现在我们看政府自己率先破坏了金圆券，政府自己率先就做了国家民族的敌人！当十月杪十一月初全国骚动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当局宣布即将有“更好”的办法颁布，所谓“更好”的办法，大概就是那个金圆券发行的修正办法了，其中决定将民间缴兑的金钞吐还出来，以便取之于民，仍用之于民。然而吃进去的时候，黄金一两只兑金圆券二百元，美金一元只兑金圆券四元，现在吐出来时，黄金一两却要金圆券一千元，美金一元却要金圆券二十元，一“取”一“用”之间，赚上了五倍，这笔没本钱的买卖真不坏。抗战末期，政府财政困难，宣

传黄金储蓄，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到真要支付黄金时，却来了一个六折，凭空扣去四成；这事大家当还记得。现在旧戏新编，又要一手。多年以来，政府把人民当着一团米粉，捏在手里，要圆就圆，要扁就扁。良善的老百姓，一再吃亏，心里恨透，可是没有办法。再说八一九政府的经改办法，规定人民所存金银外币，一律须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愈限而未兑者，即视为触犯刑法，现在又允许人民持有金钞，并将金钞的价值，提升五倍，以前服从法令的，信任政府的，都算倒了霉，不服从法令的，不信任政府的，反而大大占了便宜。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不啻叫人民以后不要再相信政府。事实也一再证明：相信政府的最初总是给政府利用了一下，以后就给政府扔下不理睬了。修正办法第十一条又说：“凡以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指定之银行，存期满一年者，除照章计息外，并得于存款时以与存款同额之金圆券向存款银行兑换金圆。在金圆未铸成前，得按规定比例兑取黄金或银币。……”一年之后的情形如何，谁都不敢说定，而一年以后的金圆券贬值到什么地步，尤其不能想像，假如今天真还有人到中央银行去定期存款，此人殆为白痴无疑。所以这条条文，撕破了脸皮来说，就等于要花两千元金圆才能兑到一两黄金；这叫做明吃一半，暗吃一半，真是算盘精极！

第二件我们要说的是翁文灏内阁的辞职问题。这件事也出乎常情之外。我在十一月三日写了一篇论翁阁辞职的文章，可是四日中英文日夜报一律报导，翁阁坚辞，并已不到政院办公，翁阁的总辞书也已全体盖章，即将送府，翁氏之辞，似成定论，深恐文章刊出时，已成马后炮，所以在付印前数小时又临时抽了出来。不料我的文章刚抽了出来，翁氏却又回行政院去办公了。这次经改失败，翁氏的责任无可推诿。真正地来

说，这个大责任假如要由翁氏一人负之（财政部部长当然有责任，但财政部隶属于行政院，在政治上，政策的失败，行政院院长的责任远大于部长的责任，故此处不独立论财长的责任），有欠公道，因为拆穿了说，翁也不过是一个账房先生，既不是当家人，也做不了多大主。但就宪法的原则言，这件事总是要翁负责的。所以从政治的责任言，翁的一辞二辞三辞坚辞，都对。问题是他虽坚辞而当时竟未能坚辞到底。这次经改的失败，其性质不可谓不严重，其影响不可谓不广远，无论就个人的操守言，或就政治的责任言，翁氏绝无继续负责的可能。严格言之，就是十月三十一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有关经改的补充办法一事，亦属不当。内阁的存亡，主要就看它所执行的政策的成败，政策既败，内阁即垮。八一九的经改办法，政府亦已自承失败，在此种情形下，行政院应当立刻呈辞，任何补充或修改的办法，都应由后任来决策办理。当翁氏上台之初，胡适之先生捧场，谓翁氏有勇气。我觉得当时翁氏并不是有勇气接受那个阁揆大任，他只是没有勇气拒绝总统这个组阁大命吧了。翁氏既无勇气拒绝任命于前，亦无勇气坚决呈辞于后。不错，当前的局势是危急的，政务不宜一日无人主持，但是从宪法原则来说，这个责任是属于总统的，而非属于行政院院长的。易言之，时局既然紧急，总统便应早日另定阁揆之选，已经呈辞并且理在必去的行政院院长，不能因为总统的迟疑不决而勉力维持下去，至于总统先生，行政院院长既然有这样严重的政治责任，其辞呈应无不批准之理；因为假如这样一个有重大政治过失的行政院院长，还不使之去职，则所谓“政治责任”也者，岂不成了好听的空话？翁氏一辞再辞，总统一留再留，已足充分表示总统对翁氏信任之重，以及对僚属气度之厚，假若一味坚留，则既破坏宪政的原则，亦置纲纪于不顾，

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都是不当的。

第三件我要批评，而为一般人不注意的，就是中央所赋予傅作义的权力的问题。按照报上的记载，要点有二：一、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不须事前请示中央；二、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与中央所颁布的法令有抵触者，以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为准。凡此记载，虽未见之正式公报，但也未见政府有何否认更正，想为事实。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举例言之，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议，不得变更之”。现在假如傅氏要变更中华民国固有之疆土，则中央是否承认傅氏之变更为合法？宪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有与宪法抵触者，则是否仍以傅氏所颁布者为准？凡此都是大有问题的，退一步言之，上面的例子或许不成立，因为只说傅氏的法令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以傅氏的法令为准，并未说到与宪法抵触的情形，如与宪法抵触者，自然无效。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宪法第一百十六条明确规定“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第一百十七条说“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宪法明白规定地方法令不能与中央法令抵触，抵触者无效。假如今天中央有人主张傅氏的法令如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应以傅氏的法令为准，这种事情完全是违宪的，在正常情形下，地方法规与中央法律抵触发生疑义时，应由司法院解释之，现在假如硬性承认傅氏法令与中央法令抵触时，即以傅氏法令为主，这是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

大局越来越紧，各种现象日见失常，但失常也有一个失常的限度，当权者虽然希望保持他们的政权，但政治的常规则究竟不能不“永矢咸遵”。上述三事，都是荦荦大者，实际上，

近来当局各种措置，大都有失体统。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

(1948年11月20日《观察》杂志第五卷第十三期)